2023 年第 5 期　第 22 卷 总第 128 期

雲南大學學報

社会科学版

主　　管　云南省教育厅
主　　办　云南大学
主　　编　蒋　红
编辑出版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印　　刷　昆明瑆煜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昆明市邮政局
　　代号:64–85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代号:BM　1860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出版日期　2023 年 9 月 18 日
国内统一刊号　CN53–1176/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1–7511
地　　址　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东外环南路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敬宾楼二楼
邮政编码　650504
电　　话　(0871)65031238　65032099
电子信箱　wkxb@ynu.edu.cn
定　　价　人民币 15.00 元

刊名题字　启　功
创刊时间　2002 年 8 月 28 日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廖炼忠

副主任　蒋　红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建军　杨立华　吴增定
张国庆　陆　韧　罗　刚
段吉方　蒋　红　傅永军
廖炼忠

目　次

执行编辑/宋琴琼　　编　务/东　陆　　封面设计/吴丰虎　　英文翻译/何昌邑

■哲　学

外国哲学

005　蔡祥元　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从“视域融合”到“身心交融”

014　毛　竹　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

——康德人类学的疑难

027　陈常燊　康德与元宇宙

中国哲学

034　方　用　“条理”与空时

——张东荪对康德时空观的修正

■文学艺术

046　高　峻　改革开放以来周来祥美学中的“物性”思想之演变

■政治学

054　范　俊　空间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取向与逻辑

本刊已许可相关学术数据库出版发行机构在其所属产品及互联网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其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声明。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

062　郭台辉，乡智洋　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必然障碍及可能路径

072　杨志军，张喜东　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

■法　学

084　石佳友，刘　欢　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释论

095　吴高臣，姜　楠　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之裁量驳回制度研究

106　郑　曦，廖建灵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 社会学

117　胡仕林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业主委员会“成立难”及其化解

■国际问题

126　毕世鸿，马丹丹　海外中资企业公共外交实践的路径、成效与问题的评析

——以越南中资企业为例

■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38　阿剑波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问题与推进对策

[期刊基本参数] CN 53-1176/C * 2002 * b * A4 * 144 * zh * P * 1500 * 2000 * 14 * 2023-09

CONTENTS

005 **CAI Xiang-yuan** The Dilemma of Hegelianism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the Possible Solutions:From "the Fusion of Horiz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

016 **MAO Zhu** Universalism or Particularism? Kant's Anthropological Dilemma

027 **CHEN Chang-shen** Kant and the Metaverse

034 **FANG Yong** "Order" and Space-time: Zhang Dongsun's Revision of Kant's View of Space and Time

046 **GAO Jun** An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of "Materiality" in Zhou Laixiang's Aesthetics in the New Era

054 **FAN Jun** Spatial Community: The Orientation and Logic of the Historical-geographical Nar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062 **GUO Tai-hui & XIANG Zhi-yang** The Conceptual Interchange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evitable Obstacles and Possible Solution Approaches

072 **YANG Zhi-jun & ZHANG Xi-d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IMBY Conflicts Incurr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Unconventional Policy Change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084 **SHI Jia-you & LIU Hua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Exercise of Representative Rights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095 **WU Gao-chen & JIANG Nan** Study on the System of Discretionary Rejection in Disputes Over Revocation of Corporate Resolutions

106 **ZHENG Xi & LIAO Jian-ling** Predicaments in Training Foreign-related Talented People for Legal Affair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and Solution Approaches

117 **HU Shi-lin** Approaches to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Establishing the Realty Owners' Committe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upport Theory

126 **BI Shi-hong & MA Dan-da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Paths, Effects and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Public Diplomatic Practice of Overseas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The Case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Vietnam

138 **A Jian-bo** Implica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sty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Solution Approaches

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从“视域融合”到“身心交融”

蔡祥元

［中山大学，珠海　519082］

摘　要：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基础上，赋予时间间距以诠释的创造性价值，提出了“视域融合”的诠释学模式，以此取代并拓展了施莱尔马赫“设身处地”的方法论诠释学。时间间距的创造性价值是其本体诠释学的核心内容，它体现在过滤功能和效果历史这两个方面。但是，由于伽达默尔过于强调效果历史中的时代视域的融合，没有看到作为个体差异的“空间间距”在诠释过程中可能具有的创造性价值，使其最终走向了黑格尔主义。结合胡塞尔有关视域跟身体的内在关系的论述，我们发现赋予身体在诠释中的创造性价值，可以有效克服黑格尔主义的主体性困境。此种“身心交融”的诠释模式正是宋儒读经法的一个基本预设。

关键词：诠释学；视域；身体；时间；空间

中图分类号：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05－09

借助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本体论思想，伽达默尔对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诠释学进行了改造，凸显出时间距离在文本诠释过程的创造性价值，由此形成并构成其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立场。这一新的诠释学洞见通常表现为一种“视域融合”的诠释学模式。这一诠释学洞见赋予理解活动以创造性价值，导致了文本的开放性。但是，仔细阅读其相关论述，我们发现，其诠释学思想中隐含了某种形式的黑格尔主义，亦即一种以“时代视域”为主体的历史发展与演进过程。在这一“时代视域”的融合中，个体性的创造性洞见被掩盖了。笔者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建构为参考，通过追溯视域思想的现象学根源，揭示出视域的身体性维度，以此表明“视域融合”诠释学模式背后有一种身心交融的诠释学维度，而后者正是融入宋儒的读经法所强调的文本诠释思想。

一、“视域融合”的提出与基本内涵

为了更好勾勒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思想要义，我们以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为背景引出其思想创见。施莱尔马赫方法论诠释学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设身处地”。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需要对文本进行阐释，是因为作者和解释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彼此的生活背景差别很大，这些差别会造成我们对作者的文本产生误解。因此，诠释学就以一种如何避免误解的技艺，而“设身处地”就是施莱尔马赫用来克服此种误解的思想方法的总结，亦即通过尽可能多地掌握作者的写作背景，然后解释者把自身代入到相应的情境之中，以期获得对作者心理状态的真切把握。正如他所说的，“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

收稿日期：2023－03－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典诠释学基本文献整理与基本问题研究”（项目号：21&ZD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蔡祥元，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Gesinung）而进入作者的意识”。①

伽达默尔接受了施莱尔马赫有关主体间距的说法，也即在作者与诠释者之间存在视域差，也正如此，才需要理解。但是，他对这种“设身处地”的诠释模式提出了根本质疑。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如何重新在自己的心里去复活作者的“意识活动”，而是实现双方视域的融合。他一方面根据海德格尔的本体诠释学思想表明，这种完全抛弃自己的历史背景（“前见”或“前理解”）而进入到对方的意识活动之中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前理解正是构成我们人之为人的“实际性”所在。抛弃了自身的“实际存在”，任何理解活动都不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同样借助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历史性思想表明，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时间间距并不一定是误解的原因，相反，它倒是创造性诠释的根源。正是解释者带有自己的“前见”，使得他对文本的理解不同于作者，也因此将超出作者原有的视域。而理解活动的价值就在于实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视域融合”。这就是时间间距的创造性价值所在。“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②

根据伽达默尔的描述，时间距离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时间距离的过滤功能。根据伽达默尔的描述，时间距离主要给我们提供一种判断的尺度，让我们将积极的成见与消解的成见区分开来。可以理解，在文本或艺术作品还没有进入历史之前，我们很容易受当前现实兴趣的影响和干扰，而不能看清作品应有的历史意义。只有当它进入历史之后，时间距离可以帮助我们悬置不相关的“过度反响”，著作的意义才展现出来。因此，时间距离为我们区分误解与真理解提供了判断的尺度。③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视域融合的思想。时间距离的生产性价值直接体现在“效果历史”这一概念之中。伽达默尔以此突出历史本身的能动性以及我们跟历史的内在关系。他指出，历史对象不是站在我们对面的对象，相反，我们总已经为历史所影响、所塑造。这种影响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比我们通常设想的更为广泛深远。在这个意义上，也就不存在那种纯粹客观的历史研究（历史客观主义），因为当我们面对历史对象提出某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提出的问题本身就包含了来自历史对象对我们的先行影响。因此，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事件”。由于历史总是已经起作用，总是在起作用，伽达默尔将理解称为“效果历史事件”：“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④

“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就是伽达默尔用来描述效果历史起作用的方式的。“我们关于视域形成和视域融合的全部说明旨在描述效果历史意识的作用方式。”⑤ “视域”可以说是我们看到事物的“立足点”或背景。通过它，我们可以判断视域内的事物的“近和远、大和小”。随着视域的改变，事物的“近和远、大和小”（亦即其“意义”）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一般说来，某个历史对象的意义只有在相应的历史视域中才能呈现出来。⑥ 我们的理解活动总已经立足于某个历史视域，它给了我们去理解的出发点。要理解一个历史文本，就要置身于文本的视域之中。与施莱尔马赫不同，伽达默尔强调的“置身”不是放弃读者的历史视域，而是让我们的当下视域跟文本的历史视域发生交融，从而获得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在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⑦

立足视域融合思想，可以更好看出时间距离的创造性价值。我们当下的视域是由各种各样的前见组成的，这是我们的历史性。这些“前见”构成我们去观看的立足点。它们确实可能导致误解，但是，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它们也构成了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因为在新的视域中，历史流传物才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理解也就不再是放弃诠释者自身的“前见”并以设身处地的方式完全进入作者或文本

① ［德］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洪汉鼎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②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
③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2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5页。
⑤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38页。——中译文中“Horizon”译为“境域”，这里改译为“视域”。
⑥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7－388页。
⑦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4页。

的“视域”，而是双方视域的融合。只要理解意味着视域融合，那么这就表明，任何理解都离不开创造性诠释，也都从根子处包含了创造性诠释。

文本本身是确定的，但是随着后来读者的视域的不断融入，文本可以呈现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自然也就超越了作者，由此赋予了读者在文本诠释活动中的积极地位，让文本向未来保持开放：“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①

二、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困境

视域融合的诠释学思想赋予读者的理解活动以积极价值，带来了理解的开放性、文本的开放性。但是，它同时也可能导致理解的相对主义，因为这就意味着每个读者都有权利从自己的视域出发对文本给予自己的解释。比如，美国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赫希（E. D. Hirsch）对《真理与方法》中隐含着的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提出了批评。②

也许为了避免此种发挥，伽达默尔在进一步剖析视域融合的时候，将它归结为不同时代之间的视域融合。虽然他也提及作者与读者的视域差别，比如：“它描述了解释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一种不可消除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由他们之间的历史距离所造成的。”③ 但是，即使在这里，伽达默尔关注的是依然是解释者与原作者背后时代上的跨沟，他们之间的“历史距离”，而不是他们个体上的视域差异。在伽达默尔看来，个体视域中属于读者或作者个人的东西都是需要被克服的“偶然性”“个别性”，如此才能达到“普遍性”，因而理解过程同时也是由解释者“历史处境”所决定的，后者进一步可追溯至“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④ 伽达默尔对效果历史的强调，有助于避免理解的相对主义，一定程度上确实保证了理解的“客观性”。

但是，由于伽达默尔过于注重时代视域对个体视域的控制与超出，使得所谓的“视域融合”，最终成为历史视域自身的发展演变。这也是“效果历史”的实质内涵。历史自身会造成“效果”，从而导致历史视域的自身更迭。以这种方式，伽达默尔赋予了历史意识以某种的能动性，具有一种自身向前发展的能力。事实上，伽达默尔自己也对“视域融合”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视域融合只是一个“假象”，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两个不同的视域。⑤ 因为过去的视域就在当前视域之中，这两者之间不是相互分离的，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并且总是处于运动之中，而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视域综合体”中。

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⑥

这种能够自身运动的“视域综合体”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传统”，它是效果历史自身的存在方式。这个意义上的“传统”已经走向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了。伽达默尔也确实转向黑格尔的“实体”思想，用它来进一步刻画历史视域的存在方式。

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这种在先给定的东西，我们可以用黑格尔的术语称之为“实体”，因为它是一切主观见解和主观态度的基础，从而它也就规定和限定了在流传物的历史他在（Andersheit）中去理解流传物的一切可能性。哲学诠释学的任务可能正是从这里出发而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必须返回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道路，直至我们在一切主观性中揭示出那规定着它们的实体性。⑦

伽达默尔也多处提及黑格尔对于理解他的效果历史的重要性，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以跟随黑格尔而不是施莱尔马赫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0页。——中译文中“Text”译为“本文”，这里改译为“文本”。
② Chris Lawn, Gadamer: A Guider For The Perplexed, London: Continuum, 2006, p. 127.
③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0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0页。
⑤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0页。
⑥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0－391页。
⑦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7－388页。

为己任”，诠释学的历史才会有新的着重点。①

当然，以现象学为思想背景的伽达默尔也不会简单回到黑格尔。他也明确指出，还要注意与黑格尔的区别。他批评黑格尔历史观的关键在于，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通过历史的辩证发展可以回到自身，获得对自身的绝对把握。伽达默尔认为这种“绝对知识”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主张”。② 为了更好标示出与黑格尔的区别，伽达默尔赋予经验以“实体性”的地位，避免它在发展的过程中被扬弃，被“无视”，被透明化。

因此，我们必须从黑格尔的观点以及与黑格尔相区别的观点来规定效果历史意识的结构。③

经验的辩证运动的真正完成并不在于某种封闭的知识，而是在于那种通过经验本身所促成的对于经验的开放性。④

正如何卫平所指出的，伽达默尔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思想的同时，扬弃了“真理是全体”的哲学立场。但是，进一步研究考察伽达默尔有关经验开放性的描述，我们发现，伽达默尔又回到或诉诸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他指出，经验是通过否定的辩证运动来向前发展的。“经验通过否定而做到这一点，因此这种否定乃是一种肯定的否定。我们称这种经验为辩证的（dialektisch）。”⑤

另外，伽达默尔还从我－你关系的角度深化了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⑥ 伽达默尔确实指出，要把文本当作“你”来对待，而不是当作可以某种从属于“我”的中介或工具，以此避免文本的理解活动成为某个主体的自我独白。⑦这构成了与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另一个方面的区别。但是，即便在这里，伽达默尔依然强调，对文本问题的重构不能超出理解活动的“历史条件”，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关键在于它们归属于一个“经验共同体”。⑧ 由此可见，在理解的问答逻辑中，“传统”占据主导性地位，“我”和“你”事实上都归属于“传统”。“期待一个回答本身就已经预先假定了，提问题的从属于传统并接受传统的呼唤。这就是效果历史意识的真理。”⑨

由此我们可以说，虽然伽达默尔意识到了黑格尔的主体主义困境，也试图以人类主体经验的有限性、对话的问答逻辑等来克服它，但是在如何克服的问题上，并没有提供出关键的方案。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伽达默尔坦陈，他对传统诠释学的批判除了受海德格尔思想的推动以外，也与黑格尔那种“包罗万象的综合”密不可分。⑩ 这就表明，他接受了黑格尔思想的综合性、整体性特征。这就使得他的“传统”思想带上了某种“独断”的色彩。哈贝马斯就从政治学哲学的角度批评伽达默尔对待“传统”缺少批判精神。⑪ 伊格尔顿（Eagleton）也批评了伽达默尔思想中“传统”的独断地位：“传统拥有一种我们必须服从的权威：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对它提出批判性的挑战，也不能设想它的影响可以是坏的。”⑫

就诠释学领域而言，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倾向导致的最大问题是无法充分解释著作和读者的个体差异性。虽然每一个体的视域都具有时代的共同性，但我们也知道，即使同一个时代，每一个体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视域，也因此，同一个时代的读者，在面对同一个古代文本时，依然会发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创造性诠释。另一方面，同一个时代的著作，除了有时代共性以外，同样具备每个作者所特有的个体性特征。这种著作或作者的“个性”，这种读者的“个性”，是理解活动的关键所在。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模式对此却无法给予充分说明。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225页。
②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7页。
③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44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57页。
⑤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54页。
⑥ 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15、221页。
⑦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60页。
⑧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65页。
⑨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85页。
⑩ Hans－Georg Gadamer，*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1，p. 39.
⑪ Chris Lawn，*Gadamer：A Guider For The Perplexed*，London：Continuum，2006，p. 128.
⑫ T，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83，p. 73.

这种著作“个性”恰是施莱尔马赫方法论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洞见。他把这种著作的“个体性”或“个性”称为“风格”，并将它区别于著作的个人性（或个别性、私人性）。后者是盲目的、任意的，前者不同，它有一定的“普遍性”。

通常人们认为风格是一种语言的任意使用。表达的顽强独特性——这甚至超越了体裁所允许的差异性——并没有一种内在的源泉，而是有习惯的源泉；它不是从个体性（individuality）而是从盲目个人性（personality）中涌现出来的；它不应当称之为风格，而应当称之为矫饰主义（mannerism）。①

比如，李白、杜甫生活在同样的时代，但是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与个性。这种作品个性的差异，仅仅求诸“客观的历史进程”是无法解释的。这种风格是作品的“原始意义统一体”，通过它，或者说把握它，我们才能把握作品的个别部分。② 文本解释的关键就是如何把握此种“意义统一体”。这种统一体虽然离不开时代的“普遍性”——客观的文法知识与历史事实，但是，它更离不开作者的独特个性，是作者个人的创造性所在。狄尔泰对于施莱尔马赫论及的个体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著作的创造性个根源：“这里是一种起统一和创造性作用的能力，这种能力虽然对自己的作用和塑造毫无意识，但为作品接受了第一推动并发展这一推动。在这种能力中，感受性和自我创造性是密不可分的。个体性在这里起非常的作用，甚至直到每一个别的词都凝结着个体性。”③

另外，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倾向导致的另一个缺陷是缺少方法论意谓，因为它强调的是时代视域之间的融合，强调的是“传统”自身的发展演变，从而与个人的个体性无关，从而也就不足以指导读者如何进行创造性诠释。正如伽达默尔本人所指出的，他只关心理解的可能性条件，“从诠释学取得其活动地盘的这种中间地位可以推知，诠释学的任务根本不是要发展一种理解的程序，而是要澄清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④ 虽然从本体层面澄清理解的发生性条件很重要，但是，诠释学首先关涉的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我们不仅想知道诠释的创造性根源，更想知道如何才可能进行创造性诠释，以及如何判断诠释的好坏优劣。

因此，伽达默尔虽然克服了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心理主义困境，但是却陷入了黑格尔主义困境，失落了施莱尔马赫有关文本诠释现象的一些重要洞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回到施莱尔马赫，回到生命体验、回到心理主义立场。结合“视域融合”思想的另一个思想来源，亦即视域的身体性，将赋予视域融合以新的理解视角，为我们走出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困境提供思想契机。

三、“视域”的思想来源及其身体性之维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视域融合”中的“视域”概念就来自胡塞尔。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明确指出，从哲学层面运用“视域”概念始于尼采和胡塞尔。⑤ 视域是胡塞尔后期发生现象学的重要概念，用于阐明意向对象在实际生活经验中的构造过程。在实际生活经验中，没有一个对象会孤零零地出现，它总是处在某种背景之中。意识在把握某个对象的同时，对这个“背景”也会有某种意识。这个背景，或者说这种对背景的“意识”，就是视域。

前面已经指出，视域融合是用来描述效果历史起作用的方式的，它最终表现为历史视域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一运动着的视域构成了人类生存活动的“传统”。这种视域意义上的“传统”与胡塞尔有关生活世界作为总视域的开放性、流动性的描述如出一辙。⑥ 伽达默尔也指出了两者的思想关联。“显然，胡塞尔用这个概念——我们也将有必要使用这一概念——是试图在整体的基本连续性中捕捉一切有限的意见意向性的转化。视域不是僵死的界限，而是

① ［德］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 39 页。
② ［德］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 33 页。
③ ［德］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 87－88 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 379 页。
⑤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 388 页。
⑥ ［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黑尔德编，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256 页。

某种随同变化而继续向前移动的东西。”① 不过，伽达默尔对胡塞尔视域思想的吸收主要集中在时间意识方面，没有考察“视域”与身体性的关联。

胡塞尔的视域思想首先是在感知领域的分析中引入的。我们在感知一个空间对象的时候，只能从某个角度去看它，并且也只能看到它的某一两个侧面，而不可能同时看到一个对象的全部表面，更不可能看到同时看到它的内部结构。但是，这些未被看到的侧面并不是完全空无的，相反，它们也以“共现”（或“侧显”）的方式参与到我们对感知对象的把握之中。因此，虽然实际上我们只能看到桌子的一两个面，但我们不会仅仅把这一两个面视作桌子。那些侧显的面也暗中被我们把握为桌子的一部分。这些未被我们直接把握的方面（比如桌子的侧面或背面或内面等等）就构成了我们看某个桌子的某种视域。虽然它们不是我们直接看到的对象，但是它们直接参与我们对看到的对象的把握和领会之中。不仅桌子未被显示的侧面参与桌子的构成，桌子所处的环境（它们未直接进入视觉焦点，而边缘的方式为我们觉察）也会间接影响并参与我们对桌子的把握。胡塞尔把前者称之为内视域，后者称之为外视域。② 这样一来，现实的感知活动总是已经包括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真实的展示，一部分是视域意义上的空乏展示。感知活动总已经这两者的结合。这种空乏展示或“空乏视域”并非完全空洞的，不是完全任意的，它可以被充实，是一种“可确定的不确定性”。③

视域结构并不局限于感知领域，它还是我们经验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推广到一般的文化、艺术领域。“这首先直接适用于素朴的、感性的经验的世界，适用于纯粹的自然界。但这间接地也适用于一切尘世的东西（Weltliche），即是说也适用于作为世界主体的人类主体和动物主体，适用于文化产品、用品、艺术品等等。”④ 因此，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思想可以看作胡塞尔视域观念在文本诠释领域的一种应用。

结合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经验的视域结构跟身体有内在关系。视域首先关涉的是观看的角度，而这个角度自然是相对某个确定身体的位置而言的。没有身体，这样一种观看的角度就是不可思议的。就一个正方体自身而言，根本无所谓上下左右、前后内外之别。⑤ 另外，视域的充实与变化同样是离不开身体的运动。随着主体移动自己的身体，对象实显的部分与侧显的部分（以视域方式被暗中领会的那部分）会发生转变。与经验结构中这种显、隐的切换相伴随的是身体的运动。当我们绕到某个空间对象的后面时，这“后面”就变成了“前面”，而原来的“前面”则变成了“后面”。我们不能同时看到正方体所有的面，是因为我们有身体。因此，视域的存在及其变化都跟身体有关。身体给了我们看待对象的视角，同时也留下了看待对象的“影子”（“视域”）。视域可以看成是由于身体相对光线的不透明性造成的。在德文中，“视域”（Horizont）这个词同时也是地平线的意思，地平线是我们观看的界线，可以被看到，但无法被达到，因为随着我们的运动，地平线总会一再地被推延。⑥ 这正如我们无论跑得多快，也无法甩掉身后的影子一样。

胡塞尔认为，即使上帝想要感知这个超越世界及其中的超越事物，也必须服从这个规律（感知的视域结构）。“视域（Gesichtsfeld）不是空间，脱离视域的就不是事物，这对于人类和全能的上帝都是一样的。”⑦ 如果着眼于视域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16页。——中译文将“Horizont”译为“边缘域”，这里改译为“视域”。

②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9页。

③ ［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第48－49页。

④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49－50页。

⑤ ［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第46页。

⑥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8页。

⑦ 这里的“Gesichtsfeld”表达的意思与“Horizont”相似，都是指事物所处的背景环境，也译为“视域”。“所有的视觉外观的呈现性内容构成一个连续体：我们称之为视域（Gesichtsfeld）。该领域是一种前经验区域，它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各种确定的视觉充实物。这些视觉的前经验区域在各种场合下为在整个感知领域中出现的各种事物提供呈现的基础，……”（Husserl, Edmund, *Ding und Raum*,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73, ss. 82－83）对比倪梁康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对“Horizont”一词的说明可以看出两者的关联：“在意向体验中现时地被意指的那个‘对象’永远不会完全孤立地和封闭地、完全不确定地和未知地被经验，而是作为某个处在联系之中的东西，作为某个在环境之中和出自环境的东西而被经验到。每一个现时的我思（Cogito）都具有视域（晕、背景、感知域）。”（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216页）

跟身体的内在关联，胡塞尔这个推论可能是有问题的。除非上帝有身体，否则，上帝感知事物是不需要视域的。这可以视作上帝跟人的区别。人有身体，所以他只能从某个角度去看事物，上帝没有身体，所以他可以同时感知事物的前后左右内外，还能同时知道古往今来，否则，他就不是全知、全能了。

当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是着眼于文本理解展开的，而不是感知问题。感知经验的视域结构离不开身体，这个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一般经验的主体是否也需要一个身体呢？胡塞尔后期为了避免先验现象学走向唯我论，以及也为了说明客观性的根源，通过进一步探究先验主体的内在结构，表明先验主体本质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交互主体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先验自我内部如何构造出一个陌生主体，一个他我？胡塞尔分析表明，自我与他我（陌生主体）的构造都离不开身体。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互动，通过身体才能发生，因此，身体是各个人格自我构造起自身的一个本质环节。没有身体，交互主体的构造也是不可能的。[①] 扎哈维在研究胡塞尔交互主体思想的过程中甚至指出，感知视域的身体性结构就已经蕴涵了一种对陌生主体的指涉，亦即在我们感知一个对象的时候，不管其他人是否实际在场，在我们的视域结构中已经预设了它可以被其他主体所感知，这样超越对象的构造才是可能的。“对交互主体性的理解召唤对具身主体性的考察。交互主体性的可能性正是植根于主体性的身体构成中。”[②]

因此，如果主体性根子处就具有一个交互主体的维度，而交互主体性的构造又离不开身体，那么这就进一步表明，身体直接参与了一般主体的构成。这样一来，即使在文化领域的经验，也都将具有视域结构，也都本质性地涉入了身体。

四、从“视域融合”到“身心交融”

考虑到文本的创作以及文本的诠释都是由一个个独特的个体进行的，而这种个体自我的构造中都有身体的维度，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的视域融合中也必然涉入身体性。一旦考虑视域的身体性特征，那么，视域融合所涉及的不会仅仅只是时间距离的融合，而是必然同时涉入空间距离的交融。没有身体的运动，视域不会发生改变，同样，没有一般的“身体性”的改变，人的视域也不会发生改变。因此，真正的“视域融合”必定同时意味着“身心交融”。由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又可称本体诠释学或本体层面的诠释学，这里把以“身心交融”为模式的诠释学思想称为身体性诠释学。

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不同，身体性诠释学可以有效克服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困境。由于“身心交融”强调在诠释的过程中读者的身体性参与，而身体又具有一个“此时—此地”的特征，那么，它就能有效考虑并解释读者的个体差异性，能够说明为何在同一个时代不同的读者针对同一个经典可以作出非常不同的诠释，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身体”，他们对同一个文本有不同的“视角”。这种视角的差异是由不同读者的身体性差别造成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共有一个时代视域，但是，这一共同的时代视域在每个人那里是透过各自的“身体”显示出来的，都打上了每个读者所特有的烙印。所以，他们完全可能对同一个作品作出各自特有的创造性诠释。“身心交融”的诠释模式同样能说明作品的个性。虽然同一时代的作者具有相同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但是，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身体”以及相应的不同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经历都以“印记”的方式刻在作者的“身体”中），因此，他可以创造出带有其个人身体性特征的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性诠释学不仅吸收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时间距离的创造性思想，同时赋予了空间距离以创造性价值。不同的读者或作者首先表现为一个个处于不同空间之中的个体。从身体诠释学角度看，不仅读者与作者的时间距离有创造性价值，他们之间“空间距离”的同样会造成视域的差异，从而为诠释的创造性提供新的可能性。另外，由于身体诠释学注重读者诠释过程中的身体性参与，使得文本诠释有了下手处，对于如何进行创造性诠释给出方法论的指引，不会失落为一种泛泛的

① ［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第 162－163 页，199 页。

② ［丹］扎哈维：《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蔡文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第 207－208 页。相关讨论还可参考罗志达：《具身性与交互主体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第 149－150 页。

本体思辨。因此，它同时融合了诠释学的本体与方法的内涵。

宋儒有关如何读经的思想方法中隐含了此种身体性诠释学。我们知道，宋儒极为强调读经过程中要“切己体察”。“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朱子语类》卷十一）[①] 另外，还有“体认”“切己体验”等相似的说法。“许多道理，孔子恁地说一番，孟子恁地说一番，子思恁地说一番，都恁地悬空挂在那里。自家须自去体认，始得。”（《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长。”（《朱子语类》卷十一）

以上文本中的“己”当然首先指“自己”的“己”，好像跟身体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为了切中这个“自己”，宋儒特别强调读经过程中的身体性参与，“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味，切己省察”。（《朱子语类》卷十一）这里的“省察”也作“体察”。另外，这进一步表现在“体察”“体认”“体验”之“体”上，这里的“体”不只是观念化的领会，而是也突出身体性的参与。相关论述很多，比如：

人之为学固是欲得之于心，体之于身。（《朱子语类》卷十一）

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朱子语类》卷十一）

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劄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朱子语类》卷十一）

看文字须是打断着精彩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中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朱子语类》卷十一）

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朱子语类》卷十）

不仅在读书之初（“闭关静坐”“敛身正气”）以及在读书的过程中（“负痛在身”“一棒一条痕”需要身体性参与，最后读书之所得也得表现在身体性的感受上来。宋儒以写书法为例来展示此种身体性理解的意谓，最后理解发生的时候是一种类似写书法之人的“心手相应”，“四体不言而喻”的状态。这种“心手相应”的状态，当然不只是理解一番道理，而是对此道理还有当下的身体性之觉察。所以，朱子自然又把此种觉察跟味觉的“滋味”关联起来，表明理解的发生会带带个人某种身体性感受：

如心之得知，则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譬如学书，若未得者，须心手相须而学；苟得矣，下笔便能书，不必积学。[②]

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会不得处，深思之；又不得，然后却将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朱子语类》卷十一）

也许有人会指出，以上有关“身体”现象的描述似乎都可以看作是比喻。这当然是一种解读，文中也出现比喻性措辞，比如“若”“如”等。这一维度当然是存在的。若严格遵循文本原意，可能还是更合理的解释。但是，如果着眼于儒家思想传统中的主体性思想，这些比喻也不全然是比喻，更可以看作是孔子所谓“能近取譬”的“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篇》），后者显然不只是修辞学中的“比喻”，而是于生活的切近处获得领会“仁”的契机。宋儒读书法中的身体，纵然不直接就是人的主体性，但是它确实处于“心”的切近处。《大学》中的八条目中有一条就是“修身”，这是一条贯通儒家传统的基本原则。这里的“身”已经具有了身体主体性的维度。事实上，阳明曾经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身体”，一种是单纯的“一团血肉”，也即是通常所谓的生理性身体；一种是作为“天理之发窍”的“真己”之身：

先生曰：“真己何曾离着躯壳！恐汝连那躯壳的己也不曾为。且道汝所谓躯壳的己，岂不是耳目口鼻四肢？”

先生曰：“……汝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礼勿视、听、言、动时，岂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视听言动？须由汝心。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

① 〔宋〕《朱子语类》，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卷十一，1986年，第181页。——凡引该书者以下简注《朱子语类》卷数。

② 黄宗羲：《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61页。

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著这个真己的本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惟恐亏损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礼萌动，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针。”（王阳明《传习录》上）

阳明乃至整个儒家哲学传统中的身体—主体性维度已经为近代学人所关注。陈立胜把这一“窍”的维度突显出来，大而广之，呈现出宋儒思想中的身体存在论维度：“儒家‘通身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一种‘敞开’与‘开放’的‘主体性’，它是扎根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① 如果人的主体性根子上就是“身心一如”的，那么，宋儒读书法中涉及的诸多身体性隐喻就不只是修辞学上的隐喻了。

由此，我们把宋儒读书法中的诠释学思想称为身体性诠释学，它的基本模式是身心交融。它强调理解的发生必定同时涉及一种身体与心灵的融通现象，对文本的内容获得一种身体性的感受。考虑到“视域”本身具有一个原本的身体性维度，我们也可以说，“视域融合”内在地也包含了“身心交融”的诠释学意谓。

简言之，突显出诠释学维度中的身体性感受，可以有助于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黑格尔主义困境，克服“时代视域”或“历史主体性”对个体理解活动之创造性功能的取代，因为身体首先是个人的身体，身体感受也首先发生在个人身上。另一方面，以“身心交融”为模式的身体性诠释学一定程度上又吸收了施莱尔马赫方诠释学中提出的作品个体性的思想，但又不沦为心理主义，因为“身心交融”关涉的是每个个体自我的“时间性构成”，它里面内在地包含了向“他者”乃至向“天地万物”开放的可能性，而不会限于某一“私己”之自我的主观心理活动。这样一来，“身体性”（而不只是“传统”或“历史”）是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身体的差异性则构成了诠释的创造性与多样性的根源。着眼于身体诠释学，创造性诠释的关键不仅仅要跨域读者与文本（或作者）之间的时间间距，而且还要尽可能调动读者自己的身体性要素，激活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让它与文本的视域发生交融。因而，身体性诠释学可以比哲学诠释学更好解释诠释的创造性、开放性与多样性。当然，这并不是对哲学诠释学的简单否定，相反，它更多是对后者的吸收和推进，因为每一个读者或作者都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身体，有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包括传统，它们都“沉淀”或“活”在他的身体之中。

■责任编辑/张瑞臣

The Dilemma of Hegelianism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the Possible Solutions: From “the Fusion of Horiz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

CAI Xiang-yu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u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Heidegger's fundamental ontology, Gadamer endowed time intervals with creative value for interpretation and proposed a hermeneutic model of “fusion of horizons”, which replaced and expanded Schleiermacher's “empathizing” methodological hermeneutics. The creative value of time interval is the core content of such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filtering function and effective history. However, because Gadamer overemphasized the fusion of the time horizon in the effective history, he did not see the possible creative value of “space distance” as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which led to Hegelianism. According to Husserl's discussion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ion and body, we find that giving the body creative value in interpretation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subjectivity of Hegelianism. This interpretative mod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 is a basic premise of the method of reading classics by the Confucian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hermeneutics; horizon; body; time; space

① 陈立胜：《宋明儒学中的“身体”与“诠释”之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7页。

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

——康德人类学的疑难

毛　竹[1,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2.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长期以来，康德一直被描绘成一位纯粹的道德哲学家，平等主义、普遍主义以及世界主义构想是康德哲学最为难以撼动的成就与结论之一。但是读者在康德哲学中也发现了诸多关于非白人种族的激烈且贬损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散见于康德不同时期关于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的著作和讲稿之中。这种鲜明的反差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了康德的种族理论与其提倡的普遍主义、平等主义及其世界主义构想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本文追溯了康德散见于各个文本种关于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以及康德的文本关于人种划分的胚芽和自然禀赋理论，梳理了讨论康德种族问题的文献脉络，尤其是吉米·雅布的终结性讨论，以期揭示康德人类学的疑难。

关键词：康德的种族理论；康德的普遍主义；胚芽；自然禀赋；人种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14－13

乍一看，似乎再没有比伟大的哥尼斯堡提倡理性、道德、自由、普遍主义和永久和平的哲学家康德，离特殊主义更为遥远的了。长期以来，康德一直被描绘成一位纯粹的道德哲学家，“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是他广为流传的格言，关于普遍法则和人性准则的定言命令则要求每个人按照普遍法则的基准行事，并且人总应当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些提法奠定了康德在平等主义思想传统之中的地位。此外，世界主义构想反复出现在康德的行文之中，它是康德哲学最为难以撼动的成就与结论之一。

相对而言，读者在康德哲学中也发现了诸多关于非白人种族的激烈且贬损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散见于康德不同时期关于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的著作和讲稿之中。[①]这种鲜明的反差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揭示出了康德哲学中的某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康德关于平等主义、普遍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构想，可以视作启蒙时代最为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们恰恰可以克服特殊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甚至可以作为特殊主义的解决之道；另一方面，在科学的特殊主义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康德的时代，康德已经开始穷其一生反复讲授关于种族分类的科学知识（人类学与自然地理学课程）。难道康德在写作人类学的时候注意到了非白人种族，但在写作伦理学的时候却完全没有？这不得不让人们联想到，这位伟大哲学家似乎持有一些令人感到难以接受的特殊主义信念，正如宝琳·克莱戈尔德

收稿日期：2023－04－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斯宾诺莎《梵蒂冈抄本》编译研究”（项目号：19CZX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毛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西方哲学研究室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世界哲学》编辑部副编审。

① 康德并没有正式出版以“自然地理学”为题名的著作，他的自然地理学讲稿在其去世后的1802年由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林克（Friedrich Theodor Rink）整理出版，收录在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编辑1802年柏林出版的《康德全集》科学院版中，是一个删减修订的不完整版本（Cf. Werner Stark, 2011, “Kant's Lectures on ‘Physical Geography’: A Brief Outline of Its Origins,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1754－1805”,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Olaf Reinhardt trans.,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p. 69－70）。

(Pauline Kleingeld) 所质疑的，康德究竟是“一位不一致的普遍主义者，还是一位一致的不平等主义者”?[①] 或者罗伯特·贝纳斯康尼(Robert Bernasconi) 指出的，“康德的特殊主义如何能够与他的道德普遍主义共存?”[②]

实际上，康德关于种族的观点早在在他的时代就曾饱受批评与质疑，以至于康德自己还屡次撰文回应过这些反驳声音。正如罗伯特·贝纳斯康尼看到的，自从康德时代以来，康德就已经被视为一名不言而喻的种族概念的倡导者，[③] 然而对于我们日常亲熟的西方哲学史中关于康德哲学的正统论述而言，这些让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几乎从未得到提及，遑论详尽研究阐释康德的种族理论与其世界公民法权的信念之间的矛盾了。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特殊主义和性别政治等研究论题的兴起，康德关于种族问题的理论再次获得了研究者们的关注。无论是同情康德的研究者对于康德的辩护，还是反对康德的研究者对康德的严厉批判，康德的特殊主义理论是否得到了恰如其分的理解?他的种族理论与先验哲学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安置?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自身的立场和理解，将会给出不同的阐释进路。

一、康德对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

自 1756 年夏季开始直到 1796 年退休，康德一直在哥尼斯堡大学定期讲授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在当时是一门新学科，康德是最早讲授这个领域知识的大学教师之一)。[④] 康德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游记，教科书是其自行撰写的手稿。[⑤] 在康德已发表的著作、未发表的课程手稿，以及学生的课程笔记之中，留存着大量关于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这些评论已经成为研究者们切入康德的人类学理论的指引性文本，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整理。[⑥] 本文收录其中一部分广为研究者所引用的内容展开如下。

(一) 康德已发表著作中关于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

在 1764 年的早期著作《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康德声称“非洲的黑人天生没有超出愚蠢可笑的东西的情感”，他援引休谟的观点，称没有任何一个黑人曾经表现出过人的才能，也“不曾发现任何一个［黑］人或者在艺术上，或者在科学上，或者在其他任何一种值得赞誉的品性上表现出某种伟大的东西”；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具有根本性，看起来在心灵能力方面和肤色方面是同样巨大”。[⑦] 在全书另一处，康德赞成某位拉巴特神父的观点，主张黑人“从头到脚都黑透了，这清晰地证明了他所说的全都是蠢话”。[⑧]

1785 年《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中康德提到：“美洲人和黑人是一个在精神禀赋上低于人

① Pauline Kleingeld, 2007, “Kant's Second Thoughts on Race”,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7, p. 582.

② Robert Bernasconi, 2003, “Will the Real Kant Please Stand Up: The Challenge of Enlightenment Racism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Radical Philosophy* 117, p. 14.

③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 146 – 147.

④ Robert B. Louden, 2011, “‘The Play of Nature’: Human Beings in Kant's *Geography*”,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 139.

⑤ Robert B. Louden, 2011, “‘The Play of Nature’: Human Beings in Kant's *Geography*”,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 140.

⑥ 康德在未刊发课程手稿中讨论人类学问题的文本整理，参看：https://users.manchester.edu/facstaff/ssnaragon/kant/Notes/notesAnthropology.htm；康德在未刊发课程手稿中讨论自然地理学问题的文本整理，参看：https://users.manchester.edu/facstaff/ssnaragon/kant/Notes/notesGeography.htm，2023 年 4 月访问有效。这两部分文献中存在大量涉及种族问题的讨论，很多研究者已经整理出了这些文稿之中值得深入讨论的片段，本文转引自研究文献的康德原文，有些亦来自这些未刊发讲稿。针对如何看待康德未刊发文稿之中的大量特殊主义评论的问题，罗伯特·贝纳司康尼正确地看到，“事实上，康德没有解决在普世历史的框架内如何调和世界主义与白人优越感的问题，这意味着他给后世留下了危险的遗产。尽管康德讲稿的笔记并没有产生任何历史影响，但他至少是一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看法的清晰代言人”(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 160)。

⑦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2 卷，前批判时期著作 II (1757—1777)，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54 页。

⑧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2 卷，前批判时期著作 II (1757—1777)，第 256 页。

类其他成员的种族”。[①]

1788年的文章《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的一则脚注中，康德列举说黑人奴隶无法成为自由工人，被释放的黑人之中没有一个从事真正的工作，“毋宁说他们一旦获得自由，就放弃他们过去作为奴隶而被迫从事的一件容易的手艺……绝不是北方的气候使他们不乐意工作；因为他们如果必须在其主子的马车后面，或者于极严寒的冬夜里在剧院的冰冷入口处（在英国）等待，就毕竟宁可忍耐，也不去打谷、掘土、搬运重物等等”，[②] 这是由他们的自然禀赋所决定的。

康德进而指出，“既然他们［美洲原住民］的体质没有达到与某一种气候的完全适应，所以也可以由此看出，很难举出另一个根据，来说明为什么这个种族还深深地处在黑人本身之下，黑人毕竟在我们称之为种族差异的所有其他等级中占着最低的等级；这个种族对于沉重的劳动来说太孱弱，对于勤勉的劳动来说太漠不关心，对于一切文化来说太无能，为此毕竟身旁就有足够的榜样和鼓励”。[③] 这段广为引用的引文清晰地证实了在康德关于人种的等级秩序之中黑人种族占据了最低的等级，但美洲原住民种族似乎还位居黑人种族之下。

（二）康德未发表的课程手稿中关于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

在其他的一些康德的课程手稿中，康德明确认为美洲原住民是全部四类人种之中的最低等者。例如1802年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林克整理的《自然地理学》笔记中，康德明确写道：“人类就其最大的完善性而言在于白人种族，黄皮肤的印第安人的才能已经较小。黑人就低得多，而最低的是一部分美洲部落。”[④] 这种观点同样出现在魏尔纳·施塔克（Werner Stark）编辑的文本中：“白人人种之中具有人性最高程度的完满性。黄色印度人有点不太聪明。黑人则要低等得多，而其中最为低等的是美洲的一些人种。”[⑤]

1781至1782年人类学讲座的学生笔记记录了康德的如下观点：美洲人种因其缺乏驱动力而不能被教育，他们缺乏情感，漠不关心，而且很懒惰。相反黑人种族则情感丰沛，可以接受教育，但却只能做奴隶。印度人具有很强的被动性，可以接受最高程度的艺术教育，而不能接受科学教育，他们永远无法达到抽象概念的水平。只有“白人种族本身拥有所有的驱动力和才能”。[⑥] 这意味着康德认为白人种族具有一种绝对完满的自然特性，而康德对此则毫不讳言“人性在白人种族的种族之中是最完满的”，它构成了白人种族具有道德行动的前提，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在历史上总是用他们的武器教育和支配其他种族”。[⑦]

这些表述与罗伯特·贝纳斯康尼在多篇文章中援引的康德自己的人类学授课手稿之中的观点非常接近，这份手稿是由埃里希·阿迪克斯（Erich Adickes）编辑整理的编号为1520的笔记，其中康德声称，美洲原住民和黑人种族都无法管理自己，只能做奴隶，[⑧] “黑人可以被规训和受教育，但却永远不能真正实现文明，他们自己就陷入了野蛮”；[⑨] 白人种族“情感上

①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②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73页。

③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74－175页。

④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4－315页。

⑤ Werner Stark, 2011,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References on the Question of a Possible Hierarchy of Human ‘Races’, ‘Peoples’, or ‘Populations’ in Immanuel Kant——A Supplement”,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trans. Olaf Reinhardt,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 87.

⑥ Emmanuel Chukwudi Eze, 1997, “The Color of Reason: The Idea of ‘Race’ in Kant's Anthropology”,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Philosophy: A Critical Reader*, Emmanuel Chukwudi Eze e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p. 117－18;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 147－148.

⑦ Emmanuel Chukwudi Eze, 1997, “The Color of Reason: The Idea of ‘Race’ in Kant's Anthropology”,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Philosophy: A Critical Reader*, Emmanuel Chukwudi Eze e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 120.

⑧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 152.

⑨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 158.

的本性包含了所有驱动力（Triebfedern）、所有才能、所有文化和文明的禀赋，总是能直接接受统治。[他们是唯一总是能够向着完满性前进的人种]”。①

康德关于其他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往往伴随着黑人种族和美洲原住民种族一道出现。例如康德在1770年自然地理学的《黑塞手稿》（*MS Hesse*）中说：“（中国人）几乎和黑人一样缺乏才能。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们都没有能在科学领域出类拔萃，所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出名到人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同样，稍后写作的《辟劳手稿》（*MS Pillau*）称“因此，有一个国家（中国），既没有发明的天赋也没有对思想的洞察力”。②

这些具有明确倾向性的表述充斥在康德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著作的各个角落，让人不禁心生疑惑，康德究竟只是他的时代大多数人的偏见的代言人，还是确立他的时代的种族理论的开创者？罗伯特·贝纳斯康尼的立场是后者，他指出：“康德故意选择了他的资料来源，以便对黑人进行最不光彩的描述。”③ 众所周知，康德的资料来源是各种旅行札记，例如1788年发表的《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一文，康德采用的材料是施普伦格（Sprengel）的《论文集》第6部分。现已考证出该文章实由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写作，康德由此文章得出结论，在美洲和英国遇到的成千上万被释放的黑人，没有一个人从事人们真正说来能够称之为工作的事情。④ 然而在施普伦格的著作中，既有托宾关于黑人天生懒惰的观点，也有拉姆齐认为黑人受到的待遇越好就越努力工作的观点，康德却有意识地只选择了前者的立场。⑤

对此，罗伯特·贝纳斯康尼仍然选择了康德编号为1520的笔记，其中康德暗示了一个针对种族问题的“更险恶的解决方案”：“所有种族都将灭绝……只有白人不会。”⑥ 同样面对类似材料的查尔斯·米尔斯也做出了类似总结：“康德相信自然的种族等级制度，白人处于最高层，黑人和美洲原住民（“野蛮人”）处于底层。他将最后两个种族视为无法取得重大文化成就的天生奴隶，因此……他反对通婚，认为这会导致白人的堕落。最终他认为，这个星球会变成一片白色。”⑦

---

①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 147 – 148.

② 转引自：Werner Stark, 2011,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References on the Question of a Possible Hierarchy of Human ‘Races’, ‘Peoples’, or ‘Populations’ in Immanuel Kant——A Supplement”,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Olaf Reinhardt trans.,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 94. 以上提到的埃里希·阿迪克斯整理的笔记、《黑塞手稿》和《辟劳手稿》都指康德自然地理学课程的不同版本。康德并未出版自然地理学著作，其面貌呈现在不同的课程手稿和来自学生与旁听者的笔记之中。除前述收录在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中的自然地理学课程之外，康德将1775年的自然地理学课程讲稿交付了年轻伯爵弗里德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霍尔施坦因（Friedrich Karl Ludwig von Holstein）整理，1759年编订完成后，康德自己在该手稿页边空白处添加了旁注，这便是《霍尔施坦因手稿》（*MS Holstein*）。对康德自然地理学的早期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埃里希·阿迪克斯1911年的著作《康德自然地理学研究》（Erich Adickes, *Untersuchungen zu Kants physischer Geographie*, Tübingen: J. C. B. Mohr, 1911），阿迪克斯认为存在某个佚失的“口述文本”（Diktat – Text），它是所有文本的母本。除此之外，1770至1780年代康德讲授这门课程的面貌只能依赖于不同的学生笔记，魏尔纳·施塔克认为其中总共有27份，其中埃里希·阿迪克斯使用过22份，我们现今可见17份，有5份笔记埃里希·阿迪克斯都没有见过，有10分笔记在1945年后佚失了。此处提到的《黑塞手稿》和《辟劳手稿》就是学生的课程笔记（Cf. Werner Stark, 2011, “Kant's Lectures on ‘Physical Geography’: A Brief Outline of Its Origins,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1754 – 1805”,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Olaf Reinhardt trans.,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p. 72 – 76）。目前魏尔纳·施塔克和莱因哈特·布拉德特（Reinhard Brandt）共同整理出了《康德全集》科学院版第26卷的两卷本，上卷为“霍尔施坦因”手稿（2009年出版），下卷包括3部手稿全本和4部手稿选本（2020年出版），他将文本放在：https://www.online.uni – marburg.de/kant_old/webseitn/homepage.htm，2023年4月访问有效。但也有学者指出，该课程的学生笔记应有36份（Cf. https://users.manchester.edu/facstaff/ssnaragon/kant/Notes/notes Geography.htm）。

③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 148.

④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73页。

⑤ Cf.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 148 – 149.

⑥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 159.

⑦ Charles W. Mills, 2005, “Kant's ‘Untermenschen’”, in *Race and Racis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rew Valls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75.

二、康德的人类学

通常认为康德撰写了三篇关于人类学的论文：1775 年的《论人的不同种族》、1785 年的《人的种族的概念规定》和 1788 年的《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第一篇文章附带的目的是为了预告康德 1775 年夏季学期的自然地理学讲座，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是最初在期刊发表的独立的论文，它们是康德为了回应其种族概念受到的来自他的前学生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以及年轻的旅行作者和人类学家格奥尔格·福斯特尔（Georg Forster）的攻击而写作的。此外在 1764 年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和 1798 年的《实用人类学》中，康德也讨论了不同种族的特点，这两部著作在讨论康德种族理论的研究文献之中也偶有出现。

这些著作的时间线索贯穿康德一生，例如《实用人类学》是康德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分别在 1781 年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1784 年发表了《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1785 年发表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此外 1788 年《实践理性批判》的出版，意味着康德可能将其种族论与其批判哲学融合了起来。以此而言，康德人类学作品的写作贯穿他的哲学生涯，这门经验性学科与他的批判哲学之间的究竟关系如何？在此我们不试图展开探讨相关问题，只呈现康德在这些文章中体现的人类学的概要面貌。

在 1764 年出版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康德已经有倾向性地勾勒出了一个存在于不同人种之间的等级秩序。根据拥有（或阙如）美感和崇高感的情况，康德对不同民族的民族特性和道德品性进行了分类，据此探讨它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意味着什么。从所列举诸多民族特性来看，白人种族属于较高的范畴，非白人种族属于较低的范畴，其划分依据奠定在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气质学说和中世纪的四种体液学说的基础上。

此后，康德于 1775 年撰写了他的第一篇关于种族的科学论文，并于 1777 年修订了此文。《论人的不同种族》建立在科学观察的基础上，康德确立了如下原则：首先，“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自然类……他们都属于一个惟一的祖源”，不同人种之间“都能相互交配繁育出有生殖能力的孩子”。① 其次，只存在四个人种：白人种族，黑人种族，匈奴种族，印度或者印度斯坦种族。② 肤色（白、黑、黄、红）是其区分的外在表现。③ 第三，种族特征的差异是由胚芽和自然禀赋决定的，这些胚芽和自然禀赋预先形成并蕴藏在生殖力之中，它们可能会（或不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发展。④ 第四，不同人种的变异都包含在单一祖源之中，胚芽和自然禀赋都是由单纯自然有目的地放在第一祖源之中，以便使人类适应于所有的气候，但并不是所有种族都能够正确地发展它们。⑤

可见在其第一篇人类学论文中，康德试图解释不同肤色差异的原因，他的解释是人类物种属于同一个原初祖源（第一祖源），大自然在人类之中赋予了胚芽和自然禀赋，其发展是预先形成的，但是由于空气和阳光的影响，胚芽和自然禀赋的发展会受到气候的促进或抑制，因此有些胚芽和自然禀赋会得到发展，有些则不会，已经发生的各种变化都是预先形成的，它们也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篇文章中，康德否认了人类物种差异的偶因论、机械论或者神义论的解释，但是还没有完全采用合目的性的理由来论证它，康德只是一笔带过了这个问题。⑥

1780 年代的两篇关于种族的文章是在康德为其批判哲学奠基的时期发表的。此时康德的重要转变之一，就是强调经验观察不足以证成“种族”概念，他开始试图从哲学层面阐释种族的差异，认为只有胚芽和自然禀赋的合目的性才能解释种族差异的必然性。1785 年发表《人的种族的概念规定》的同时，康德

①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2 卷，前批判时期著作 II（1757—1777），第 442 页。

②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2 卷，前批判时期著作 II（1757—1777），第 444 页。

③ 参见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2 卷，前批判时期著作 II（1757—1777），第 446 页。

④ 参见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2 卷，前批判时期著作 II（1757—1777），第 446－448 页。

⑤ 参见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2 卷，前批判时期著作 II（1757—1777），第 448 页以下。

⑥ “相反在我们没有察觉到目的的地方引证自然的原因”［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2 卷，前批判时期著作 II（1757—1777），第 448 页］。

发表了第二篇对赫尔德的评论（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二部书评），两篇文章同月发表，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明确提到赫尔德，但其主旨很大程度上都在回应来自赫尔德的批评。文中康德强化了他之前的核心主张：肤色是区分人类种族的主要特征，因为它是唯一可以必然遗传并且永恒化的特性。种族概念建立在肤色遗传特性传递的必然性之上，“它们必然蕴涵在人类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初祖源的胚胎之中”,[①] 并且在不同的气候差别下必然遗传。

在《人的种族的概念规定》中，康德提到了某些理性的准则，他说“我认为我的准则是可靠的，完全适合自然科学中的理性应用的”,[②] 这些理性准则的运用使得康德的人类学具有了某种先天基础，普遍根据内在于合目的性之中：“一种组织中合目的的东西毕竟是我们推论到原初以这种意图被置于一个造物的本性之中的装备，而且如果这个目的只是后来才能达到的话，推论到天生的胚芽的普遍根据。”[③] 在“附释”中，康德进一步强调人类具有同一个原初祖源，其中胚芽和自然禀赋是单纯自然放置在原初祖源之中的潜能，由于不同的空气阳光等条件的作用。胚芽和自然禀赋发展分化出了不同的人种，以便其能够在不同气候的地区居住，一旦肤色这种特有的属性得到了确定，那么它就是必然恒久遗传的。康德据此认为，从对四个种族的经验性观察之中，可以反推出原初祖源中的胚芽和自然禀赋理论的正确性。[④]

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康德还没能确立原初祖源的形象（肤色）究竟是何种性状，他的结论是“甚至白人的特征，也只不过是诸般原初禀赋与其余禀赋一起能够在那种特征中发现的一种禀赋的发展罢了”。[⑤] 这种对理论而非经验事实的强调，引发了格奥尔格·福斯特尔的直接批评，福斯特尔认为人类物种的经验区分不能奠定在理论化的区分之上，他以常年旅行的经验，质疑将人种机械地依据肤色划分为“四种”的正当性。康德在1788年发表长文《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就是为了回应福斯特尔的反对意见，它也是康德撰写人类学文章之中最长的一篇。

《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开篇即诉诸目的论的论证，康德指出合目的性只能从纯然理性的原则、而非经验观察之中获得。[⑥] 同时，康德明确定义了“种族”的概念，再次主张人类物种的所有发展（甚至变异）都存在于原初禀赋的预先规定之中，这是大自然的合目的性之所在，其中不存在任何的偶然性。[⑦] 此外，原初禀赋同样地分布于所有人种之中，只是由于气候的作用，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不同种族，“而在这种作用一旦实现之后，就不再可能通过任何移置形成新的变种，这个原因只能被视为逐渐合目的地发展的、被置于祖源之中的、按照空气影响的主要差异被限制在某个数字上的原初禀赋”。[⑧] 换言之，当一个种族的特征在一个特定地区发展起来时，它们就可以适应当地的气候，而当这种特征成了永久性的时，就不能在其他地区之间进行交换。最终康德在总结中进一步捍卫了目的论原则，“一种纯粹的、实践的目的论，亦即一种道德，注定要在世界之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⑨]

可见在《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中，康德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毋宁说他只是以先验哲学的话语重塑并细化了他此前的人类学，这种学说的目的论阐释最终具有一种道德与实践的指向，其中必然存在着某些先天的原则。在康德看来，人类的四个种族都属于同一原初祖源所从出的变种，根据胚芽在不同气候作用下发展而来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种族，一旦种族形成，就稳定下来不会改变，其分布区域封闭存在一定的边界之

①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01页。
②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99页。
③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05页。
④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04页。
⑤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08页。
⑥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58–162页。
⑦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64–165页。
⑧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76页。
⑨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82页。

内。不同种族之间可以通过生育力相互联系产生混血儿，但是“自然似乎在防止融合，因为它与自然的目的，亦即特征的多样性相悖”①，尽管存在混血儿的情况，四个种族的截然区分仍然不会改变。

以此而言，康德的著述中关于白人种族（不同民族和国家）和非白人种族的评论，都是基于以上人类学的看法。在康德的人类学中，胚芽和自然禀赋的理论构想确保了人类种族同属一个原初祖源，所有种族的胚芽和自然禀赋都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原初祖源之中，其传递与遗传确保了区分不同种族之间的截然区分。乍一看，在“所有人类种族共有同一个原初祖源”这个单源论立场上，康德只是依据四种不同的肤色（作为恒久遗传的可见特性）划分了四个人种，并没有直接给出四个人种之间的高低等级秩序。然而联系本文第一节中康德在其中发表的关于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令我们不禁心生疑惑，康德的那些偏颇而激烈的看法，究竟有何依据？

罗伯特·贝纳斯康尼补充了一份康德坚定反对种族融合的证据：“康德说，大自然早已不再创造适应土壤和气候的新形式了。他还提醒人们……种族融合会使‘好的种族’退化，而且不会等比例地提升‘坏的种族’。”② 可见康德反对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认为种族融合只会拉低“好的种族”，同时也并不会给“坏的种族”带来任何益处。可是，既然原初祖源相同，四个不同人种之间又是如何以及为何区分出了好坏呢？康德似乎暗示了四个种族在发展胚芽和自然禀赋的能力上存在强弱的不同，非白人种族在此方面不如白人种族，而康德又将这种论点建立在了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基础上，作为一门科学的人类学具有某种先天的奠基。

三、问题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特殊主义和性别政治等研究论题的兴起，康德关于种族问题的理论日渐获得各领域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关于康德是否持有一种先天的种族秩序观念的讨论层出不穷。1997年，尼日利亚哲学家伊曼努尔·楚克乌迪·埃兹（Emmanuel Chukwudi Eze）探讨了康德的种族问题是如何与康德的先验哲学相结合的。在《理性的肤色：康德人类学中的“种族”概念》（*The Colour of Reason: The idea of “Race” in Kant's Anthropology*）一文中，埃兹注意到，只作为“纯粹”哲学家的康德自从1756年他到哥尼斯堡大学工作直到1797年（退休前的一年）一直不间断地讲授人类学或自然地理学课程。埃兹历数康德职业生涯中人类学的占比（72门），指出人类学课程要比逻辑学（54次）、形而上学（49次）等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生命最后阶段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正是《实用人类学》，但其材料收集准备的时间要远比三部“批判”更早。③ 埃兹据此指出，康德的特殊主义是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特殊主义，康德对人种的区分奠定了他的批判哲学的理论基础。④ 换言之，埃兹主张，康德正在将人类学作为一门普遍科学来研究，人由此将自身转变为道德的存在，这才是康德研究人类学的意义所在，康德运用他的先验哲学构想了他的种族理论，使得这种关于种族等级秩序的看法具有了先天的基础。

自从这部著作开始，研究康德种族理论的论述开始蓬勃发展，研究结论围绕康德关于种族的评论是否影响了康德哲学分成两派。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W. Mills）、罗伯特·贝纳

①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第165页。

②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 154 – 155.

③ Cf. Emmanuel Chukwudi Eze, 1997, “The Color of Reason: The Idea of ‘Race’ in Kant's Anthropology”,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Philosophy: A Critical Reader*, Emmanuel Chukwudi Eze e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p. 103 – 104；参见吉米·雅布更详尽的统计（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44）。霍莉·威尔逊指出，康德一直教授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这两门课程，这表明他认为这两门课程是必然相关的（cf. Holly L. Wilson, 2011, “The Pragmatic Use of Kant's Physical Geography Lectures”,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p. 167 – 168）。

④ Cf. Emmanuel Chukwudi Eze, 1997, “The Color of Reason: The Idea of ‘Race’ in Kant's Anthropology”,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Philosophy: A Critical Reader*, Emmanuel Chukwudi Eze e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p. 125 – 126;

斯康尼和狄勒克·胡赛因扎德甘（Dilek Huseyinzadegan）等研究者呼吁认真对待康德的种族评论，罗伯特·劳登（Robert Louden）、托马斯·伯克希尔和伯纳德·希尔（Thomas Hilland Bernard Boxill）、宝琳·克莱戈尔德等研究者则主张，康德的种族问题只是康德思想中的边缘问题，这些研究者中又有激进者和温和者，下文将分别展开他们的观点。①

罗伯特·贝纳斯康尼追随埃兹的主张，认为康德是启蒙时代以来“科学”的特殊主义的奠基人，康德超越了关于种族的经验观察，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种族理论，并且是“第一个值得称道的种族理论”的发起者。② 在2002年的文章《康德作为特殊主义不为人熟知的来源》（*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中，贝纳斯康尼明确借用了以赛亚·柏林1972年的演讲《康德作为民族主义不为人熟知的来源》（*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Nationalism*）的题目，正如以赛亚·柏林展示了康德与民族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一样，贝纳斯康尼直指康德与特殊主义之间无可分割的联系。他强调，康德从来没有反对动产奴隶制，而是对其始终保持沉默。③ 他使用了康德未发表的讲稿笔记，认为康德并不否认奴隶的存在，而是将这种奴隶理解为本质上的奴隶，因此奴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④ 此后他进一步认为，西方哲学史一直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否认康德的特殊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专家倾向于为他们研究多年的思想家做辩护。⑤ 这种存在于当代哲学中的制度性的特殊主义，使得研究者们或忽视或淡化康德的特殊主义倾向。⑥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真正的康德并不是历史中真实的写作了特殊主义言论的康德，而只是他的诸多“核心哲学原则”的作者，他们大多数人恰恰是因为没有能力解决特殊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同时在一个思想家身上共存的问题，才会倾向于忽略其中的特殊主义问题。⑦

这也正是2021年9月去世的牙买加裔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所认同的路向。在其2005年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康德的次人》（*Kant's Untermenschen*）中，查尔斯·米尔斯激进地指出，哲学界普遍宣传的康德理论是一种“低级的、理想化的、被净化地重构”的错误理论，康德哲学的官方叙述必须得到重新思考和改写。⑧ 他有意采用了纳粹运动重名昭著的“次人”一词，直陈自己是“故意来挑衅的……试图挑战我们对现代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看法”⑨：被假定为具有种族包容性的“尊重所有人”的康德“吹嘘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仅限于白人”。⑩ 因为康德意义上的“人”意味着整全的人，它需要具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智力、自主能力等；在康德看来，人是一个道德主

① 迄今关于康德与种族问题的评论卷帙浩繁，本节仅对此问题史之中的代表性学者做一概述，关于这一问题更详尽的研究文献整理，参见：https://northamericankantsociety.org/resources-on-Kant-race-and-racism，2023年4月访问有效。

② Robert Bernasconi, 2001, “Who Invented the Concept of Race? Kant's Role in the Enlightenment Construction of Race”, in *Race*, Robert Bernasconi ed., Blackwell, 2001, p. 15 & p. 31n. 20. 此处他援引的是1920年代瓦尔特·施耐德特（Walter Scheidt）的观点。

③ Cf.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 149.

④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 152. 罗伯特·贝纳斯康尼援引《道德形而上学》导言部分康德的观点，指出“只有义务却没有法权的存在者”这个类别之所以阙如，是“因为这会是些没有人格性的人（农奴、奴隶）”［参见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⑤ Robert Bernasconi, 2003, “Will the Real Kant Please Stand Up: The Challenge of Enlightenment Racism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Radical Philosophy* 117, p. 14.

⑥ Robert Bernasconi, 2003, “Will the Real Kant Please Stand Up: The Challenge of Enlightenment Racism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Radical Philosophy* 117, p. 13.

⑦ Robert Bernasconi, 2003, “Will the Real Kant Please Stand Up: The Challenge of Enlightenment Racism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Radical Philosophy* 117, pp. 15-16.

⑧ Charles W. Mills, 2005, “Kant's ‘Untermenschen’”, in *Race and Racis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rew Valls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89.

⑨ Charles W. Mills, 2005, “Kant's ‘Untermenschen’”, in *Race and Racis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rew Valls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69.

⑩ Charles W. Mills, 2005, “Kant's ‘Untermenschen’”, in *Race and Racis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rew Valls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76.

体，黑人种族和美洲原住民种族由于达不到“人”的门槛，他们都是被康德定义为“类人实体，由于与种族有关的缺陷，缺乏享受适合于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必要道德状态”的“次人”。[①] 换言之，康德根本没有把非白人种族包括在“人”的群体之中，他们只是“次人”，康德哲学的核心原则不应当适用于“次人”，因为他的平等主义理论从来没有打算普遍扩展到欧洲人种之外。由此，他的最终立场是认为，康德的普遍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白人和男性的平等主义，特殊主义才是康德思想的核心。[②]

查尔斯·米尔斯的主张引发了罗伯特·贝纳斯康尼、宝琳·克莱因戈尔德和撒母耳·弗莱沙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等学者的激烈讨论。2022 年，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女性主义学者狄勒克·胡赛因扎德甘（Dilek Huseyinzadegan）将查尔斯·米尔斯的方法论总结为“黑人激进康德主义，BRK”（Black Radical Kantianism），认为他的研究代表康德种族正义理论之理念的升级。查尔斯·米尔斯呼吁人们认识到康德是特殊主义、性别歧视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惟其如此才能承认白人至上主义和自由平等主义的兼容性，认识康德的特殊主义对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影响，最终反思和重构自由主义，她称之为查尔斯·米尔斯的“某种哥白尼式的革命”。[③]

在伊曼努尔·埃兹、罗伯特·贝纳斯康尼和查尔斯·米尔斯等学者的呼吁之下，此后为康德的特殊主义问题辩护的学者大致采取以下三种策略。

其一，彻底否认康德特殊主义的观点对其哲学有任何影响。这种比较极端立场的代表者是罗伯特·劳登，在其 2002 年的代表性著作《康德的不纯粹伦理学》（*Kant's Impure Ethics*）中，劳登对比了康德的理论和康德的偏见，他承认“康德的著作确实表现出许多私人偏见和矛盾的倾向……但康德的理论比他的偏见更强大，这正是哲学家们应该关注的理论。……偏见与他的人类道德发展理论的决定性特征没有核心的联系”。[④] 此外，他还从康德反复断言“整个人类具有道德命运”之中推论出康德是一名渐进主义者，妇女和非白人男子也将最终参与到道德化的进程之中，整个人类物种最终必须分享道德物种的命运，实现道德之完满性。[⑤] 尽管在另一篇文章中劳登也承认，康德很有可能和托马斯·杰斐逊以及其他主要的启蒙知识分子一样，在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时，也继续认为“黑人……在身体和心灵的禀赋上都不如白人”。[⑥]

其二，承认康德的种族观点影响了他的哲学主张，但它否认这些观点影响了康德哲学的核心论点。这种较为温和派立场的代表者为托马斯·伯克希尔和伯纳德·希尔，他们策略是一开始就把康德的哲学论题与他的经验主张区分开来，把康德的“特殊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信念和态度”同化在一起。这使他们能够区分他们所谓的康德的“基本思想”（例如三部“批判”）与康德哲学的其他“可分离的部分”，只要证明了康德的主要哲学主张与康德的特殊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任何指出康德写了特殊主义言论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康德”。[⑦] 因此，“我们的立场是，虽然注意和阻止康德著作中反映或可能鼓励特殊主义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但对特殊主义的指控并不能企及康德的深层理论……并不意味着康德的核心哲学原则存在特殊主义的污点”，在他们看来需要改变的只是康德所捍卫的某些错误的经验和不重要的派生理论。[⑧] 不过这种立场仍然有些难以自洽，在文章

① Charles W. Mills, 2005, “Kant's ‘Untermenschen’”, in *Race and Racis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rew Valls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77.

② Charles W. Mills, 2005, “Kant's ‘Untermenschen’”, in *Race and Racis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rew Valls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69 – 170, pp. 185 – 188.

③ Dilek Huseyinzadegan, 2022, “Charles Mills’ ‘Black Radical Kantianism’ as a Plot Twist for Kant Studies and Contemporary Kantian – Liberal Political Philosophy”, *Kantian Review* 27, pp. 651 – 652, p. 659.

④ Robert B. Louden, 2000, *Kant's Impure Ethics: From Rational Beings to Human Be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05, p. 177.

⑤ Robert B. Louden, 2000, *Kant's Impure Ethics: From Rational Beings to Human Be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4 – 106.

⑥ Robert B. Louden, 2011, “ ‘The Play of Nature’: Human Beings in Kant's *Geography*”,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 154n. 128.

⑦ Thomas Hill and Bernard Boxill, 2001, “Kant and Race”, in *Race and Racism*, Bernard Boxill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48.

⑧ Cf. Thomas Hill and Bernard Boxill, 2001, “Kant and Race”, in *Race and Racism*, Bernard Boxill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49 – 452.

的结尾，托马斯·伯克希尔和伯纳德·希尔也承认，“固执的、自满的、处于有利地位的白人”将很难去做他们知道是正确的事情，而实际上更难知道什么是正确的。①

其三，界于前两种立场之间，承认康德曾经持有某种种族等级秩序的立场，但是康德在某个思想时刻放弃了这样的偏见，看待种族问题时变得更加平等。这种观点最著名的代表者是女性主义学者宝琳·克莱戈尔德，② 她的文章《康德关于种族的第二次思考》（*Kant's Second Thoughts on Race*）将辩论焦点，从康德的种族观点如何影响其哲学的问题，转移到如何拯救康德的问题上。宝琳·克莱戈尔德的总体论点是，康德在1792年底有了对“种族”的第二次思考，他放弃了他的种族等级秩序，接受了人性的普遍原则。这方面的证据存在于康德关于世界主义的表述之中，她主张康德在1794至1795年之间写作《论永久和平》之际批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时，放弃了种族等级秩序的观念③，康德的世界主义是对其特殊主义的一种补救，它是康德解决不正义的欧洲殖民主义问题的一种方式，并为世界公民之间的未来关系设定了一条全新的平等主义道路。④ 不过宝琳·克莱戈尔德的观点已经在2011年罗伯特·贝纳斯康尼《康德关于种族的第三次思考》（*Kant's Third Thoughts on Race*）一文中得到了坚定的反驳。⑤ 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宝琳·克莱戈尔德并不认为康德对女性的看法也经历过类似“第二次思考”的转变。⑥

总之，赞成“康德的特殊主义偏见影响了康德哲学的核心原则、甚至奠定了康德哲学核心原则基础”观点的学者们坚持认为康德关于种族的论述不应该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康德关于种族的论述是无足轻重的，它们对正统康德哲学并无影响。辩论的两方都接受了这样一种前设，也即是认为康德的哲学可以区分为核心观点和边缘观点，于是辩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究竟哪些论述才是核心的，哪一种面相才属于“真正的康德”。

四、吉米·雅布的界定

2021年喀麦隆哲学家吉米·雅布（Jimmy Jab）的著作《康德与特殊主义政治——康德世界公民法权的特殊主义形式》（*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试图终结以上辩论。他指出，“主流叙述并非总是揭示真相”，如果康德的种族理论是特殊主义的，那么这一点可能会影响西方关于康德普遍主义－平等主义者的叙述。⑦ 不同于查尔斯·米尔斯和罗伯特·贝纳斯康尼依赖于康德未发表著作中关于非白人种族的激烈贬损性表述来论证康德的特殊主义倾向，吉米·雅布试图依靠康德已发表的著作来证成康德的特殊主义贯穿他的哲学生涯并且丝毫未曾改变，也即是“康德是一名特殊主义的思想家”⑧，“康德的种族等级秩序观念贯穿康德的一生，自始自终保持不变”。⑨

不同于以往研究者针对康德关于种族的贬损性言论的关注，吉米·雅布更多试图发掘奠基康德的这些貌似不经意的贬损性评论的哲学基础——决定康德的种族理论的思想是康德关于人类物种的“特性”（Charakteristik）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康德关于导致种族多样性的人类“自然禀赋”的观念，同时也解释了康德的世界主义的意涵，所有自然禀赋的发展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奠定了世界主义的基础。换言

① Thomas Hill and Bernard Boxill, 2001, “Kant and Race”, in *Race and Racism*, Bernard Boxill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70.

② 关于“康德在生命最后阶段改变自身特殊主义信念”的观点，宝琳·克莱戈尔德是其中一位代表者。罗伯特·贝纳斯康尼还指出，苏珊·肖尔（Susan Shell）、山卡·穆图（Sankar Muthu）和彼得·芬乌斯（Peter Fenves）等学者都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cf. Robert Bernasconi, 2011, “Kant's Third Thoughts on Race”,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 291, p. 312n. 1）。

③ Cf. Pauline Kleingeld, 2007, “Kant's Second Thoughts on Race”,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7, p. 593.

④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26.

⑤ Cf. Robert Bernasconi, 2011, “Kant's Third Thoughts on Race”,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edited by Stuart Elden and Eduardo Mendieta, Albany: SUNY Press, pp. 291－318.

⑥ Cf. Pauline Kleingeld, 2007, “Kant's Second Thoughts on Race”,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7, p. 586n. 28.

⑦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3.

⑧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7.

⑨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183.

之他认为，“康德对非白人种族不屑一顾的说法，表示出种族的等级秩序是本质性的，尤其是当我们把康德的定言命令和他的世界公民法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是如此”。①

吉米·雅布将自己的研究路向称为“非正统解读”，他批评了以往研究者区分康德的核心思想（三部“批判”）和边缘思想（早期著作和人类学）的研究路向，主张不能仅凭为康德哲学辩护的倾向而否定那些不符合他们喜好的康德文本，或者夸大其他康德文本以支持他们单向度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划分忽视了康德的人类学文本，由此得出的康德形象与康德本人对其体系的构想并不相称。因此，他总结出了康德关于种族理论的两个基本困难：“（1）白人种族的完满性特性及其后续问题，美洲原住民人种的不完满性特性；以及（2）剥夺黑人种族的美与人之尊严的特性”。吉米·雅布看到，康德本人已经将其哲学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都浓缩到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之中，由此康德的哲学应该从人类学的立场才能得到理解。②

对于吉米·雅布而言，康德哲学的人类学基础在于人类物种的“特性”概念。除了康德的三篇人类学论文之外，他还将《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和《实用人类学》这两个文本纳入考察范围，认为前者是康德种族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后者意味着康德种族理论的完成。③他看到，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将“特性”定义为“从外部来认识人的内心的方式”，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特性”的概念。肤色是人类物种“特性”的可见表现，种族的外在特性是身体属性，内在特性是道德能力，两者都决定了人类是否能实现其自身的目的。以此而言，“特性”是对人类物种特性的研究，这些特性是人类物种的自然禀赋之所在，而世界公民状态（cosmopolitan conditions）的实现则是这种自然禀赋充分发展的先决条件。④

在吉米·雅布的论证下，康德的世界主义构想与康德的种族理论之间产生了更为本质性的联系，他认为康德之所以耗费如此之多的心力研究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其目的正是为了更本质地认识“人是什么”，并将其种族理论转换为对“特性”概念的实用主义理解。康德的“特性”概念是由康德的四种气质学说（多血质、忧郁质、胆汁质、黏液质）转化而来的，它以康德关于自然禀赋的学说为基础，是康德的这一理论独有的特征。⑤ 吉米·雅布论证道，黑人种族不属于这四种气质之中的任何一种，“黑人不属于气质学说的范畴”，⑥ 并且“黑人种族不属于康德的实用主义人类学构想”。⑦ 而康德种族理论之中存在的道德问题恰恰在于，康德区分了不同肤色的人种的“特性”，只有白人种族才拥有最为完满的特性，这是基于大自然的合目的性而言的，大自然有目的地选择不把发展美感和崇高感的自然禀赋给予黑人，因为黑人不能受到教育，只能做奴隶，他们不能从底层上升到高层，而且他们从未在科学和艺术方面表现出任何才能。通过在人类物种“特性”的形成过程中诉诸自然禀赋，康德致力于人类物种发展的概念，将人类的多样性解释为具有一种合目的性的意义，换言之，康德追随种族不平等的观念的基础正是由于目的论的理由。⑧

这正是为什么吉米·雅布始终强调，康德在讲座中的讲授对象是白人，康德不断提到的

①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3.

②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p. 4 – 5.

③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9.

④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p. 6 – 7.

⑤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p. 20 – 21.

⑥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157.

⑦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158.

⑧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Chap. 5.

“我们”和“我们的”用语也只针对白人种族。[①] 当康德的实用主义人类学构想假定所有种族都注定要从他们的技术性禀赋发展到他们的实用性禀赋、最后发展到他们的道德性禀赋的时候，康德只讨论了一个种族、也就是白人种族的自然禀赋的发展[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实用人类学》的《论民族的特性》和《论种族的特性》章节中，康德丝毫没有提及非白人种族的深层原因。由此可以推论出，康德关于世界公民法权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思考并没有将非白人种族纳入其中，因为康德的世界主义构想是以“所有自然禀赋的发展是自然的最高目的”这一观点为前提的，人类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其道德禀赋，[③] 而白人种族是唯一拥有道德发展所需的所有自然禀赋的种族[④]，并且“只有白人种族才能企及道德禀赋，这才是永久和平理想的世界主义状态”。[⑤] 在吉米·雅布的论证下，康德的世界公民法权成了一种事实上专属性的权利形式（亦即非普遍主义的），其内容和对象都只是白人种族，只有白人种族才被康德包括在他的实用主义构想之中，并且为世界立法。[⑥]

由此吉米·雅布强有力地得出了他的观点：“如果康德的种族理论是康德关于人性概念的构想，如果人性是康德哲学中最普遍的问题，如果康德的人类学恰恰是找到他的人性概念的正确所在，那么这就表明人类学是康德哲学的核心学科。这意味着，本书的关键就在于人类学在康德哲学中的作用。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康德的人类学是其哲学的基础。”[⑦]

吉米·雅布的著作对康德的整体人类学奠基及其道德哲学和世界公民法权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试图从根本上论证康德关于种族的等级秩序的观念始终不变并且构成了康德哲学的先天基础，这是迄今为止分析康德的特殊主义问题最为详尽的论证。不过吉米·雅布自己也认识到，任何一个哲学论证总是会有另一个相反的或者更好的论证与之相对[⑧]，他的主张同样也需要经过时间和文献的检验。尽管如此，吉米·雅布的开创性工作仍然给后来的反驳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他把康德的人类学放置在了比康德的先验哲学更为基础和本质的位置上。

结语：我们是谁?

康德的哲学声誉由来已久，以至于任何试图玷污它的行为，都只能被理解为不入流的下等研究。罗伯特·贝纳斯康尼正确揭示道，哲学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专注于重构哲学家的所谓“核心论点”、排除其他边缘论点的倾向。正当研究者们以最偏狭的形式为洛克、休谟、康德、尼采和海德格尔等经典哲学家的道德正当性做辩护的时候，乍一看我们似乎是为了捍卫这些哲学家的“核心思想”，但却将其抽离出当时特定的思想环境和特质，无视了他们写作之中的那些难以为人接受的部分，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本身，也削弱了哲学家在历史之中活生生的生命活动，哲学家成了某些僵化思想标签的代表，高高供奉在无社会环境的真空之中。然而，通过删减哲学家著作中的某些让人难以接受的部分来满足我们现代人自己的兴趣，我们恰恰就有可能排除掉了这个哲学家的思想中最具有挑战性的

①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33, p. 162, p. 175, p. 182.

②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174.

③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189.

④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11.

⑤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219.

⑥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229.

⑦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p. 243 – 244.

⑧ Cf. Jimmy Jab, 2021,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sm: Towards Kant's Racialised Form of Cosmopolitan 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p. xi；罗伯特·贝纳斯康尼也认为，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文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由欧洲人塑造世界秩序与立法（Cf.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 154）。

内容。[①]

关于康德与特殊主义的难题这个话题，在某种意义上同样也适用于康德关于女性的讨论。[②] 例如，康德在《实用人类学》等著作中充斥着大量关于非白人种族与女性的贬损性评论[③]；《道德形而上学》提出“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的，因为他还没有犯法”[④] 这一熟悉的原则时，康德随即简要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说一个人的妻子、孩子或仆人属于这个人的财产，如果他们逃跑，他有权取回这些财产。[⑤] 换言之，康德的普遍主义的观点与康德对女性的解释之间同样存在某种矛盾。这些都可以表明，尽管康德声称普遍主义适用于每个人，但是他对非白人种族、女性和孩童的讨论，并不能支持这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康德主张种族差异是永久存在的、并且他坚决反对种族融合，这是大自然的合目的性之所在，由此非白人种族是否被纳入了康德的普遍主义和世界公民法权的范畴，这些都是康德的特殊主义给他的世界主义带来的困难。

本文的讨论试图揭示康德的种族理论及其困难所在。正如吉米·雅布指出的，特殊主义既不是康德哲学中的“边缘主张”，也不应该成为被研究者回避甚或无视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正视与反思康德哲学中世界主义与非白人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会阻碍我们承认对康德哲学在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它只会引导作为非白人种族的我们重新看待“我们是谁”。

■责任编辑/张瑞臣

Universalism or Particularism? Kant's Anthropological Dilemma

MAO Zhu[1,2]

(1.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Kant has long been portrayed as a purely moral philosopher, and egalitarianism, univers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smopolitanism are among the most unassailable achievements and conclusions of Kant's philosophy. But readers also find in Kant a number of fierce and dismissive comments about non-White races, scattered throughout Kant's writings and lectures on anthropology and physical geograph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striking contrast in a sense reveals the intract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Kant's theory of human races and his advocacy of universalism, egalitari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cosmopolitanism. This article reveals Kant's anthropological dilemma in his dismissive comments on non-White races in his works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germ and natural predispositions on the division of the human races, with a summary literature review on his theory of human races, especially Jimmy Jab's conclusive discussion.

Keywords: Kant's theory of human races; Kant's universalism; germ (Keime); natural predispositions (natürliche Anlagen); human races

① Cf. Robert Bernasconi, 2002, “Kant as an Unfamiliar Source of Racism”, in *Philosophers on Race: Critical Essays*, Julie K. Ward & Tommy L. Lott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 159.

② 托马斯·伯克希尔和伯纳德·希尔正是这样的处理策略，他们将康德的特殊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信念和态度一起讨论(Cf. Thomas Hill and Bernard Boxill, 2001, “Kant and Race”, in *Race and Racism*, Bernard Boxill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48)。

③ 例如参看《实用人类学》之《论性别的特性》一节。

④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第294页。

⑤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第292-294页。

康德与元宇宙

陈常燊
［山西大学，太原　030006］

摘　要：康德对现象界/物自身的区分中隐藏着元宇宙的哲学奥秘。基于兰顿和查尔默斯对康德先验观念论的认知结构实在论（ESR）解读，现象界关乎事物的关系性质，物自身关乎事物的内在性质。这意味着，实在的关系性质或元宇宙的物理学结构是可知的，而其内在性质或元－宇宙的物理学结构是不可知的。“元宇宙→现实世界→元－宇宙→本体世界”的模拟链条连接了元宇宙与物自身。对认知结构实在论的“平原景观”和“山地景观”的区分，为我们理解康德与元宇宙提供了一个实现双向阐释的全新视角：元宇宙的模拟假说契合于认知结构实在论者的口号“一切源于结构，结构源于X”，而这里的“X”正是康德的物自身。最后我们回应了一些重要的批评意见。

关键词：物自身；元宇宙；元－宇宙；模拟假说；结构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27－07

从1938年法国剧作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首次提出“虚拟实在”（la réalité virtuelle），到1992年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小说《雪崩》中首次提出“元宇宙”（metaverse），再到2021年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将Facebook重新命名为Meta的“分水岭时刻”，以及Oculus VR头盔的问世，元宇宙的历史可谓是许多相关理念和技术的编年史。[①]元宇宙只能在人类的科技创造、理论思辨、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充分准备下应运而生，其哲学本质涉及我们对“虚拟实在”“增强实在”（augmented reality）等基础概念，以及“模拟假说”（simulations hypothesis）等哲学理论的理解。借助兰顿（Rae Langton）和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等人对康德的结构实在论解读，本文试图搭一座沟通康德与元宇宙的哲学之桥：一方面，阐明《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现象界/物自身（Ding an sich）的二元区分有助于厘清元宇宙的形而上学实质；另一方面，揭示元宇宙背后的模拟假说可以验证康德哲学的当代价值。

一、兰顿的康德

作为康德对休谟和贝克莱关于主客体关系以及独立于心灵的外部实在问题的回应，物自身学说无疑是康德哲学的重点和难点。[②]诚如牟宗三所言，康德哲学隐含了两个预设，其一是现象界和物自身的区分，其二是人类的有限性。[③]雅各比（Friedrich H. Jacobi）说过：“没有

收稿日期：2022－1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分析的西方哲学史研究”（项目号：19AZX01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维特根斯坦与寂静主义研究”（项目号：21FZXB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常燊，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Cf. QuHarrison Terry, Scott Keeney, *The Metaverse Handbook: Innovating for the Internet's Next Tectonic Shift*, 2022, p. 57.
②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274），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③ 参见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第1页。

（物自身）这个预设，我无法进入这个（康德的批判）体系，但有了这个预设，我却也不能停留其中。”① 此言虽是对康德的批评，但客观上佐证了“物自身”在康德哲学中的特殊地位：学界一般认为，物自身是人类感知经验的起源，也是经验知识的限度，还是一个富有价值意蕴的概念。② 康德主张，所有的自然法则，包括物理学定律和特殊的科学规律，实际上都是理性的人类行为主体必须服从的认知规律。既然自在之物是事物独立于思维的一面，就不能被赋予任何这样的主观认知特征，它们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必然是不可知的。③ 我们的认知图景（如时空和因果关系）只能提供主观上作为现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事物。然而，物自身的本质不存在于它与感知者的关系中，也不存在于我们赋予它们的彼此关系中。

根据兰顿的区分，康德把物自身理解为那些具有内在性质（intrinsic properties）的实体，这些性质独立于它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现象则是实体之间的关系性质（relation properties），包括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④ 实在的关系性质是可知的，但内在性质是不可知的。具体地说，她认为康德对事物自身的无知应该被理解为对内在性质的无知。据此，兰顿提出了著名的“康德式谦逊”（Kantian humility）论题，即我们并不具有关于实体的内在性质的知识。⑤ 她认为这个论题与当代分析形而上学非常相关，通常被称为“兰顿的康德”（Langton's Kant）。它不同于“休谟式谦逊”（Humean humility），后者把谦逊论题作为怀疑隐含该论题的形而上学理论的理由，而康德则不同，他把谦逊论题视为适用于世界的真理。

“康德式谦逊”论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加传统的“性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operty），它独立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根据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等人的区分，范畴性质（categorical properties）是定性的实体：每个范畴性质都有一个内在的定性性质，有时称为本质。虽然这些性质可能具有因果效力（causal power），但它们是偶然的：它们的因果角色可以在不同的可能情况下改变，由每个世界的自然法则支配。⑥ 而根据倾向性质（dispositional properties）的说法，拥有一个性质通常意味着拥有某种因果关系的效力或能力（capacities），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能说的关于一个性质的唯一信息就是它赋予它的实例以什么效力。在当代学界，谦逊论题常常是倾向主义者对范畴主义的认识论抱怨。在刘易斯（David Lewis）等范畴主义者看来，尽管内在性质的存在是物质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它们，这已成为他们的主流观点。⑦ 他们认为所有的基础性质都是倾向性的，而存在更多的基础内在性质这一想法意味着我们对相关性质的无知是无可补救的，我们没有理由断言我们永远不知道的事物居然会是存在的，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假定内在性质的存在。

与之相反，“兰顿的康德”承认物自身在本体论上的实在性，同时又否认它在认识论上的可通达性。而这正是认知结构实在论（epistemic structural realism，ESR）的形而上学立场，主张放弃了解不可观察实体的本质的尝试，转而关注正确地描述世界结构。一方面，它主张作为认识对象的物自身是真实存在的，并不以认知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我们所有经验知识的来源——如果否认它们的存在，我们只能走向反实在论的观念论和建构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够获得关于物自身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知识，也就是关于外在性质或关系性质的知识，其内在性质或范畴性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知的。“兰顿的康德”是认知结构实在论的拥趸，尽管康德的著

① Friedrich H. Jacobi, *David Hume über den Glauben, oder Idealismus und Realismus*, Breslau: Gottlieb Loewe, 1787, S. 223.

② 参见李明辉：《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何以有价值意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③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246/B303），第223页。

④ Cf. Langton, Rae, *Kantian Humility: Our Ignorance of Things in Themsel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0.

⑤ Cf. Langton, Rae, *Kantian Humility: Our Ignorance of Things in Themselves*, p. 21.

⑥ Cf. Armstrong, David M., 1978, *Nominalism and Realism*, Vol. I. A Theory of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⑦ Cf. Lewis, D 1986,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比这个观点的命名早了两个世纪。结构实在论的理论优势正是它在当代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中所占据的有利地形：根据沃拉尔（John Worrall）的说法，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连续性是形式或结构的连续性，而不是内容的连续性，这样它既不违背实在论者所给出的“无奇迹”论证（no - miracles argument），又能避免实在论者所面对的“悲观元归纳”（pessimistic meta - induction）反驳。[①] 这个被誉为“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在当代学界得到了其他哲学家的呼应。杰克逊（Frank Jackson）提出“康德式物理学主义”（Kantian physicalism）[②]，主张科学只揭示了物理学对象的因果关系性质，我们只知道世界的因果和关系性质，而对世界的内在性质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刘易斯称之为“拉姆塞的谦逊”（Ramseyan humility）。[③] 安格尔（Peter Unger）也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纯粹是结构性的，而感受质（qualia）是现实的非结构性组成部分。[④]

二、查尔默斯的康德

在康德与元宇宙相互诠释方面，查尔默斯的《实在 +：虚拟世界与哲学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契机：一方面，该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关于元宇宙的哲学基础的前沿研究成果，出版于2022 年；另一方面，该书对于推介“兰顿的康德”以及如何借助“康德式谦逊”夯实虚拟世界或元宇宙的哲学地基的阐述极富启发性。[⑤] 特别是可以借助查尔默斯的“模拟假说”来理解康德的物自身预设。如果说上一节“兰顿的康德”是将康德的物自身学说与当代认知结构实在论紧密结合起来，把“康德式谦逊”作为其核心概念，那么本节“查尔默斯的康德”（Chalmers' Kant）的核心概念是“模拟假说”。

“模拟假说”最早由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提出，其含义是：我们生活在计算机模拟环境中，或者，我们无法分辨自己是否处于模拟宇宙之中。[⑥] 查尔默斯接着指出，模拟实在还需要满足其余两个条件：首先，模拟必须是终身的，或者至少是在我们能够记忆的时间内，从昨天开始就参加模拟比赛不算；其次，模拟需要由模拟器（simulators）来设计，没有模拟器就随机弹出的计算机程序不算模拟。[⑦] 例如，如果我们生活在《黑客帝国》的世界中，我们的神（也称之为“模拟器”）就是机器。他把虚拟世界称为“实在 +”（reality +），它可以被视为物理学实在与增强实在和虚拟实在的元宇宙结合体，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交互式的、由计算机生成的空间。虚拟实在的核心要旨在于，它是一种真正的实在，满足查尔默斯对实在的下述标准：具有因果效力（causal power）、独立于心灵，并且并非错觉。康德的物自身也满足上述实在标准，但它并不满足现象世界的可感知和可测量条件，所以只能是一种“顶级实在”（top - level reality）。

在查尔默斯看来，元宇宙比现实世界更加虚拟，但是有一种宇宙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他称之为元 - 宇宙（Meta Universe），现实世界居于二者之间。现实世界是对元 - 宇宙的模拟，但根据模拟假说，即使我们在模拟宇宙中，我们所有的证据都与我们在非模拟宇宙中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表明，完美的模拟假说与认知结构实在论者所宣称的“一切源于结构，结构源于 X”（it - from - structure - from - X）是高度一致的。[⑧] 这

① Cf. Worrall, J., 1989. “Structural realism: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Dialectica, 43: 99 - 124. Reprinted in D. Papineau (e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39 - 165.

② Cf. Jackson, 1998. From Metaphysics to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 - 24.

③ Cf. Lewis, David, 2009. “Ramseyan humility,” in D. Braddon - Mitchell and R. Nola (eds.), The Canberra Program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3 - 222.

④ Cf. Unger, p., 2001. “Why there are no people,”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4: 177 - 222.

⑤ Cf. Chalmers, David, 2022, *Reality +: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W. W. Norton (US) and Allen Lane (UK), pp. 419 - 422.

⑥ Cf. Nick Bostrom, “Are You Living in a Computer Simulatio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3) Vol. 53, No. 211, pp. 243 - 255

⑦ Cf. Chalmers, David, *Reality +: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 29.

⑧ Cf. Chalmers, David, *Reality +: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 417.

里的“X”又是什么呢？认知结构实在论主张，无论科学告诉我们什么关于物理学实在的结构，都有一个潜在的本质，不妨称之为“X”，这是科学没有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处于一个完美的模拟环境中，我们的物理学结构与非模拟宇宙相同，但具有元宇宙的基础性质。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结构，但不能知道它的本质。当然，元－宇宙的物理学有自己的结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模拟宇宙的结构是通过元－宇宙的进一步结构实现的。这就为如何实现元宇宙的结构提供了可能性。也许这是通过在一个元宇宙的进一步结构实现的，但这只是转移了问题，所以只需关注最初的顶级宇宙（top－level universe），也就是一个包含所有其他宇宙的宇宙。据此，笔者认为，如果把康德的“本体世界”视为某种完美的模拟实在（perfect simulated reality），那么“X”就是康德的“物自身”。在元宇宙与康德的“本体世界”之间，还有现实世界与元－宇宙。

由此可知，这里存在一个模拟链条：元宇宙→现实世界→元－宇宙→本体世界。假定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那么元宇宙模拟了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又模拟了元－宇宙。最终，所有宇宙最终都模拟了本体世界（物自身）。只有作为顶级宇宙的本体世界才是完美的模拟实在，所以我们称其他几种宇宙为“不完美的模拟实在”（imperfect simulated reality），亦即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VR）。本质上，元宇宙是对元－宇宙的模拟，二者之间是技术与理念的关系，或者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元－宇宙也不等于康德的物自身或“本体世界”，但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程度上或技术上的，而不是性质上或形而上学上的。在传统的现象世界与康德的“本体世界”之间存在很多中间状态，从原始的人造物（如石斧）到现在的电影、电视、智能手机，再到满足了互动性和计算机生成性条件的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进一步借助满足了沉浸感条件的虚拟实在设备，如VR头盔、VR手套，我们进入了一个共享的、计算机生成的元宇宙世界，在其中进行社交、工作和娱乐。元宇宙不一定是错觉、幻觉或虚构物，我们进入其中不等于逃避实在。实际上，人们已经在虚拟世界中过着复杂而有意义的生活，比如虚拟实在游戏“第二人生”，而虚拟实在将使这种生活变得司空见惯。

元宇宙听起来很像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场景，但二者仍有重要区别：元宇宙在真实程度上远不如“矩阵”中的世界，毕竟“虚拟的X”不等于“真实的X”，也没有人会在其中度过一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进入和退出。元宇宙中的人无法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元－宇宙），每个人都出生在日常的物质实在中，并且仍然以那里为基础。当人们选择进入时，他们可以戴上耳机，穿上紧身衣，进入元宇宙的虚拟世界。相较而言，黑客帝国是一个模拟的宇宙，大多数人都在其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但《黑客帝国》只是科幻小说（当然理论上也有可能是真实的），不过元宇宙正在逐渐成为实在。“矩阵”世界属于真实性较高的实在层级，即模拟实在（simulation reality）：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充其量只能创造局部（特定层次和区域）的、临时的、预编（设定好情节）的，以及律则上不完美的模拟实在，现在谈论全局的、永久的、非预编的、律则上完美的模拟实在还为时尚早。

假设我们在一个完美的模拟世界中，当我看到一个杯子时，我可以知道它的一些性质：我知道它的颜色和形状。更一般地说，我可以知道它的结构性质。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杯子的现象，但我不知道杯子的本质或物自身。事实上，在现象背后，有一个数字对象在元宇宙的计算机上运行。在模拟宇宙中，数字对象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元宇宙中的数字杯子本身是不可知的，它就是杯子的物自身。“康德式谦逊”主张我们不可能知道杯子背后的那个物自身。进一步，“查尔默斯的康德”告诉我们，物自身是一个不可知的“X”，它超越了我们的心灵，从而超越了我们的知识，尽管现象，即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中感知到的日常对象，与人的心灵有着深刻联系。根据查尔默斯的解释，康德持有一种“从结构到X”的观点，认为结构包括一个关系网络，而X包括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潜在内在性质。

三、结构实在论的“平原景观”与“山地景观”

当代哲学中出现了一场关于“平原景观”（flatland landscape）与“山地景观”（mountain landscape）之间的论争。[①] 平原景观论者（flatlanders）认为我们的世界是平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依赖关系，不能被我们在形而上学工具箱中已有的关系所捕获。据此，实在领域是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类似于我们将纽约地铁描述为关系网络的方式。这种关系网络刻画了一幅实在的结构图景，事物的领域本身类似于网络中各个车站的内在性质，这些内在性质刻画了实在的内在图景。相反，山地景观论者（mountaineers）认为，我们的世界是多山的——这意味着一种层级性（hierarchy）。他们认为我们需要在工具箱中引入新的概念来理解世界的结构，因为我们的世界是由依赖链条构成的：世界上有些地方是最基础的，或者至少是比其他部分更为基础，世界上那些不太基础的层级依赖于世界上更基础的层级。

鉴于上述分歧，将模拟假说类比为康德的物自身学说同样体现为两个方面。这两种景观之区别可以简化为是否承认实在的不同层级。在平原景观论者看来，不同层级的实在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同层级的现象界（元宇宙）/物自身（元－宇宙）的区分是不必要的。我们无法跃迁至上一级实在之中，甚至无法证明上一级实在是真实的，而所谓的顶级实在其实就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物自身世界，它是现象世界的认识论来源和本体论基础，同时也是现象世界价值观的根本。笔者认为，“兰顿的康德”体现了结构实在论的“平原景观”：如果在康德看来，数字杯子背后是一个真正不可知的东西，那么相当于说，康德持有一个关于物自身的“平原景观”。据此，实在的结构对应于康德的可见现象领域，而无论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什么，都与康德的不可知物自身相对应。

相较而言，“查尔默斯的康德”体现的正是结构实在论的“山地景观”：康德会把元宇宙中的数字杯子看作是另一种现象，因为下一个宇宙中的人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感知到它。这样，物自身仍能与模拟假说之间维持一个有趣的映射。为了理解查尔默斯所说的“下一个宇宙”，笔者将模拟假说拓展至“嵌套模拟假说”（nesting simulations hypothesis），它是一个容纳山地景观的模拟假说：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处于某个层次的计算机模拟世界中，从中接收我们的输入，并将我们的输出发送给这个世界。罗素（Bertrand Russell）讲过一个故事：某个印度思想家相信，世界由四头大象支撑，而大象又由一只巨龟支撑，而巨龟又由另一只巨龟支撑，以至无穷。[②] 借助模拟假说，两个相邻层次的世界或海龟之间可见一种“元宇宙（现象界或不完美模拟宇宙）/元－宇宙（本体世界）”关系，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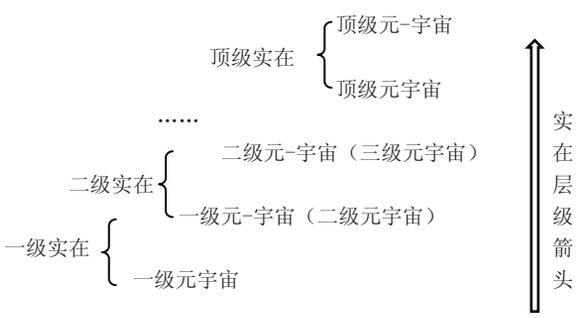


图1 实在层级与嵌套模拟假说

据图1可知，下级实在的元－宇宙同时也是上级实在的元宇宙，顶级实在既是“顶级元宇宙”（top－level metaverse）也是“顶级元－宇宙”（top－level meta－universe），亦即，通过无限上升而最终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我们并不知道目前的地球人类身处几级实在之中，但也许可以乐观预测，随着地球文明的层级提升，我们将来有机会跃升至上一级实在之中，这样一方面，我们的元宇宙是下级实在的元宇宙，这意味着我们是下级实在中的创造万物的“上

① Cf. Kristie Miller, “Is our world structured?”, in Duncan Pritchard (ed.),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5, pp. 223－235

② Cf. Russell, Bertrand. “Is There a God?” (1952), 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Volume 11: Last Philosophical Testament, 1943－68, John G. Slater and Peter Köllner (eds.),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544.

帝”；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有自己的“上帝”，除非我们在某个时刻跃升至顶级实在中——此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假设我们身处模拟宇宙，也就是对非模拟宇宙的一个完美的模拟。物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宇宙包含夸克、原子和分子。但如果我们是在模拟宇宙中，我们的物理学就不是“顶级物理学”（top－level physics）。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学要奠基于下一个宇宙中的计算机。[①]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元－宇宙”就是下一个宇宙。元－宇宙本身可能是模拟的（在非顶级实在中），也可能不是（在顶级实在中），它有自己的物理学机制，可能与模拟宇宙的物理学机制完全不同。模拟宇宙和非模拟宇宙有一个四维时空，而元宇宙可能是 26 维的，可能居住着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生物。至于模拟实在的层级结构在顶级宇宙中是如何实现的，这里有两种可能：其一，顶级宇宙可能是纯结构的宇宙。如果是这样，我们在顶级有纯粹的“结构起源”（it－from－structure）的观点——这是一种本体结构实在论（ontic structural realism，OSR）立场。其二，顶级宇宙是一个非纯结构（impure structure）的宇宙，换言之，其结构仍然是由某种非结构之物实现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在顶级宇宙中又有了“一切源于结构，结构源于它”（it－from－structure－from－it）的观点，这与认知结构实在论是一致的。如果后者更具说服力，那么康德的物自身学说可以与模拟假说相互诠释。

笔者也不断言结构实在论的“平原景观”与“山地景观”何者更为正确，但似乎后者所蕴含的嵌套模拟假说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举个例子，现象世界的道德法则来自康德的“本体世界”，或者上级实在之中。在本体论上，即便下级实在与上级实在都是真实的，在真实程度上也还是会有差别：相对于同级元宇宙，元－宇宙总是“实在＋”。在伦理学上也是如此：如查尔默斯所言，也许非模拟人类比模拟人类有更高的道德地位，仅仅因为他们在顶级宇宙中。[②]

四、对批评意见的回应

借助上述两种康德解释所共享的哲学立场，即认知结构实在论，我们将康德的物自身与为元宇宙提供形而上学奠基的“模拟假说”联系起来，实现了康德背后的认知结构实在论与元宇宙背后的模拟假说之间的相互诠释和深度契合。毋庸讳言，其可行性奠基于一系列理论预设，而这些预设恰恰又面临一些重要的批评意见，下面稍作回应或澄清。

首先，回应对康德对现象界/物自身区分的批评。黑格尔提出了“生活实践”的观点来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③] 据皮平（Robert Pippin）解释，黑格尔的实在或绝对精神是个发展着的理念，而康德的“物自身”是一个悖谬性概念：如果它是不可知的，那么它与被它规定之物是毫不相关的；而如果它与它们是相关的，那么它就不能是不可知的，也不能是“自在”的。[④] 此类批评太多，已超出本文范围，只能简单回应道，元宇宙的理论无需奠基于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即便后者是不成立的，并不影响我们对元宇宙的形而上学研究。

其次，回应对“兰顿的康德”的批评。阿里森（Henry Allism）批评兰顿把康德的物自身与莱布尼茨的单子（具有内在属性的实体）等同起来，但是很难说康德会认同这种实体学说，况且断言物自身具有内在属性的说法也可能导致康德本人明确反对的对物自身概念的“先验的误用”。[⑤] 其实兰顿本人也意识到，“康德式谦逊”的解释有其削足适履之处，但笔者仍选择与查尔默斯一道，对这个方案抱理解之同情，因为它具有解释力：帮助我们理解元宇宙的模拟假说。

再次，回应对认知结构实在论的批评。尽

① Cf. Chalmers，David，*Reality＋：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pp. 419－422.

② Cf. Chalmers，David，*Reality＋：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p. 345.

③ 参见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3 页。

④ 参见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陈虎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年，第 321 页。

⑤ 参见亨利·阿里森：《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一种解读与辩护》，丁三东、陈虎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29－30 页。

管雷迪曼（James Ladyman）等本体结构实在论者同样认为，我们所知的只是事物间的结构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但仍坚称没有事物，结构就是一切。[①] 通俗地讲，可以存在没有关系项（relata）的关系（relations）、没有结点的网络，类似于说，可以存在没有设计者的设计、没有程序员的编程。对此的回应是，目前无需断言认知结构实在论与本体结构实在论孰是孰非，但即便前者是不成立的，并不影响我们对元宇宙的形而上学研究。

再其次，回应对查尔默斯的模拟假说的批评。一个来自观念论者的反驳意见是：如果我们的现象决定了实在，这就排除了完美模拟假说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个假说中，从来没有任何线索表明我们活在模拟宇宙中。在此情况下，即便模拟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仍然无法在现象上把捉任何模拟的迹象。[②] 对此的回应是，正如查尔默斯所言，我们不能排除意识可能是宇宙的基础，因此某些形式的观念论应该至少作为一种推测性假说而被认真对待。然而这不影响我们断言，任何将现象与实在等同起来的观念论做法都是难言成功的。

最后，回应来自对“元宇宙”不同理解的批评。也许有人认为，目前的元宇宙在技术上尚未成熟，其概念规定性尚不确定，相关的技术哲学和运用伦理学研究仍处于摸索中，所谓“元宇宙形而上学”更是无从谈起。对此的回应是，作为技术的元宇宙与作为“理念”（idea）的元宇宙原本就处于康德关于现象界/物自身的二元关系中，本文侧重于哲学上探讨元宇宙相对于现时代的前瞻性和元－宇宙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基础性。换言之，这是一项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事业——而这正是康德的一部元哲学著作的书名。[③]

■责任编辑/张瑞臣

Kant and the Metaverse

CHEN Chang-she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secret of the metaverse is hidden in Kant'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henomenal world and *Ding an sich*. According to Langton and Chalmers' epistemic structural realistic (ESR)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ology, the phenomenal world i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al nature of things, and *Ding an sich* is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nature of things. This means that the real relational nature or 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metaverse is knowable, while its intrinsic nature or 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meta-universe is not. The simulation chain of the metaverse→ the real world→ the meta-universe→ the? noumenal? world" connects the metaverse and *Ding an sic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latland landscape" and "mountain landscape" of ES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dual interpretation for us to understand both Kant and the metaverse: the simulation hypothesis of the metaverse corresponds to the slogan of "all originates from the structure while the structure originates from X" in the cognition of the structural realists, while "X" here is Kant's *Ding an sich*. Finally, we have responded to some major criticisms.

Keywords: *Ding an sich*; the metaverse; the meta-universe; simulation hypothesis; structural realism

① Cf. Ladyman, J. and Ross, D., with Spurrett, D. and Collier, J., 2007. *Every Thing Must Go: Metaphysics Naturalis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Cf. Chalmers, David, *Reality +: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 71.

③ 参见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条理”与空时

——张东荪对康德时空观的修正

方　用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摘　要：早期张东荪在多元认识论的视域中考察空间时间的“根据”“形态”和“性质”，强调时空是“认知上的先验格式”，但又必与外界的“条理”相应，并通过“主客交互”的认识活动发挥作用与获得改良。他也将空时理解为宇宙最根本的架构，并由宇宙的“层创进化”而主张创造的人生与超越“今此”的生活。学思转变后，张氏更尝试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中西时空观之异及其基础。张东荪自诩是“修正的康德主义”者，他有关“条理”与空时及其交互作用的思考，试图跳出仅以纯粹的主观与确定的形式理解空时的观点，并回应来自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挑战，拓展了20世纪中国哲学时空观的研究。

关键词：空间；时间；条理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34－12

在西方哲学中，时空无疑是极为彰显的主题。随着西学东渐，20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也敏锐地发现了时空问题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并在古今中西的时代背景中开展各自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时空观。张东荪（1886—1973）对时空的思考是在翻译柏格森、理解康德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以“修正的康德主义”自命，从其“多元认识论”出发探究空间时间的“根据”“形态”和“性质”，强调时空是“认知上的先验格式”，但又必与外界的“条理”相应，并通过“主客交互”的认识活动发挥作用与获得改良。他也将空时理解为宇宙最根本的架构，并由宇宙的“层创进化”而主张创造的人生与超越“今此”的生活。后期他更尝试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中西思想之异及其基础，将中国传统的“理”确定为“条理”而非“物理”，并由此揭示中国传统时空观的特点以及担负融汇中西以创造新文化之责。张东荪有关“条理”与空时及其交互作用的思考，试图跳出仅以纯粹的主观与确定的形式理解空时的观点，并回应来自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挑战，自成一体，独见颇丰，大大拓展了20世纪中国哲学时空观的研究。

一、“认识的多元论”

贺麟赞誉张东荪《多元的认识论》一书是“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①]张氏的哲学体系即“认识的多元论”（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他有关时空问题的思考，首先就是在此视域中展开的。他认为知识乃是由多种要素“混合而成”，故为“多元”。

收稿日期：2023－02－2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哲学中的‘时间’观念研究”（项目号：15BZX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方用，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①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1页。

尽管他前后曾有“三元”“四元”“五元”乃至“七元”等异说，但综观其论，其实也还是可以概括为基本的“三元”：客观的“条理”（order）、主观的“格式”（form）以及主客之间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认识的多元论”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是强调认识是“主客交互”的过程。从“生物中心说（biocentric view）”的立场出发，他主张作为“生物”，而非“神”或“超人”，我们认知外物时，必须先有“若干根本的格式”：

这些格式的性质是根据于生物的性质的。但我们却不专靠这些原始的格式，必须拿这些格式来加以混合与锻炼，这便是主观的方式与客观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外界的认识不是写照，乃是先以自己的格式吸取外界的材料，然后再变化自己的格式以应付客观的实际，于是格式愈变化而愈复杂，其与客观相交织乃亦愈密切。①

张东荪赞同胡塞尔将认识作用分为“能认识的主观”“所认识的客观”和“在认识中的‘内蕴’（essence）”等三部分，但他认为胡塞尔所谓“内蕴”之说“颇为费解”，他则有意逃离此“迷阵”，提出了“主客交互”之说：就主观而言，有先天的“格式”；就客观而言，有“外界的材料”即“经验”。认识一方面是“以先天的格式左右后天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以后天的经验改良先天的格式”，因而是一个主观与客观、“格式”与“经验”交互作用的过程。

张东荪以“修正的康德主义”（revised Kantianism）自命。他一方面坦言自己“大体上可说仍是循康德的这条轨道”，另一方面又强调“重要之点却有不同”，即他承认外界有条理，并坚持条理不能“完全是心的综合能力所产”。他主张认知是一种“合成的产物（Joint product）”：有由外界映来的条理、有由内界自具的格式，还有“中立性质而本不存在的感相”。内外有别，彼此独立，故各成一元；“感觉”是主客相涉、内外兼备的另一元，是认识过程的起点。外界有“条理”，内界能“立法”；前者与康德相左，后者与康德同行。如其所言，每一认识就是一个“含有两极的整体”（bipolar whole），在其中，“‘主’‘客’‘关系’三者凝成一体，不可分开”。② 在此过程和作用中，认识的主观格式与客观的外界素材“相待相成，且互相循环辅助”，不仅提升了所得知识，也改良了主观格式，从而能使知识不断“进化”。所以，知识的确具有“内的”性质，但其所得、结果却能揭示外界的“条理”，他喻之为“闭门造车”而能“出门合辙”，或如“庖丁解牛”，“刀刀都中其关节”。

无疑，“主客交互”是多元认识论最显明的特征。张东荪试图超越当时各种唯心或唯物的一元论，或心物二元的观点，尝试综合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的各种新成果，并将认识视作一个主观与客观、“格式”与“条理”通过反复多次“交互作用”而辩证发展的过程。他指出，认识如同“戴了眼镜看东西”，我们无法去除眼镜的作用，但应该设法分析这副“眼镜”，区别“虽经过眼镜而现于眼镜中，然依然不失为仍属于所对的外物”和“属于眼镜的自身的……格式”的不同性质，前者即外界客观的“条理”（order），后者即内在主观的“格式”（form）。

二、作为“格式”的“空间”与“时间”

张东荪不仅赞同康德的“先验格式”，并也将“先验格式”区分为“认知上的先验格式”（the cognitive a priori）和“名理上的先验格式”（the logical a priori）两个部分。其中，“认知上的先验格式”即：

我可以列举出来的只有三个。第一是空间，第二是时间，第三是能所的关系（subject object relation 或称主客关系）。③

与康德相比，张东荪特别增加了第三种格

① 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第 23 页。
② 张东荪：《认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07 页。
③ 张东荪：《认识论》，第 50 页。

式即主客关系；其次，从其排序来看，张氏始终很严谨地将空间置于在时间之前，简称为“空时”，他反对“把时间归并于空间”或“把空间亦归并于时间”，主张空间和时间是两种不同的格式。他如此界定“空时”：

我……愿意把空时限于知觉上的，经验上的。至于这种连续体我亦承认确是有的，但其详我们却不甚知道。……原子性连续性与创变性亦正是关于这个连续体的。就连续性而言，似可说与空间相类似。就创变性而言，可以说与时间相类似。但在我的意思则以为空间与时间虽只是主观格式，然其背后却又必与外界所有的有些相应。在认识上的空间是与在外界的连续性相应。在认识上的时间是与在外界的创变性相应。[①]

首先，张东荪明确指出，“空时”只限于主观的“知觉”和“经验”，作为主观的“格式”，有其先验性。这与康德无异。

其次，空时这种内在的、主观的格式背后，“又必与外界所有的有些相应”。这是张东荪与康德分歧之所在。他不同意康德认为“第一种条理”即“外界的秩序或共相”是内在格式所生，而是强调这种“属于认识上的预立方式”的空间与时间，必定与“外界的条理”（genuine external order）相应。张氏要面对的来自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挑战，比如：所谓的“实体”“物”或“共同的客体”“共相”等真实存在吗？他认为“外物”只是一个“构造方式”（Structure），而非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物质（matter）。作为构造方式，“外物”的大部分仍是属于认识作用本身的。但他坚持其中仍有若干方式“不纯粹属于主观”“不由于我们认识的立法所造”，这些方式不仅独立于主观，而且还是能引起知觉上产生变化的因子，是认识过程中不能不承认的“外界的背景”。建基于当时自然科学对外物之“构造方式”的理解，他很谨慎地提出了三条最基本的积极“条理”，即“原子性”（atomicity）“连续性”（continuity）“创变性”（creativity）”，以及作为“消极方面”的条理的“可塑性”（plasticity）[②]。

所谓“原子性”是主张外界在构造上是“可分”的，具有“个体性”，“凡是我们的对象，不拘是物质，是生命，是心理，总是都具有这种原子性的条理”。[③] 他主张必须抛弃“实质”的观念；但他认为，有物理、生理和心理，这些“理”都具有“原子性”的条理，他称之为“架构”。所谓“连续性”是相对于原子性而言的：“我以为外界的条理固然有分断可能的原子性，然同时必亦有不断可能的连续性。前者是说一个东西可分为若干小块；后者是说虽分为若干小块而依然只是整个的东西。凡一个东西能够成为整个儿的，必是具有连续性。”[④] 他借用罗素、柏格森论“数”的观点，指出数学上的“一”（Unity）是由原子性而成，但“一”总可分为多，“多”（Multiplicity）是由连续性与无限性而来的。所以有“一”有“个体性”，“多”即“连续性”“无限性”便蕴含其中，因为个体不是独立的，而是处于关系中的，原子性与连续性实为一体之两面。所谓创变性是指“有新奇（Novelty）发生而言。设若这个世界绝对没有新奇的东西生出来，则这个世界必定亦没有变化”。[⑤] “创变性”即指外界是可变的，世界有变化、有创新，“每一个组织在本身必定就是一个新东西”，这些新出来的东西，并非纯粹出于我们主观的构造。消极的“可塑性”，揭示的则是外界条理作为认识对象，是可以被“假设”为具有“对象性”且可被认识的，亦即“一切自然条理只能潜伏于凝构（即可塑者）之中”。

总体而言，张东荪更重视的是三个积极的“外界条理”，从其阐释可以看出，这些“条理”正是以当时科学所达的三种“物理性质”为据的。他以此批评唯物论和新实在论，也否

① 张东荪：《认识论》，第53页。
② 详见张东荪《认识论》，第38页。
③ 张东荪：《认识论》，第39页。
④ 张东荪：《认识论》，第41页。
⑤ 张东荪：《认识论》，第43页。

认康德的“物自体”。[①] 他把“原子性”“连续性”“创变性”比作认识的重重帘幕上“所透入的一些微光”，并强调这是认识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认识的成立即是条理的发现。离了认识固无条理，离了条理便不成认识”。[②] 他主张认识不是“照相”而是“打洞”，照相一次成型，且照相机无知，而人有知，“打洞”有“能打”与“所打”之别，而“打”即是二者相互作用且逐渐创造出“洞”之形态的过程。换而言之，并非有现成的条理、而认识也不是静观，“条理可说是由内外交互而成”[③]，知识是内在的主观格式和外在的客观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知识并不能只靠感觉，理智是“辨别或揭出这种自然条理的能力”，条理（order）必须与理智（reason）合一。因而“知识不是临摹或拓写，乃是‘造作’（construction），亦可以说是‘再组织’（reorganization）。”[④] 他坦承其“多元认识论”是“循康德之路”而走的，这首先就是他引进了康德的“先验格式”，但他接下来几乎与康德唱了反调，因为他主张作为主观格式的空间和时间，是与外界的那三个条理“相应”的，强调外界的“条理”不纯粹是内在的认识造出来的。张氏亦称其说为“温和的实在论”，因为一方面，他支持新实在论的外界有“条理”之说，但另一方面，他也赞同康德的“先验的格式”，并试图将二者合而用之，同时坚定地批驳经验论的“反映论”。

张东荪引用了怀特海有关两个事件（Event，张氏译作“事点”）之关系的讨论来阐发空时与外界“条理”的关系。“譬如有 A 与 B 两个事点（Event），其间的关系可有四种：（1）A 可以扩及 B；（2）B 可以扩及 A；（3）A 与 B 可以扩及另外一个 C 而不及其他；（4）A 与 B 可以完全分开。”怀特海将前三种名为 Junction 或 Conjunction，第四种名为 Disjunction，并据此而提出“推扩的抽绎法”（Method of extensive abstraction），如空间可分为“点”，时间可分为“瞬”。张氏将第四条（即 Disjunction）译作“可断性”，并说：

> 这足见空间确有可分性（即可断性），时间亦是如此。总之，我们于一方面千万不可即认空间是集点而成，时间是联瞬而成；然在他方面却又不可不承认空间与时间确有可以分割的可能性。这便是所谓空间与时间上之原子性（Atomic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不仅空时为然，物质亦然。[⑤]

这里他的说法很审慎，一方面承认空时与物质等一样，有分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主张不可说“空间是集点而成，时间是联瞬而成”。换而言之，不能说空时就是“点”或“瞬”，而是空时与外界的“原子性”相应。

进而，张氏认为怀特海所言之前三条（即 Junction 或 Conjunction）即是对于“连续性”的解释，并指出：

> 在认识上的空间是与在外界的连续性相应。在认识上的时间是与在外界的创变性相应。但不可有所误会：以为时间就是创变性，空间就是连续性。须知二者绝不相同。在知觉上的空间无论如何只有三量向，且是无边的。而在外界的连续性则不限于三量向，亦不限于是无边的。在知觉上的时间是只有一直线的；而在外界的创变性则必不限于一直线。因此我们决不可把这四个混为一谈。并且时间亦是与连续性相应。……外界只有连续，而却无时间。总之，空间与时间只是认识上属于主观的。换言之，即只是能知者于施行认识时所必须的条件。而

---

① 张东荪说：“我们所知的只是物理（physical law 即物的法则）而不是物的本身（things – in – themselves）。”（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 20 页）就康德的“物的本身”，他后来进而说道：“这便是我与康德不相同处。他所谓物其自身绝不是我所说的自然条理。因为物其自身乃是物之本来面目。在康德以为凡被认识即变为现象。……这是康德的苦衷，所以他必须假定物其自身之存在。康德虽是现象论却仍留有素朴实在论的根底。我则以为可以不要这个物其自身。……我所主张的自然条理依然在认识以内，不是超越在背后的。只是透露于感觉中，夹杂在感相内，而并不是藏在其背后独自存在，不为人知。既不是事物，当然不能说到其自身了。”（张东荪：《多元认识论重述》，《认识论》，第 117 页）

② 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 10 页。

③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 107 页。“打洞”之喻源自柏格森。

④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第 66 页。

⑤ 张东荪：《认识论》，第 38 页。

于外界仅有相关而决非一致。①

空间、时间有性质相同的一面，二者互相依靠（Interdependent），都可与外界的“连续性”相应。但时间另有一面，即“时间只是先后次序”。怀特海曾改造柏格森的“绵延”，提出“自然之流”（Passage of nature），并认为“感觉知识所能知的只是对于其变化之‘间’（Its only chance）”；于此，张东荪说：

在他的意思固明明以为自然之流不可量，而时间是一个系列，可以量的。在此所谓自然之流正与我上文所谓创变性完全无二。②

时间也与外界的“创变性”相应，因为外界总是有“新奇”发生，当时间格式与外界作用时，便呈现为一个可以度量的、有先后次序的系列。张氏严格地将“空间”和“时间”限制在“能知者”一方，主张在主观的知觉中才有空间和时间，外界只有连续和创变，没有空时。在这点上，他坚守了康德的立场，强调空间时间的内在主观性。由此，他批评柏格森之大误“在把绵延即认为是时间。其实绵延只是绵延而不是时间”。③ 柏格森将“绵延”视作“真的时间”，但张氏认为，绵延只是外界的创变性。同样，他指出我们以“三量向”（Three dimensions）言空间、以直线论时间，所言所论都是主观的认识，而非外界本身。

必须承认主观的空时“至少有些根据在于外界”，这是张东荪与康德的重要分歧。康德常以“经验性的实在性”与“先验的观念性”来论说时空④，并以此强调时空作为先天的直观形式具有普遍必然性。“经验实在性”只是强调时空作为先验的直观形式必将客观地作用于经验对象，但并不意味着时空与任何外在的东西“相应”，否则就有违“先验的观念性”了。但是张东荪明确主张“空时”作为格式，其形态是主观的，而其作用必须有“外界的根据”。

就空时与“直观”的关系，张东荪亦有独见：

空时不是由直观得来的，不过直观却必具有空时二格式罢了。因此我修正康德，以为空时是与直观有关的格式，而不是由直观得来的格式。⑤

与康德一样，张东荪也认为空时作为主观格式，与“直观”有关，但他否认“直观”是“空时”的来源。前文已述及张氏“生物中心说”，他承认生物都有根据于生物性质的“若干根本的格式”，此说与金岳霖“官觉类”的讨论相仿。他进而强调“我们却不专靠这些原始的格式”，这些格式在与外界的交互作用中可以得到锻炼且改变，从而能更加“密切”地作用于客观的外界的实际。在此我们亦可见“主客关系”在张东荪认识论中的特殊意义，以至于他要在空时之外又加入了“主客关系”或“能所关系”作为直观格式。也就是说，他认为主客关系不仅与内外相涉，同时也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内在关系。

张东荪与康德之疏离还表现在两类“先验格式”及其关系上，他不仅将“空时”等直观格式归于“生物的”，而且视“设准”（即范畴）为“文化的”“社会的”；无论是空时还是“名理”即逻辑律都是可变的——这些都使得他的“先验格式”带上了经验的烙印。他认为康德因为重视“综合”，所以把“直观”（即空间与时间之格式）“概念”（即范畴）和“理念”（Idea）视作三个层次；但他从多元论出发，否认这种“层次”，而强调所谓多元是“平列的”，是通过分析“认识”的事实而发现的彼此独立各不相同的成分，由此他也否认康

① 张东荪：《认识论》，第53－54页。

② 张东荪：《认识论》，第54－55页。

③ 张东荪：《认识论》，第54页。

④ “经验的实在性是说，凡是在经验中被给予的对象（即现象），时空都对之有实实在在的（客观）的作用和效力；先验的观念性是说，时空既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其属性，也不是经验事物‘本身’的属性的抽象，而纯粹是主体的认识能力本身具有的先天直观形式，这就是说，如果抽调感性直观的各种条件，时空就什么都不是了，就是无了。换言之，时空是实在的，但只是对经验现象而言，因此又不是绝对实在的（不是对物自体而言）；时空是主观的，但并不是像来自后天的感觉质料（色、声、香、味等）那样纯属主观的、偶然的、因人而异的，而是来自先天的直观形式，是对经验对象具有普遍必然的效力（因而具有‘客观性’）的。”（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87页）

⑤ 张东荪：《认识论》，第49页。

德的“统觉”。

张东荪认为，将时空视作“直观上的先验者”（The a priori in intuition）的思想是“康德的真贡献”，他则在延续此说的基础上做出了若干修正。他还说若以近代物理学上的相对论来证明空时为格式的观点，“亦未尝有何不调和处”。一般的意见都是以康德时空观为牛顿时代的表述，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动摇乃至推翻了牛顿和康德的时空观。但张东荪引用斯墨资（J. C. Smuts）的观点，认为爱因斯坦（他译作哀斯坦）最大功绩即在“把属于内界的与属于外界的设法分开”。在他看来，康德的主张就是确定时空是“主观的”，是属于“知者”（Knower）而非“所知”（Known）。但若认识以经验为起点，“则我们只能有相对的，私的空时”。他的结论是：“所以空时既是相对的便可以说必是主观的。”①

与张东荪坚持爱因斯坦相对论证实了“空时”的主观性形成一特殊对照的是徐志摩。他是中国最早翻译并撰文系统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他在文末强调相对论的哲学意义时说：

“相对说”决计不是无聊的玄思，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相对说”是科学试验的结果，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且随时可用科学方法来复验的。第二“相对说”根本没有玄思的意味，因为他完全脱离人生的感情意气经验种种，是纯粹唯物的性质。寻常哲学多少总脱不了以人心解释自然。相对说是彻底彻面抛开人间世的理念。我们人类一部知识史是发源于以个人为宇宙中心一直到放弃个人观念，这“相对说”可算最后的一期。此是“自然法”的最后胜利，其范围之广为从前所未曾梦见。这是一个佛家所谓“大彻悟”，从此吾们勘破宇宙原来是一个盲目的机械，他那结构完全不是人的官觉所能推测。……我们只要跟着科学走，总错不到那里去。②

在此，徐氏强调了科学方法的价值，同时认为相对论令人产生“纯粹唯物”的彻悟，即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是一个与人的官觉无关的“盲目的机械”，人应该摆脱个人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爱因斯坦也同样留心哲学尤其是认识论，他将认识论视作“踏上哲学的薄冰”，主张离开科学的认识论只是“空架子”，缺乏认识论的科学只有原始、混乱的材料。爱因斯坦在一次与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讨论中曾说：

康德哲学把作为容器的空间和时间，同作为内容的物质和力分隔开来，结果引起了二律背反；而爱因斯坦的概念则以容器同内容的不可分割性作为特征，这就使我们摆脱了二律背反。③

爱因斯坦指出，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即是构成科学的先验概念。他认为人们确实需要这些概念，然而他却无法确定这些概念究竟是如康德所言是“先验地给定”的，还是如后来彭加勒指出的“任意的约定”。另一方面，他区分了作为“容器”和与“内容”有关的时空。就此而言，张东荪关注的是时空作为“容器”的相对性及其与个体主观经验的关系，他几乎完全否认“内容”即物质的实在性；徐志摩在意的是时空性质与物质运动的不可分，热衷“相对论”时期的他试图彻底摆脱时空的主观性。或许可以说，张氏重视认识论，更接近康德；但徐氏强调科学理论和方法及其价值，其实更贴合爱因斯坦的理论本身。

三、空间、时间与宇宙架构的“层创进化”

张东荪认为哲学家可以从不同方面研究空间时间，比如康德将空时当作“格式”（forms），就是从认识论上而言。从其他视角，空时可以被视为“关系”（relations）“属性”（properties）“凭藉”（mediums）“范畴”或“概念”（categories or concepts）“架构”（structures）等等。以空时为“架构”，便是

① 张东荪：《认识论》，第52页。

② 徐志摩：《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徐志摩全集》第1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58页。

③ ［美］爱因斯坦著：《对康德哲学和马赫哲学的看法（报道）》，《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53页。

从宇宙论的立场来说的。他明确主张有一与“主观格式的空时”有别的“宇宙架构的空时”存在，两种空时对于知识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张东荪认为康德的认识论为新的形而上学预留了地盘，其认识论是替哲学开先路的；与此有别，他的多元认识论不仅是居先的而且是自足的，并且其中已经隐含着宇宙观：

我把形而上学中的本体论根本上取消，而仅留有宇宙论。不过这个宇宙论却就隐隐约约宿于认识论中。这就是说，我们研究人类的知识即大致上可以窥探宇宙的结构，所以我们即根据在知识中所呈现的宇宙结构可加以推论而扩大之，便成为一个宇宙论。因此我的认识论同时乃就是一部分的宇宙论。①

具体而言，张氏将包罗万象的宇宙万物归并为五项：物质、心灵、生命、时间和空间。由知识的推扩而形成的宇宙并无本质，只是由种种关系组成的“空架的结构”：“这个架构的构成不是完全自然的，而必须有我们的认识作用参加其中。因为我们不能拨开认识以窥这个架构的本来面目。但这个架构在认识中虽非本相，然而亦决不十分大亏其本性。”②

张东荪指出，作为“架构”的空时与作为“格式”的空时是不同的：

当作架构的空间可不限于“三量向”……而在认识上的空间却不能有第四量向。架构的时间亦可不限于过去现在未来一条线。而主观的时间却不能有另外的时间方向。③

架构的空时之“量向”和“方向”有着多种可能性，而主观的格式只能是“三量向”的空间和“一条线”的时间。张氏后来还从“其根据”（their ground）“其形态”（their form）和“其性质”（their nature）的“三重叠合”来阐释空时，即“空时……同时是根据于外在者，同时出现于知觉上，又同时为造成概念”，也就是说，“外在者”是形成“空时”的根据；但“空时”之为知觉上所现呈的“形态”，同时必须有心理上的依凭，“先就感觉言，每一个感觉必本具有若干‘伸张性’（extensity），同时亦必有若干的‘住留性’（duration）。由感觉的伸张性而拼合起来就成为空间。至少是两度的空间。如果是视觉动觉触觉连合起来，三度的空间便可造成。至于时间，由感觉的住留性而再加以记忆与想像就可造成一个‘顺列’。”④“根据”与“形态”都是本来具有的，但“形态”或“格式”的空时不同于“条理”或“架构”之处是何以形成的？张氏会说因为空时形态是“生物的”，只有这一种空时能透过人类的重重帘幕。

张东荪认为，作为“架构”的宇宙并非静态的，架构总是不断“进化”的：

我们的这个宇宙乃是无数架构互相套合互相交织而成的一个总架构；其中无数的架构间又时常由缔结的样式不同而突然创生出新种类来；这个新种类架构的创出，我们名之进化……我们主张这个世界虽是自性本空的一簇架构，但这个架构却自身在那里进化，常有新种类突创出来，这种进化的发见在思想上可谓是启了一个新纪元。⑤

这个只是由各种关系所组成的“空架的结构”的宇宙与佛教的观念有些类似，但二者最大的区别即在张氏的宇宙观有“进化”的观念。他认为“进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变化”（becoming），即一个架构复杂至某种程度会突然增添一些新的成分，使原有的架构突然变成一个新的架构；二是这些先后创生出来的新种类必须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具体而言，宇宙架构的“进化”如同一座层层向上的“极高大的塔”：

宇宙的最根本的结构（即架格）止是空间时间；由这个最元始最素朴的再添创出来一些，便成了物质；由物质再创进一层便有所谓生命，

① 张东荪：《认识论》，第93－94页。
② 张东荪：《认识论》，第89－90页。
③ 张东荪：《认识论》，第105页。
④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33页。
⑤ 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34－35页。

由生命而心灵，这样便是宇宙的塔形全图。①

物质、生命和心灵，是宇宙的由低到高突创的三个层次，这个世界就是由“物的结构”进化到“生的机构”，再进化到“心的结构”的过程。无疑，张东荪的“架构”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揭示了宇宙的发展过程以及具体的类似量变引起质变的创化方式等。他还指出：

由物到生，由生到心，这显然的三级，其所以为增进的缘故即在通体合作的性质增加一级，其综合统御的范围增大一层，其活络自主的程度增进一步。②

关于宇宙的构造我们以为既不是呆板的机械论，亦不是先定的目的论，乃是于呆板中逐渐创出来活动，就是于不自由中逐渐创增自由。③

张氏反对各种唯心主义的神秘的目的论，也批评将宇宙仅视作无生命的机械运动。他的“宇宙”是有人的认识活动参与并创造出来的，从物质到生命到心灵的塔型进化的过程，也是宇宙越来越自由的过程。而且，他将空间时间视作“最根本”的架构，是早于物质、生命和心灵的“最元始最素朴”的架构，这个似乎也有些难以自圆其说。④

四、创造的人生与超越“今此”的生活

宇宙越来越自由是因为出现了越来越自由的心灵。张东荪认为，宇宙观是人生观的基础，人生观是从宇宙观中导引出来的：

因为人是宇宙中的一部分，生活（换言之即生命现象）亦是宇宙中的一部分。若不知宇宙全体的性质，很难决定人生的性质。所以讲到人生观就非讲宇宙观不可。

人生是随着宇宙的创造进化的大潮流而行，其前进并无预定目标，好像放花炮一样，一放以后，便散发开来。⑤

以“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为基础的人生，当然也是以“创造”为基本特征的。张东荪是柏格森《创化论》和《物质与记忆》最早的中文译者，也是柏氏哲学在中国蔚然成风的首要功臣。他认为“人生就是好像放花炮”，这明显是柏氏“意志自由”和“生命冲动”的翻本。这样的人生一方面是“无目的的”，没有确定的方向或归宗；另一方面，人们却可以决定并实现此“这个花炮样子的人生”的具体模样：“你虽不能要他不放，而你却可以要他放得径直些，或放得倾斜些”。所以，人生虽“无目的”，但人可以努力“加上去一个目的”：

所以就目的而论，可以说人生的目的由无而到有，由微而到著，由隐而到显。就自由论，亦是由无自由而渐自由，由小自由而甚自由，自然的机械性与人文的自由性完全是一个互相消长的东西。但两者始终分不开。自由即在机械中，不在机械外。目的即在自然中，不在自然外。⑥

与柏氏生命冲动背道而驰的是，张东荪认为，这种能“窥透机械，阐解自然”的能力是人的理智，理智不仅能动摇“固定的呆板的没有丝毫破绽的宇宙”，同时也通过奋发向上的创造过程提升自我：“由素朴人而自己改造以成文化人，而对于文化义不断地在那里改造，去其渣滓……其人是智明更切一层，主宰更强一层，圆活更大一层，自由更甚一层，所以这种人生观又是创造的人生观。”⑦ 张氏认为“人格”是“最进化的”，是宇宙进化中“最高的突创品”，与下一级相较，人格中新增的要素即是“周详

① 张东荪：《人生观 ABC》，上海：世界书局，1929 年，第 36－37 页。

② 张东荪：《哲学 ABC》，上海：世界书局，1931 年，第 108 页。

③ 张东荪：《人生观 ABC》，第 33－34 页。

④ “因为著者总觉得空时只是一种‘架构’（frame work）对于知觉固然有排配的作用，而对于事实却没有解释的作用。”（张东荪：《知识与文化》附录三，第 228 页）虽然在此张氏之目的在于说明为何不如怀特海那样将“空时”理解为“概念格局”（即范畴），但他始终也没有说明“空时”架构如何“添创”能成为“物质”。

⑤ 张东荪：《人生观 ABC》，第 4 页、第 38 页。

⑥ 张东荪：《人生观 ABC》，第 82 页。

⑦ 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 56 页。

的思辨力与亲切的责任感”，因而人格的特质即是“自觉”：“自觉就是自己晓得自己处于宇宙中的真正地位。详言之，即对于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以外的存在都有充分的认识。”①

“创造的人生观”意味着“时间”的异质性，这与生命的“原子性”相应。且人生的价值不仅是变化，更是理智“一天一天广大起来，一天一天扩张出来”的进化。张东荪说，生活本来只是“人人当下所经历之事实”，“吾人之一见一闻一喜一悲一言一动即为生活”；生活的性质是“新鲜活泼”，即此时此地（here and now），他也称之曰“今此”，“亲历验此‘今此’者则谓之曰生活”。② 若以横线直线分别代表空间和时间，则时间与空间之交点，或横直二线之切点即“今此”。生活始终不离“今此”但也不限于“今此”，因为“现在”的“今此”中有对于过去之“今此”的回忆，或对未来“今此”的希望，所以“生活绝不限于今此，而于此时空之切点以外必有放大之范围，特此范围各人不同各生活不同耳”。③ “今此”是生活之本身（the living in itself）或生命之自身（life in itself），并无意义；理智如同置于“今此”的灯之光，光之所耀处，赋予生活以价值（life value）。理智之光逐层地增强、放大，就可以不断超越“今此”，“以时空交切点之今此言之，乱中求定，浑中求分，所以超越空间上此地之限制也；流中求住，杂中求纯，所以超越时间上此时之限制也。”④ 超越“今此”，在张东荪看来即是以理智之“觉”（consciousness）“知”（to know）化除情欲，从而在空间上超越“此”、时间上超越“今”。所以他也将创造的人生称作“化欲主义”的人生，主张以理智利导情感，“把下等本能移到高尚方面去”，提高文化修养。他强调“化欲主义”与纵欲、绝欲乃至节欲都不同，但在理欲之辨上，张氏主智的人生观与冯友兰的觉解相去不远。

张东荪重视文化的价值，并强调超越“今此”，意味着突破生活的“有朽”，进而追求“不朽”。他说：

> 所谓朽与不朽只是指其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进化上所贡献的影响大小广狭而言：其影响小而狭的即是朽；大而广的便名曰不朽。而实则无论如何大而广，而终不能波及宇宙进化的全程，所以不朽亦终必变为朽。可见这原是程度上的等差而已。不过人生于世总希望自己能内而把自己的人格愈提愈高，外而把所处的环境愈改愈善，则其所为之影响可谓于可能限度内已届极远极广极大的程度了；如此当然可以尊称之曰不朽。⑤

张东荪以是否有利于宇宙进化为“朽与不朽”的评判标准，特别强调真正的不朽并非指“曾在宇宙间的地位”或“在时间上存续较长”，而是以是否“依着进化”而言。“进化”与“时间”不同，他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之所以可以称作“不朽”，并非就“时间”而论，而是因其能“顺着宇宙进化的本性，依了人生向上的天职”，从而推动文化并有助于宇宙之进化。他也认为“留芳”或“遗臭”可能都会为后人所知，但“其性质不同：一个是真致有确实的影响于后世人生；一个只是人人口上的一句空话罢了。其分别即在一实一虚。遗臭是虚的，因其人的姓名虽在人人嘴里，但其人于文化的增进没有关系，他遂不能有真正的影响及于后世人生。我们可以说遗臭不是不朽，而乃是朽”。⑥ 张氏以“进化”为“不朽”的实质，就此而言，他的“不朽论”与主张“天地境界”的冯友兰，或宣扬“所有人”的“一切言行”都是“不朽”的胡适都有不同。牟宗三曾主张个体生命不能“只是横剖面地挂搭在现在的时空中”，“只限制在眼前时间的这一瞬、空间的这一点”，而必须有“纵贯的文化背景”；个体生命是有限而短暂的，但文化生命是生生不息的，而且“它可以从自然生命跳上来找一

① 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41－42页。
② 张东荪：《道德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220页。
③ 张东荪：《道德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220页。
④ 张东荪：《道德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221页。
⑤ 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55页。
⑥ 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53－55页。

个超越的根据来润泽提撕我们的自然生命”，从而使个体生命能成长、扩大、持久且充满意义。[①] 牟氏主张文化生命对有限个体的护持，与此相较，张氏的人生观更朝向未来，更彰显个体的创造对文化进化的贡献。

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张东荪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有所调整，其转变的重要表现即在此时他跳出认识论的视域，试图从“社会学”“文化”出发以解释知识、思想。比如在《理性与民主》中，张东荪把人类文明进程分为三期，并分别以“死之威胁”和“生之威胁”来区分前两期文明，并认为第二期文明虽是充满生计威胁的“病社会”“丑文明”，但其冲破了第一期文明（史前文明）中的“宗教与迷信性”，出现了“机器之发明”和“理性之抬头”，由此孕育了近一二百年以来的第三期文明的种子：前者满足了人类“节省人力而大量生产的需要”，是文化进步的征候，只是这种“需要”被资本制度“利用而演成罪恶”。但机器之发明靠的就是人类的智力与理智，机器的出现即标志着人类“理性的抬头”，而此理性之光可以使人类文明由第二期进至第三期。他认为理性的功用在于能戳穿、揭破社会的病态与人性的缺点，从而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与合理的人生，因而“人类只要有理性便自会有其乐观的前途”。“死之威胁”和“生之威胁”都源于生命之有朽，唯有“理性”才能推动宇宙的进化，实现人生之“不朽”。这与其早期主张人格之特征即在“自觉”，或以理智之“觉”“知”超越“今此”一样，都是相信唯有理性之光才能照亮历史、并开辟有前途的未来。但此时他试图从社会学的乃至人类学的视野审视进化的根本和历程，进一步探究了文化增进的内在动力和具体规律，使其“进化论”有了更坚固的基础和更现实的价值。

五、“礼”与中国文化中的空间时间

张东荪学术路向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就时空观而言，在早期的认识论体系中，他将空间时间理解为“格式”，并认为此主观的“格式”与外界的“条理”相应。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这只是西方人，甚至只是康德时代的时空观，他开始探索中国人的时空观及其产生的原因。

张东荪指出，中西哲学都讲“理”，但是西方的理是“理性”（reason），中国的理是“条理”（order），这个“条理”与之前认识论中的“原子性”等三条“外界条理”不同：

> 中国人所谓理与“礼”字相通。礼字表示社会秩序，即所谓伦常。人事上的秩序是谓人伦，将此种秩序性使之普遍化，遂成所谓条理。故理学始终是指纹理分界条辩而言。所以便是秩序之意。不过中国人始终不分外界的秩序与内界的秩序之不同，更不分道德界上的秩序与自然界上的秩序之不同。换言之，即没有人事秩序与天然秩序之分别。[②]

张东荪认为，中国之“理”始终是伦理，与西方所谓“物理”（physical law）完全不同。中国文化大部分属于历史，但中国历史的要义并非记载往事，而是意图“以往事而视为垂训于将来”，因而特重道德。中国思想的主题是“天人关系”，注重整体，以“礼”为源头和实质的“理”所揭示的条理实为伦理秩序，其旨在实现天人相通，或部分对整体的适应。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影响也决定了中国人的时空观：

> 我以为拿“空间”与“时间”二概念为例，便可显见有些相关联的地方。先言空间，中国思想上始终没有“匀同普遍的空间”（homogeneous space），而只有方向不同的处所，如东西南北中央等。我们遂可说中国人不注重空间之有数量性（quantitative character of space），而只注重空间有“性质”（qualitative nature）。于时间亦然，只承认有春秋冬夏等季节，而未发见有永流无间的时间。可以说中国人只见到“期间”（periodicity），而不见到“时流”。这亦是只承认时间之有性质上不同，而不

① 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全集》，第 29 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年，第 87－88 页。

②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第 120 页。张东荪亦以此“条理”批评冯友兰“新理学”以“共相”解“理”。

注重于时间之有数量上差别。①

他曾指出，“有些民族抽象能力未十分发达，便只有‘地位’‘地点’等观念而无空间；有‘先’‘后’‘古’‘今’而无统贯一切的时间”。② 中国文化视空间为“相对的位置”（relative positions），将时间理解为“周期性的变化”，因而中国文化中没有形式化的、抽象的空间或时间，也不注重空时的量的区别。进而，他认为“这些都与社会政治有直接关系”：

空间成为“中外等级的秩序”（heirarchical order），时间成为周期轮转的秩序（pereodical order）……前者足以助社会之有阶级与身份，后者足以解释政权之有代替（即革命）。故严格讲来，中国思想上只有“转换”（alternation）而没有“变化”（change）。因此中国思想不注重于“进展”（progress）。其故由于中国人不视时间为直流下去的，乃只是分期轮替出现的。同时空间亦不是均同普遍的，故不能把空间从时间上抽除出来。因此进展颇有困难，致不可能了。③

西方文化重科学，科学以“物”为研究对象，“必须把物从无限的空间与长流的时间上抽出来”，因而空间时间是独立于“物”的“空的格子”。中国文化重历史，历史是关于“事”的，“事”是一次性的，总是发生在具体的位置或时刻。中国古代注重于“事”而甚于“物”，其对事（尤其是人事）、历史的关注，“乃是想以历史为镜鉴，把往事来作教训。不过这却暗中含有事之重复性。于是，进步的观念就被循环的观念来代替了”。④ 中国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公式”诸如“五德”“三统”“三世”等主张，都是将革故鼎新视作某种循环，所以时间往往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张东荪认为“进步”是西方16世纪后独有的概念，而“西方人所以能有进步观念，实由于他们独对于时间观念特别注重”。⑤ 所以现代中国若要发展科学、建立民主，就必须“调和”与“沟通”中西文化，包括汲取西方空时观的理论成果。

张东荪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自己的知识论研究之所以从注重康德哲学而转到社会学，把“社会学与知识论的合并”，把“文化发达与社会学配合起来看”，是缘于对哲学家贡献的思考，“我觉得，我们所学的学问如果与人类幸福无关，则其价值都是可疑的”。⑥ 在此转变中，他不仅扩展了知识论的研究，更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试图更多地发现和解释中国的传统、探究中国的未来。他认为创造、革新是哲学家之责，所以他认为：哲学家应该做的是文化到了不能不变时，就要出来做思想领导。

结 语

叔本华将康德的时空观喻为其哲学皇冠上的两颗钻石之一，罗素则说康德的时空观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见康德的时空观在其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康德时空观对20世纪中国学界也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很多思想家，如张东荪、金岳霖、牟宗三、李泽厚等，对时空问题的探讨就是由康德启程的。他们重视时空的一体性，重视时空形式的客观性及其对知识的奠基性意义，这与朱谦之、梁漱溟和方东美等心仪柏格森的“绵延”，更关注时间，并以“情”“意”为时间奠基，从而更注重时间的内容和动力不同。金岳霖和张东荪等都致力于改变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和认识论不发达的情况，以知识论为背景讨论时空问题，是中国现代时空观的重要内容和理论突破。早期张氏主张“多元认识论”，认为空时是直观必须的主观“格式”，但必与外界的“条理”相应，主客观之间有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并主张“空时”架构的多样性，无疑都是富有创见的。学术转向之后张氏尝试将社会学与知

①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84页。

②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第35页。

③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第119页。

④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13页。

⑤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13页。这是张氏对斯宾格勒观点的转述，他引用的斯宾格勒（张氏的译名为“许滂格拉”）的英语原文是：Without exact time，measurement，…Western man is unthinkable. 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揭示了时间于西方文化的意义。

⑥ 张东荪：《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什么》，《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

识论结合起来，并更关注阐明中西时空观的不同特征并力图探究其原因。他强调“时空格式”的经验性和可变性，与金氏主张“所与”的呈现和时空架子的“根据”等也有相通之处。[①] 这与熊十力一脉，以及贺麟等侧重从“心”出发理解时间的路数颇不相同，但他们都注重宇宙的进化与创造、超越的人生。张氏坦言其有得于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以文化为“唯一的决定力，以决定思想的内容”，将空时的差异仅归于“解释”，甚至以政治作为中国的空时观的直接原因，其实并未达究竟。如同在“多元认识论”中，他试图到知觉之外寻找“空时”的根据和原因，并看到了人的社会性，但他又否认外界条理的客观物质性，似乎也没有真正刨根问底。就此而言，他并没有真正走出以主观出发论知识的格局。近半个世纪以后，冯契、李泽厚将“实践”引入认识论，进一步推扩了张氏的空时理论。

■责任编辑/张瑞臣

“Order” and Space – time: Zhang Dongsun’s Revision of Kant’s View of Space and Time

FANG Yo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In his early days, Zhang Dongsun discussed the “foundation”, “form” and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epistemology. He emphasized that time and space were “the cognitive a priori”, but must correspond to the “order” of the outside world, and work or improve through the cognitive activities of “subject-object interaction”. He also understood space and time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advocated a way of life beyond “now and here” based on the emergent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With changes in learning and thinking, he also tried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ern views and the Chinese views of space and time and their foundations from the anthropological and culturological perspectives. He regarded himself as a revisionist of Kantianism. His thinking of “order” and space and time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 is an attempt of transcending the view of space and time based only on pure subjectivity and definite forms and a response to various challenges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s, which has expanded the research vision on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space; time; order

① 比如金氏特别强调我们是“利用架子”，“因为我们并不以为架子是我们创造的。……架子的时间也是有根据的。单位可以不同，而根据一样”（金岳霖：《知识论》，《金岳霖全集》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91页）。

改革开放以来周来祥美学中的“物性”思想之演变

高　峻

［山东师范大学，济南　250014］

摘　要：在对马克思主义之“物”的阐释与解读中，形成的“物性”思想之演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时期美学之“中国特色”的独特体现，其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中国化的产物。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周来祥先生之和谐美学中的“物性”思想之具体演变，以管窥中国新时期美学之发展逻辑：其以改革开放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客观物）和形式观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改革开放初七八十年代的“关系说”“和谐论”等“物性”思想标志着和谐美学的正式形成；八九十年代则关注物之“整体性”（系统论）及“历史性”；21世纪进一步提出“超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物的现实性”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构建的意义。

关键词：周来祥；和谐美学；物性思想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46－08

引　言

当代中国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1929.8.12—2011.06.30），不但经历了中国当代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发展繁荣的积极践行者和辛勤奉献者，如其治美学近六十载，创建“和谐美学学派”，八十高龄还重新招收博士研究生等。[①] 季羡林先生赞誉：“周来祥教授独树和谐美的大旗，既能自圆其说，又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巍然挺立于美学之林，为中国美学界增光添彩。”[②]张岱年先生也曾高度评价：“周来祥同志提出‘美是和谐’，并作了详细的论证，这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周来祥同志宣扬‘美是和谐’，是对于当代美学的一项重要贡献。”[③]

周来祥先生之“和谐美学”（又称“和谐论美学”或“和谐自由论美学”）作为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学派之一，其理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抽象上升到具体”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为方法原则，坚持美是审美关系的和谐自由说，提出“三大美”论——古代的和谐美、近现代的崇高、丑、荒诞及当代的辩证和谐美，并融合了中西美学思想及古今艺术形态。

“和谐美学”之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改革开放至1985年（方法论年，第

收稿日期：2022－06－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项目号：21CWYJ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峻，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参见邹华、李增杰：《周来祥学案》，《上海文化》2016年第10期。

② 季羡林：《美学文选》，《光明日报》1999年3月12日第5版。

③ 张岱年：《谈〈周来祥美学文选〉》，《光明日报》1999年8月13日第5版。

二次美学热期间）为形成期，[①]“美是和谐”观点的提出；（2）1986 年至 20 世纪末为完善期，以自然科学方法（系统论等）完善辩证思维，以及崇高、丑及荒诞等范畴的发展；（3）21 世纪为成熟期，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结合“和谐社会”理念，倡导现代辩证和谐。纵观“和谐美学”思想之形成、完善与成熟历程，可发现其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思想等领域休戚相关，并直接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的自我建构及中国式理论话语的生成。

中国当代文艺及美学的发展逻辑，其深层是“物性”思想的演变，即对马克思主义之“物”的阐释和解读时所产生的断裂、扬弃与聚合。这种“物性”思想，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美学之“中国特色”的独特体现，其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中国化的产物。追溯其发端，则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时）对于马克思之物质客观性的强调。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践美学”把人的主体性纳入物性的思考中；90 年代的“生命美学”揭示了生命系统中物的本能欲望与原始智慧，而“生态美学”则说明了物的系统本质；21 世纪的“身体美学”又指明了人的物性维度及与世界的一体性，“生活美学”则进一步凸显了“精神”（审美）的物性特征；另当代艺术的具体实践亦是朝向“物性身体”和“物性材料”的积极探索与不断深化。[②]故本文欲从“物性”思想之演变的视角，分析周来祥先生“和谐美学”各阶段“物性”之维，以解释其思想的美学史意义。

一、改革开放前的“物性”思想：客观物与形式观

“和谐美学”思想的具体形成虽是改革开放以后，然每一种思想必有其根源，只有“追本溯源”，从源头出发才能更好地梳理思想发展之脉络。周来祥先生美学之源，则为其改革开放前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之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社会物质生产力较低，在政治权力话语的引导下，学术界开启“唯物”或“唯心”的讨论，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社会实际活动中，却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陷于唯心主义之泥潭。通过周来祥先生 1957 年合著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1958 年的《乘风集》以及相关论文中关于“客观物”及“形式”的讨论，我们可以管窥先生之美学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物性”思想之形态。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及《乘风集》旨在批判胡适、胡风、俞平伯等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美学，从而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历史唯物论”新美学。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物质（客观现实）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原则；宇宙的实质是物质，世界的同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又劳动（物质生产实践）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艺术（思想形式的上层建筑）。[③] 这里的“物质”是指“客观物”（实物），按物理学相关定义即“质量的空间分布”，它强调了物质的客观性（独立于意识）及本源性（宇宙的本质）意义。其实质是“唯物主义一元论”，意识（精神）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反映如何可能？因为意识具有物质性（现代脑科学，如“意念控制机械手”可佐证），这也就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关于“物质—精神”的二元对立局限。这种对“客观物”的关注，有利于推动当代日常实用之物的意义维度（生活美学）研究，并促进艺术的及物性。

① 到底以何年作为周来祥美学思想分界点仍存在争议，这主要是关注点不同而导致的。如邹华“以 1987 年重论美与崇高的关系为标志”把周来祥先生的和谐美学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参见邹华：《崇高的历史提升与更新——周来祥美学简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本文以 1985 年，即“方法论年”为界限，其一是为显示思想转变时更大之文化背景，其二时周先生之代表著作《美学问题论稿》《论美是和谐》均于 1984 年已出版，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与美学研究》一文则表发于 1986 年。

② 参见朱立元：《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1 期；蒋永青：《中国当代艺术的逻辑起点》，《文艺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③ 参见周来祥、石戈：《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4－5 页；周来祥：《乘风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第 23－24 页。

除了强调马克思之“客观物”外，周来祥先生五六十年代的“物性”思想还体现在有关“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该时期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较强，以“十七年文学”为例，要求反映时代精神，题材多限于“歌颂、回忆、斗争”，重在塑造典型和英雄形象，而忽略形式的创造或对形式持否定的态度。周来祥先生则反对情节（它同时也是内容的因素）是构成艺术形式的因素。”① 我们可以看出“情节”把“形式—内容”作分裂的二元对立的理解，“在政治方向、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之后，只要作品的思想感情是健康的，其艺术形式是愈美愈好”。② 何谓艺术形式呢？它是“艺术对现实作美学的、感性的反映时，所使用的诸物质材料的总和，就是将艺术形象固定和表现时所使用的诸物质手段的总和。艺术语言、结构，③ 它同时可以作为形式和内容，这也就取消其两者间的决然对立。“颜色、声音、线条（形体）是构成艺术形式美的物质材料。各种艺术所使用的自然材料是不同的，文学运用语言，音乐使用声音，绘画利用颜色，雕塑则离不开石膏、木、石等物质材料。”④ 周来祥先生充分肯定了物质材料具有自身“形式美”的意义：“形式美指自然物质材料的美及其在空间、时间排列组合上的形式规律的美。这种美就其自身而言就是一种独立的美，是不依赖于其他内容的。”⑤ 这些“物质材料”，周先生有时亦称其为“艺术媒介”⑥，因此他反对完全弃绝内容的现代“形式主义”（如野兽派），认为他们把“人降低到动物之下”⑦。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曾描述马奈的绘画为“实物画”，认为其画作中的画框、画布、色彩、线条等物质材料具有自身的艺术韵味，形式同时也即就是容，而非作为媒介存在才有意义。⑧

二、改革开放初的“物性”思想：关系说与和谐论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受政治权力话语的束缚减弱，加上西方现当代思想的译介与传播，从而促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美学热”，有学者称此时期为“新启蒙”（主体性觉醒）时代⑨。李泽厚等先生通过对马克思之《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形成了以“实践”为逻辑起点，以“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现当美学的主导流派——实践美学，其最终发展为四大独立形态：李泽厚“社会积淀美学”、周来祥“和谐美学”、蒋孔阳“自由创造美学”、刘纲纪“实践本体论美学”。

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强调实践（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美和审美关系产生的根源。这相较“主观派”（吕荧）⑩、“客观派”（蔡仪）和“主客观统一派”（朱光潜）有了深化，因为只有通过“实践”，“异质同

① 周来祥、石戈：《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第 90－91 页。

② 周来祥：《浅谈艺术的形式美》（1962），《美学问题论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10 页。

③ 周来祥先生称“情节”为内形式，其与“内容”具有同一性。“形式具有双重的形式，相对于艺术的主题思想和情感观念来说，人物、情节、场面是内形式。内形式和艺术内容直接相关，人物、情节、场面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艺术的观念意蕴，在这个意义上，内形式也就是内容。”（参见周来祥：《论形式美》，《论美是和谐》，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53 页；周来祥：《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34 页。）

④ 周来祥：《浅谈艺术的形式美》（1962），《美学问题论稿》，第 105 页。

⑤ 周来祥：《论形式美》，《论美是和谐》，第 143 页。

⑥ 周来祥：《论形式美》，《论美是和谐》，第 153 页。

⑦ 周来祥：《浅谈艺术的形式美》（1962），《美学问题论稿》，第 102 页。

⑧ 参见［法］福柯：《马奈的绘画：米歇尔·福柯，一种目光》，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13－43 页。

⑨ 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⑩ 对此学界仍有争论。如邹华认为：中国近现代美学研究曾根据吕荧关于美是人的一种观念的论点，把他的美学思想归为主观论一派，但这不过是以美学观点表面上的相似而作的归类。事实上，吕荧与主观论有着很大的差别。主观论以美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论证美；吕荧的全部美学则是以生活论证意识，以生活论证美。（参见周来祥主编：《中国美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726 页。）

构”的对象世界与主体之人的关系才得以可能，才使得人能够以审美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但是“实践”（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仍只说明了包含审美关系在内的人对社会、自然之一切对象性、自由关系的来源，并未能显示指出美和审美关系的特质。

正是在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与区分之中，周来祥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和谐美学”思想体系。周来祥先生认为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人的对象和主体自身，并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审美（美）、实践（善）和认识（真）等三种对象性、自由关系。[①]只有“和谐”才是美的独特性质，“人的劳动实践，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美产生的根源和一般的本质，和谐自由则是美的根本特征。美的特征也是美的本质的表现，和谐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自由”。[②]可见和谐实际乃是一种关系属性。

周来祥先生曾总结其“美是和谐自由关系”的说法，认为其有两个区别与其他美学流派的重要特点：一是在美的本源上主张主客体的客观关系说，二是在美的本质特征上主张关系的和谐自由说。[③]

何谓“关系”？“关”为牵系、涉及；“系”是关联、牵挂。它揭示的是“物”与自身及他物的亲密性可能。黑格尔曾说：“实存着的东西包含有相对性，也包含有与别的实存着的东西多方面的联系于自己本身内，并且作为根据反映在自身内。这样，实存便叫做‘物’。”[④] 这是说“物”并非孤立存在的，到马克思则言“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周来祥先生在《艺术典型的辩证思考》（1981）一文中便指出“事物的本质就是关系，就是事物的内在矛盾，事物的根据、内因”。[⑤]此后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中的“系统论”以及对“二元对立”观念的辨析，都是对“关系”范畴理解的进一步理解与阐释：“关系就是一种存在，属于本体，而且其比那最早的实体存在还更深化一步。事物的本质不仅是由过这一事物本身来决定的，并不仅仅是这一事物本身的属性。一个事物，它的本质是在一定的关系中决定的。”[⑥] 这指明世界的本体或本质是由实体（物）与实体（物）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的。[⑦]“关系”范畴提出的意义在于它将具体物放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结构上来把握，此超越了实体性、对象性思维，而上升为关系性和系统性思维，从而能在综合与整体的观照下全面而具体地把握（事）物的性质和变化。

在对“关系”的探索中，周来祥先生提出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并认为审美关系作为人与现实对象（自然、社会）的一种关系。它有客观的方面——美的本质、美的形态；主观方面——美感、审美类型、审美理想；以及主客观统一产生的高级形态——艺术。故而美学研究应以审美关系为轴心、为中介，把美、审美、艺术这三个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⑧]到20世纪90年代时蒋孔阳先生同样把“审美关系”当作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问题，如他在1993年出版的《美学新论》中打破了美的实体论而进入美的关系论；到《美在创造中》（1997）则进一步确立了关系性思维。

何谓“和谐”？“和”为协调、一体，“谐”是调和、统一。它关联于西方之“harmony”范畴与中国古典“中和”之美。最早在《我们时代的美是对立的和谐统一》（1980）一文中，

① 周来祥：《马克思的“人化自然”学说和美的本质》（1983），《论美是和谐》，第125页。

② 周来祥：《论美是和谐》（1981），《美学问题论稿》，第83页；周来祥：《论美是和谐》，第119－120页。

③ 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1985），《再论美是和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

④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7页。

⑤ 周来祥、栾贻信：《艺术典型的辩证思考》（1981），《美学问题论稿》，第264页。

⑥ 参见周来祥、戴阿宝：《我与新中国美学发展五十年》（2004访谈），《三论美是和谐》，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3页。

⑦ 周来祥先生认为物质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实物或实体的物质，如物理世界的中子、质子、电子、夸克等。一种是各种实物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关系“场”的存在形态，如“引力场”“电磁场”，爱因斯坦也曾沉思过支配各种场的关系的“统一场”。（参见周来祥：《文艺美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⑧ 周来祥：《论美学研究的对象》（1980），《美学问题论稿》，第4页；周来祥：《美学三讲》，《论美是和谐》，第250页。

周来祥先生就正式提出“美是和谐”的理念，并指出其“不是指广义的美（它包括崇高、优美等），而是指狭义的美，只是优美。美是和谐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是真与善的和谐，是主体实践自由地符合着客观规律。它的感性特征是小、柔、曲，滑、细、静”。[①]故而“崇高”并非“和谐”而为“对立”。在《论美是和谐》（1981）中又进一步概括为：“美是和谐，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自由和必然，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和谐统一。”[②] 可见“和谐”乃是“物”[③]（广义）的关联一体状态，是人与物（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统一。到《再论美是和谐》（1985），周来祥先生进一步明晰：“和谐是一个深刻的美学和哲学范畴。它起码包括这样紧密联系的四层含义：（1）形式的和谐。人、物、艺术、外在因素的大小、比例及其组合的均衡、和谐（形式美）。（2）内容的和谐，即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情感与理智的和谐（内容美）。（3）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生活美，特别是艺术美更以此为主要的要求）。从唯物主义说，首先是内容的和谐，内容的和谐要求着形式的和谐，并规定着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和谐统一。（4）而内容的和谐又决定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和谐自由的关系，这种和谐自由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完美的、全面发展的人（在艺术中则体现为理想的典型和意境）。”[④] “和谐”揭示了“物”之间的一体亲密关系。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并非源始境域，而是抽象思维的结果。形式美及内容美均是即客观物（实物）与人之身体感觉的相互构建、[⑤] 亲密显现。

三、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物性”思想：系统论与物的历史性

1985 年，中国当代文艺界称其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深化至“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系统科学理论进一步从自然科学方法向人文科学（尤其是美学研究）方法拓展。[⑥] 此时开始至 20 世纪末为和谐美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此时期涌现出了继“实践美学”之后的又一个中国当代重要美学流派——生命美学。[⑦] 受时代的影响，和谐美学的研究与生命美学一样都带有明显的系统论思维方法痕迹。因从系统论的整体属性出发研究美，周来祥先生认为美不是对象本身的一种属性，美非纯客观的，也非纯主观的，而是由和谐自由的审美关系所规定的关系属性、系统整体属性。[⑧]

那么，“系统论”又是什么呢？“系统论”实际是对“关系”范畴的进一步深化。其由贝塔朗菲（Bertalanffy）在《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1968）中确立。系统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系统的属性决定要素（事物）的属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个系统，就会在其本体属性上增添新的系统属性。故要素（事物）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它的本体属性；二是系统的

① 周来祥：《我们时代的美是对立的和谐统一》（1980），《美学问题论稿》，第 84 页。

② 周来祥：《论美是和谐》，《美学问题论稿》，第 30 页；周来祥：《论美是和谐》，第 73 页。

③ 广义的“物”除指自然外，还包含社会和人的维度。如周来祥先生认为：《乐记》所说的“物”不仅是指具体的物，而且还接近于“物质”这样一个抽象概括的哲学范畴，“政治”包括在“物”之中。（参见周来祥：《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文艺理论的奠基石——论公孙尼子的《乐记》》，《美学问题论稿》，第 456 页。）又“人类主体是整个物质世界发展的一个环节，就主体的整体而言是一个感性的物质存在。”（参见周来祥：《文艺美学》，第 106 页。）

④ 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1985），《再论美是和谐》，第 190－191 页。

⑤ 周来祥先生称为“主客体的‘双向同构’关系”。（参见周来祥：《论文学主体性及其历史演变——兼评刘再复同志的《论文学的主体性》（1986），《再论美是和谐》，第 454 页。）

⑥ 可参见颜槟：《怎样对待美学研究的不同方法——1985 年美学方法论探讨述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2 期。

⑦ 生命美学流派以潘知常的《生命美学》《生命的诗境》《生命美学论稿》《生命美学的视界》和封孝伦的《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生命之思》为代表，其认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并非“实践”而是人类系统中的“生命活动”，强调“物”与人的同构性，突出了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和自由意义。

⑧ 参见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自序第 1 页。

整体属性，即系统质。在这两种属性中，尤以系统质为根本。事物的质首先是由系统质来决定的，对事物的认识首先是把它放在特定的系统中，把握其系统整体属性。同时系统论指出，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不同的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功能又反作用于结构，对结构产生制约作用。[①] 例如，一棵树，其本体属性即为木质，当其在自然系统中，它的系统质为生命（吸收阳光、雨露、养料而生长），而当其在人类社会的系统中，它的系统质可能为用具（木桌椅）、景观（绿化）等。而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作用，足球运动中的阵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进攻型的“三三四”、防守型的“一四三二”（混凝土型）等。

系统论还认为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原则，其体现在系统的自发生、自运动、自调节、自发展、自实现的整个过程之中。即任何系统作为开放系统，都能通过与环境进行适当交流而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行动，无须外力干预而凭借内部矛盾的运动实现自身的发展。这同普利高津（Prigogine）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1969）具有共通之处。耗散结构理论则认为在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中，通过与外界环境信息的相互交换、相互渗透，它有一种自组织、自调节的力量，不断地克服无序性，当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可能发生突变，从而使事物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的有序状态。[②] 系统论思维，尤其是“系统质”概念，是对传统绝对“客观物”观念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其对于当代超越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探索具体积极的意义。

周来祥先生和谐美学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由于“逻辑”是指思维（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因而体现周来祥先生“物性”思想的主要是“历史”范畴，即物的历史性。周来祥先生认为美、崇高，丑、荒诞等并不是自古迄今都存在着的永恒并列范畴。它们之间有一种历史的发展，美是古代的总范畴，崇高是近代的总范畴，而丑与荒诞则是现当代的总范畴。古代的美是单纯的主客体未经分化的朴素和谐一元美，而近代的崇高（广义）则是对立的复杂多元的美。到了现今，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替代形而上学思维，新的时代将创造一种新型的辩证和谐美。[③]以上所讨论的“美”（广义）的历史性，实际也就是人（主体）与物（客体）之关系的历史性。从主体（人）而言，古代时依存于客体（物或对象），感性与理性是均衡和完满的，缺乏自觉与个性意识；到近代以来，或高扬理性，或感性主导，最后则是主体的矛盾、消解。从客体来看，古代和谐中的人与物一体未分，客体是基础；近代崇高中的客体，特别是现实主义中的客体是本质的、必然的，而不是经验的类型的；而在丑的客体中，特别是在自然主义中，更向个别、感性、偶然、纯客观方向发展；到了荒诞，则完全否定了客体本体的统一性本质，一切都变成为无中心、无深度、无意义。[④]此言“物”的历史性，或“物”的时间性，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中永恒不变之“物”理念的消解，突显了“物”自身的变化与创造性。只是这里的历史性（时间性）仍然是一种“线性”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观念，它只能描述已发生的却不能很好地说明“未来”对于当下之“物”的经验构成的意义。

四、21 世纪的“物性”思想：超二元对立与物的现实性

自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始，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逐渐成了中国当代文艺美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法变革的关键路径。已近耄耋之年的周来祥先生仍笔耕不辍，力图

① 参见周来祥：《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与美学研究》（1986），《再论美是和谐》，第 82－83 页；周来祥：《文艺美学》，第 39 页。

② 参见周来祥：《系统论原则与美学、文艺学的方法论》（1987），《再论美是和谐》，第 108 页；周来祥：《文艺美学》，第 42 页。

③ 参见周来祥：《在矛盾、冲突、激荡中追求着和谐》（1991），《再论美是和谐》，第 5－7 页。

④ 参见周来祥：《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前言第 3－6 页。

实现自我超越，通过对“二元对立”概念的辨析、对“和谐社会”理念的阐释，更加丰富与完善了其和谐美学理论体系。此时期“生态美学”[①] 成为影响广泛的美学流派之一，与“生态美学”一致而集中体现周来祥先生“物性”思想形态的是“超二元对立”理念及“物的现实性”相关问题。

关于“二元对立”，周来祥先生认为事物的矛盾（差异）可分为“对立”与非对立的“杂多”两种。二元对立是指矛盾的双方在本质上截然相反且相互依存，如美与丑、善与恶、正与反、是与非等。而非对立的杂多，本质上并非完全不同，如酸与甜、咸、辣，如东与北、西与南，其性质各自独立。[②] 周先生又把“对立”分为绝对的对立和辩证的对立。绝对的对立即双方彼此之间就不能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如“物自体”（康德）概念，主客二元对立观念等。[③] 而“二元对立”的解决需要辩证思维方式：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矛盾思维着眼于斗争，即一方消灭一方；而和谐思维则强调统一，双方相互融合。[④] 而事物在和谐中诞生，在和谐中运动，和谐贯穿于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正因为和谐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存在于一切事物自始至终运动的全过程，和谐才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才是事物存在的内在根据。[⑤]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近代的产物，在古代则是主客未分、一体和谐的前二元对立状态。[⑥]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对象化的力量大大提高了人改造自然、塑造社会的能力，因而从某方面可以说二元对立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但“二元对立”模式在当今产生了诸多恶果，如人与物的隔阂、人与人的冷漠等，因而我们需要超越二元对立，重寻世界的亲密性。但对于其超越，周来祥先生曾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主客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⑦] 不单需要认识和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因此与作为思维方式的“超二元对立”相关的是“物的现实性”问题。

有研究者指出：“‘和谐美学’不但是‘和谐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审美的总结，同时它也直接参与、促进、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美学’思想从现代辩证思维的方式出发，吸收和强调了传统思维和文化的合理成分，关注人与自然、社会及人的和谐统一，对建立‘和谐社会’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⑧] 在当今中国，周来祥先生认为“物”的现实性，就是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代状况及现实基础，其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主体与对象高度和谐统一的社会。[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但创造了彻底

①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严重，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形成了反思人类的生活方式的“生态美学”。而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倡导人物是曾繁仁先生（周来祥先生山东大学同事），代表著作如《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生态美学导论》等。生态美学是一种系统论思维模式，倡导普遍联系、生态平衡、物种平等，从而实现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等二元对立范畴的统一。生态美学的兴起受“物”（自然、社会）的现实性影响，其内在特征乃是生命性，及其延伸的宜人性，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而周来祥先生亦曾撰文专门讨论生态美学。（参见周来祥：《生态主义和生态美学》（2006），《三论美是和谐》，第 73 页。）

② 参见周来祥：《论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产生、发展及辩证的解决》（2005），《三论美是和谐》，第 2 页。

③ 参见周来祥：《论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产生、发展及辩证的解决》（2005），《三论美是和谐》，第 4－5 页。

④ 参见周来祥：《辩证思维·矛盾思维·和谐思维》（2007），《三论美是和谐》，第 73 页。

⑤ 参见周来祥：《现代辩证和谐论与和谐的普遍性》（2006），《三论美是和谐》，第 52 页。有学者认为周来祥先生事实上把差异作为了本质存在，因为周先生对于事物存在的划分就只有本质对立和非本质对立（即杂多）。（参见周纪文：《和谐论美学思想研究》，济南：齐鲁出版社，2007 年，第 286 页。）这其实没有很好地理解周先生的意思。事物产生之前的“混沌一体”状态便是原始的和谐，“和谐”一旦开始分别，于是事物产生，物与物便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为对立，也可能只是杂多。

⑥ 参见周来祥、韩贻杰：《半个多世纪的和谐》（2007 访谈），《三论美是和谐》，第 511 页；周来祥：《文艺美学》，第 138－139 页。

⑦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27 页；周来祥：《论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产生、发展及辩证的解决》（2005），《三论美是和谐》，第 17 页。

⑧ 刘继平：《和谐自由论美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23 页。

⑨ 周来祥：《从和谐美学看和谐社会》（2007），《三论美是和谐》，第 77 页。

解决和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现实基础，同时又开创了辩证和谐大发展的时代。[①]如它为现代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且其自身就是新型和谐美的现实展现。周来祥先生对“物的现实性”问题的强调，指明了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正式形成、发展、成熟的周来祥先生之“和谐美学”理论体系，以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物性”思想——“客观物”与“形式”探讨为思想基础和根源，并伴随着中国近四十年的美学发展之逻辑。其中的“物性”思想不断生成和演变，形成了丰富、独特、而又具有当代意义的诸种形态：20世纪改革开放初，与李泽厚先生等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实践美学”相异，倡导“关系说”与“和谐论”；至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同“生命美学”相区分而又联系的“系统论”与“物的历史性”；21世纪，再一次自我超越，生成与“生态美学”呼应的“超二元对立”与“物的现实性”。周来祥先生和谐美学中的“物性”思想之演变，究其本质是其美学思想与时代之政治、社会、思想等相互促进的结果。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的各具自身特色的中国新时期美学流派，如“生命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等之“物性”思想又是如何演变的呢？这是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瑞臣

An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of “Materiality” in Zhou Laixiang’s Aesthetics in the New Era

GAO Ju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lucid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teriality” concept of Marxism, the evolution of the “materiality” ideology is a unique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which is fundamentally a produc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s. By exploring the specific evolution of Zhou Laixiang’s concept of “materiality” in his “harmony aesthetics” in the new era, we can glimpse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it was based on the Marxist material (objective) and formalist view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the “relationship theory” and the “harmony theory” of the early 1970s and 1980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marked the acknowledged establishment of harmony aesthetic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wholeness” (systems theory) and “historicity” of things; in the 21st century, it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super-binary oppositio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ality of things”.

Keywords: Zhou Laixiang; harmony aesthetics; materiality

① 参见周来祥、韩贻杰：《半个多世纪的和谐》(2007访谈)，《三论美是和谐》，第511页。

空间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取向与逻辑

范　俊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摘　要：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空间共同体内涵，通过合理的历史地理叙事来增进各族人民的空间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这种逻辑既符合现代民族建构的一般性规律，也贯穿于中华民族从近代到当代的整个建构过程，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以往的历史地理叙事结构中，也存在着诸多不恰当的方式，甚至暗含着对中华民族空间共同体属性的解构性力量。面对这样的问题，须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历史叙事中地理线索，基于国家性、民族遗产、历史记忆的多重视角持续强化地理要素在中华民族叙事体系中的功能，加强中华地理符号的塑造，对冲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中的负面因素。

关键词：中华民族；空间共同体；历史地理叙事；中华地理符号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54－08

正因为地理“不仅是表现时代意识的载体，而且是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①]因此凝聚“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的空间共同体意识，就成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维度。这种共同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强化，离不开中华民族历史叙事体系的有效建构，而进行历史地理方面的叙事又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要义。这就决定了梳理和挖掘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历史地理要素，强调或重新表达好其与中华民族的密切关联，以此推动“共同空间”认知的牢固，进而激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构成了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但在运用历史地理进行空间共同体叙事的实际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一些削弱甚至是解构中华民族空间共同体属性的“反向叙事”的存在，如“中国本部”概念、“崖山之后无中国”论调以及“新清史”的“元清非中国论”等就是典型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取向和逻辑进行再次反思，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话题和政治话题。

一、现代民族的空间共同体属性及其地理叙事

关于民族的界定众说纷纭，未有标准性定义，但在某些方面却有一致性认识，诸如文化共同体的属性。抛开试图统一的定义不论，民族无论如何与地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个“空间共同体”。可以说，人们正是基于共同的地理空间，开展着共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形成着共同的社会关系，塑造着共同的文化，进而“聚众成族”持续着民族

收稿日期：2022－03－26

作者简介：范俊，云南大学副研究员。

① 谢龙新：《生长的“时空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叙事刍议》，《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的壮大与凝聚。这种空间共同体属性，首先为传统历史文化民族以及“族群”所拥有，此后又被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建设浪潮中出现的现代民族所继承。相比传统民族，现代民族的空间共同体认同更具建构性色彩，人为的历史地理叙事在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空间共同体”属性的传统内涵

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前，不同区域的人们在地理空间、自然环境所促成的社会关系纽带基础上，聚结为“族”的关系。今天，人们通过“追认”的方式，将这些族体称为“民族”，即传统历史文化民族。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空间”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这个空间不一定是地理上明确的界域”。① 所以它们“不仅是地理方位的社会实体，而且是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有机组合体”。② 可见，地理空间与民族关系密切，是构成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同时，地理还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独特的服饰、饮食、建筑等文化特征，以及生产方式、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等都要受到地理环境影响，有时地理环境甚至影响着民族性格。对此，孟德斯鸠就提出，气候是民族性格、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决定性因素。③ 黑格尔也认为地理环境是民族精神产生的“自然的联系”。严寒和酷热的气候迫使人们竭尽全力面对生存的压力，无法自由地建筑自己的民族精神，造成了“历史的真正舞台”在北温带。④

所以，后期人们在探讨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与精神特质时，总是不约而同地将“制约每个民族发展的力量——它的自然条件”作为考虑因素，⑤ 在民族历史中寻找与之形成发展相关的地理因素进行民族起源的叙事，以此凝聚民族精神与品格。

（二）“空间共同体”属性的传承与发展

在西方率先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阶段后，匹配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建设随之开启。在“以族构国”的时代，国家与作为国族的民族紧密关联。通过民族历史地理叙事构建出一个完整明确的民族整体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方式。此时，领土已为民族国家的关键构因，具备领土属性的地理在民族安全与发展上的决定性影响进一步放大。领土空间的获得以及被承认往往成为现代民族政治共同体的重要追求，地理空间叙事也演变为现代领土叙事，被纳入民族国家叙事体系之中。这一时期，领土往往被叙述成民族生存空间，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它都被描绘为民族发展的基础保障。而且，国土空间规划还被述说为国家安全建设内容，通过特殊地区开发、居住空间安排、道路交通改善等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也常见于民族叙事内容之中。

更重要的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相关的民族认同理论认为心理的赞同，即“我属于哪个民族”，在民族发展中意义重大。以构建民族认同心理为中心的叙事自然受到关注。区别于民族叙事，民族认同叙事是要创造一个以“民族”为中心的完整的文化形象、文化符号和价值体系，以此增进民众对民族的归属感和忠诚性。⑥ 其中，共享的历史记忆，共有的风俗习惯，共赏的文学艺术往往都是常用的叙事要件。

民族认同叙事者显然洞悉到，民族是被“‘位置’在空间里，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的共同体，⑦ 民族地理空间能够在“建立某种总体 、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⑧ 基于这种认知，叙述民族的特定地理空间，提供各群体互动的“各种场景”，⑨ 以此弥合和弱化族群差异，制造出统一性体验，也成为了民族认同叙

① 谢龙新：《生长的“时空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叙事刍议》，《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② 常宝：《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的理论认知与内容框架探索》，《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③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70－271页，第326－329页。

④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2－83页。

⑤ 郭圣铭、王晴佳：《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0页。

⑥ 李赞：《“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逻辑结构和历史意义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

⑦ ［西］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⑧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⑨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05页。

事的重要策略。

在这种策略中，讲述与地理相关的民族共同苦难、共同辉煌，制造出民族共同的经历和感情，构成了主要叙事方式。常用于疆域边界划定的山脉河流，位于领土疆域边缘的边疆，事关民族国家主权独立与未来发展的首都等重要省区地域，甚至是完整的地理空间版图，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叙事内容体系。即使是一些与民族历史瓜葛不强的风景，也通过突出其独特“地理个性”而被赋予精神文化意义，变身为民族精神、形象的象征。例如，19 世纪初，丹麦把“复原和改变欧石南生长地变成了一项民族事业”，以此“复兴民族精神”。①

二、中华民族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地理叙事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中交流融合而成的传统民族，也是在近代抗击西方列强入侵的强烈危机下觉醒凝聚而成的现代民族。晚清以降的现代建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属性和现代属性有机地连接起来的过程，历史地理叙事在其中发挥了纽带性作用。百余年的现代建构历程，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空间共同体属性以及历史地理叙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纵深性的历史长时段视角。

（一）西方势力冲击下传统历史地理叙事的消解

王朝国家运用“天下”“四方”“四海”“九州”地理概念进行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华夷之辨”所造成的分离趋向，开始了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② 但这些地理概念仍有分散各地之意，于是古人将“家”这一最能凸显紧密关系的血缘符号与之并联，创造出“天下一家”“四海一家”的叙事话语，弥补了先前整体性不强的缺憾。虽是如此，但抽象的“天下”“四海”无法提供中华民族的确定性位置，客观需要一个感知性更强的地理定位坐标，“中国”“中华”便应运而生。“中国”最初指代“中央之城”，即为天子所居之地，而“中华”却指“宫城的中间之门”③，都指中心方位。围绕中心，“天下”诸族汇入中华民族“一家”的想象具有了可能。

晚清以后，在西方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裹挟与西方势力冲击下，“天下”想象崩溃，“万国一员”认知开始形成。时人运用地图表达这一新认知，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世界地图的使用。此时，颓势尽显的中华民族，亟须振奋民族自信，走出列强环伺吞并的危机。此时，中国具备的辽阔疆域、温带气候等地理条件便被纳入民族自信叙事范畴。如中国“有东方亚细亚之什九”等言说。④

（二）国体转型与现代历史地理叙事的开启

现代中华民族建设初期，地理因素在两个方面参与民族起源叙事。一是以地理环境证明起源必然性。如梁启超认为黄河、扬子江、阿尔泰山、喜马拉雅山是中华文明独立于世界五大文明的地理屏障。⑤ 二是以地理要素叙事中华民族文化起源同一性。如“黄河流域之肥沃”是开“东方文化”重要地理原因等论述。⑥

此时，在与西方列强力量悬殊的对比中，时人感受到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力量，催生出引入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愿望。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是民族，领土主权是构成民族国家的必备要素。由此，国土、城市、区域常被纳入中华民族叙事以塑造其国族属性。如此时被外强侵占的“青岛”“山东”“澳门”“香港”等被作为丧权辱国象征用于爱国主义叙事。面对边疆危机，也有全民族同保“一个疆土”，同拥“一个主权”，⑦ “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⑧ 若是同意列强“内、外藏方案”，则

① ［西］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3 页。

② 李艳峰、王文光：《商周时期华夏族的民族观、地理观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

③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0－11 页。

④ 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 年，第 1 页。

⑤ 《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4252 页。

⑥ 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第 1 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 年，第 1 页。

⑦ 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论文集》第 1 集，上海：中华书局，1925 年，第 25－27 页。

⑧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49 页。

“大好江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①] 等以地理论说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一部，不应分化的叙事。

民国政府初期，中华民族“同一地理空间”的叙事进一步强化。时人自觉将中国领土喻作“海棠叶形”，提醒此为中华民族同一活动领域。[②] 域内五族“在地理上又唇齿相依”，[③] 处于边疆地区的蒙古、西藏与新疆“同为中华民族之一部”，“皆处于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相同地位。[④]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地理叙事中华民族团结一体达到高潮。一是民族危机、民族抗战决心与力量叙事中的“一地”，如“松花江”“卢沟桥”“长城”“黄河”等最为典型。二是民族复兴叙事中的“一域”，如“西南”“西北”地区被叙述为中华民族复兴根据地，[⑤] 表明国内“各民族‘一体化’整体自觉”转化为“实现整体的独立发展与强大的‘现代化’自觉”。[⑥] 三是民族整合叙事中的“边疆”。如主张边疆同胞称谓以地域区分，将“少数民族”简称“边民”“边胞”。[⑦] 四是中华民族版图叙事中的地理面积。如“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⑧] “面积有一千一百十七余万方公里”等中华民族版图一体的强调。[⑨]

（三）民族国家时代历史地理叙事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家的中华民族建构完成，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属性具备了实质内容。建国初期，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关系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叙事重点，于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以及“自治区、州、县”行政地理成为叙事常见内容。同时，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一批纪念性地理标识开始用于叙事中华民族近代历史记忆。传统中华历史地理要素继续被叙述同时，在内涵上开始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创作于 1959 年并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运用长城、黄河、长江、珠穆朗玛峰等地理要素图像式地参与中华民族磅礴精神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历史纪元。在继续强调民族政治平等同时，少数民族加快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叙事主题。“各民族杂居散居的地方”“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开发”等区域地理话语被创制出来，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叙事。在强调保障少数民族政治平等地位同时，突出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同样受到重视。长江、长城、黄河、泰山等中华文化标志属性继续强化塑造。与之前更加强调它们中华民族文化、中华儿女团结抗战形象不同的是，此时的叙事更加侧重其腾飞昂扬、包容开放等象征内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新的人文景观也进入中华民族共同经历叙事体系之中。一批新的地理要素在叙事中变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例如“大庆”代表着“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⑩] “红岩”“井冈山”“延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⑪]

一路走来的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建设的新命题。以更多的地理要素强化中华民族实体性与主体性地位的叙事前所未有、旗帜鲜明的突显出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辽阔的疆域被叙述为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华民族故土与家园，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则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标志。社会各领域也开始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发掘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交融团结历史、精神文化特性、民族遗产属性的地理要素，挖掘讲述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内

① 喇秉德：《简评“西姆拉会议”前后马麒的历史作用》，《回族研究》1993 年第 2 期。
② 常乃悳：《中华民族小史》，上海：爱文书局，1928 年，第 1－2，7 页。
③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第 429 页。
④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 646－647 页。
⑤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28 页。
⑥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 222 页。
⑦ 杨思机：《“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 1905 年到 1937 年》，《民族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⑧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星期论坛》1937 年 1 月 10 日。
⑨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807－808 页。
⑩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93－394 页。
⑪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 401 页。

涵，从而将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推向了更加重要的地位。此时除进入叙事的地理要素内容范围扩展外，一些国家层面的地理叙事机制得以创制，如以长城、大运河、黄河、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为内容的国家公园叙事机制。

三、以往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特点与功能

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凝聚与建设中，人们总是在思考着它为何物，如何凝聚，怎样发展等诸多问题，由此形成各种观念认知和政策措施。将这种认知与政策叙述出来便是中华民族叙事。由叙事引导社会形成对中华民族全面认识，也以此激发出更高层次的心理体验，最终可以化作全社会共同性建设力量与行动。认知完整表达即是叙事情节功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激发则是叙事情感功能发挥。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叙事体系中，围绕着共同地理空间、共同空间中的具体地理要素的叙述，为展现中华民族历史脉络以及引导共同社会思想情感形成提供了支持。

（一）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特点

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地理空间与要素或多或少的参与了各面向的叙事。一是空间位置叙事参与。中华民族经历了自在与自觉两种状态，“天下”“中心”地理概念以及地图图示，叙述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不同的只是前后两种完全相反的位置认知，但都达成了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由松散转化为紧密的叙事功能。二是中华民族来源叙事参与。“昆仑”“黄河”与屏障型地理环境叙说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三是领土叙事参与。近代以来形成的“秋海棠”地形，“山东”“青岛”“卢沟桥”等城地，“边疆”与“腹地”等区域，“一千一百十七余万方公里”等面积构成中华民族领土叙事话语。四是民族共同发展叙事参与。“西部”开发区域、“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叙事话语。五是民族关系叙事参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叙事中，突出的是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关系。六是文化记忆叙事参与。“黄帝陵”“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等构成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等共同记忆的叙事内容。六是民族精神叙事参与。“长城”“黄河”“卢沟桥”“井冈山”“大庆”等折射了崇高的国民性格，叙述的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当然，这些地理要素并非只是可以叙事中华民族的一面，对部分地理要素而言，是在多方面进行着叙事参与。

叙事参与中的地理要素，部分采用是其能指意义，另外的则是其所指意义。“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符号学的概念，“符号指称的外在形态称为‘能指’”，符号所表达的对象意义成为‘所指’”。[①] 具体的领土面积、“中国境内各民族”“各民族杂居散居的地方”等更多的是地理的能指运用，“长城”“卢沟桥”等更多运用的却是所指。部分地理要素的所指意义并不天然具有，而正是在参与中华民族叙事中，从最初纯粹的地理概念的所指，转化为中华精神文化与政治内涵的能指。可以说，地理要素参与叙事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地理符号的塑造过程。一系列的塑造机制促使了这一转化发生，从而诞生出最能表征中华文化的地理符号。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叙事中，四种机制塑造了中华民族地理符号。一是理论研究。理论揭示了地理要素与中华民族关系，这是部分地理符号意义得以生成的基础。如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论述。二是文学书写。文学作品运用比喻等手段描述景观，注入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等意义。如《沁园春 · 雪》描绘了北国壮丽风景，歌颂的却是中华民族磅礴伟力。三是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以不同于文学的声、图等表达方式，异曲同工的创设了地理符号。例如《黄河大合唱》对于“黄河”符号的塑造。三是科考活动。地理科考能够宣誓政治主权，塑造出地理的民族主权内涵。如 1927 年组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对于“西部”民族主权的强化与塑造。[②] 四是国家政治。国家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纪念建筑，设置“大运河”等国

① 王仕民、陈文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表达》，《民族学刊》2021 年第 9 期。

② 陈申、徐希景：《中国摄影艺术史》，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305 页。

家公园，举办“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运用国家货币等政治工具，或是领导人重要讲话，塑造出一批民族历史纪念景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民族自然地理遗产等重要地理符号。

（二）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功能

地理要素通过参与中华民族“源从何来”“分布何处”“发展如何”“如何发展”的叙事，表达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征、历史脉络、物质基础，一定程度上支持着叙事认知功能的实现。由此情节形成的叙事文本在社会传播中获得叙事对象的接受，他们在理解、联想的过程中形成各种情感体验，叙事的情感功能也由此徐徐获得。

首先，制造出中华民族一体感。诸多地理要素用于中华民族多面叙事，形成了同一性文化起源、同一性文化润泽、同一性居住领土、同一性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一体形象。素未谋面的公众接收中华民族叙事中的地理信息，理解附着之上的同一性特征并由此及彼的联想，同属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心理感受进而生成。近代地理要素参与中华民族叙事并非停留于简单的话语陈述，而是伴随着列强入侵，国土沦丧的现实背景，背景的催化作用增强了同一性感受，并且在现实的“保卫全中国”的斗争实践中得到不断训练而进一步强化。

其次，塑造了中华民族身份感。民族身份感就是民众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感受，它来自于对民族独有民族性格、领土特征、空间位置的感知中形成的独特性体验。于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而言，人民英雄纪念碑、长城等叙述出中华民族顽强不屈、不畏牺牲、爱国奉献等独特的民族性格。版图具象化形状，精确的面积数字，独特的地理环境展示出这一共同体共同栖居领土的具象化特征。“黄河”“黄帝陵”等文化血缘地理，叙述出中华民族自成一脉的历史。

再次，赋予了中华民族归属感。中华民族一体感、身份感都属于自我意识认知，既“我是谁”，而中华民族归属感则是更高层次的心理情绪，是在自我意识层面上的情感升华。地理年复一年的存在，最能代表历史的久远，康德就曾认为历史悠久代表着伟大与崇高，崇高让人尊敬而具有力量。因此，地理要素纳入中华民族叙事，使其“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在制造崇高伟大形象中，“型塑民族情感”。[①] 长城、黄河、长江、珠穆朗玛峰、西部景观、辽阔疆域壮丽姿态、恢弘气势与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最能诠释中华民族崇高形象，民众在感知与想象中，对中华民族的自豪、喜爱之情油然而生。

最后，激发了中华民族发展自觉性。由对中华民族热爱到自觉推动其发展，是地理要素参与叙事的心理体验功能的再次跳跃。此间，经由地理参与政治性中华民族叙事，一般性地理转化为领土，构成了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保障。基于这种认知，民众在热爱中华民族的情感推动下，发展复兴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得以生发，继而转化为开发建设民族领土以及由此延伸出推动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自觉实践。

四、空间共同体导向下中华民族的再叙事议题

伴随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而自觉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具有同世界上其他现代民族相同的空间共同体属性。中华民族的空间共同体属性一方面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演进形成的，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也是在历史地理叙事过程中被不断强化的，又具有建构性。就其建构特性而言，采取何种叙事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叙事得当，就能够为空间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提供正当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正向”作用；叙事失当，则会削弱空间共同体属性，甚至可能会朝着“反向”发挥作用。立足中华民族空间共同体属性，可对现有的历史地理叙事进行整体反思，由此也就引发了中华民族的再叙事议题。

（一）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反思

一是地理叙事线索的非独立性。近代以来，地理要素参与中华民族叙事的肇始与高潮分别形成于清末民初以及抗日战争期间，集中在中华民族起源追溯与领土保卫方面。整体上看，这些地理要素大多隐含于宏大中华民族史以及抗战卫国动员叙事中，以整体性中华民族建构

① 李正亮：《风景民族主义》，《读书》2009 年第 2 期。

为明确导向，将单独的地理要素摘出进行专题论述偏少。少数的独立性地理叙事集中于传统的“黄河”“长城”等上，缺乏创新拓展。随着现代中华民族建构的正式完成，使得更多能够突出中华民族整体形象和主体性地位的地理空间话语理应得到强化。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四个共同”的提出更加突出了这种必须。在这之后，“坎儿井”“都江堰”等中华民族地理得到重视，有关“共同疆域”“长城”“黄河”等的单独叙事开始层出。相比之前而言，这种历史地理叙事的自觉和深度虽有提升，但相对中华民族复兴使命而言，整体上仍显不足。

二是地理的符号化建构不够。符号化就是对事物赋予意义的过程，具有了意义的事物成为表征另一事物的符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不仅需要宏大历史叙事，也需要微观具象叙事。微观具象叙事就是提取中华民族中的具象要素进行符号化加工，形成中华文化符号的过程。提取中华民族共同地理空间中的具象地理要素，赋予文化内涵使其符号化转化十分重要。借助中华地理符号显性化、具象化、扩散化特征，以及嵌入社会发挥日常民族政治功能的优势，能够在中华民族宏大历史与社会公众间铺设联通的梯子，提升民众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正向感知和深刻共情。但与此相悖的是，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华民族，除早就耳熟能详的“长城”“黄河”地理符号外，与其今时地位与发展任务匹配的典型文化符号偏少的现象仍旧突出，“珠江”“东海”“南海”“河西走廊”“天山”“楼兰”“日月潭”等理应成为中华民族关键性的文化符号，但却由于缺乏符号建构自觉而未能很好地转化或传播。

三是部分地理叙事存在偏差。部分地理的民族内涵的叙述偏差，势必影响到中华民族知识生产以及社会对中华民族的体认，进而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性，在此方面存在三个问题需要谨慎对待。第一，地理杜撰有悖于中华民族真实历史。例如，近代日本帝国主义配合分裂中国的图谋，无中生有的杜撰出“满洲”，麻痹国人对东三省的领土意识，而且还创造出伪“大元国”和“回回国”。[①] 第二，地理叙事定位不准有害中华民族建设。例如，“崖山之后无中国”的错误论调亟待纠正。第三，地理意涵脱离时代有碍于中华民族发展。地理要素民族意涵的叙说必须遵循有利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原则。而现实却是，部分地理要素还停留于传统“汉族—少数民族”等叙事框架下，不利于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例如，当前还过多以“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文化落后区”叙述边疆之地，“各民族共同开发，共同居住”以及新时代“一跃千年”的边疆叙事相对不足，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当代建设。

（二）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新思维

一是中华民族叙事中地理要素的独立性。解决当前地理要素隐含于中华民族叙事话语中，突出性不强和影响力不够的问题，需要认识到运用地理要素进行中华民族叙事的历史线索以及现实重要意义，树立中华民族地理要素独立叙事的主动意识。除继续诠释好“长城”“黄河”等已具影响的中华民族地理外，还需主动增强都江堰、布达拉宫、坎儿井、承德避暑山庄、南海在中华民族叙事中的显示度，通过独立叙述将其背后隐含的中华民族交融交往交流历史，独特民族文化气质等充分突显出来。

二是地理要素参与中华民族叙事的视角。只有找到地理要素与中华民族的关联视角，才能最大化发挥它的叙事功能。在此方面，需要重视三种视角。一是国家视角。统一的地理空间为历史凝聚和现代塑造而成的中华民族提供保障，而国家与政权统一是中华民族地理空间完整性的保证。所以说，“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的前提是国家统一和政权有力，中华民族疆域的叙事必然离不开国家视角，要非常之警惕部分西方学者模糊边疆的国家主权，将“中国西南边疆置于‘超国家’区域中进行讨论”的现象。[②] 二是民族遗产视角。顾颉刚指出“我们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应是国民“合法地承受”并“享有的遗产”，[③] 明确地提

①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前线》1939 年第 2 期。

② 罗群：《被弱化的西南边疆：“同质化”区域重塑的西方经验与反思》，《中华文化论坛》2022 年第 2 期。

③ 顾颉刚：《纪念辞》，《禹贡》1937 年第 1、2、3 合期。

出了地理的民族遗产属性。因此，突显地理要素中华民族遗产形象，理应得到加强和重视。三是文化记忆视角。突出地理要素背后承载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这是当前地理要素的中华民族叙事同样需要继续重视的一方面。

三是对冲不当中华民族地理叙事影响。当前最紧要的是对西方存在的一些中华地理的错误解读按真实史实进行纠正，尽力消除消极影响。例如，对于长城要突出“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交汇地带”意涵，尽量避免“文明冲突带”的叙说。另外，中华民族的叙事不能局限于过去，还应立足于时间中的当下与未来，随着中华民族建设核心任务变迁而创新发展。当下中华民族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的命题。根据这一变化，面向包括海外中华儿女、国际社会等更广泛群体，抛弃地理要素中陈旧的、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意义，赋予其时代新意，以此表达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团结担当等新形象，也是对冲的有效手段。例如，表征中华民族起源的“昆仑山”，就可通过当前戍边卫国、誓死守土的感人故事叙事，赋予其爱国精神意涵，升级为中华民族“昆仑精神”新符号。对于西藏的叙事同样也需突出其“一跃千年”新形象，从而避免这些地理“出现价值断裂与意义虚无状态”，动摇“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①

四是中华民族地理符号的塑造。党的二十大特别强调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要，这对中华地理符号塑造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塑造过程，需要注意解决地理符号的封闭化，克服符号不能根据历史变迁而被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的问题。这就要求：首先，解决多数地理符号形成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时期，反映中华民族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背后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符号相对不足问题，进一步塑造出更多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其次，针对已不能满足中华民族复兴新背景下新叙事需求的传统地理符号，通过各种方式，赋予其新的意义从而实现地理符号的升级。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突破之前固有的民族文化符号来自于历史记忆的局限观念，树立即使是当下鲜活实践，通过塑造也能成为中华民族符号的认识。最后，少数民族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子文化，要在叙述布达拉宫等少数民族文化特性基础上，特别注意共同性导向树立，更多地融入共同经历、共同价值、共同精神等中华民族内涵，在社会认知上实现少数民族地理符号向中华民族地理符号的转化。

■责任编辑/张瑞臣

Spatial Community: The Orientation and Logic of the Historical-geographical Nar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AN J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of a spatial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patial community of all the ethnic groups of China through a reasonable historical-geographical narration. This logic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general law of constructing a modern nation, but also runs through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early modern times to contemporary times, which plays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see that there were quite a few inappropriate ways in the previous historical-geographical narrative framework, which even hid some power deconstructing the attribute of the spatial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solve such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geographical clues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geographical elements in the narrative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ity, nation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memory, reinforce the shaping of the Chinese geographical symbols, and restrain the negative factors in the historical-geographical nar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Chinese nation; spatial community; historical-geographical narration; Chinese geographical symbols

① 冯月季、石刚：《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思想战线》2021 年第 5 期。

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必然障碍及可能路径

郭台辉，乡智洋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摘　要：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有外来引入、传统赓续、田野提炼与官方文本扩展四种路径，而对后者互通的可能性问题鲜有讨论。一方面，政治与政治学之间难以概念互通。其中，在适用条件上，政治概念的非历史性遭遇政治学概念的高度情境性；在意涵性质上，政治概念要求语义唯一性，而政治学概念是多义性解释；在目的指向上，政治概念是证成国家权力合法性，而政治学概念是理解与解释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两类概念可以有条件实现互通，包括共享价值前提与情境条件；政治概念的语义处于政治学概念多重语义的核心位置；二者内蕴共同的政治理想与目标。由此，二者互通路径是，概念及其特定语义在运用于官方文本之前，需要政治学对概念所有语义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与经验论证，一旦成为政治概念，需要政治学进一步廓清其适用范围、操作化测量与评估限度。

关键词：政治概念；政治学概念；互通性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62－10

中国政治学自恢复重建四十余年来，一开始是有意识地向外“取经”与“效仿”，逐渐转向中国本土的自觉意识，进而推动本土化的概念建构，以解释中国政治生活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因此，清理过去的历史遗产，并形成基于中国问题意识的概念建构方法论兹事体大。

迄今为止，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主要有四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外来引入。百年来养成“向强者学习”的思维，习惯性地从西方或日本引进或再造新概念，诸如“国家”“民族”“政党”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政治学基础概念无不是舶来品。在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几代中国学者不断从西方和日本引入、吸收并借鉴概念，已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中国政治学学科与世界接轨的基本框架。这些外来概念是以西方世界的政治现实为参照，把中国政治实践相应地带入世界现代化的同一进程。但中国现代化实践还有其独特性，需要以中国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导向清理与重构许多熟视无睹的学术概念。①

第二种路径是传统赓续。中国文明进程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学术界以当代的问题意识，改造或激活历史中形成的既定概念，使之在理解与解释当代中国与世界进程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如赵汀阳将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天下”概念重构为规范意义上的世界制度概念，回答世界和谐何以可能的人类难题，现今意义重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隐约可见“天下”概念的时代需求。②

收稿日期：2022－12－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项目号：22&ZD19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乡智洋，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陈明明：《新时代政治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中国政治学》2018 年第 1 期。
② 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 年第 5 期。

第三种路径是立足经验观察。得益于长期的社会调查，在田野经验中把特定社会政治现象提炼并概括为政治学概念。比如从中国地方官员治理模式提炼“晋升锦标赛模式”，用“压力型体制”描述和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过程；[①]“祖赋人权”“韧性小农”等概念试图有意识地对话西方经典理论，无不体现出中国政治学者的理论自信及其扎实的田野观察与敏锐的学术眼光。[②] 这些学术概念有利于解释部分经验现象，但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国际学术界的有效对话，是其生命力、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最重要标志。

第四种路径是扩展官方正式文件通用的政治概念。比如贺东航的系列研究展示从政治概念“高位推动”创造性转化到政治学概念“政治势能”，同时也指出政治概念和政治学概念之间的差异及其转化困境。[③] 杨雪冬和季智璇分析“治理”的概念史，充分展示不同话语主体对“治理”概念意义的争夺性形塑，并且指出日常概念、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之间的转化不是断裂性的，而是依据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实现“平滑”的概念转移。[④] 目前学界较少从概念建构的角度，评估从政治概念转化为政治学概念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必然障碍及可能互通问题。

鉴于此，本文集中讨论第四种路径的必然障碍与可能路径，包括概念建构的前提、过程和效果等方面。因此本文首先在条件、意涵与目的指向三方面理解“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之间的三重障碍，在方法论层面厘清两者的适用范围与条件；其次，以“边民”为例对概念互通的三重障碍展开经验讨论；最后尝试在共享前提、核心语义与共同目标三方面，提出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的可能路径。

一、概念互通的必然障碍

聚合社会大众，一起来过政治生活，进而结合成有高度认同感的政治共同体，得益于一套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意识形态的话语单位与体系得以生成，不得不诉诸彼此关联紧密的系列政治概念，进而凝结为体系化表达的概念集丛与结构。政治概念惟有固定的语义指向，才能确保政治观念单元以合乎逻辑的命题表达方式，关联成为意识形态（ideology）。因此，政治概念成为证成政治权力合理性的最基本符号，也是合法化宣传的最有效手段。然而，知识生产领域的政治学概念更为严谨，虽然来自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观察、提炼、抽象、演绎或导引，但不能随意挪用政治生活中使用的术语，更无法直接挪用官方文本中注重单一语义和特定意图指向的政治概念，否则其解释力与生命力有限，无法通达超乎具体或局部对象的更大范围，更难以理解更复杂的政治现象。换言之，政治学概念有必要区分于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概念。比较起来，“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至少在适用条件、意涵性质与目的三个维度存在本质性差异，以至于之间的转换面临如下三重障碍。

从适用条件而言，政治概念的非历史性与政治学概念的高度情境性之间存在障碍。政治概念的唯一意涵以单一语义来抽离社会历史语义的复杂性，因此难以同时满足意识形态的单一能指范围与对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多元阐释。结果，政治概念只能刻意回避时空条件的复杂细节，按照适用当下形势需要的标准来建构政治概念及其单一语义，对符合国家权力现实需要的特性进行本质化处理，而清理历史过程中无益现实政治需要的、异质性的竞争性语义。这样，政治概念因国家权力的需要而风生水起，也因不合时宜而销声匿迹，在政治场域的生命力随国家意志的指向而跌宕起伏。

比较起来，政治学概念的适用条件取决于研究者所设定的问题意识及所持的观点。比如19世纪前期的马克思考察以英国和法国为原型

①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荣敬本：《“压力型体制”研究的回顾》，《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6期。

② 参见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③ 贺东航、贾秀飞：《作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政治势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④ 杨雪冬、季智璇：《政治话语中的词汇共用与概念共享——以“治理”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的西欧国家，提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经典命题，而世纪之交的韦伯聚焦于其所处的德国，提出“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论断。其概念所指向的事实对象都是国家，但所呈现的国家概念却迥异，背后都是各自鲜明的个人立场及其明显的现实关怀，直面所处空间及时代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他们所提出的概念都很深刻，但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显得“片面”，一旦时空条件发生变化，概念的解释力也随之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的政治学者并不是生而伟大，而是因发现该时代的重大问题，并诉诸创造系列基础性的相关概念及其集丛来解释。由于重大的问题可以穿透特定的时空范围，或者直指人类无法解决的永恒困境，与之相应的基本概念也不断被阐释、发展、传播和运用，以至于概念的原创者被后来人奉为知识史不可绕过的丰碑。比如马克思创造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等概念依然有效，在于其所批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只要资本主义及其所处条件继续存在并长期有效，马克思主义及其系列经典的概念就依然富有生命力。

概念所处的时空条件变化带来语义的变化、争议与更替，从而带来政治概念固守语义与政治学概念扩展语义之间无法互通。这最为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中国学术概念所面临的障碍。近代中国诞生于战争与革命的浪潮中，传统中国的认知框架难以解释其眼下的社会政治变迁。急剧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激化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焦虑，只能从西方仓促引进各种概念、命题、理论模型。这种“西学东渐”的潮流是可以部分解释现代新兴的中国社会政治现象，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却拉开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距离。这必然体现为古—今、中—西之间的双重对峙。如今需要反思并“替换”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概念、理论乃至认知框架，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这些社会政治现象被“替换”的历史基因，即用中国问题意识解释中国政治实践。[①]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证是“治理”概念。“治理”是一个外来引入的概念，没有中国问题意识的引导，概念语义的所指与能指在古—今、中—西之间自由穿梭，甚至以此来解释传统中国的国家结构独特性。其目的无非是要凸显中西治理的思维与范式差异，证实中国国家治理丰富的历史传统资源与现实优越性。其实，这不是仅忽略了“治理”的时空条件限制，反而是以精确语义的政治概念来掩饰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历史智慧。这种做法以目的论方式投影至传统中国，忽略传统治理只是现代“治理”的准备过程与零碎积累，而“治理”是“现代”高度成熟情景中的社会政治实践。[②]这意味着，从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的过程可能遭遇两个极端，即因过分警惕时空条件的细节羁绊而导致学术概念“失语”，或者导致二者共同走向大而化之的“反历史”后果。

从意涵而言，政治概念要求的语义唯一性遭遇政治学概念的多义性解释。政治概念强调能指与所指的高度一致，并以国家权力确保其语义的不容置疑，高度配合并佐证权力结构的有效运行过程。政治概念是对国家干部与普通大众塑造并表达国家意志，满足权力合法化的需要，因此，语义指向与权力指向之间高度一致。其语词表述必须通俗易懂，语义表达单一、简单、直接。这才能有利于国家强有力且高效的政治宣传、教育和实践，以体系化的概念落实意识形态（逻辑一致的观念）的价值与目标追求，推动大众的思想与意志整合。显然，政治概念必须依赖于国家权力，才能实现其语义的唯一性并达成高度统一的共识。反过来，国家权力也必须依赖于政治概念，社会普罗大众经过政治宣传与教育，接受政治概念的唯一语义，可以准确理解与领会所指的国家意图或社会政治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概念的建构和推行必然遵循权力的运行逻辑，是政治社会化的关键环节，使国家与社会大众得以紧密关联。当然，其语词推广与语义共识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国家权力所能触及之处及其目的指向的时效性。

① 汪晖：《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

② 任剑涛：《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行政论坛》2021 年第 2 期。

比较起来，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建构遵循的是知识生产逻辑。政治学概念强调专业术语对特定政治现象的认识、阐释与分析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同研究者根据自身的问题导向、价值立场与具体研究需要，赋予具体的政治学概念以独特语义。能指与所指在不同研究者的使用中并不完全保持一致，对同一概念术语的不同语义阐释充满争论与竞争。这恰恰是学术观点证成、知识增长与学术繁荣必不可少的环节。学者的研究旨趣和方法直接影响政治学概念的意涵，而衡量一个概念的有效性，在于有助于解决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针对的社会政治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厘定政治学概念的唯一“标准”意涵是徒劳的，且没必要。[①] 概念的模糊和充满语义多样性的阐释，恰恰是作为最有效方式，表达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事实，反映信仰、价值等抽象观念在一段时期内的流行、包容性和可接受性。[②]

由此，从政治概念转换到政治学概念，必然面对其语义的差异化与复杂化及其导致的冲突。政治概念是“模糊的精确”，要求在国家权力允许的言说框架下保持语义界定的唯一性，并可随政治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权力的需要，在意识形态体系框架下做出适当调整。相反，政治学概念倾向于“精确的模糊”。学者受价值立场、问题意识和研究目标的不同引导，根据具体研究议题的需要而赋予特定政治学概念以不同语义，使概念的不同定义在知识生产场域持续竞争。如果没有外部物质条件的干预，没有哪一种概念的特定意涵能自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因此，政治概念从政治话语场域转移到知识生产场域，原来作为支撑力量的国家权力应悄然退至幕后，转而遵从知识生产逻辑的运行规则，接受学术界在不同视角和知识领域的讨论。否则，政治概念的唯一意涵不可避免地遭遇政治学概念场域中意涵众多不一的稀释，或者相反，学术研究没有自由的生长余地或生存空间而丧失创造性与生命力。相应的，国家权力意志的单一语义要求与对社会政治事实的多重解释之间充满张力，充分表现为并贯穿于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把政治概念的制作权交给国家，把政治学概念还给学术界。

从目的指向而言，政治概念和政治学概念都试图描绘与解释政治现象，但前者是为了证成国家权力生成与行使的合法性，而后者则是期望透视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政治概念的生命力与国家权力的目标追求息息相关，其目的是论证权力的合法性，而权力赋予概念以生命力。权力是社会价值与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政治概念则是政治权力将其意图进行语言操作化的重要工具。国家权力可以决定社会政治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并定义有关社会政治现象的具体特性，规划政治工程的未来图像，但都依赖有效而准确的政治概念来进行刻画、抽象与想象。不同的是，政治学有着不懈追求“善”的学科本质，所创制与运用的学术概念不仅为了揭示政治现象的本质与规律，还内蕴丰富的政治想象与愿景。承载事实与价值的政治学概念不完全满足现行的政治社会安排，而是指向更美好的未来政治蓝图。

由此，从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的障碍在于，丰富多彩的政治现象难以诉诸语义精确的政治概念描绘。反之亦然，一旦使用不同价值立场预设的政治学概念，论证并追求单一语义的国家权力合法性，无异于扼杀概念语义的多样性。例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者的语境而言，政治场域中的国家机器决定“阶级”的特性，确立无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分标准。不同阶级的划分大至关乎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小至影响个体的命运。但对于知识生产场域中的“阶级”而言，更多的是关注其内在逻辑，探讨使用“阶级”的变动语义及其相应的时空条件，“阶级”相较其他社会政治关系概念的优劣程度，“阶级”概念与政治学所追求的“善”之间的关系，等等。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世界的政治与知识世界的政治学之间关系纠缠不清，并不完

① 段德敏：《名词、概念与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国家”》，《北大政治学评论》2019 年第 2 辑。

② 郭台辉：《观念与概念的关系变动及其对概念构建的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

全存在泾渭分明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学概念”。区分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的差异，并非说明政治概念到政治学概念转换的不可能，恰恰相反，纯规范层面的学理澄清有利于方法论层面的实践操作。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如果对二者差异的理解与重视不够，往往带来政治概念的政治学误用，陷入概念转换的方法论误区。

二、政治概念的政治学误用：以“边民”为例

“边民”最早可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①] 然而，其内涵与外延的运用完全受制于边疆概念集群的变迁，进而随国家权力所处的时空条件变化而变动。近年来在国家权力作用下，边疆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边民”概念越来越进入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边民”作为描述性的政治概念，意涵趋于稳定，但学术界似乎无差别地“共享”现实官方正式文本的政治概念。这种“共享”恰恰忽视了政治概念和政治学概念之间的转化障碍，也陷入方法论误区。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只有当边疆成为国家关注的重要议题时，栖息于边疆的社会群体才成为解决问题的“抓手”，并受到高度关注。不同的时空条件使边疆呈现为不同性质的问题，边民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也随之变化。[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处理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需要，“边民”开始作为描述性的政治概念出现在官方文本中。1962 年中国和尼泊尔政府为解决边界勘定后对两国边境居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关于边民选籍、过界耕地和过界放牧等问题的换文》，但条约的签订只是将两国历史传统加以制度化，并未对“边民”做出明确定义。此后中尼两国新签、续签了多条关于边界与边民的协议，但直到 2012 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关于边民过界放牧的协定》才首次将“边民”定义为“两国边境地区县级行政区内的常住公民”。有趣的是，同一天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关于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中“边民”的定义是“常住在中尼边境地区的双方居民”。微妙差异的背后是，官方文本以单一语义抽离社会历史的复杂性，有意忽略具体的社会政治情境。

近年来，政治学界提出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议题，逐渐凸显边民作为治理主体或被治理主体的重要性，其身份认同亦成为研究焦点。然而，一些研究试图因建构国家认同而关注边民身份，直接挪用并改造官方文本中的前提假设，认为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相互消解。[③] 但个体的地域认同并不必然消解国家认同，相反，个体的地域认同在特定的机制作用下可能会增强国家认同，或者说，边疆居民的地域认同是以中原文化和行政管辖的国家认同为基础的。[④] 这里的“边民”概念显然不是僵化的政治概念，而是以肯定其社会政治身份的多重属性为前提，并贴上“边民”的身份标签。

问题在于，他们将具体的时空条件大而化之，使边民身份认同这一议题缺乏实地与实证调查的理论基础。实际上，边民群体的个体命运受宏观的国家政策影响，也与个体在微观层次的生命体验相关，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场域中互动，形成不同的边民身份构造与次序。唯有提供具体的时空条件，并在现实场景中对应到真实的群体对象，“边民”

① 司马迁：《史记 · 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896 页。

② 朱圣明的研究指出，秦汉边民身份在不同时空下的演化，而东北边塞（边疆）提供排斥与包容的象征功能。参见朱圣明：《秦汉边民与“亡人”“蛮夷”的演生——以东北边塞为例》，《学术月刊》2022 年第 4 期。

③ 参见袁明旭、邹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再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孙保全：《边民意识：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广西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④ 田汝康对芒市边民的人类学研究则更直接明了地指出：“无论如何，摆夷（芒市傣族边民的汉语称谓）却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我们也承认他们是中国西南边陲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优秀宗族。”参见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 页；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21 年。

才能成为有丰富多元语义的政治学概念，进而与“国家认同”发生关联，形成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政治学命题。

中国地域之广阔，社会经济文化差异之巨大，使得官方文本难以用精确的概念准确地指向栖息边疆地区的社会群体，但囿于政治现实的法理权威统一性，又不得不诉诸精确语义的政治概念。这种悖论意味着，“边民”在现实社会生活情境关系中有着丰富的意涵，而官方文本中的“边民”语义却始终如一，从而拉开了政治与政治学两类概念的语义距离。

从宏观到微观的多重社会政治关系变化决定着边民概念的意涵变迁。其中，在周边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中，政府面对毗邻国家因战争而涌入中国边境的难民群体，往往认定其为“边民”而非“难民”，从而化解国际形势与国内法律法规之间的紧张。[①] 在国内的政治关系中，政府的不同治理模式形塑了不同的边民意涵。当采取族际主义的治理模式时，边民被泛化为少数民族，采取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时，边民首先是居住边疆的公民。[②] 在政策关系中，边疆省份近年来出台“兴边富民行动”规划与边民补贴政策，力图提高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进而将边民身份关联到守土固边的国家行为。不同边疆省份对边民群体的重视程度不同，源于各地边疆问题的关注度，表现为各地补贴力度的差异。在经济关系中，“边民证”的边民资格认定是边民互市贸易的产物，脱离这层经济关系，该群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无从谈起。在日常社会关系中，“边民”明确指代中国与毗邻国边界线两侧县级行政区域内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

然而，在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场域中，“边民”概念模糊，不同学者出于各自学术立场与研究需要，对作为研究对象的边民群体有不同界定。这种界定既可以与政治概念的“边民”一致，也可以相应地对其内涵与外延做出调整。如果强制要求“边民”的政治学概念意涵与政治概念意涵保持一致，或认为能指与所指的高度一致是建构概念的“标准”，那无疑忽视了“边民”作为一个关系概念，本身没有本体性和实质性意义，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情境关系和问题意识中才得以具体界定。的确，边民补贴、边境贸易管理、跨境婚姻管理等一系列针对边民身份的地方管理策略或福利，其最终的目的都可以指向建构边民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③] 可是，“边民”并非单纯心智层次的认同建构，也不只是被创立和传播的观念。他们是通过边民证及补贴等实物进行体验与思考，以边民的符号制度形式塑造自我指代的社会群体。[④]

但是，已有的边民身份研究几乎将“边民”概念置于国家的框架下，强烈的结构预设掩饰边疆社会群体的能动性与异质性，忽略“边民”作为一种动态自我建构与被建构的社会身份实践，强化人为建构的边民与非边民之间群体区隔及心理距离，在原有所处物理空间不平等的基础上增加心理认知的新的不平等。事实上，国界作为国家权力的物理与象征建构标志，在规训边疆社会群体的同时，边民自身也在以“弱者的武器”去改变国界的呈现方式与现实意义。[⑤] 这些结构化的处理方式背后是研究者“社会工程学”的立场，他们试图从普遍化的社会政治现象生成明确的“难题”（problem），进而为国家建言献策。[⑥] 于是，在“难题”形成及其解决过程中，边疆社会群体自身的主体性被无形中遗忘、架空或抹杀了，或者处于失语状态，从而边疆研究鲜有讨论社会群体的差异化。虽说社会科学研究是“深刻的片面”，所得出的发现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相对真理，但强势的、单一的结构视角以牺牲主体

① 周鑫：《难民还是边民？中缅边境战争涌入者身份研究》，《东南亚纵横》2019 年第 6 期。

② 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思想战线》2008 年第 3 期。

③ 杨丽玉：《边界与国民：现代国家边疆建设中的双重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④ ［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 页。

⑤ 朱凌飞、陈滢至：《边界地方感与边民身份建构：以中缅边境猴桥口岸黑泥塘村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⑥ ［美］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性为前提。

人类学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方法或许对处理“边民”概念有所启发，“个人透过自身有目的的行动，编织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社会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其作出某些行动的选择；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①] 在结构过程的视角下，边民社会群体运用各种生存策略，将自身与真实的或想象的“中心”联系起来，能动地建立特定的群体身份认同。[②] 当然，这里的“中心”不一定是政治、经济或者文化意义上的中心，对于边民群体而言，边疆即中心。只有当“边民”概念不再单纯用于“治理术”，而是回归到边疆社会群体与国家互动的实践进程，真正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属性，才能从政治概念的单一语义中解放出来，转换为具有主体性与多义性的政治学概念。

三、概念互通的可能路径

政治学是一门“追求最高善的实践科学”，既脚踏实地，总结政治生活的实践智慧与策略，又仰望星空，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因此，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活实践与知识世界的政治学之间互动紧密。更具体而言，政治学的知识生产需要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活提供原料、观察场域与对象，其观察、提炼、抽象的有效性与解释力需要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得到检验。反过来，政治生活实践需要政治学提供专业知识的理解、解释与引导，并最终提供合法化论证与逻辑性检验。在此过程中，概念是二者互动的最重要桥梁。如何在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之间锚定互通的可能路径？这是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的一项重要问题。

虽然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存在必然障碍，但政治概念的学术化表达与政治学概念的政治化之间并非不可能实现。这需要相互关联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共同的价值前提、一致的核心语义及其内蕴的共同目标。以此为基础，即使在不同时空情境中传播，部分语义富有争议性，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概念与知识生产场域的政治学概念之间依然存在有效转换的可能性，实现通则性的理解与分析。

首先是共享前提，包括价值预设性与情境性两种前置性条件。[③] 萨托利提出“抽象阶梯”模式，从基本规范确立、经验路径选择、操作化测量到有效性评价，对概念建构提出一套系统方案与理想“指南”。[④] 但这并没有化解概念建构过程中的争议。这是因为，除去概念建构过程中显著的逻辑谬误可以澄清之外，概念建构面临前提预设的“本质上的争议”，更体现为价值、道德、思维结构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冲突，不同世界观之间总是蕴藏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特性，形成“理性上的不可比”，无法用经验证据、语言使用或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化解。[⑤] 换言之，前提决定结果与目标。那么，概念建构的基本前提从何而来，如何确保与之后的操作化及评价之间保持与前提预设的一致性，从而避免本质上的争议性呢？这意味着，确保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性，第一步是二者始终共享一致的基本价值规范。然而，即使是所谓的普遍规律都受到历史变迁的结构制约，所有的命题、理论和概念都只适用于特定的时空。在时空情境条件的挑战下，概念建构与转换不得不展示所遮蔽的规范基础，并证成或证伪其价值规范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唯有在同时间性与共空间性的双重条件下，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才得以可能。

因此，无论是情境性条件还是价值预设性条件，都受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重时间观念与中西之间空间划分观念的双重影响。就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而言，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关注时间上的“现在”与空间上的“中国”，即使存在历史与未来的两重时

① 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②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③ 郭台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前置性条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 年第 4 期。

④ G. Sartori，(ed)，*Social Science Concepts*：*A Systematic Analysis*，London：Sage，1984，pp. 22 - 34.

⑤ ［英］约翰·N. 格雷：《论社会政治概念的可争议性》，郝诗楠编译，高奇琦、景跃进主编：《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

间面向，都据于当下的需要相向延伸，相反，政治学概念的适用范围更大，是时间观念与空间观念的自由组合，并且包含政治概念的所有语义及其价值预设与情境条件范围。政治概念强调现在之于过去的进步性与优越性，同时以“中国中心”反击各种所想象与建构出来的“西方中心”，这是政治概念为政治权力提供支撑论证的必然要求。因此，两类概念互通的关键在于，既维持“现在”与“中国”为中心的时空定位，肯定历史传统和未来期望与“现在”的关联及其对“现在”的双向影响，承认中国拥有现代世界的普遍情境与基本价值共识，亦有基于各自国情的独特情境与特殊价值。简言之，情境性条件与价值预设性条件的时空差异使得概念建构无法避免分歧与争议，但如果以问题导向而共享“当下中国”这一动态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大大地减少不必要的争论。

其次是核心语义一致。概念的核心语义即是定义的核心属性，是指“那些与假设、解释以及因果机制具有相关性的内容”。[①] 一旦核心语义发生变化，意味着概念的语词形式与语义内容之间脱钩，发展成为新命题与新知识的构成元素。在亚里士多德与洛克看来，物质都存在本质与表面两类属性，唯有前者的改变才导致性质变化。概念也同样如此，核心语义对应事物的本质特征，在事物的因果假设与解释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惟有核心语义保持一致，才能确保其间的汇通成为可能。

概念是结构性的构成方式，存在多维度与多层次的差异。借用戈茨的“三层次”概念框架划分，[②] 最为重要的层次是运用于理论命题的“基本层次”及其表征的核心语义，这是意识形态概念与学术概念得以互通的唯一基础，而且必须达成共识；二者主要是在“维度层次”出现分化，意识形态概念往往选择性地把概念语义固化为单一的维度和领域，并辅之以限定词来表达其固定语义，但学术概念却可以根据问题意识、学者偏好和语境条件而灵活选择不同的概念维度。更不用说在“指标/数据层次”上，意识形态概念的测量比学术概念更为单一，无法真实地反映特定基本概念在社会生活世界的对应性，而是找到特定维度的真实反映。

显然，两种概念类型需要互通，一方面是在基本层次的核心语义上必须确保一致，另一方面是要明确意识形态概念为何以及如何在第二层次上，有意选择突出某个维度而放弃其他维度。在这个基础上，学术界才能对学术概念进行操作化处理，一方面集中关注意识形态所选择的维度，并在特定时空情境中寻找其现实世界的对应物；另一方面排除其他竞争与冲突的概念语义维度，并展开专项的科学测量。政治概念都是经过学术界在逻辑与事实层面的充分论证，以学术概念的多义性为基础，抽出有利于权力论证的语义，最终形成一义性的政治概念。

然而，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不可简单地通过线性回溯而成，而是需要将语义性分解为可供学术界讨论的多个分析维度。第二层次的不同维度组合，形成第一层次的核心语义。以民主概念为例，在欧美国家的自由主义语境中，作为政治概念和政治学概念的意涵高度统一，判断依据是竞争性的选举民主，符合定义的为民主国家，反之则为不民主国家。以此定义方式的民主概念只关注到符合定义的正面案例，对中间和负面案例置之不理。因此，在概念漂移或移植的过程中必然处处碰壁，“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也随之而来。

因此，如果中国政治概念的“民主”可在第二层次分解为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四个构成维度，那么，概念光谱的两端是理想类型意义下的民主和非民主，即完美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不可能存在的完全不民主状态。此种转换方式突出了中国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同时为民主概念的光谱留出正面案例、中间案例和负面案例的学术讨论空间，即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此案例是民主国家。新技术和新现象的出现也无法从根本上推翻概念的核心语义，第二层次的构成维度可根据社会政治情境的变迁有所调整，维度的增加并不缩小概念的外延，反而增加概念的覆盖范围，

① ［美］加里·戈茨：《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尹继武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 页。
② ［美］加里·戈茨：《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第 4 页。

从而为跨国情境的比较提供可能。

最后是共同目标。社会政治的基本概念带有过去的经验、现在的体验和未来的期待。[①] 概念的历史意涵反映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变迁，概念的当下实践是权力与知识的交锋，概念的未来期许则提供社会政治的理想图景。对于德国概念史家科塞雷克而言，1750—1850 的一百年间德国概念史出现一个“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鞍型期”，一部分概念受传统“经验”的约束而语义稳定，而另一部分却受未来想象的引导而出现语义转换。[②] 然而，一旦完成社会政治结构转型，政治想象转而成为政治与政治学两种概念的共同基因，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学专业化知识生产必然描绘共同的政治图景，进而共享“公共善”的一致政治目标。

同时，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相辅相成。官方文本的绝大多数正式概念都是愿景性的，而且是来自转换政治学学科范畴中或是批判性或是命名性的术语与名词。在进入官方文本之前，政治学者已经对特定概念进行了充分的专业论证，其诸多语义之间容易引发争议性，也因此有多维度的扩展空间。在进入官方文本成为指向未来的愿景性概念之后，受未来美好的想象与目标引导，必然选择并强化有利于合法性论证的语义，并注入新的语义。必然的结果是，给概念本身及其所指的真实对象带来新的模棱两可。这时候，政治学者再次介入概念争论。其目的是通过分拆、上移与降格等方式，重新清晰地定义政治概念，一方面确定什么是由于文化传统与社会习惯而产生的结果，因而不会引起争议，另一方面确定什么是关联现实与未来想象的断言或价值评价，从而有可能引起争论，需要论证或者遭到驳斥。[③]

显然，政治概念的模棱两可与政治学概念的清晰论证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现实的政治领域，模棱两可的概念语义并没有限制特定的政治观念、学说或理论体系。相反，只要政治与政治学在“公共善”的目标上达成高度一致，并承载在特定概念中，那么，概念语义越是不确定，经过学术界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竞争性阐释，反而越容易理解与传播，越能够把概念内蕴的政治想象与前景目标清晰地关联起来。即使在官方文本中是描述性的概念，有特定情境的能指范围与指代对象，但进入学术领域之后，就可能转换成为理解不同情境与对象的阐释性概念，其能指与所指范围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围绕达成共识的政治目标之后，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之间可以构成辩证统一关系，而政治概念的模棱两可、政治理想的有效传播与政治学清晰论证之间看似对立，实则互补。

总之，政治概念既是当下政治实践的一块拼图，又蕴含对理想政治价值的不懈追求，迈向理想的政治图景。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现实政治的生活世界与政治学的知识世界汇合一起，建构彼此逻辑关联的系列概念集丛或体系，既适用于政治实践的应然面向，又可供政治学对政治现象的科学解释，并满足其对“公共善”的最高追求。

结 论

概念由语词的“术语”与赋予的“意义”两部分构成，既是表达思想与构成命题和理论的最小单位，又是对事物的最基本概括，因而成为人类主体认知并解释客观世界的最重要枢纽。通过赋予特定事物以概念性的象征符号，人们才能诉诸语言交流，跨时空思考与想象，才能对相关的同类事物进行整体解释并深入分析，从而形成对所处生活世界的集体认知。[④] 因此，社会政治生活实践的任何领域都必然有意识提炼与建构概念。然而，任何概念与其所构成的理论和命题一样，都有价值预设、建构途径、目的指向、适用范围与情境条件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决定其语义集合的内部分化、竞争与冲突。

① 方维规：《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以科塞雷克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21 年第 6 期。

② Keselleck, R.,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59.

③ ［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14 页。

④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 页。

在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活与知识世界的政治学研究中，存在两种彼此关联又无法完全互通的话语与概念。来自政治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需要一套内在关联、逻辑严谨的概念体系，诉诸自我美化的话语体系。由此而建构的政治概念成为意识形态及其体系化运转的最基本单位，旨在论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并成为合法化宣传与教育的最重要手段。然而，在知识生产场域，政治学作为追求最高善的实践科学，概念建构与政治实践有着密切关联，包括从政治实践中提炼学术概念；概念是为了理解、阐释与解释政治实践；概念的有效性是需要在政治实践中检验；体系化的概念建构是为了指导政治实践。这意味着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之间的互通必然面临适用条件、意涵范围与目的指向等多重障碍。这充分体现在作为官方文本的“边民”概念运用于政治学的诸多误用中。

当然，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之间的互通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其一是共享前提。任何概念都内蕴前提预设，承载着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基本规范。两类概念得以互通，在于对前提预设达成基本共识，避免本质上的争议性。其二是一致的核心语义。政治概念语义的单一性与政治学概念语义的多重性之间可能存在不对称，但二者是集合的包含关系，而且，政治的概念语义在政治学概念的语义集合中处于核心要义的位置，可以确保两类概念的互通。其三是共同的目标。概念建构不仅立足于特定的前提预设，而且还设置特定的目标与未来图景，甚至前提决定了目标。政治概念不仅在于论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而且立足于当下而提供一套政治理想，同样，政治学所追求的“最高善”最终落定于基本概念。如果两类概念都能指向共同的政治理想，并以目标为导向，则可能成就其间的互通。

显然，从政治与政治学概念互通的可能路径而言，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可以相得益彰。一方面，政治概念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运用于官方文本与政治实践之前，需要学术界对该概念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与经验论证，尤其是得到政治学在理论与经验层面进行广泛讨论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特定的政治学概念一旦被选择来作为政治概念，特定语义得以强化，而压制了与其相竞争或冲突的其他语义，需要政治学进一步廓清其适用范围，并对其在生活世界所对应的政治现象进行操作化测量，进而反过来科学评估其可行性与限度。

■责任编辑/宋雨桃

The Conceptual Interchange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evitable Obstacles and Possible Solution Approaches

GUO Tai-hui & XIANG Zhi-ya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has four approaches: introducing new concepts from abroad,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refining the findings from the field survey, and exte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fficial texts for new findings, but there has been little discuss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changeability in the last one. On the one hand, it is difficult to interchange concepts betwee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 for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the non-historical nature of the concepts of politics will encounter the highly contextual nature of the concepts of political science;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implications, political concepts require semantic uniqueness, while the concepts of political science have poly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in terms of purpose, the political concept is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the state power, while the concepts of political science aim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political phenomena. On the other hand, the two types of concepts can be conditionally interchangeable, including the shared value premise and contextual conditions; the semantic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concepts are at the polysemantic heart of the concepts of political science; both of them embody common political ideals and goals. Thus, their interchange approach is as follows: b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a political concept as well as its specific semantic implications to official texts, political science needs to fully theorize and empirically justify all the semantic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and once it has become a political concept, political science needs to further clarify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operation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limits.

Keywords: political concepts; concep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changeability

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

杨志军[1]，张喜东[2]

［1. 贵州财经大学，贵阳　550025；2.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　266100］

摘　要：面对“建在或将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设施，社会民众与地方政府易形成“冲击—回应”模式，促使地方政府产生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为地方社会治理带来巨大隐忧。本文运用 fs－QCA 对选取的 40 个具有明确非常规政策变迁结果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来自组织、主体、客体、社会、文化五组变量的因素拟合成九条主要路径，相互交织、同频共振，促使地方政府以“压力—回应”模式主动开启非常规政策变迁。同时，文章亦从地方政府、冲突群众、新闻媒体构成的“邻避三角”出发，提出冲突消解策略，为地方政府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回应民众诉求，消解邻避冲突提供建议。

关键词：邻避冲突；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72－1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几年来，中国不少地方发生了邻避冲突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给地方治理造成困境，给国家治理带来隐忧。不管是从自上而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压力型政治体制角度，还是从由里而外地方治理必须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获得绩效表现来看，地方党委政府作为地方治理最重要的主体，都必须回应和解决邻避冲突。这种回应方式符合一般规模性、群体性事件和集体行动形成的“一闹就灵”规律，只是邻避冲突将“一闹就灵”具体化为“一闹就停、一闹就迁、一闹就改、一闹就缓”；[①]根据邻避型公共项目设施改变的轻重程度表现为“停建、迁建、改建、缓建”，亦可称之为“决策型回应”。[②]须知，一闹就灵的反面是“闹不灵”，之所以会出现一闹就灵的“闹决”[③]现象，本质是地方政府决策和治理行为出现了偏差。从“闹决”的属性来看，这就是一种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非简单的政策终结或政策失败，其“突发性、临机性、即时性和消极性”[④]特征中最为显著的是消极改变政策决策。针对邻避冲突经常性带来地方治理主体消极改变其原初决策的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已有的解释更多偏重于发生机理、行为逻辑、应对策略和解决之道上，这是不够的，在公共政策行为分析上要有新的突破。

收稿日期：2022－10－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防灾减灾救灾政策变迁研究”（项目号：22AZZ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志军，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喜东，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① 杨志军、李颖：《嵌入式吸纳：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消解方略》，《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 期。

② 杨志军：《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4 期。

③ 韩志明：《信息支付与权威性行动——理解“闹决”现象的二维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15 年第 2 期。

④ 杨志军、欧阳文忠：《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

邻避冲突关系民生发展、社会安全，考验地方政府治理智慧。利益群体共享、风险私人承担既是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也是其牵动社会神经的敏感点。风险收益均衡，邻避项目落地顺利则地方公共服务优化、百姓满意，反之，风险收益分配不均，邻避项目推行梗阻不仅破坏地方政府形象，更可能酿致群体性事件，引发社会安全忧虑。妥善处置邻避冲突不仅是关系地方民生发展的社会议题，也是关系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安全议题，同时隐含着发展与安全如何兼顾的现实治理问题，考验地方治理智慧，也考验学者的社会责任担当。邻避冲突作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由各类因素相互交织，相互缠绕，共同发酵催动而成。探究其发生、发展原因，如果仅用单个案例进行结果论证，然后确定其影响因素或得到某个结果，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单案例或多案例进行的描述性论证只能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研究，“经验事实只会片面化更多复杂化和混合动因的抗争场景”。[①] 面对邻避冲突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分析，笔者集合了中国具体情境下冲突案例，选取出 40 个已有明确回应结果（“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冲突案例为样本，设置出若干解释变量，然后通过 fs－QCA 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剔除无效条件变量，得出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地方政府向上承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向下转变政府职能、回应民众利益诉求提供实践出路。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邻避冲突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典型，主要是指因市政设施的修建将对其所在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身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产生负面影响而引发的反对或抵制行动。[②] 在我国城市建设中，源于发达国家的邻避冲突频频发生，其爆发的核心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分化带来的矛盾冲突，通常是以“极端化”的发展进程和“妥协式”的平息路径来完成。[③] 即政府出于区域经济增长、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建设邻避项目，并从技术层面界定有关污染和损失。相反，周边居民则从个人主观感知层面出发关注邻避设施对周边的负面影响，并以邻避设施污染环境、危害身体健康、选址建设不当为由加以拒绝，由此产生以邻避设施兴建及其后果为核心的“中国式邻避”。[④] 邻避冲突作为社会运动的典型，可认为是因环境诉求而引发的集体行动。[⑤] 正因为“来自社会的不满与诉求如何表达既是一种值得深入分析的社会现象，也是国家在社会稳定与治理层面密切关注的政策议题。”[⑥] 置于社会冲突视角下的环保类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受到持续关注“经历了从集体行为论到集体行动论”的主流范式转变”。[⑦] 我国学者对“中国式邻避”的案例研究则表明“邻避设施效用共享与邻避风险私人承担的矛盾”[⑧] 构成了邻避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在对其演化机理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揭示出邻避冲突是当地居民、地方政府、专家媒体、社会组织等多方互动的结果，这与西方当前的集体行动论观点相互印证。

事实上，邻避冲突作为群众维权与政府回应间的互动过程，往往会推动形成政策变迁。安德森的研究明确了政策变迁的两种形式，一

① 王刚、宋锴业：《多因型抗争：对邻避运动肇因的多维审视——以 R 市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为例（1983—2015 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② 何艳玲：《对“别在我家后院”的制度化回应探析——城镇化中的“邻避冲突”与“环境正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第 6 期。

③ 许波荣、金林南：《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冲突风险的应对——基于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复工项目的个案分析》，《地方治理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④ 王佃利：《邻避困境：城市治理的挑战与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 页。

⑤ 涂一荣、魏来：《“邻避”研究的概念谱系与理论逻辑——文献梳理和框架建构》，《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 2 期。

⑥ BECK U，*Risk*：*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2，P. 187.

⑦ 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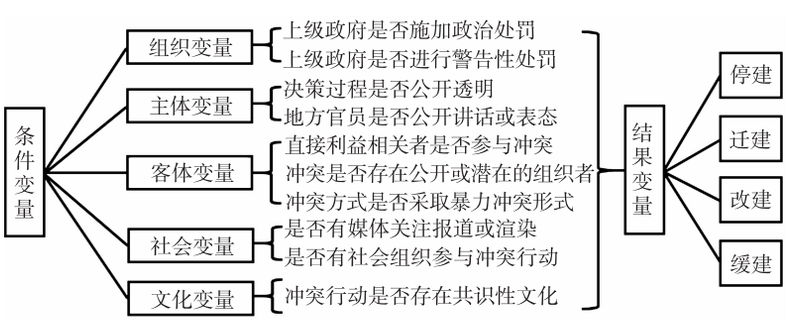
⑧ 朱正威、王琼、吴佳：《邻避冲突的产生与演变逻辑探析——基于对 A 煤矿设施当地民众的实证调查》，《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

是线性的渐进性变迁，二是非线性的突发性变迁。[①] 以有限理性决策和制度结构为基础的间断—均衡模型则将政策变迁的两种形式统一到一个框架内，揭示了政策过程中呈现的长时期稳定和短时期剧烈反转的现象。[②] 在鲍姆加特纳和琼斯看来，相对于决策情境的持续变化，决策偏好更具稳定性导致了政策的长期稳定，而决策情境变化的长期累积将导致决策者对根本偏好的注意力在短时期内产生急速转变，从而产生了政策变迁的间断现象。[③] 因此，间断—均衡模型将政策变迁看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注意力稀缺；[④] 而广义的政策变迁过程则包含着政策接续、政策创新、政策维持和政策终结四个过程。[⑤] 李琼指出，在高风险社会，其他社会个体和子系统会随时对政策系统产生重大影响，促使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或终结。[⑥] 杨志军通过一项旅游优惠政策研究指出，公共政策并非一味寻求创新和终结，而是趋向于维持现状或平稳接续，在地方治理中，后者更为常见。[⑦]

因此，若从邻避冲突发生、演进、消解所呈现的“群众抗议—政府回应—政策变迁”全流程看，当前学界所关注的邻避冲突生成机理和影响因素仅涉及流程前半段——“群众抗议—政府回应”，事实上，作为后半段的政策变迁亦有丰富内容可待挖掘。相比由冲突群众、专家参与、社会组织、环保精英及互联网平台构成的复杂冲突网络和日益组织化的冲突形式，地方政府企图以环境评价、公众参与、经济补偿为主的回应策略日见失效，在此种情景下就不得不由上级政府施压或主动进行回应，其结果往往是推动形成“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非常规政策变迁。非常规政策变迁既是群众抗议的结果、又是政府回应的手段，是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显性行为，直接影响冲突解决的质量。遗憾的是，学界对此研究稍显不足。笔者之前的相关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规律，但仍缺乏实证检验。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法，对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进行实证检验。并将邻避冲突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条件变量凝练为组织、主体、客体、社会和文化五组。结果分别为停建、迁建、改建和缓建 4 个。所谓停建就是指项目直接停止或终止取消；迁建是指项目移址，迁到别的地方再建；改建就是指对原有项目采取缩小规模或技术升级或投入增加等；缓建是指没有做出项目终止建设的决定，只是宣布暂时停止项目建设。如下图 1 所示。



资源来源：作者自制。

图 1 研究变量假设

① JAMES E A, *Public Policy – Making: An Introduction (Fifth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3, p. 171.

② ［美］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布赖恩·琼斯：《美国政治中的议程与不稳定性》，曹堂哲、文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③ 於莉：《预算过程：从渐进主义到间断式平衡》，《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

④ ［美］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布赖恩·琼斯：《美国政治中的议程与不稳定性》第 235 页。

⑤ HOGWOOD B W, PETERS B G, *The Dynamics of Policy Change: Policy Succession*, *Policy Science*, No. 3, 1982, pp. 225 – 245.

⑥ 李琼：《风险治理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变迁逻辑——以 X 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 年第 3 期。

⑦ 杨志军：《地方治理中的政策接续：基于一项省级旅游优惠政策过程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其中，①组织变量是考察政治因素在邻避冲突推动政策变迁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②主体变量主要考察城市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在邻避冲突推动的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③客体变量主要考察社会因素在邻避冲突推动的政策变迁中是否发挥作用；④社会变量主要考察社会因素在邻避冲突推动的政策变迁中是否发挥作用；⑤文化变量主要考察民众的反抗意识和风险认知在邻避冲突推动的政策变迁中是否发挥作用。五组条件变量中，如果案例中呈现的情形是“是”，则在该案例中赋值为“1”，如果案例中呈现的是“否”，则赋值为“0”；四组结果变量中，变量操作为：如果案例中呈现的是“是”，则在该案例中赋值为“1”；如果案例中呈现的是“否”，则赋值为“0”。

三、案例选取与操作化

本部分立足于前述研究模型与变量假设，选取2003年以来以环境性群体事件为主的有明确冲突结果的40个邻避冲突案例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案例选取；二是案例操作化。需要说明的是，40个邻避冲突案例获取遵循两大原则：一是事件均被媒体有程度不等的报道，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二是事件均产生了四种非常规政策变迁的行为结果。

（一）案例选取

案例选取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结果考量上基于明确冲突结果选取典型案例，即本文选取的案例都是具有明确冲突结果的典型案例；二是覆盖程度上基于各地区选取典型案例，横向上保证邻避冲突过程撬动的政策变迁的普遍性规律；三是时间跨度上基于发生时间跨度选取典型案例，纵向上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全面性。基于以上标准，筛选自2003年以来的权威媒体新闻报道制得下表，见表1。

表1　案例选取

序号	年份	冲突事件名称	冲突条件变量										冲突结果变量
			组　织		主　体		客　体			社　会		文化	
			上级政府是否施加政治处罚	上级是否进行警告性的处罚	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	关键个人是否公开讲话或表态	直接利益相关者是否参与	是否存在公开或潜在组织者	是否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是否有媒体关注报道或渲染	是否有社会组织参与	是否存在共识性文化	
1	2003	深圳丰泽湖反高速横穿小区项目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改建
2	2004	石家庄反基力垃圾焚烧厂建设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3	2004	安徽蚌埠反九采罗化工厂建设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迁建
4	2006	上海反磁悬浮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停建
5	2006	北京六里屯反垃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6	2007	上海松江反垃圾焚烧厂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7	2007	上海春申反高压线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8	2007	福建厦门PX项目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迁建
9	2008	安徽六安反垃圾处理厂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10	2008	广州反110KV骏景变电站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11	2009	广东番禺反垃圾焚烧厂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12	2009	陕西凤翔反东岭冶铁厂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停建
13	2009	杭州钱江新区反垃圾中转站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续　表

序号	年份	冲突事件名称	冲突条件变量										冲突结果变量
			组　织		主　体		客　体			社　会		文化	
			上级政府是否施加政治处罚	上级是否进行警告性的处罚	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	关键个人是否公开讲话或表态	直接利益相关者是否参与	是否存在公开或潜在组织者	是否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是否有媒体关注报道或渲染	是否有社会组织参与	是否存在共识性文化	
14	2009	江苏吴江反垃圾焚化发电厂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15	2011	北京西二旗反餐厨垃圾处理站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改建
16	2011	大连反 PX 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17	2011	上海反国轩新能源电池厂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18	2011	安徽望江反对帽子山核电站建设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停建
19	2011	四川眉山反精神病院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停建
20	2011	海南乐东反莺歌海煤电厂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21	2012	天津反聚碳酸酯（PC）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22	2012	四川什邡反钼铜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23	2012	江苏启东反造纸污水排海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24	2012	宁波反 PX 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25	2012	北京至沈阳路段群众反京沈高铁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缓建
26	2013	广东鹤山反核燃料项目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27	2013	昆明反 PX 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缓建
28	2013	成都反 PX 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缓建
29	2014	广东茂名反 PX 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30	2014	杭州余杭反九峰垃圾焚烧厂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31	2014	海南三江反麻风病医院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32	2015	上海延吉反第二养老院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缓建
33	2016	浙江海盐反垃圾焚烧厂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停建
34	2016	湖南宁乡反垃圾焚烧厂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35	2016	江苏六合反光大垃圾厂建设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36	2016	山东济南反齐鲁制药厂扩建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37	2016	江苏连云港反核废料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38	2017	浙江九峰反垃圾发电厂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缓建
39	2018	辽宁海城反大型垃圾焚烧场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40	2019	贵州白云区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迁建

注：本表由作者根据权威报道的内容绘制而成。

（二）案例操作化

1. 变量赋值

由于 QCA 方法分析的是不同条件组合下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而不是直接对案例内容，包括个案和多案例进行分析，根据图 1 中的条件变量赋值规则和表 1 中的结果变量赋值规则，构建案例变量赋值统计表（表 2）。

表 2　案例变量赋值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具体变量选取	“否”单位赋值	“否”累积数	“是”单位赋值	“是”累积数
条件变量	组织	上级政府是否施加政治处罚（org1）	0	38	1	2
		上级政府是否进行警告性处罚（org2）	0	38	1	2
	主体	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sub1）	0	37	1	3
		关键个人是否公开讲话或表态（sub2）	0	8	1	32
	客体	直接利益相关者是否参与冲突（obj1）	0	0	1	40
		是否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obj2）	0	4	1	36
		是否采取暴力冲突形式（obj3）	0	17	1	13
	G 社会	是否有媒体关注报道（soc1）	0	1	1	39
		是否有社会组织参与（soc2）	0	36	1	4
	文化	是否存在共识性文化（cul）	0	1	1	39
结果变量	停建		0	0	1	19
	迁建		0	0	1	7
	改建		0	0	1	2
	缓建		0	0	1	12

注：本表由作者根据赋值规则自制。

2. 真值表构建

按照 fs－QCA 的运行逻辑和操作顺序，根据 40 个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赋值结果，构建案例真值表（表 3）。

表 3　真值表

Case	Org1	Org2	Sub1	Sub2	Obj1	Obj2	Obj3	Soc1	Soc2	Cul	Res
1	0	0	0	0	1	1	1	1	1	1	1
2	1	1	0	0	1	1	0	1	0	1	1
3	1	1	0	1	1	1	0	1	1	1	1
4	0	0	0	1	1	0	0	1	0	1	1
5	0	0	0	1	1	1	0	1	0	1	1
6	0	0	0	0	1	1	0	1	0	1	1
7	0	0	0	0	1	1	1	1	0	1	1
8	0	0	0	1	1	1	0	1	1	1	1
9	0	0	0	1	1	1	1	1	0	1	1
10	0	0	0	0	1	1	1	1	0	1	1
11	0	0	0	1	1	1	0	1	0	1	1
12	0	0	0	1	1	0	1	1	0	0	1
13	0	0	0	1	1	1	0	1	0	1	1
14	0	0	0	1	1	1	1	1	0	1	1
15	0	0	0	1	1	1	0	1	0	1	1
16	0	0	0	1	1	1	0	1	0	1	1
17	0	0	0	1	1	1	0	1	0	1	1
18	0	0	1	1	1	1	0	1	1	1	1

续 表

Case	Org1	Org2	Sub1	Sub2	Obj1	Obj2	Obj3	Soc1	Soc2	Cul	Res
19	0	0	0	1	1	1	0	0	0	1	1
20	0	0	0	1	1	1	1	1	0	1	1
21	0	0	0	1	1	1	0	1	0	1	1
22	0	0	0	1	1	1	1	1	0	1	1
23	0	0	0	1	1	1	1	1	0	1	1
24	0	0	0	1	1	1	1	1	0	1	1
25	0	0	0	1	1	1	0	1	0	1	1
26	0	0	1	1	1	1	1	1	0	1	1
27	0	0	0	1	1	1	0	1	0	1	1
28	0	0	0	1	1	1	0	1	0	1	1
29	0	0	0	1	1	1	1	1	0	1	1
30	0	0	0	1	1	1	1	1	0	1	1
31	0	0	0	1	1	1	1	1	0	1	1
32	0	0	0	1	1	1	0	1	0	1	1
33	0	0	0	0	1	0	1	1	0	1	1
34	0	0	0	0	1	1	1	1	0	1	1
35	0	0	1	1	1	1	0	1	0	1	1
36	0	0	0	1	1	1	0	1	0	1	1
37	0	0	0	1	1	1	0	1	0	1	1
38	0	0	0	1	1	1	0	1	1	1	1
39	0	0	0	1	1	1	1	1	0	1	1
40	0	0	0	0	1	0	0	1	0	1	1

注：本表由软件生成。

（三）单变量分析

fs－QCA 分析采用“连续值集”模糊集形式，即“1 为完全隶属，0.5 < X < 1 为偏隶属（等于 0.5 为既非隶属也非不隶属），0 < X < 0.5 为偏不隶属，0 为完全不隶属”。通过 fs－QCA 方法得出的单变量分析结果呈现为三项指标，即 Combined（相连度）、Raw coverage（原始覆盖率）和 Consistency（一致性）。根据 fs－QCA 分析软件得出的数据结果汇总制作而成单变量指标分析统计表（表 4）。

在单变量分析中，虽然一致性都为 1（1 > 0.9），但并不说明单个条件变量都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性条件。关于 Consistency（一致性），当出现四种结果的任何一种时，都赋值为“1”。关于 Combined（相连度）指标，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属于偏隶属关系，邻避冲突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呈现偏不隶属关系，存在微弱的因果联系。需要注意的是，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Sub1）这个条件变量中，虽然其测定的值集不在 0.5 < X < 1 之间，但这个值集是对决策过程是否公开回应条件变量肯定赋值得出的验证结果，在结果变量中应视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Raw coverage（原始覆盖率）指标下，10 个条件变量假设中有 4 个条件变量的原始覆盖率指标达到 80% 以上，与四大结果变量之间存在非常强烈的因果联系，是结果变量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余四个假设变量的原始覆盖率低于 20%，即条件变量上级政府是否施加政治处罚（Org1）为 5%，条件变量上级政府是否进行警告性处罚（Org2）为 5%，条件变量是否采取暴力冲突形式（Obj3）为 4.25% 以及条件变量是否有社会组织参与（Soc2）为 12.5%。这四个变量单独存在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较为微弱。

表 4　单变量指标分析统计

指标 / 变量	Combined（相连度）	Consistency（一致性）	Raw coverage（原始覆盖率）
Org1	0. 222 486	1. 000 000	5%
Org2	0. 222 486	1. 000 000	5%
Sub1	0. 272 489	1. 000 000	7. 5%
Sub2	0. 889 944	1. 000 000	80%
Obj1	0. 994 987	1. 000 000	100%
Obj2	0. 648 652	1. 000 000	42. 5%
Obj3	0. 648 652	1. 000 000	4. 25%
Soc1	0. 982 471	1. 000 000	97. 5%
Soc2	0. 351 781	1. 000 000	12. 5%
Cul	0. 982 471	1. 000 000	97. 5%

注：本表由软件生成。

四、多变量组合与影响路径

（一）三种方案

通过 fs – QCA 分析，得到邻避冲突推动政策变迁的三种方案：一是复杂方案；二是中间方案；三是吝啬方案。其中吝啬方案因数据已被简化，无法进行比较。在复杂方案和中间方案中，二者的整体覆盖率和整体一致性都为 1，表明了二者对所选择案例都具备很高的解释力度。同时二者的原始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中的最高路径也是同一条件组合，甚至在复杂方案和中间方案中，除了最高路径相同之外，其他构成路径的条件组合也对应相同，详见表 5。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只需要在复杂方案和中间方案中任一选择一个方案进行分析即可。

表 5　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指标 / 方案	条件组合	原始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整体一致性
复杂方案	~ org1 * ~ org2 * sub2 * obj1 * obj2 * soc1 * ~ soc2 * cul（最高路径的条件组合）	0. 625000	0. 275000	1. 000000
中间方案	cul * ~ soc2 * soc1 * obj2 * obj1 * sub2 * ~ org2 * ~ org1（最高路径的条件组合）	0. 625000	0. 275000	1. 000000
吝啬方案				

注：本表由软件生成。

（二）影响路径分析

复杂方案和中间方案都有九条路径，且路径一一对应相同，随机选择中间方案进行分析。其中，“~”表示“非”即没有该变量，“*”表示变量之间是“且”的关系。一致性同单变量分析一样，相同且都为“1”，表明测量结果对案例的解释程度比较高，完全覆盖。“唯一覆盖度”表示案例库中有多少案例仅能被该条组合因素解释；“原始覆盖度”表示该组合因素所解释案例的比例，而同一结果可能被多类组合型因素解释，是充分性组合因素。

影响路径一：存在共识性文化（cul）*没有社会组织参与（~soc2）*有媒体关注报道（soc1）*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obj1）*关键个人没有公开讲话或表态（~sub2）*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sub1）*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org1）*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org2），该路径的原始覆盖率为 0. 75，唯一覆盖率为 0. 05。即在没有“社会组织参与、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上级政府

施加政治处罚、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共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直接利益者参与冲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0.15，必要性为 0.02。

影响路径二：存在共识性文化 * 没有社会组织参与 * 有媒体关注报道 * 没有采取暴力冲突形式（~obj3） * 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obj1） * 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 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 * 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社会组织参与、采取暴力冲突形式、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共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直接利益者相关者参与冲突”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0.40，必要性为 0.025。

影响路径三：存在共识性文化 * 有媒体关注报道 * 没有采取暴力冲突的形式 * 是否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obj2） * 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 关键个人是否公开讲话或表态 * 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 * 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暴力冲突形式、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共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讲话或表态”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0.425，必要性为 0.075。

影响路径四：存在共识性文化 * 没有社会组织参与 * 不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 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 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 * 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 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 * 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社会组织参与，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吃法，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共识性文化、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0.625，必要性为 0.075，

影响路径五：存在共识性文化 * 没有社会组织参与 * 没有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 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 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 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 * 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 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 * 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社会组织参与，暴力冲突的形式、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共识性文化、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地方政府官员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这几个条件变量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0.35，必要性为 0.025。

影响路径六：共识性文化 * 媒体关注报道 * 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 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 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 没有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 * 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 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 * 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关键个人进行公开讲话或表态、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施加政治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共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采取暴力冲突形势、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这几个条件变量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0.1，必要性为 0.025。

影响路径七：不存在共识性文化 * 没有社会组织参与 * 有媒体关注报道 * 采取暴力冲突形 * 没有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 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 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 * 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 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 * 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共识性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媒体关注报道、采取暴力冲突形式、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这几个条件变量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0.025，必要性为 0.025。

影响路径八：存在共识性文化 * 没有社会组织参与 * 有媒体关注报道 * 没有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 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 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 关键个人没有公开讲话或表

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采取暴力冲突形式、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这个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共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地方政府官员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0.025，必要性为0.025。

影响路径九：存在共识性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媒体关注报道＊没有采取暴力冲突形式＊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采取暴力冲突的形式”这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共识性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媒体关注报道、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地方政府官员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0.025，必要性为0.025。

对比上述九条路径，路径四的充分性测量值位属第一，必要性也位属第一；路径三的充分性位属第二，必要性位属第二；路径二和路径五分别次之，其余路径测量值较为低下。除了路径二、路径三、路径四与路径五，剩余五条影响路径在充分性和必要性的测量值都较低且相差不多，但并不代表这些路径中的组合因素在邻避冲突活动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结果中没有发挥作用。基于此，对九条影响路径中条件变量的出现次数进行统计并比较，看哪些变量在九条路径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哪些出现的次数最少，从而找出邻避冲突活动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的影响因素，详见表6。

表6　条件变量出现的频数统计

条件变量	共识性文化	社会组织参与	媒体关注报道	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地方政府官员公开讲话或表态	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	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	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出现次数	8	1	7	9	6	7	2	2	2	5

注：本表由软件生成。

由此得出，九条影响路径中各条件变量出现的频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9次）＞共识性文化（8次）＞媒体关注报道（7次）＝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7次）＞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6次）＞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5次）＞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2次）＝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2次）＝采取暴力冲突形式（2次）＞社会组织参与（1次）。可发现直接利益相关者的维权意识逐渐提升、社会民众普遍存在的共识性文化逐渐形成、公开或潜在的冲突组织者大有人在、社会媒体开始关注报道环境问题和民生诉求、城市政府本身的决策过程依旧不公开不透明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在关键时候的公开讲话或表态等主要因素相互交织一起，共同推动城市政府在邻避冲突下进行政策变迁，回应民众诉求。

此外，邻避冲突活动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的四种结果，与是否采取暴力冲突的方式、是否存在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是否存在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以及是否存在社会组织参与之间的联系较少，间接说明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环保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纠正了目前国内围绕“一闹就灵”的主流观点，亦即认为只要采取了暴力维权，地方政府则都会回应问题和解决矛盾。而诸多邻避冲突事件则不是简单的暴力维权就会产生效果，还需要深入细化暴力冲突的时机和规模等问题。这些深入的问题所形成的更加细化的中介变量，可能会成为未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发

现，在邻避冲突推动城市政府进行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条件假设变量中，“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社会民众存在共识性文化、存在公开或潜在的冲突组织者、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社会媒体关注报道因素以及关键个人的公开讲话或表态”六大因素成为关键性要素，进而也得出了“采取暴力冲突的方式、存在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存在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以及存在社会组织参与”这四个条件假设变量发挥效用微弱，其存在与否已对城市政府的政策变迁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变化。另外，六大因素中的单个因素之间不能相互取代或替代，也不能替代或取代其他因素组合中相对边缘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只能在各自因素组合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和其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缠绕，共同产生同频共振，推动主动和被动性政策变迁行为的发生。此外，研究还得出了因素组合路径中的最强路径，由高到低分别为“路径四、路径三、路径二与路径五”，成为城市政府进行政策学习的主要动力，推动政策变迁的主要源泉。

综合来看推动政策变迁的各项影响因素和主要生成路径，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过程呈现出主动的“压力—回应型”模式，而非被动的“冲突—回应型”模式。即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冲突方主要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而非暴力冲突向政府施加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共识性文化起到凝聚人心、团结组织的作用，媒体的关注报道则起到放大器的作用。而政府作为回应方则主要经由关键领导者的公开讲话或表态主动开启政策变迁，而非在上级政府施加处罚后再被动进行政策调整。这显示出冲突方在城市邻避冲突中的方式方法日益成熟，政府同样也能及时回应其诉求。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尚不明显，这可能与我国政治类社会组织发展尚不完全有关，未来社会组织可能成长为影响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在由地方政府、冲突群众、新闻媒体构成的“邻避三角”中，地方政府既是社会公众与新闻媒体的管理员，又是邻避冲突的承压方和破局者。消弭邻避冲突、破解邻避困境需要至少做好五个方面：

其一，政府应重视公众的风险感知、加强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风险沟通。在邻避冲突中，正是基于对邻避设施风险的担忧和恐慌与政府在风险沟通中的欠缺推动了邻避冲突的升级，形成从“不怕”到“我怕”的冲突动机。①

其二，政府应提高决策透明度，以切实的公众参与赋予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公众发起邻避冲突既源于心中对邻避项目的不了解及由此产生的未知性恐惧，也源于知情权和参与权被剥夺产生的“逆反心理”。为此，地方政府应在邻避设施的建设和选址过程中采取恳谈会、专家论证会，必要时综合运用电视、广播、等形式倾听公众意见，有效地促进公众参与从而增强公众政治效能。

其三，建立健全邻避设施的风险分担与利益补偿机制。风险分担指的是在做好重大邻避设施安全预警和应急保障的情况下，为当地居民提供定期水源、土壤、大气监测，定期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以及因邻避设施引发的健康疾病全额救助等，以此分担因项目运营引发的额外成本。利益补偿指的是在邻避设施附近建设公共绿地、体育馆、图书馆、健身房、游泳馆等“迎臂”设施，邻避设施所提供服务的优先、优惠享有或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补偿来抵消其负效应，体现政府对居民正当权益的重视和保障。

其四，完善协商民主机制，以公民四大能力建设打造良性的官—民互动。现代公民应具备与政府互动中的利益表达能力、协商谈判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政治生活中的有序参与能力和法律框架内的依法维权能力。协商民主通过强调公共利益取向和理性表达方式，可以使邻避冲突相关主体不仅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也能在民主协商和集体讨论中帮助其超越自身观点和需求重视集体利益，培育公民理性精神、增强四大能力。②

其五，强化舆论监管，引导新闻媒介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闻媒介在

① 何艳玲、陈晓运：《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学术研究》2012 年第 5 期。

② 马奔、付晓彤：《协商民主供给侧视角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

邻避冲突中充当着知识数据库、信息传声筒、虚拟组织者、认同建构者等多重角色。[①] 而媒体的失实报道也可成为公众情绪的引爆点和谣言滋生的温床。监管媒体、善用媒体需要政府利用大数据建设舆情预警检测平台，密切关注敏感信息；利用微信、微博、论坛、博客打造政务官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利用政府新闻发言人、专家学者等建立网络意见领袖队伍，迅速抢占舆论制高点。

（二）研究启示

在城市邻避冲突过程中，地方政府做出原初决策的改变，是一种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若地方政府政策变迁不需要依靠任何社会压力、外部事件或上级指示，那么可视为一种从问题提出到政策终结若干过程所得出的常规政策变迁行为。不管是常规政策变迁还是非常规政策变迁，最后都需要建立健全良性和可持续的政策变迁行为，通过改进和优化治理体系来吸纳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压力，从而提升治理效能。就城市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过程来看，一方面从政策变迁动力上推动了城市政府进行政策学习，对于撬动城市政府进行政策变迁和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城市邻避冲突的冲突特性代表了政策体系的间断－平衡性双重调整，并成为地方治理活动中长期面对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建立健全具有弹性和韧性的地方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通过邻避冲突行为延展开来可以发现，一系列社会冲突催动城市政府进行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消弭城市化进程中的负面因素，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对社会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学者们对新兴的研究方法运用相对较少，主要还是停留于两大传统的研究路径：一是通过现有单案例或多案例列举的描述论证性研究方法，经验性地总结出若干影响因素；二是依靠实证调研，实地访谈，获取一手资料，进而展开论证。采用这样两种方法得出的研究结果大都是描述型或经验型的总结，并偏好于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集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方法的优越性，对邻避冲突事件推动城市政府进行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可视为研究上的一种纠偏和深化。

■责任编辑/宋雨桃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IMBY Conflicts Incurr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Unconventional Policy Change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YANG Zhi-jun[1] & ZHANG Xi-dong[2]

（1.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2.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NIMBY facilities "built or to be built in my backyard", the public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prone to form an "impact-response" model, prompt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stop, relocate, rebuild or delay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with unconventional policy changes, which brings great concern to the local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uses fs-QCA to analyze 40 selected cases with clear results of unconventional policy changes, and finds that the factors from the five groups of variables (organization, subject, object, society and culture) have led to nine main paths, which are intermingled and resonate with each other, prompt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actively initiate unconventional policy changes with the "pressure-response" model. At the same time, starting from the "NIMBY triangle" form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protesters and the news media,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conflict-resolution strategies, provi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further innova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respond to the public demands and resolve NIMBY conflicts.

Keywords: NIMBY conflict; local government; unconventional policy change; influencing factors

① 高新宇：《邻避运动中虚拟抗争空间的生产与行动——以B市蓝地社区为例》，《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释论

石佳友，刘　欢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集体所有权如何行使是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理论界对此存在诸多不同见解。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产权主体变迁的历程可知，历史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是无可争议的集体所有权人，但该种意义上的集体所有权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公法人的所有权。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私法人性质决定了其再无力担当集体所有权人，因此，农民集体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规范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集体所有权源自法律对农民集体授权意思的直接拟制。为保持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总体上应参照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塑造集体所有权的行使规则。

关键词：集体所有权；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依法代表；委托代理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84－11

一、问题的提出

集体所有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有权类型，[①]如何构建该项权利的行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走向与成败。《民法典》第261条和第262条共同确立了集体所有权及其“代表行使”规则。[②]但这一看似明确的规定在理论上却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探究之处。

首先，依《民法典》第262条之文义，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似应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前者意指依照某种特定标准（如一定的时间或者空间范围）界定的人的集合。但是，该集合体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地位，却难以在当下的民法理论与规范体系中找到确切答案。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在农民集体不具有明确的主体性地位的前提下，其究竟如何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授权意思，以及授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何种程度上的代表权限？对于以上问题，目前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立场：一种观点认为，立法塑造的“农民集体”概念有其特殊的规范旨趣，应将法律解释或者制度

收稿日期：2023－05－3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研究”（项目号：20ZDA049）、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法治文明研究院2023年项目“民法典与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石佳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温世扬：《从集体成员权到法人成员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的内容构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② 《民法典》第261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承包；（二）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四）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项；（五）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

《民法典》第262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建构的重点聚焦于“代表”二字所蕴含的法权关系构造；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就是同一主体，后者不存在代表权限来源不明的问题。再者，依体系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是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同时亦具有依法取得特别法人资格之主体地位（《民法典》第99条）。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造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机制之建构。由立法机关的释义可知，《民法典》第99条仅在于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其中的“具体问题还需要根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一步由其他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①] 然而，就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有关规定来看，上述问题似乎并未因立法工作的推进而得以明确。如《草案》第5条第1款与《民法典》第262条并无实质性区别，第2款则是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及《农业法》等相关立法文本的再次表述。[②]

法典化的实质是法律渊源体系的理性化。[③] 从解释论的角度准确阐述集体所有权及其代表行使规则背后所蕴含的法权关系构造，不仅涉及《民法典》民事主体制度与集体所有权制度之间的规范联动，同时亦是强化作为民事特别法之《草案》与《民法典》之间体系衔接的逻辑必然。本文拟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法典》第262条作一解释论上的探讨，以期对相关问题的明晰稍有助益。

二、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的既有解释方案及其反思

围绕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的争议，首先表现为两者究竟应当视为一体抑或区分对待，下文将这两种立场分别表述为“同一说”与“区分说”。考察相关的立法资料可知，立法机关内部对此亦未形成一致意见。立法机关在阐述《民法总则》（已废止）第99条时曾表明，农民集体作为民事主体，其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④] 然而，在《民法典》正式施行后，立法机关又再次强调，《民法典》第262条之“行使所有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并非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人，而只是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⑤] 显然，立法机关在两个存在体系关联的条文中分别对“同一说”和“区分说”表达了支持态度。故而，立法者之原意仅凭相关的法律条文实际上难以探明，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理论展开。

（一）“同一说”

在“同一说”的理论构造下，农民集体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二者被认为具有同一性。应当认为，将两者塑造为同一主体能在最大程度上解决所谓集体所有权主体缺位之难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行使所有者的全部权利。不过，该说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察视角，有学者将其分别总结为“实质同一体说”与“应然同一体说”。[⑥] 本文从之。“实质同一体说”认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实质上的同一性。[⑦] “应然

① 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316－317页。

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应当充分发挥在管理集体财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履行以下职责：（一）发包农村土地；（二）办理农村宅基地申请、使用事项；（三）合理开发利用、保护耕地等土地资源并进行监督；（四）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出让、出租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五）组织开展集体财产经营、管理；（六）决定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七）分配、使用集体收益；（八）分配、使用集体土地被征收征用的土地补偿费等；（九）为成员的生产经营提供技术、信息等服务；（十）为成员提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养老等服务，或者对村民委员会提供服务给予资金等支持；（十一）支持和配合村民委员会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村民自治；（十二）支持农村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依法发挥作用；（十三）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③ 石佳友：《解码法典化：基于比较法的全景式观察》，《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

④ 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第311－312页。

⑤ 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146页。

⑥ 参见管洪彦：《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理论证成和实益展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⑦ 宋志红：《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

同一体说”则认可现行法之教义未将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同视之，但应在接下来的立法过程中将两者塑造为同一主体。[①]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虽然在观察视角上有解释论与立法论之分，但其在最终产生的制度效果上则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即便是“实质同一体说”亦强调，要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集体的“法定代表”行为符合农民集体之利益，必须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一系列特殊要求，[②] 而这显然又有赖于立法层面的制度建构。因此，无论是“实质同一体说”与“应然同一体说”，其面临的最根本的诘难是，在《民法典》等立法文本一致将农民集体表述为集体所有权人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何以在实证法文义之外成为新的集体所有权人？

有学者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出发认为，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农民集体这种组织形式，故“农民集体所有”的说法难以成立，应当回归历史理性，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所有权人。[③] 这实际上是否认了农民集体的主体性地位，而仅强调其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历史之沿革是否可以为突破现行实证法之文义提供全部的正当性依据？立法既然已将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别表述，则似有必要首先以现行实证法为遵循，各自探求两者的规范内涵。事实上，集体所有权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权形态之一，其所有权人显然不能是私法人，故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所有权人，则意味着必须按照公法人的逻辑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机制，而这似乎又与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造联结农村社区与外部市场的立法本旨存在明显冲突。

再者，将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一体化处理尚有如下两个体系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处理：其一，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民法典》第 262 条还规定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可作为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同时，根据第 101 条第 2 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优先于村委会等主体担任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④] 如果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作一体化处理，“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意味着农民集体乃至集体所有权亦不存在，此时显然更不会产生由村民委员会代表行使集体所有权的问题。此间逻辑尚须进一步理清。其二，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基于法律行为的可识别性与利益冲突之避免，私法原则上禁止自我行为。[⑤] 将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一体化处理，是否意味着《民法典》所规定之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存在自我代表的逻辑矛盾，从而沦为立法技术上的叠床架屋？进言之，如果必须“提出一系列特殊要求”方能确保二者的“同一”，那么是否意味着二者原本并非同一主体？综上可知，“同一说”尚存在进一步论证的空间。

（二）“区分说”

“区分说”内部亦存在众多不同观点。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将农民集体解释为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所有权只享有代表权限。因此，“区分说”总体上更加关注《民法典》第 262 条“代表”二字所蕴含的法权关系构造。

1. “代表关系说”。如果严格从《民法典》第 262 条的文义出发，那么最容易得出的理解是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被代表与代表之关系。有学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集体设立的专门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前者构成后者的“要素”；[⑥] 应按照“法定代表行使关系”来建构我国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权结构，代表关系的纽带是法定授权。[⑦] 对于农民集

① 参见林广会：《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范围的确定及其法律效果》，刘云生主编《中国不动产法研究》第 23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31－46 页。

② 如“自动全权代表”“代表行使全部财产的所有权”“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与唯一对应性”“成员一致性”等。参见宋志红：《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中国法学》2021 年第 3 期。

③ 参见李永军：《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历史变迁与法律结构》，《比较法研究》2017 年第 4 期。

④ 《民法典》第 101 条第 2 款规定：“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另见高圣平：《〈民法典〉与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从归属到利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⑤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50 页。

⑥ 韩松：《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明确性探析》，《政法论坛》2010 年第 1 期。

⑦ 管洪彦：《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理论证成和实益展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体的主体性地位，“代表关系说”一致认为应属非法人组织。应当指出的是，将农民集体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授权行为解释为法定的授权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前者欠缺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问题。不过，私法意义上的“代表”通常只存在于法人的语境之下，代表人构成法人的机关，以法人的名义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将其效果归属于法人。然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显然是独立的私法主体，其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无论是外部名义方面抑或责任归属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很难解释为另一组织体的机关或者“要素”。而且，将农民集体归为非法人组织，则表明该团体不具有脱离于其成员的独立法人格。由此进一步衍生的问题是，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人）的对外行为导致农民集体（被代表人）负债且后者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农民集体的成员须为此承担无限责任，这在实践层面显然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

2. “代理关系说”。这种观点认为，农民集体的主体性地位可以类比于国家，即农民集体具有“拟制法人”地位。在此前提下，可借鉴国有资产“委托—代理”模式达到集体资产之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目的。[①]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委托代理权限应只包括非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享有所有权。[②] 相比较于“代表关系说”，此说在解决组织的外部名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附属于农民集体，而是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交往。而且，从形式上看，《民法典》对国家所有权行使机制的法律表达与集体所有权具有相似性。[③] 但此一学说同样面临着责任归属的难题。一般而言，被代理人需要负担代理行为之后果。将这一规则用于解释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就是，农民集体既是委托人又是被代理人，依法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另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造的背景下，将农民集体拟制为法人是否会消解前者作为特别法人的制度性价值，也值得进一步思考。[④]

3. “投资关系说”。该说认为，农民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其可以通过附着于集体土地之上的用益物权（主要是未承包到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投资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此不仅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可有效规避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后的经营风险。[⑤]《草案》第 6 条第 4 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思路，根据该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参与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然而，“投资关系说”若要成立，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农民集体具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与治理机制，集体成员之间能够形成有关投资的决议；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而设立，而这两个前提目前似乎都不具备。前已述及，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机制之所以如此特殊，最根本的原因是作为所有权人的农民集体不具备意思能力，无法作出相应的决议行为。再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其“特别性”之一，便体现为其设立未必以出资为必要。譬如，现实中广泛存在的社区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其产生与延续具有历史性，根本不存在成立与否的问题。[⑥] 即便是新设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该类组织具有天然的地域性或者说组织依附性，故其设立更多地取决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行政命令，而非集体成员的出资或者申请行为。[⑦]

4. “信托关系说”。有学者将《民法典》第 262 条之代表关系解释为“法定的信托关

① 参见王洪平：《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主体性关系》，《法学论坛》2021 年第 5 期。

② 姜红利、宋宗宇：《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实践路径与主体定位》，《农业经济问题》2018 年第 1 期。

③ 《民法典》第 246 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

④ 参见林广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的机遇与展望》，《求是学刊》2020 年第 3 期。

⑤ 参见于飞：《“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谁为集体所有权人？——风险界定视角下两者关系的再辨析》，《财经法学》2016 年第 1 期。

⑥ 参见屈茂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研究》，《政法论坛》2018 年第 2 期。

⑦ 参见陈甦：《籍合组织的特性与法律规制的策略》，《清华法学》2018 年第 3 期。

系”。具体可描述为：农民集体是委托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受托人为作为受益人的集体成员之利益管理、运营集体资产，并将由此产生的收益在集体成员间进行分配。[①] 按照信托是否依据当事人的意愿而设立，信托可分为意定信托、法定信托与推定信托。顾名思义，法定信托是指不取决于委托人的意愿，而是依法律规定强制成立的信托。[②] 在立法论的意义上，通过信托关系来塑造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机制确实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同时也契合了集体资产由农民集体所有，并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集体成员之利益而管理、运营的立法表述。但从解释论看，仅凭《民法典》第 262 条实则难以得出两者构成法定信托关系的必然结论。具体而言，需要进一步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法定信托是否存在实定法上之依据。根据《信托法》第 2 条之规定，[③] 我国法律上之信托一般是指意定信托，法定信托则仅指该法第 55 条所规定之情形。依第 55 条，信托终止后，信托财产如有剩余，应当将该剩余财产移转给信托文件指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权利归属人；在此之前，原信托视为存续，并以最终的权利归属人为受益人。此一规定的目的在于确保在对原信托的剩余财产分配完毕前受托人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等并不因原信托的终止而消灭，并同时把权利归属人作为受益人予以保护。[④] 准此以言，我国法上的法定信托与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似乎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其次是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在我国《信托法》的语境下，设立信托是否需要委托人向受托人移转信托财产之权利并不明确。但理论上一般认为，设立信托需要委托人把财产转移给受托人，让受托人成为信托财产的财产权人。[⑤] 以此而论，作为信托财产的集体资产需要在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发生所有权移转，但如此一来，对两者作出区分则似无必要。有学者指出，信托的实质是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由委托人保留财产权利并无不可。[⑥] “信托关系说”基于此立场进一步认为，在设立信托时是否移转集体资产之权属，应视资产类型分别予以讨论，如资源性资产没有必要移转，而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则由农民集体自主决定。[⑦] 然而，一方面，既然两者之间的信托关系源自法定，那么前者又如何自主决定向后者移转其他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并且，依“信托关系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集体所有权人，相关政策对集体资产作类型化划分既无法律效力也不涉及所有权归属的问题，那么其如何接收相应的集体资产而成为集体所有权人？此间逻辑似乎有待进一步明确。另一方面，所谓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所强调者，是信托财产独立于受托人和委托人的固有财产，原则上不被他们的债权人追及，至于是否在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发生财产移转，则并非关注之重点。在这个意义上，设立信托之所以要将信托财产由委托人移转至受托人，最根本的原因是相比于向受托人移转财产权利，委托人保留所有权更加难以有效区隔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其他责任财产。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展开的诸多探讨虽然极具启发意义，但并未形成具有相对说服力的意见。这些观点最根本的分歧主要有二：其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否作为适格的集体所有权人？其二，应当借助何种理论阐述其与农民集体之间的代表关系？下文将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

---

① 参见吴昭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法权关系界定》，《农业经济问题》2019 年第 7 期。

② 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第 2 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年，第 38 页。

③ 《信托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④ 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年，第 519 页。

⑤ 参见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第 98 页。

⑥ 参见楼建波：《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信托财产归属的关系——兼论中国〈信托法〉第 2 条的解释与应用》，《广东社会科学》2012 年第 2 期。

⑦ 吴昭军：《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权——基于信托理论的阐释》，《当代法学》2023 年第 1 期。

三、集体所有权主体演变的历史逻辑

在《民法典》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但却并未对农民集体的主体性地位予以说明的背景下，准确理解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需要对“农民集体”这一概念作出有效阐释。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到农民集体，都是围绕集体所有权而建构的法律概念。集体所有权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所有权形态，其并非产权市场自发交易的产物，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断重新界定权利的结果。因此，集体所有权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极其浓厚的本土实践色彩，对此一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阐述也必须首先置于历史的维度下进行考察。

（一）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私有产权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随即于1950年6月通过《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生产生活资料，并将之无偿分配给贫苦农民。[①] 到1953年初，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土地改革运动是否确立了土地在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私人所有权？有学者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维度对此进行了否定。具言之，在法律所有权层面，农民虽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法律却未赋予任何个人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也即未取得处分权，因此，此时所谓的农民私人所有权的权能并不完整；在经济所有权层面，农民通过无偿的方式取得的土地权利既不是法律上的原始取得，也不是继受取得，而是一种“授田制”，其本质上属于土地使用权制度。[②] 显然，根据此一观点，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民带来的只是名义上而非实际上的私人所有权。

笔者认为，此处首先涉及的其实是所有权的本质问题。在法哲学层面，所有权具有三个本质属性，即终极的支配、财产上的归属以及专属的享有，这一理论构造属个人自由主义的体现。[③] 故而，在传统民法理论的支配下，所有权或者源自社会习俗之法律认可（如通过先占取得对无主物的所有权），或者发端于产权市场的自发交易。但是，通过土地改革运动确立的农民私人所有权，本质上是国家运用强制力量重新界定农村产权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实际上无意直接取得对土地的所有权，因而在立法层面只能将农民规定为所有权之主体。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私人所有权之建构所遵循的实际上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实践逻辑，而非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使得原始取得抑或继受取得等传统所有权理论很难对其进行有效解释。

至于这种私人所有权权能不完整现象，实则并非指法律禁止农民以任何形式处分其所有之土地，而是指后来国家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农民在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配合”态度。从《土地改革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农民显然对其取得的土地享有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④] 事实上，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后迅速出现的土地买卖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新的贫富分化等现象后来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根本动因，这也间接证明此时农民对其土地享有处分权。农民之所以愿意“配合”其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前述整体主义的实践逻辑所使然。由于国家在重新界定农村产权的过程中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此，通过国家行为“制造”的这种所有权已经“包括了后来集体化公有的一切可能的因素”。[⑤] 在产权治理的意义上，国家通过土地改革运动造就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农民”关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塑。在这组新型的产权结构中，虽然农民对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享有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但其行使权利的限度实则取决于

① 参见《土地改革法》第2条、第3条和第10条。

② 参见刘正山：《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史》（上），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

③ 石佳友：《民法典与社会转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7页。

④ 《土地改革法》第30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⑤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国家权力的限度。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集体公有产权的形成

目前，学界不少观点将集体所有权的形成追溯至农业合作化运动，但此一观点未必准确。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包括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我国农村产权结构的表现形式存在显著差异。

1. 初级合作社阶段。通常认为，农业生产合作源自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客观需求，有其历史必然性。[①] 首先，虽然农民私有制的确立在短期内发挥了激励效用，但这种私有制归根结底以小农经济为其基础，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仍受到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等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大致走向了两条道路：其一是自发地联合起来，开展互助活动；[②] 其二是任由小农经济自由发展，从而产生新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显然，后一条道路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方向有所背离。[③] 再者，小农生产的一大弊端就是其往往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无力再扩大生产，而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又需要农业的支持，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加速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④]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1951 年 9 月，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并于同年 12 月下发各地党委试行。

《决议（草案）》总结了农业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一是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二是常年互助组；三是实行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在后来也被称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方面，临时互助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并不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常年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则已具备一定程度的组织化特征，譬如，存在农副业的结合、技术上的分工以及少量的公有财产等，尤其是初级合作社还享有统一使用和调配相关生产资料之权限。值得注意的是，在 1955 年 11 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初级合作社被明确定义为“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组织”，而初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是农业合作社发展的两个阶段，据此，初级合作社可以说“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初形态”。[⑤] 但应当指出的是，初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有本质不同。根据《决议（草案）》的有关内容，此时的农业生产互助总体上仍然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强调的是农民对于生产资料的联合。[⑥] 可见，我国在这一阶段并未建立起农村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组织”此时仅取得对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2. 高级合作社阶段。应当认为，我国农村产权主体制度由农民私有制向集体公有制的转变，发生于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过渡的阶段。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具有部分社会主义因素的初级合作社，再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表明，建立在农民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初级合作社只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必要阶段。1956 年 6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专指高级合作社）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57 年 3 月底，全国加入高级合作社的农户比重达到 93.3%，[⑦] 这也标志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式形成。[⑧] 但需要强调的是，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都属于“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具有一级行政单位的主体地位，只不过后者取得了对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

① 参见［美］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第 68 页。
② 马晓河：《中国农村 50 年：农业集体化道路与制度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5－6 期。
③ 吴建征、武力：《国家整合与体制重塑：以 1949—1956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考察》，《湖北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2 期。
④ 参见丁志刚、王杰：《中国乡村治理 70 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4 期。
⑤ 何宝玉：《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内涵与成员确认》，《法律适用》2021 年第 10 期。
⑥ 申始占：《“所有权—权能调整”框架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百年变迁的评价标准建构》，《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 年第 5 期。
⑦ 宋涛：《积极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对于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社的作用》，《经济研究》1958 年第 2 期。
⑧ 参见李永军：《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历史变迁与法律结构》，《比较法研究》2017 年第 4 期。

权，我国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由此形成。

3. 人民公社阶段。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小规模的单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已难以适应现阶段的发展要求，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管理体制方面，人民公社的显著特征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根据《决议》相关内容，人民公社不仅要扩大规模，将其管理范围覆盖农林牧渔等各行各业，而且，“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1959 年 4 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指出，人民公社所有制既包括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也包括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由此明确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格局。由于人民公社同时具有经济组织与政权组织的性质，故与高级合作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相比，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则已难谓纯粹的集体所有制，而是兼具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双重属性。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权模式使得我国各类农村组织的形式趋于复杂，为后来我国乡村中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职能交叉以及农村产权结构含糊不清埋下了伏笔。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所有制的再表达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产权高度集中，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国家要维持这样一套制度的运转也必须支付极其高昂的成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也因此势在必行。据学者考察，从 1977 年到 1978 年底，安徽、四川、吉林等地已在农村试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①] 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正式明确生产队领导下的“包产到户”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自主经营权，随着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人民公社体制迅速走向瓦解。1983 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发［1983］1 号），提出“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为政社分设”的要求，一方面要依照《宪法》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另一方面为经营好土地，有必要保留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

不过，尽管相关文件一再重申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其实际上并没有明确涉及集体所有权的主体问题。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史上的确曾作为集体所有权人而存在，但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形成的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乃至乡镇政府等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实际上都是为了填补人民公社解体后造成的农村组织空白而设置的。在这个意义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集体资产的当然继受者。

1982 年实施的《宪法》亦未明确规定集体所有权之归属，其第 9 条第 1 款、第 10 条第 2 款仅规定农村土地及森林、山岭等自然资源依据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但该“集体”是否特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难以凭借上述条文得出确切答案。1986 年《民法通则》第 74 条对集体所有权之主体作出了规定。[②] 不难发现，本条第 1 款之文义存在两种解释可能性：既可理解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同时属于劳动群众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解释为该款意图将本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转移至劳动群众集体。但结合该条第 2 款可知，应以采纳后一种解释为宜。该第 2 款首先明确区分了农民集体所有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且强调对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有“经营、管理”职责；其次则是强调，对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则“可以”

① 参见钟怀宇：《中国土地变革的历史与逻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90 页。

② 《民法通则》第 74 条第 1 款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一）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二）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三）集体所有的建筑物、水库、农田水利设施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四）集体所有的其他财产。”第 2 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

改为农民集体所有。

从体系相关的立法看，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属于两个不同的主体。如 1993 年《农业法》第 12 条。[①] 这一规定实际上已摒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立法表述，并且，如果认为本条所称之“集体”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将产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承包其自身所有之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逻辑矛盾。1986 年《土地管理法》第 8 条虽然采纳了与《民法通则》第 74 条接近的表述，但前者在 1998 年修订时也删除了“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规定，而是仅强调该组织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职责。2002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12 条的规定与此类似。需要指出的是，从《民法通则》到《农村土地承包法》，并未突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人”地位。直到 2007 年《物权法》出台才正式作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的规定。

通过历史的回顾可知，集体所有权最早可追溯至高级合作社阶段。此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确是无可争议的集体所有权人，但在“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下，集体所有权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异化”，具备了部分国家所有权的性质。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集体所有权曾一度处于主体不明的状态，其后的立法逐步确立了由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别担当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和代表行使主体的集体所有权行使机制。这一过程说明，“农民集体”概念之塑造有其历史逻辑和特殊使命，在新的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宜再担任集体所有权人。一方面，“农民集体所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种表达形式，意在确保“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底色。因此，“农民集体”虽然并非传统民法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主体。[②] 与此同时，“集体所有”并不拒斥农户个体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可以出于“集体所有”的这一本质属性分享和利用集体所有的资产。[③] 就此而言，集体所有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利益分享机制，只不过“集体所有”所蕴含的公益底色与农户个体的私益主张需要经由集体成员身份实现连接。另一方面，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导致了“三级所有”结构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向转型，[④] 新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历史上的高级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存在实质区别。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作为集体所有权人本质上属于公法人所有权，从而不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总体方向。但当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造是按照私法人的总体方向塑造其治理机制。[⑤] 以此而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宜继续作为集体所有权人。

四、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的解释展开

在区分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后，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阐述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背后的法律结构。

（一）农民集体的意思源自法律的直接拟制

《民法典》将民事主体划分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三种类型，农民集体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但这并不影响其法律关系的形成。换言之，在农民集体不具有意思能力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人”地位可以来自法律的直接授权。这种授权模式并非孤例。譬如，依《民法典》第 145 条，在自然人意思能力欠缺之场合，其作出的意思表示原则上需经由法定代理人追认或者同意方可生效；第 246 条规定，国有财产依法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权限源自法律的直接授予，是指立法者通过立法技术手段，对农民集体的授权意思进行了法律上的拟制。拉伦茨认为：“法律拟制是：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于此应分别作为立法技术的

① 1993 年《农业法》第 12 条规定：“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农业生产。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造林。个人或者集体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农业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② 李国强：《权利主体规范逻辑中的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求索》2022 年第 3 期。

③ 参见刘小平：《土地财产权的二维构造——一种从现实出发的理论解释方案》，《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 年第 6 期。

④ 杨一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国农村观察》2015 年第 5 期。

⑤ 参见刘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实现形式》，《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 年第 4 期。

手段、作为判决理由的手段以及应用于学术中的拟制”。[①] 黄茂荣进一步从作为立法技术手段的拟制（即拟制性规范）中区分出“隐藏的引用”与“隐藏的限缩”两种类型，并将隐藏的引用具化为表见拟制、推定式拟制以及引用性拟制三种类型。发生表见拟制的原因是，“当处理系争问题，尚未发展出成熟的法律原则，以致必须借助于假象，借用一个在当时已被接受，但不尽该当之法律原则，处理系争案件”。[②] 不难发现的是，《民法典》第262条的立法表述在很大程度上系仿自第246条之国家所有权行使规则，而该两条规定又分别继受自《物权法》第60条和45条。之所以如此安排，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延续自《民法通则》之一贯路径。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物权法》立法时期，立法机关一方面在国家所有权应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这一问题上基本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③] 另一方面，对于集体所有权应如何行使却缺乏充足的理论积淀与实践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尽管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机理与国家所有权存在明显区别，[④] 但具体到规则表达上，只能“表见地借用”同为公有制表达形式的国家所有权行使的相关规定。当然，恰如有学者所言，运用表见拟制“虽然可以济理论贫乏之急，但却未能清楚地将处理上之真正的考虑表现出来。这可能使系争考虑之基础观点的发展（具体化）受到抑制”。[⑤] 这其实也是在《民法典》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在对待“谁是集体所有权人”这一问题上存在反复的根本原因。

（二）集体所有权委托代理行使机制的解释证成

采取委托代理的解释方案首先是为维持《民法典》逻辑体系上的一致性。集体所有权的行使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仿照国家所有权而确立，因此无论是国家所有权抑或是集体所有权，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现方式。两者的区别只存在于形式方面，其内在的构造机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质言之，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益的分享机制，只不过国家所有权强调全民分享利益，而集体所有权重在使特定范围内的人分享其中的利益。

就国家所有权而言，《民法典》第246条采用了由国务院代表行使的立法表述，但同时依照相关特别法的规定，也可以由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有关权利。[⑥] 在实践中，国家所有权的代表行使往往被表述为“委托代理”。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为例，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要明确由国务院授权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表行使所有者职责；探索委托省、市（地）级政府代理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资源清单和监督管理制度。这一行使机制被外界解读为国家所有权的“分级行使”机制。也就是先由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全民）授权国务院全权代表，再由国务院授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表权限或者授予省市级政府“代理”权限。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在此交叉使用了“代表”和“代理”两个具有不同法律内涵的术语，但从行为归属的角度看，前者或许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国务院原本就是由各组成部门所构成，各该组成部门的行为同时构成国务院的行为。因此，应然的逻辑是，国家（全民）在向国务院授权时，作为国务院组织架构之一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就已经自动获得了行使国家所有权之权限。对于这种所有者权限，其可以选择自己行使，也可以委托地方政府行使。由此，国家所有权之行使机制实则是一种“国家（全民）—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三层次结构。并且，从实然层面看，土地和矿产资源之国家所有权一般也是由地方人民政府代表行使，[⑦] 而根据《指导意见》，该代

①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2页。

②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增订七版），台北：作者自版，2020年，第331页。

③ 参见何勤华、杨秀清、陈颐：《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下卷（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90页。

④ 参见宋志红：《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民法典〉第262条真义探析》，《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5期。

⑤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增订七版），第332页。

⑥ 参见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解读》，第100页。

⑦ 屈茂辉、刘敏：《国家所有权行使的理论逻辑》，《北方法学》2011年第1期。

表关系的实质就是“委托代理”。

具体到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指导意见》提出，“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要处理好该两项权利之间的关系，才能“创新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由此可知，在产权体系建设层面，相关的顶层设计并不区分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而是一体要求推进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在产权主体层面，要“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明确农村集体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循国家所有权之行使逻辑，集体所有权之代表行使机制应作类似处理。也就是按照相关顶层设计，“所有权委托代理的客体是‘所有者职责’，是一个包含了权能、权利、责任、义务的综合概念，不宜单纯套用民事或行政委托代理规范”。[①] 换言之，集体所有权的委托代理行使机制与传统民法语境下的委托代理具有实质性的区别。由于集体所有权兼具公益和私益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其在行使方面还内嵌一定的公法逻辑。这种公法逻辑仅体现为一种职责，也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理人）须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并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结 语

集体所有权如何行使关系到该项权利如何最终得以落实？透过上述分析可知，立法塑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集体两个概念各自有其特定规范目的，二者属于不同民事主体。《民法典》第262条仅规定集体所有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仿自国家所有权。自解释论的立场而言，自该条出发至多只能明确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且应当仿照国家所有权建构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机制。由此，集体所有权行使的具体机制问题实则属于《民法典》未完成的任务，须待未来的立法作进一步明确。

■责任编辑/宋雨桃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Exercise of Representative Rights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SHI Jia-you & LIU Hu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How to exercise collective ownership is the very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over which the theorists concerned have controversies.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rural property righ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veals that in the past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had the undisputed collective ownership, but it was essentially a kind of ownership similar to that of the public legal person.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eople's commune, the nature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s a private legal entity determined that it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acting as the owner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farmer-led collectives was developed for a specific normative purpose. The exercise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tems from the law's direct formul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farmer-led collectiv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nsistency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legal system,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exercise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should be modeled on the "principal-agent" mechanism of the state ownership.

Keywords: collective ownership; farmer collectiv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legal representative; entrusted agent

① 陈琛：《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中国自然资源报》2022年3月25日第1版。

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之裁量驳回制度研究

吴高臣，姜　楠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摘　要：裁量驳回制度在平衡决议瑕疵与决议稳定的利益冲突、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的权益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适用范围、要件认定方面也存在技术差异和理念偏差。单一的判断模式无法满足不同瑕疵类型对制度适用的多样化需求，应以决议撤销功能为制度适用方向，区分不同瑕疵类型，力求统一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对于信息瑕疵，优先以程序瑕疵与股东权利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轻微瑕疵，再结合决议内容判断实质影响，并重构原告的举证义务以增强滥用诉权功效；对于非信息瑕疵，主要应进行实质影响要件的价值审，并在程序正当性与决议稳定性的利益衡量中运用比例原则审慎判断。

关键词：决议撤销制度；裁量驳回；程序瑕疵；实质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095－11

一、裁量驳回制度的体系定位与实践检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4条针对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引入了关于程序瑕疵的新规则。具体而言，当股东会、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认定为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法院不应支持撤销决议的诉讼请求。这种存在程序瑕疵仍维持决议效力的裁判规则被称为公司决议撤销纠纷的裁量驳回制度。该制度经过五年多的司法实践取得了较好效果，2022年12月30日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26条将裁量驳回制度的规定予以吸纳，肯定了该制度在公司决议瑕疵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也对该制度的实际效用寄予了更高期望。2023年8月28日提交审议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保留了该制度。但由于“轻微瑕疵”“实质性影响”均属于“包含开放价值判断的量化性概念”，[①]在表述方式上语义抽象、边界模糊，如何提高制度适用的预期度和可裁性，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裁量驳回制度的体系定位

法条只是组成各法律规定之成员，法律规定又是组成法律规范之单元，几乎没有一个法条是完全的。[②]理解适用法条的规定，必须整体地了解其所在的制度体系。《公司法解释四》完善了决议瑕疵诉讼的法律适用规则，确定了决议不成立之诉。至此，决议不成立、决议无效与决议可撤销共同构成了决议效力瑕疵的“三分法”格局。“三分法”格局的立法逻辑将瑕疵性质、瑕疵程度及决议违反的规范性质作为划分依据。其中，最主要的分类依据为瑕疵性质，其将决议效力瑕疵分为内容瑕疵与程序瑕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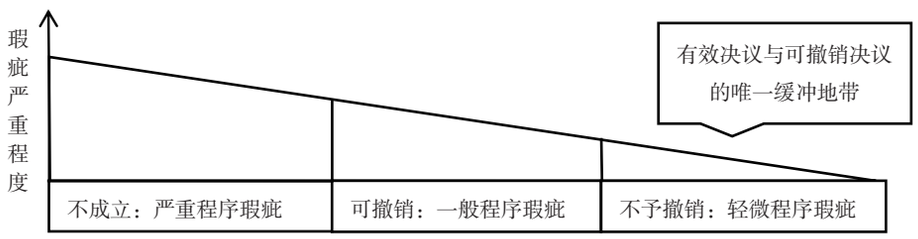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3－05－31
作者简介：吴高臣，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姜楠，首都师范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① 李建伟：《论公司决议轻微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1期。

②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6－107页。

本文所探讨的裁量驳回属于决议效力瑕疵体系中程序瑕疵范畴内的裁判制度。程序瑕疵依瑕疵严重程度可分为三类：一是严重程序瑕疵，公司会议未召开、未表决，或缺少与召开或表决相关的实质性要件，因缺乏决议外观，被赋予决议不成立的法律后果。二是一般程序瑕疵，公司决议已成立，但会议的召集程序或表决方式违反法律或章程规定的程序性规范，被赋予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三是轻微程序瑕疵，会议存在违反程序性规范的瑕疵，但程度轻微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法院可驳回原告撤销决议的诉请。三类程序瑕疵的严重程度依次递减（见图 1）。

《公司法解释四》第 5 条已明确列举导致决议不成立的情形，故严重程序瑕疵与一般程序瑕疵的区分较为清晰。但由于《公司法解释四》第 4 条表述的抽象性，轻微程序瑕疵与一般程序瑕疵的区分仍十分模糊。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背景下，作为有效决议与可撤销决议的唯一缓冲地带，[①] 面对多样的瑕疵类型和复杂的案件事实，探索裁量驳回制度的适用范围和裁判方法十分必要。



资源来源：作者自制。

图 1　不同程度的程序瑕疵下决议的法律后果

（二）裁量驳回制度的实践检视

为探究裁量驳回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情况，本文聚焦于决议撤销纠纷中与裁量驳回制度相关的裁判。笔者 2023 年 1 月 8 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 court. gov. cn/）进行检索，检索条件设置如下：全文检索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案由为“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文书类型为“判决书”，裁判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25 日[②]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获得裁判文书 208 份。筛除同一案件不同审级的重复文书、争议焦点与裁量驳回制度无关的、超过除斥期间的案件，经整理获 107 份样本案例。按照程序瑕疵类型与频次进行分类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案例裁量驳回程序瑕疵事由统计表

序号	程序瑕疵类型	案件数量	所占比例	支持诉求数量	裁量驳回数量
1	召集通知时间瑕疵	30	28%	6	24
2	召集通知内容瑕疵	16	15%	7	9
3	召集通知对象瑕疵	22	20%	8	14
4	召集主体瑕疵	21	20%	10	11
5	主持主体瑕疵	3	3%	0	3
6	会议记录瑕疵	3	3%	0	3
7	表决方式瑕疵	10	9%	7	3
8	计票程序瑕疵	2	2%	0	2

资源来源：作者自制。

① 李建伟，王力一：《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实证研究——〈公司法解释四〉出台前审判创新实践的价值发现》，《经贸法律评论》2020 年第 3 期。

② 《公司法解释四》颁布之日。

对瑕疵类别和裁判观点的归纳可以探析制度的适用现状，避免纯理论化经验面向的不足。样本案例中，适用裁量驳回制度的瑕疵按会议进程可分为会议召集瑕疵、会议召开瑕疵、议题表决瑕疵。

1. 会议召集程序瑕疵的裁判观点

会议召集程序瑕疵包括召集权瑕疵和召集通知程序瑕疵。召集权瑕疵包括越权召集和未以董事会名义召集股东会。越权召集是否适用裁量驳回在实践中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其根本原因乃是后文所阐述的裁判理念的差异。对于未以董事会名义召集的案件，由于董事会召集股东会应体现其集体意志，故仅以董事长个人名义签发召集通知，属于重大程序瑕疵，决议应予以撤销；[①] 未以董事会之名但实际已通过董事会的相关程序，法院则认为属于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无实质影响。[②]

召集通知程序瑕疵具体表现为时间瑕疵、内容瑕疵和对象瑕疵。合理的召集通知时间是保障股东参会权利的客观基础。在通知时间与法律或章程规定时间差距较小的案件中，股东一般实际参会，法院以瑕疵并未实际损害股东权益裁量驳回案件。[③] 而对于仅在会议召开前一天或召开当日才发出召集通知的案件，法院认为属于严重程序瑕疵，判决撤销决议。[④]

召集通知内容的全面准确是股东充分准备会议的必要保障。《公司法》未对有限公司召集通知应当载明的内容作出规定，也不禁止会议期间临时增加议题进行表决。因此，当股东会决议内容超出通知的议题范围或未载明议题具体内容，是否属于召集程序瑕疵以及瑕疵是否轻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观点。对于决议超出会议通知内容，主张不属于召集程序瑕疵的法院认为，《公司法》对此未作出明确规定，当公司章程也未规定时，不属于决议可撤销事由。[⑤] 而持相反意见的法院则认为，临时增加的议题属于对决议产生了实质影响的程序瑕疵，且不属于轻微瑕疵，应当撤销决议。[⑥] 对于召集通知仅载明标题而未载明议题具体内容的案件，也存在观点分歧。一种裁判观点认为瑕疵轻微，且当原告股东持有的表决权不足以动摇既有的表决结果时，决议不应予以撤销。[⑦] 另一种则认为仅载明议案标题将导致无法为股东充分发表意见和有效行使表决权预留合理的准备期间，瑕疵不应认定为轻微，决议应予撤销。[⑧]

召集通知对象瑕疵涉及公司是否将召集通知送达股东。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对股东未出席会议的案件判决撤销，[⑨] 而对于股东未受瑕疵影响实际出席会议的案件，则一般适用裁量驳回。[⑩]

2. 会议召开程序瑕疵的裁判观点

会议召开程序是决议真实的保障。一方面，须保证会议实际召开，具有适格的主持主体；另一方面，应当制作会议记录，确保会议过程

① 参见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8民终1283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20）浙0304民初671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2民终959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496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8民终271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542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5549号民事判决书。

⑤ 参见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2民终862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608号民事判决书。

⑥ 参见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2民初8547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428号民事判决书。

⑦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民终210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43105号民事判决书。

⑧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15755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20民终8542号民事判决书。

⑨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2民终4101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3民终3108号民事判决书。

⑩ 参见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11民终538号民事判决书。

的真实性。虽然法律对主持主体的顺位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法院一般认为会议主持程序方面的瑕疵并未阻碍股东获取信息权和表决权，且主持人的主持作用并不必然直接影响股东个人自由投票之意思表示，对决议并未产生实质影响，故裁量驳回案件。[①]《公司法》第 41 条第 2 款规定了会议记录记载所议事项和股东签名的必要性，但会议记录仅为会议过程的记录性文件，只要存在其他证据证明会议实际召开，且未影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则认为未对股东会决议产生实质影响，适用裁量驳回。[②]

3. 议题表决程序瑕疵的裁判观点

议题表决阶段的瑕疵主要包括表决方式瑕疵、计票程序瑕疵。在缺少股东表决记录、表决主体无权行使表决权等实际影响或可能影响表决结果的案件中，法院均以表决方式可能对决议内容产生实质影响为由撤销决议。[③] 在涉及计票程序瑕疵的案件中，原告对表决投票时的清点人员提出异议，法院则认为未按照人员规定进行投票清点仅为轻微瑕疵，对涉案决议不产生实质影响。[④]

二、裁量驳回制度的司法困境与价值功能

司法过程是将抽象的法律条文适用到具体案件事实的过程，[⑤] 而适用法律条文的前提是解释那些“承载”意义的法律文字。[⑥] 虽然整体上与裁量驳回相关的判决书都具有一定的说理意识，呈现出向法定要件靠拢的统一化倾向，但仍存在宏观理念层面和微观技术层面的问题。[⑦] 探求制度要件“轻微瑕疵”“实质性影响”的意义，不能只阐明事理，还要释明法理。[⑧] 对此，制度定位与价值功能是有效解决其司法困境的理论根基。

（一）制度适用扩大化倾向下的范围限定

1. 司法困境：裁量驳回制度存在适用扩大化倾向

实证研究表明，在召集通知内容瑕疵的样本案例中，撤销决议与裁量驳回的比例最为接近，法院对该类程序瑕疵的裁判观点也存在较大分歧。原因在于《公司法》和大多数样本案例中的公司章程均未对该类程序瑕疵作出明确规定，一些法院难免顾此失彼，过分关注程序是否存在瑕疵、瑕疵是否轻微，而忽视了程序瑕疵本身的判断依据。具体而言，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召集程序本不具有决议撤销制度的适用空间，但有时却被认定为瑕疵，进而利用裁量驳回制度作出裁判。虽然裁判者作出这种扩大解释一般出于维护原告权利和寻求程序正义，但也造成了司法中裁量驳回的适用混乱、标准不一。

2. 制度定位：对违法违章决议的“合理容错机制”

立法与学界对于裁量驳回制度能否适用内容瑕疵的观点较为统一。裁量驳回是考虑到撤销之诉的瑕疵可因起诉期间的经过归于治愈而认定的制度，因内容瑕疵无治愈之空间，故不适用于内容瑕疵。[⑨] 对此，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立法也均将裁量驳回制度限制于程序瑕疵的范围内。由于某些程序规则不涉及公司

① 参见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 04 民终 1316 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18 民终 3245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 0523 民初 1074 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 10 民终 489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 民终 4843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1 民终 2805 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01 民终 9672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8 民初 43105 号民事判决书。

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第 100 页。

⑥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94 页。

⑦ 参见李建伟：《论公司决议轻微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1 期。

⑧ 胡仕浩、刘树德：《新时代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制度构建与规范诠释（上）〈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18 年第 16 期。

⑨ 参见［韩］李哲松：《会社法讲义》（第 26 版），韩国博英社，2018 年，第 620 页。

民主决策的本质，我国立法选择将其赋予公司自主决定。根据《公司法》第22条，只有决议程序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时才认定为存在瑕疵。此时，股东或董事才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撤销决议。裁量驳回的制度定位应是对违法或违章决议的“合理容错机制”,[①] 而非对所有程序问题的驳回机制。若原告以法律和公司章程均未规定的程序存在问题为由提起诉讼，不存在适用裁量驳回制度的空间。司法裁判应当尊重立法选择，如果将任何不规范的程序均纳入裁量驳回，将降低其法律要件适用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还具有侵犯股东诉权、影响决策稳定的风险。

（二）制度要件适用偏差下的功能反思

1. 司法困境：“轻微瑕疵”要件的僵化适用

《公司法》对股东会、董事会召集表决程序的规定彰显了保护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立法价值。经营管理权是股东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权利，与会并表决是股东行使经营管理权的重要途径，会议应当确保每位股东与会和表决机会的实现。[②] 正因如此，实践中多数法院均以程序瑕疵是否影响各股东获取信息、公平地参与多数意思的形成，作为轻微瑕疵的判断标准。然而，基于裁判技术的差异和当事人间复杂的利益博弈，轻微瑕疵适用的着力点容易被“曲解”。在微观技术层面，很多法院将轻微瑕疵僵化理解，仅以股东是否实际出席会议衡量瑕疵是否重大。例如，在刘丰年与贵州省铜仁天鑫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中，法院认为通知时间上的瑕疵妨碍了未实际参会的原告股东公平地参与多数意思形成的权利，且原告未出席会议，遂判决撤销决议。[③] 然而，关注案件事实后可以发现，会议通知仅比规定延迟送达三天。原告未出席会议与召集时间瑕疵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仅因原告未参会就撤销决议是否具有合理性？诚然，当瑕疵并未影响股东和公司意思表示的形成，也未触及公司决议的正当性之时，即使存在程序瑕疵也并不一定伤害实体正义。[④] 此时，驳回撤销决议的诉请更具有合理性。

制度要件的僵化适用不仅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困境，还可能在衡量股东权利和决策效率时本末倒置，为原告利用拒绝参会和程序瑕疵挽回对其不利的决议结果留下可乘之机。决议撤销之诉以原告行使诉权具有正当目的为前提，即原告与公司利益保持一致，期望会议能以合法程序形成决议，而非利用诉讼妨碍其他股东及公司的经营。[⑤] 但样本案例中滥用诉权情况频出。例如，原告与公司积怨颇深，故意拒收召集通知邮件后又提起决议撤销之诉;[⑥] 又如，原告收到会议通知后无正当理由不参会，仍以程序瑕疵为由请求法院撤销决议。[⑦] 上述案例中，原告起诉并非为了维护自身权利或决议合法，而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甚至是损害公司利益，假借程序瑕疵之由扭曲了决议撤销之诉的本来功能。

2. 功能反思：防范滥用诉权功能的有限性

我国立法对决议撤销之诉的功能定位为“公益之诉”，与日韩保持了相同的立场。“公益之诉”也被称为“共益诉讼”，意味着除个人利益受到瑕疵影响的股东外，个人利益未受到损害的股东也具有维护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权利。[⑧] 正是由于撤销权的公益性质，每个股东与决议撤销均具有利害关系，仅具备股东资

① 刘俊海：《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平衡艺术：〈公司法解释四〉的创新、缺憾与再解释》，《法学杂志》2017年第12期。

② 李建伟，王力一：《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实证研究——〈公司法解释四〉出台前审判创新实践的价值发现》，《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

③ 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811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李建伟：《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类型及其救济体系再构建———以股东大会决议可撤销为中心》，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2008年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⑤ 黄辉：《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85页。

⑥ 参见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终623号民事判决书。

⑦ 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1442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496号民事判决书。

⑧ 丁勇：《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功能反思》，《法学》2013年第7期。

格即可作为决议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诉讼门槛过低的立法选择无法从源头上遏制滥诉，而诉讼担保制度也仅以提高诉讼成本的方式预防滥诉的发生，“对抗滥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诉讼中由法院认定并予以驳回”。① 然而，在理论上，基于决议撤销的“公益之诉”性质，股东正常行使权利提起撤销之诉，构成滥诉的标准很难认定；在制度上，裁量驳回制度的法律规定缺乏与滥诉直接相关的内容，“防止滥诉并非制度设计之初衷”。② 因此，理论上裁量驳回抑制滥用诉权的功能较为有限。

（三）裁判理念差异下的价值衡量

1. 司法困境：“实质影响”要件的裁判理念偏差

在宏观理念层面，裁判者面对利益衡量时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关于股东、监事越权召集股东会的瑕疵之裁判。持结果正义观点的法院认为该瑕疵未影响其他股东参会权、表决权，重新开会表决仍能通过相同决议，对决议并无实质影响，应裁量驳回。③ 持程序正义观点的法院则认为违反召集前置程序本身即不属于轻微程序瑕疵，应撤销决议。④ 公司利益及决策稳定与少数股东权益的不同主次关系引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判观点，其根源乃是裁量驳回制度带给法院的利益衡量难题。此外，实证研究表明，结果导向思维是法院普遍的裁判理念。在因程序瑕疵导致原告股东未能参会的案件中，被告公司通常辩称，即使原告参会，其持股比例也不会改变公司决议的原定结果，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法院的主流裁判观点亦是如此。⑤ 不可否认，大股东的表决权占有绝对优势，小股东的表决权一般不能撼动股东会的决议结果，但法院完全依持股比例作出判决未免有失偏颇。

德国法对于程序瑕疵与决议撤销之间的关系标准，经历了“因果关系理论”“客观判断股东标准”的变迁，最终落脚于“相关性理论”。⑥ 因果关系理论要求程序瑕疵与决议结果必须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才应当撤销决议，⑦ 但基于因果关系理论，程序瑕疵与决议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将因小股东的持股比例而被切断，无论程序瑕疵与小股东能否出席会议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大股东都可以主张基于小股东的持股比例会作出相同的决议结果，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司法界“结果导向”思维的缺陷。对于绝大多数程序瑕疵来说，其所违反的程序规定本身就旨在保证中小股东的参与权利，⑧ 结果导向思维下，控股股东可完全以程序瑕疵不影响决议结果为由任意侵犯中小股东权利，将中小股东的权利置于更为不利的境地，也易纵容公司“重实体，轻程序”的治理模式。

2. 制度价值：平衡多重利益冲突

《公司法》的立法目的条款表明，制定该法旨在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公司法解释四》贯彻细化了《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加强了股东权利保护，妥善处理了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等利益冲突。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立法目的围绕着公司治理、权利保护、利益冲突展开，裁量驳回制度的立法价值也以此为指引，是一种平衡公司自治与司法调整，衡量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安排。⑩

裁量驳回制度具有平衡决议瑕疵与决议稳

---

① 丁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历史、功能与规则改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45 页。

② ［日］山下郁夫：《“株主总会决议撤销请求の裁量弃卻———以裁判例绍介と检讨”商法之商业登记》（《味村最高裁判事退官纪念论文集》），载《商事法务》1998 年，第 191 页。

③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3 民终 110 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20）津 0112 民初 4725 号民事判决书。

⑤ 参见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5 民终 2806 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 05 民终 794 号民事判决书等。

⑥ 参见丁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历史、功能与规则改进》，第 76－81 页。

⑦ 王彦明：《股东大会决议的无效与撤销——基于德国股份法的研究》，《当代法学》2005 年第 4 期。

⑧ 丁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历史、功能与规则改进》，第 164 页。

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57052.html，访问时间：2022－12－18。

⑩ 参见南玉梅：《公司瑕疵决议诉讼中裁量驳回规则的构建与适用》，《法学评论》2018 年第 6 期。

定的利益冲突的价值。改变会议已通过的决定比重新产生新的决定更值得深思熟虑，这是为了避免会议组织决策的不稳定。[①] 公司决议作为团体法律行为，直接影响公司经营效率和社会经济交易安全。裁量驳回制度的出台有助于减少司法实践中不确定性的裁判变量，促使法官审慎判断各类程序瑕疵的性质和程度，缓解撤销之诉中司法过于绝对地干预公司自治的情况，减少对公司经营效率和社会经济秩序安全的不利影响。[②]

裁量驳回制度具有平衡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的权益保护的价值。在公司决议形成的过程中，股东滥用权利的本质是滥用其优势地位，[③] 控股股东时常利用优势地位违反程序规则。对此，决议撤销诉讼制度旨在否定以违法程序假借多数决的公正意思而成立的决议的效力，保障因违法程序而受到侵害的少数股东权益。[④] 但当程序瑕疵轻微违法，未侵害少数股东权益之时，直接撤销决议势必对公司和多数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引入裁量驳回制度时也曾表示，增订裁量驳回的目的是为了“兼顾大多数股东之权益”。[⑤] 因此，裁量驳回制度可以兼顾公司和多数股东的权益保护，防范决议撤销制度对少数股东权益的“过度救济”，实质上促进了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的平衡状态。

三、裁量驳回制度的审慎适用

裁量，对法院而言，意味着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决定案件结果的权力；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非此即彼的裁量结果。正确适用裁量驳回制度包含强烈的价值判断，即裁判者对于“轻微瑕疵”与“实质影响”的解释与认定，关涉商事决策稳定与股东权益保护、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等利益衡量。法院必须充分阐明作出裁量的事实和理由，审慎适用裁量驳回制度。

（一）以决议撤销功能为制度适用方向

决议撤销是基于公平的纠错机制，裁量驳回是基于效率考量的决策稳定机制，上述裁判理念偏差问题的根源，乃是决议撤销与裁量驳回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虽然学界始终致力于对决议撤销制度的功能进行重校和反思，[⑥] 但不可否认，在我国“公益之诉”的立法下，保护股东权利、控制决议合法构成了决议撤销的双重功能。

作为对决议撤销制度在诉讼中绝对化倾向的矫正，裁量驳回的制度解释不应脱离决议撤销制度的功能。例如，以决议撤销保护股东权利的功能为基础，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轻微瑕疵的认定应当判定瑕疵是否真正影响了决议参加者的实体权利（主要是固有权），[⑦] 误导股东表决权的瑕疵应认定为重大瑕疵，不得裁量驳回。[⑧] 然而，依据这种判断标准，召集主体瑕疵、主持主体瑕疵等未影响股东表决权的瑕疵，均认定为轻微瑕疵是否合理？是否有违程序规则本身的立法价值？由此，单一的判断模式无法满足不同瑕疵类型对制度适用的多样化需求，解决之道在于依照不同瑕疵特征提供不同的裁判模式，由裁判者根据具体案情作出选择，以促进裁量驳回制度适用的一致性、功效性和合理性。

（二）信息瑕疵下裁量驳回的司法适用

知情权是股东行使其他股东权的必要手段和媒介，其本质在于，股东有权知晓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某些真实信息。相应的，公司和有关

① ［美］亨利·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袁天鹏、孙涤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5 年，第 48 页。

② 施天涛：《公司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年，第 373 页。

③ 叶林：《公司治理制度：理念、规则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57 页。

④ 钱玉林：《论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法学》2006 年第 11 期；丁勇：《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功能反思》，《法学》2013 年第 7 期。

⑤ 《公司法修正条文对照表及立法理由》，台北：元照出版社，2001 年，第 51 页。

⑥ 参见王湘淳：《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功能重校与规则再造》，《法学论坛》2018 年第 1 期；丁勇《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功能反思》，《法学》2013 年第 7 期。

⑦ 参见李建伟：《论公司决议轻微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1 期。

⑧ 参见南玉梅：《公司瑕疵决议诉讼中裁量驳回规则的构建与适用》，《法学评论》2018 年第 6 期。

主体负有依法向股东提供有关真实信息的义务。[①] 股东有权知晓会议召集信息的权利，一定程度上符合知情权的本质，可称之为信息瑕疵。法律或章程中的信息瑕疵程序规范旨在保障股东权利，确保股东提前获知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议题等相关信息，以便提前了解会议内容，做好相应准备，进而充分发表意见，参与表决。

1. 轻微瑕疵的司法认定

对信息瑕疵而言，因涉及股东是否参会的事实问题，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可以先从更偏向事实判断的“轻微瑕疵”入手。样本案例中，召集通知时间瑕疵、内容瑕疵、对象瑕疵属于信息瑕疵。其中，召集对象瑕疵属于公司未将会议通知有效送达某些股东，直接侵犯股东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的重要权利，相应的决议属于无效，[②] 亦或不成立、可撤销，[③] 尚存在争议。对此，从体系性角度进行解释，一个扼要的结论是：需明确界分内容违法和程序违法排除对决议无效的认定，应当根据瑕疵轻重（未通知成员的比例）以及是否缺乏决议外观，认定决议不成立或可撤销。若公司未通知全部股东，意味着缺少保障会议实际召开的必要条件，决议不成立。若公司未通知部分股东，在已经实际召开会议、合法表决的情形下，由于并不缺少与召开或表决相关的实质性要件，即使某些股东未能参会，也仅具有通过司法途径撤销决议的权利，无法撼动决议已经成立的事实。那么，在决议撤销之诉中，是否可适用裁量驳回呢？

由于“职业讼客”主要借助登记障碍阻碍决议的登记实施，德国引入“豁免程序”，即法院可以依公司的申请，将股东阻止决议登记的利益与决议生效公司产生的整体利益进行衡量，而原告获胜的关键通常在于必须依靠证明所主张的决议瑕疵属于特别严重的情形。[④] 1978 年日本一则经典判例认为，即便瑕疵不影响决议结果，但瑕疵重大时，从尊重程序正义的角度而言，不得驳回起诉。[⑤] 可见，决议行为以程序正义为其法哲学基础。[⑥] 只有确定原告所主张的决议瑕疵不属于特别严重的情形下，才具有进行利益衡量和适用裁量驳回的空间。未通知股东的召集瑕疵“严重违反民主参与规则”，[⑦] 这种对根本性股东权利的侵犯本就属于重大瑕疵，不撤销相关决议是不合理的。

相反，召集时间、内容瑕疵并非直接剥夺股东的表决权，而是通过影响股东获取信息、准备会议的方式间接影响股东表决，具有裁量驳回的适用空间。由于信息瑕疵对应的程序性规范主要价值在于保障股东权利，因此裁量驳回适用的着力点应从决议撤销制度的股东保护功能视角出发，判断瑕疵对股东权利的侵害。轻微瑕疵是对股东权利损害得轻微，瑕疵仅造成股东权利的轻微损害或仅具有损害危险，才可考虑适用裁量驳回制度。[⑧]

2. 实质影响的司法认定

轻微瑕疵和实质影响均是裁量驳回不可或缺的要件构成。我国裁量驳回制度中“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这一要件本身就隐含着立法者重结果而轻程序的价值取向。[⑨] 因此应从决议撤销制度控制决议合法的目的出发，将裁量驳回适用的着力点定位于维持真实合法的决议。这样一来，实质影响的判断应落脚于程序瑕疵对决议结果的影响，即程序瑕疵是否影响公司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进而影响表决结果。对于信息瑕疵而言，优先判断轻微瑕疵可辅助法官澄清逻辑链条，为实质影响的判断捋清思路，限

① 宋从文：《股东知情权行使与限制之维》，《法律适用》2009 年第 7 期。

② 参见叶林：《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公司法解释》，《法学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③ 参见南玉梅：《公司瑕疵决议诉讼中裁量驳回规则的构建与适用》，《法学评论》2018 年第 6 期。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 01 民终 10925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 02 民终 4101 号民事判决书。

④ 丁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历史、功能与规则改进》，第 146－148 页。

⑤ 参见南玉梅：《公司瑕疵决议诉讼中裁量驳回规则的构建与适用》，《法学评论》2018 年第 6 期。

⑥ 王雷：《〈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当代法学》2018 年第 5 期。

⑦ 叶林：《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公司法解释》，《法学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⑧ 参见王湘淳：《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功能重校与规则再造》，《法学论坛》2018 年第 1 期。

⑨ 钱玉林：《论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法学》2006 年第 11 期。

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①]

当股东实际出席会议或未参会股东事后对决议追认或否认时，属于轻微瑕疵，此时，会议程序瑕疵并未实际影响股东权利，各股东意思表达渠道畅通，法院应认定瑕疵对决议不产生实质影响，进而判决维持决议效力。这种原告股东有效避免程序瑕疵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结果上未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属于决议瑕疵的治愈，即通过诉讼程序以外的方式对决议的程序瑕疵进行救济，使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得以复原。[②] 当前，很多国家都承认这种瑕疵治愈。例如，日本有判决认为，全体股东出席大会足以说明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即使会议的召集程序存在瑕疵，也不应当否认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③] 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也有类似主张。[④]

当未参会股东事后没有对决议表态时，不能排除其在会议上通过充分发言改变决议结果的可能，但也不意味着程序瑕疵与决议结果必然存在因果关系。[⑤] 公司决议是由多个主体根据表决原则做出的决定，全部参会主体的意思表示均随着自由的辩论协商过程而不断变化，每一位与会成员都有尽其最大努力把自己的立场变成总体意愿的权利，在整体利益所能容忍的程度之内，这种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⑥] 因此法院对实质影响的判断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对此，域外立法为实质影响的判断提供了新思路。《韩国商法典》第 379 条规定："在已提起决议撤销之诉的情形下，法院参照决议的内容、公司的现状及各项情况，认定撤销不当时，可以驳回其请求。"[⑦] 衡量决议内容等具体情况能够贴合个案实际，判断未出席会议的股东参与讨论对公司的意思表示影响是否重大，确保事实认定与要件适用的关联性在可控范围内。例如，在"案涉决议内容与原告密切相关，对原告权益构成实质性重大影响"的案件中，这类决议的内容"对于原告准备、参加会议，发表意见影响多数意见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股东会决议应予撤销。"[⑧] 但若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成立清算组，应有别于其他股东会决议事项的要求，且并未影响公司的实际权益。"[⑨]

综上，对于信息瑕疵案件中实质影响要件的判断，应聚焦于受信息瑕疵影响的股东行使表决权的具体情况，难以判断瑕疵对股东的意思表示和对公司的意思表示的影响程度时，再结合决议内容、公司内部情况作出审慎裁判。由此，被告除了证明原告持股比例不足以在形式上改变决议结果外，还应在结合决议内容在实质上证明程序瑕疵缺乏对决议结果造成影响的可能。这样，既防止被告公司恣意利用股权比例侵害小股东权益，也避免了决议的撤销既干预公司正常运作，又毫无实际意义和效益的情况。[⑩]

3. 增强滥用诉权功效：重构信息瑕疵下原告的举证义务

程序瑕疵是否轻微属于被告主张的抗辩利益，原告不就瑕疵之轻重承担举证责任。[⑪] 但影响股东信息知情权的瑕疵实质上与侵权责任中的侵害行为相似，均在客观上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在原告举证义务的构建中，不仅应基于决议撤销之诉举证证明决议存在程序瑕疵，还需基于"个体权利保护"功能，参考侵权的举证模式证明程序瑕疵与权利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举证义务的重构可以纠正原告未能出席会议就认定瑕疵严重而撤销决议的裁判思路，也是出于对增强防范滥诉功能有效性的

① 李建伟：《论公司决议轻微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1 期。
② 赵心泽：《股东会决议的判断标准与判断原则》，《政法论坛》2016 年第 1 期。
③ ［日］末永敏和：《日本现代公司法》，金洪玉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年，第 110 页。
④ 参见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年，第 283－285 页。
⑤ 参见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救济》，《现代法学》2005 年第 3 期。
⑥ ［美］亨利·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第 47－48 页。
⑦ 《最新韩国公司法及实施令》，王延川、刘卫峰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年，第 45 页。
⑧ 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2019）湘 3101 民初 2680 号民事判决书。
⑨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 09 民终 1829 号民事判决书。
⑩ 参见［日］今井宏：《股东大会的理论》，有斐阁，1987 年，第 183 页。
⑪ 刘俊海：《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平衡艺术：〈公司法解释四〉的创新、缺憾与再解释》，《法学杂志》2017 年第 12 期。

考量。如前所述，裁量驳回抑制滥诉的功能有限。但实证研究表明，裁判者对制度要件的合理适用有望增强司法权间接实现遏制滥诉的效果。在中国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食科创（北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中，法院结合原告办公地点等因素，认为原告参加案涉股东会不存在交通不便等客观障碍，会议通知时限不应构成原告拒绝参加股东会的当然理由。[①] 这种认定思路与德国当前主张的“相关者理论”相似，即程序瑕疵是否真正给相关股东权益造成损害。[②] 德国立法也采纳了该理论。《德国股份法》第 243 条第 4 款规定，在不正确、不完整或者拒绝提供信息的情况下，只有在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也会认为告知该信息是合理地行使其参加权和成员权的重要条件时才能提起撤销诉讼。因此，在信息瑕疵类案件中，“轻微瑕疵”的判断不应仅局限于关注股东权利是否受损，而应更多地关注瑕疵与股东权利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原告无正当理由不参会后仍主张撤销决议的情形，只有原告举证证明程序瑕疵在客观上足以导致其无法出席时，才具有以程序瑕疵为由撤销决议的可能。

（三）非信息瑕疵下裁量驳回的司法适用

1. 以实质影响判断为主

非信息瑕疵仅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审理难以认定瑕疵是否轻微。一方面，从“轻微瑕疵”到“实质影响”更似从事实到价值的说理渐进历程。[③] 除表决方式瑕疵外，非信息瑕疵一般对股东表决权不产生影响，相应的程序性规定旨在保障决议整体程序的正当性。因此违反非信息瑕疵规则时，决议撤销之诉主要发挥纠正违法决议的功能，重点在于判断“程序之于公司决议的功能是否受损”，即“公司决议的组织性与自治性的功能受到影响”，这也是“实质影响”要件规范内涵的核心构成。[④] 另一方面，非信息瑕疵并不必然触及公司决议的正当性，如仅基于瑕疵的客观存在进行裁判，可能会与立法原意相违背。[⑤] 因此，应当考虑非信息瑕疵的性质及程度，将股东会程序的正当性要求与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要求作出利益平衡，[⑥] 即主要进行实质影响要件的价值审。

2. 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利益衡量

德国法注重平衡股东与公司间的利益冲突。其虽然没有在法律上确立类似于裁量驳回制度这种排除轻微瑕疵的规定，但在理论上支持依照法理上的“比例原则”限制决议撤销，考量因素中包括瑕疵性质、瑕疵严重程度、瑕疵对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影响。[⑦] 在对非信息瑕疵利益平衡的过程中，运用比例原则审查裁量驳回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首先，两者的理论内核是一致的。裁量驳回的基本价值在于纠正过度撤销决议的现象，比例原则的基本理念在于强调干预的适度性，反对过度干预。[⑧] 其次，比例原则具有适用于裁量驳回的逻辑前提。裁量驳回的适用过程存在程序正当与结果稳定这一相互冲突的利益。比例原则的教义学功能就在于其可使权衡过程合理化和权衡内容具体化，从而能够促使诸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及法益和谐均衡。[⑨] 最后，比例原则还是预防裁量驳回矫枉过正的有效手段，可以禁止裁量驳回逾越实现其功能所必要的程度而对股东提起撤销的诉权进行过度干预。

那么，比例原则如何在非信息瑕疵的程序正当性与决议稳定性的利益衡量中具体运用？首先，考察程序规定的立法本意。如前所述，决议程序违反《公司法》第 40 条股东会召集顺序的规定，在司法中存在不同裁判观点。该召

① 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1 民初 11442 号民事判决书。
② 王彦明：《股东大会决议的无效与撤销——基于德国股份法的研究》，《当代法学》2005 年第 4 期。
③ 李建伟：《论公司决议轻微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1 期。
④ 李建伟：《论公司决议轻微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1 期。
⑤ 参见李建伟、何秉泽：《决议可撤销之诉裁量驳回的利益衡量》，《交大法学》2022 年第 6 期。
⑥ 参见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救济》，《现代法学》2005 年第 3 期。
⑦ 参见丁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历史、功能与规则改进》，第 162 页。
⑧ 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 年第 2 期。
⑨ 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 年第 2 期。

集程序规定的目的在于平衡保护股东、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各方的合法权利，对维护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公平和效率较为重要。其次，判断裁量驳回是否严重违背该立法目的的实现。将违反股东会召集顺序规定的决议撤销之诉予以驳回，实际上将削弱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召集程序的约束力，使公司的治理规则和结构置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公司组织结构和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再次，判断裁量驳回是否必要。为维持决议稳定而忽视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影响较大的程序性规定的保障，难谓存在充足的理由。且享有召集权即意味着在讨论议题、召开时间、召开方式等方面均占据优势地位，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控制着股东会的决策，对于决议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即使重新召开股东会议再次进行表决未必通过相同的决议。最后，比较是否裁量驳回对公司利益损害的影响。公司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利益构造物。对处于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主体的利益进行利益衡量时，还需结合具体的时空背景，比较哪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更值得法律对其进行保护。[①] 综上，对非信息瑕疵实质影响要件的价值审中，需对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一一考量，才能得出是否应当裁量驳回的审慎决定。

结　语

《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保留现行司法解释中裁量驳回制度较为抽象的要件，对裁判者审慎适用裁量权提出更高要求。裁量权赋予法官在处理具有一定弹性或者需要进行多种价值衡量的事实认定时自由判断的权力，[②] 进行实证研究可帮助裁判者将自我利益的价值追求限制在客观现实的可能范围之内，在科学把握裁量驳回制度“实然”的前提下贯彻“应然”的价值取向。[③] 在利益衡量的视角上，严格贯彻立法目的，结合个案充分衡量保护商事决策稳定、纠正程序瑕疵、保障股东权益、遏制股东滥诉的制度价值。在要件适用的视角上，充分考虑股东权利、决议内容、团体意思表示对公司良治的重要意义。只有保持司法审慎干预公司治理，才能实现公司内部利益的合理平衡。

■责任编辑/宋雨桃

Study on the System of Discretionary Rejection in Disputes Over Revocation of Corporate Resolutions

WU Gao-chen & JIANG Na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discretionary reje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alanc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defects of the resolu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resolution, and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ajority shareholders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s. But there are also technical differences and ideological deviations i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elements. A single judgment model cannot meet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efec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Therefore, the revocation function of the resolution should be taken as the dir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types of defects and strive to unify the methodology and valu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For information defects, the priority is to identify slight procedural defects b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al defects and the shareholder rights damage, and then judge the substantial impact combined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resolu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plaintiff's duty of proof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avoiding the abuse of litigation rights. For non-information defects, the value of substantial impact should be evaluated,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balancing? of? interests between procedural legitimacy and the resolution's stability.

Keywords: resolution-revocation system; discretionary rejection; procedural defect; substantial impact

① 梁上上：《论公司正义》，《现代法学》2017 年第 1 期。

② 参见张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与司法正义》，《法律科学》2015 年第 4 期。

③ 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中国法学》2000 年第 4 期。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郑　曦，廖建灵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摘　要：西部地区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推动区域对外发展、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中，形成了对多领域、多层次、多语种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但当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尴尬又无奈的处境，主要体现为人才需求多元但人才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形式多样而培养质量不高，人才数量不足又难以留住人才几个方面。这与西部地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全密切相关，也跟西部地区薄弱的人才培养基础和欠优的人才环境有相应关系。为纾解困境，通过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建构起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有助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和留用，进而服务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发展。

关键词：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106－11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涉外法治建设服务涉外领域的生产生活，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生活幸福的目的，[①]涉外领域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随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贯穿到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随着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中国将会由过去的向东开放，转变为东西兼顾；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到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努力打造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②]向西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对外合作的新重点和新亮点。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③]同样的，涉外法治建设离不开人才保障，因此要点之一在于培养适应法治需求的涉外法治人才，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西部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情况如何？是否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痛点和难点？这些问题又当如何解决？等等。本文试图从西部地区的视角研究涉外法治人才需求，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及成因等，并提出构建人才培养路径的方案，以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形成一个体系性的认识，同时为涉外法治建设及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西部地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

在国家依法治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西部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持续扩大，涉外法治在西部开发建设中的意义更加凸显。其中，人才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涉外法治人才不仅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宏观需求，也是推动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发展的重要力量，还是西部地区落实各项改革新举措的现实需要。

收稿日期：2023－02－17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号：XJJG202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卓越人才支持计划支持。
作者简介：郑曦，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建灵，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 参见王利明：《法治具有目的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
② 刘方平：《“一带一路”：引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甘肃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③ 参见戴翔：《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阅江学刊》2023 年第 1 期。

（一）实现国家战略的宏观需求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对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正以非常坚强的战略定力，大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①] 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下，我国的开放政策不再仅仅是获得外汇和技术的手段，而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增强其在全球治理中作用之必要。[②] 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从被动地、有选择性地适应外部规则，到积极地、有选择性地重塑国际经济规则。[③] 中国正在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方式，又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将中国智慧贡献于人类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则体系，必须善于运用法治。[④]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这一论断蕴含运用法治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判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下要统筹好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两个方面。当下，法治中国建设在国内法治建设方面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完善的涉外法治建设有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我国的国际化进程，有助于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真正实现由旁观者、跟随者向参与者、引领者的转变。

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得了较多的倾向性政策支持，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以“一带一路”为引领，进一步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对外开放正在“向西看”。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是我国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区的涉外法治建设是新开放格局下，我国实现全面法治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当下，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西部地区应当积极融入我国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深刻领会涉外法治建设中国家安全的意义，发挥西部地区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地缘优势，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人才智慧助推我国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这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国家站位、通晓国际规则并勇于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推动，从而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加强对国际法律、国际规则的研究，以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专业素质参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

（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区域发展要求

西部地区地处我国内陆，与十余个国家接壤，跟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往来有相应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促进了西部地区与更多国家开展更深层次的往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持续升级、内陆型开放经济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不断发展、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的落实，西部地区对外发展路径更加清晰。近年来，中欧班列、中越班列、中亚班列、中老铁路等对外交往“硬渠道”相继开通，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等“软渠道”在西部地区成功举办。西部地区众多企业不断打开国门、走向国际，一大批外贸企业也在西部地区开展业务，西部地区对外贸易高速发展。2020 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 2.95 万亿元，是 1999 年的 26 倍，年均增长 15.5%。[⑤]

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拓宽了涉外法治工作领域，提高了对外协调关系、维护秩序、应对争端的质量标准，刺激了对多领域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伴随高速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对外政治、文化等的交往日益密切，西部地区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大幅增加，涉外法治工作领域拓展到涉外立法、涉外司法、涉外执法、涉外法律服务、涉外事务管理等诸多领域。培养法律与外贸、法律与文化、法律与外语等的

① 熊光清：《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重要战略宣示》，《人民论坛》2020 年第 16 期。

② Hideo Ohashi，“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opening－up polic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Vol. 7，No. 2，2018.

③ Heng Wang，“Selective Reshaping：China's Paradigm Shif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No. 23，2020.

④ 参见王轶：《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19 日第 2 版。

⑤ 详见《西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1）》。

复合型人才，有助于在各项涉外法治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高质量解决好发展中遇到的涉外问题。结合西部地区对外发展趋势，除一般国际规则外，更需要强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国家与西部地区接壤国家的语言、法律法规、文化等的学习运用，服务“一带一路”、西部地区对外交往向纵深发展。这需要一批具有良好外语、外贸等专业基础，并且通晓外国法律，能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在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审时度势，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和安全，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外企业引进来，保护我国公民的海外权益和利益。

（三）西部地区改革新举措的现实需要

为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适应新发展需求，西部一些地区出台相应举措，强化涉外法治的体系建设和法治保障作用。如重庆成立两江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负责审理重庆全市涉外商事案件；新疆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作出重大调整，多个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有权对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进行管辖；云南省耿马县孟定人民法庭顺应涉外经济发展趋势，更名为孟定涉外法庭，以便更好地处理涉外事务；四川正在打造天府中央法务区，拟为中西部地区国际化进程提供法律服务；一些西部地区转变政府职能，将涉外行政许可（如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等事项的办理权限下放，更多基层工作者参与到涉外服务事项中。西部地区涉外法制建设新举措涉及部门多、领域广，更多基层工作者、更多非涉外工作部门加入涉外法治建设行列。

西部地区服务对外开放新发展的举措，直接指向司法行政等实务部门中涉外法治人员的功能发挥，需要法官、律师、法务人员、其他法治建设者具有坚实的国内法基础，有深厚的研究功底和较强的思辨能力、行政管理能力、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改革新举措要求法律人能将国内法灵活运用至涉外领域，能对域外法律的国内运用作出适当反应，能实现国内法与外国法、国际法的有效衔接，能在涉外事务的管理中实现法治建设的要求。这些因改革新举措而被纳入涉外法治建设行列的工作者，以及由改革新举措延展的涉外法律服务领域，需要相关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强化涉外意识、国家意识、法治意识，以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准，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情怀、忠于法治的政治素养投入涉外法治建设工作。总而言之，西部地区改革新举措需要一批新的涉外法治人才落实，也需要老一批法治建设者进一步提升能力、活跃思维。新老涉外法治人才共同发力，在具体涉外事务中，运用涉外专业能力和法治思维引导并规范涉外主体行为、治理社会、解决纠纷，建设对外发展的良好秩序、扫除对外发展中的障碍，进而促进开放、维护发展。

二、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困境

西部地区推进国家战略实施、推动区域对外发展、推行各项改革措施离不开强有力的人才保障。现阶段，西部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呈现出供需不匹配、人才培养难、人才留不住等突出问题，这与高质量、多元化的涉外法治人才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冲突。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首先要突破涉外法治人才需求多元化但人才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形式多样而培养质量不高、人才数量不足又难以留住人才的困境。

（一）涉外法治人才需求多元化与人才结构单一的矛盾

自 2014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初步提出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加强涉外法律工作要求以来，涉外法治建设工作在诸多领域逐渐展开。特别是根据《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的要求，涉外法治工作领域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要求更加严格。《规划》提出要完善涉外法律和规则体系、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强化涉外法律服务，这需要立法、行政、司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各领域涉外法治人才推动，需要立足国家层面、西部层面、省级层面、具体岗位层面的涉外法治人才共同发力。西部地区积极贯彻各项决议决定，在《规划》指引下开展符合西部地区发展规律的法治建设工作，以新发展势头融入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同步推进各项涉外法治工作，这需要多领域、多层级、多语种的涉外法治人才保障。

多元化法治人才的价值体现在西部地区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涉外企业等单

位的具体工作中，但目前各单位人才价值发挥路径不同、效果不一。立法机关组建省内外高校、律所、人大的专家组成专家库发挥智库作用，政府多通过法律顾问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吸纳专业力量（主要是律师）参与政府法治建设，司法系统采用人才引进或通过培训的方式强化涉外法治能力培养，外贸企业、跨境电商等企业自主招聘人才或像西部地区那样将涉外法律事务交由北上广深的总部进行处理。其中，涉及的涉外民商事诉讼、个体间的涉外纠纷多交由律师经司法程序完成，此外西部一些地区探索建立涉外法治人才库的做法也主要集中在律师行业。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实践看出，现阶段律师的涉外法治才能发挥较为充分，其他法治人才知识和能力结构则比较单一。从涉外法律服务工作语种看，涉外法治人才所掌握的外语以英语为主，在2019年司法部建立的全国涉外律师人才库中，西部地区涉外律师共计148名，除英语外，掌握越南语、老挝语、德语、法语等外语的律师人数分别为3人、1人、2人、4人，[①] 涉外法治人才中的外语能力培养也存在结构性失衡。相较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多元外语的需求，非通用语涉外法治人才亟须培养。

（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形式多样但培养质量不高的尴尬

现阶段，西部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呈现出高校培养、培训培养、自我培养等多头培养的人才培养状况：在高校，西部地区个别高校探索并尝试了一些新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设“一带一路”法治人才培训实验班，打造“法学+小语种”专业特色，培养面向欧洲、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②] 在实践领域，结合具体业务需求，对已经服务涉外法治建设的工作者多通过培训的方式进行，培训对象涵盖涉外法官、涉外知识产权人员、涉外律师等，培训方式通过研修班、赴境外交流学习等方式进行，个别地方与境外机构联合设立律师事务所强化人才交流和业务往来；在前述培养形式无法涵盖的领域，相关人员以自我发展为导向或以业务需求为契机，自主学习涉外法律规范，自我强化涉外业务技能。目前，高校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处于探索阶段，培训在法律实践领域运用较为普遍。这些或新或旧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对象涵盖已经服务或拟服务于涉外法治建设的人员，注重强化培养对象的业务知识，提升其业务素质，有助于实现由普通法律工作者向涉外法治人才的转变。

然而，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质量离涉外法治建设需求尚有一定距离。如前所述，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需要知识广、能力强、素质高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但现阶段个别高校“法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尚待检验：绝大多数西部地区高校仅限于传统的国际法理论教学内容，没有与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区域发展需求相对应的理论课程，也没有专门针对涉外实务的教学与实践，涉外人才汉语与非通用语、法律与其他专业、国内法与国别法的复合性明显不足，应用性体现不充分。而在实践中，即便在涉外法治才能发挥较为充分的律师行业，参与国际法律交流的程度也较低，79%的涉外律师未参加任何国际律师行业组织。[③] 此外，涉外法治人才相比于普通法律工作者而言，有“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的要求，有“涵养律己、德法兼修”的素质标准。尴尬的是，西部地区培养对象的涉外意识和涉外专业能力明显不足，德育实质性缺失。实践中普遍运用的培训培养和自我培养，多立足于岗位实际，专注于某一知识或技能的“才”的培养，涉及面窄，相对缺乏对素质内容、对“德”的持久养成，这与“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有一定差距。

（三）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足却难以留住人才的无奈

相比于迅猛的涉外经济发展，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供给并不能与之相匹配。为此，西部各省都在强调涉外法治人才的建设和培养，采取措施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引进和保障体系，但现阶段西部地区涉外法

① 该数据根据2019年司法部公布的《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统计得出。载司法部官网，http://www.moj.gov.cn/pub/sfbgw/fzgz/fzgzggflfwx/fzgzlsgz/201903/t20190321_161699.html，访问日期：2022-02-14。

② 目前，西部地区尝试该种培养模式的学校有西南政法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法学+法语”项目，云南民族大学开展的“法学+南亚东南亚非通用语”项目。

③ 参见冷帅等：《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探析》（上），《中国律师》2017年第5期。

治人才仍然处于缺口大的状态。如重庆市拟到2023年实现全市各类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在法律服务队伍中的比例达到5%左右的目标，目前尚有较大的缺口。[①] 而贵州省“十四五”人才规划指出，到2025年，全省法律服务人才达到2.2万人，[②] 但2020年，贵州省律师才突破1万人，离“十四五”规划目标尚有较大距离。其他西部地区也面临类似的人才缺口问题。在涉外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补足涉外法治人才特别是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的缺口，是西部地区法治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由于前述的原因，仅靠自身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引进人才就成为西部地区建设涉外法治人才队伍的重要途径。

然而，无奈的现实是，西部地区往往难以留住从国外、国内其他地方引入的人才。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严重已是困扰西部各人才部门多年的问题。据统计，2010年至2014年，西部Q省检察系统共流出人员199名，法院系统共流出人员157人。其中，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流失严重。[③] 甚至一些从西部地区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法治人才，为追求更大平台、谋求更好发展，也相继离开西部地区。青海一名基层检察官表示，每次全国优秀公诉人评选结束，发达地区会通过不同渠道以优厚的工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挖走”青海当地的全国优秀公诉人，而留下的也是因为自身原因无法离开。[④] 尽管追求个人更好的发展无可厚非，但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缺乏的现状。

三、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成因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成因复杂。作为人才培养主力军的高校，西部地区高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作为人才培养普遍运用的培训手段，囿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薄弱基础，并非解决涉外法治人才问题的根本之策；加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环境在吸才、用才、留才方面的劣势突出，人才培养成果难以反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以上原因综合导致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难、留才难的困境。具体如下：

（一）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立足于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定位和现状，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有规划地进行人才培养。基于此，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应当在明确培养目标、培养理念、培养主体、培养模式等的基础上进行。然而，西部地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全、问题突出。

第一，培养目标脱离实际、同质化严重。从上文论述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对涉外法治人才有实务精英、多元外语等的需求，但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跟跑国内其他一流高校，更注重法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更倾向英语外语能力的培养。但西部地区师资力量较弱，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高校理论研究水平普遍低于中东部地区，从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看，西部地区“双一流”高校仅有28所，“双一流”学科才54个，在全国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中的占比分别为19%和11%，[⑤] 这些问题在根源上决定了西部高校难以赶超中东部高校的理论研究。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东南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使用效率不高。西部地区以较低的科研实力参与较高标准的理论研究，以较大的英语资源投入适用于通用效率不高的发展中国家，这与西部地区人才实际需求和培养能力相脱离，“以低就高”的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定位，脱离实际，不仅不能实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平产出，也不能解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实践性需求。

第二，人才培养理念有待更新。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格局改变了西部地区在国家区位发展中

① 详见《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行动方案（2020—2023年）》（渝司发〔2020〕21号）。

② 详见《贵州省“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

③ 参见王允武：《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与法学教育协同推进——以改进民汉双语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为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1期。

④ 沙泓：《为偏远地区的人才流失惋惜和痛心》，《检察日报》2018年7月2日第7版。

⑤ 经统计，全国“双一流”高校147所，“双一流”学科508个。特别说明：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名单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主确定建设学科但尚未公布名单，该两校统计数据以2017年公布的“双一流”学科计算。

的地位和定位，西部地区一转偏远落后的固有形象，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星”。相比于涉外经济的高速发展，西部大部分地区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人才培养，培养对象在涉外专业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德育工作的实质性缺失与守旧的人才观、知识观不无关系。守旧的人才观念难以打破单科专业的壁垒、难以突破国家边界，在法治人才培养中局限于国内法和有限的国际法内容，没能与国别法及其他学科专业有效融合，不利于培养法治人才的专业才能和国际化视野。此外，过分注重知识的观念导致以往的法学教育存在重客体轻主体、重法意轻人格、重智育轻德育的问题，[①] 也不利于培养法治人才的主体意识、“大德观”意识和家国情怀。因此，西部地区需要快速转变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理念，认真思考如何建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德”的内容体系，注重培养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增强涉外法治人才的涉外意识、家国情怀，扭转不利于良好国家形象建构、有碍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人才培养观念。

第三，培养主体有较大缺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离不开高等法学教育，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②] 但西部地区的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主体缺位问题。在西部，除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几个院校外，其他大多数西部地区高校甚至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组建国际法教研室，涉外法律师资队伍极度缺乏。而实务方面，既没有转入机制也没有课程空间允许实务人员进入参与人才培养，实务领域培育力量也相对缺乏。欠缺培养主体这一核心力量的作用发挥，西部地区高校无法“产出”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重庆、云南等地高校才创造性地探索“法学 + 小语种”的人才培养路径，同样，高校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实务部门中涉外业务工作需求，其他以培训等方式进行的人才培养才普遍存在实务领域。亦即西部地区现阶段呈现的学校培养、自我培养、培训培养等多头培养的现状，与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主体缺口大这一现实密切相关。培养主体在人才培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欠缺培养主体的西部高校便失去人才培养的根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只能是空谈。

第四，人才培养模式有待改进。西部地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既有国内其他高校的通病，也缺乏对区域特色的创新思索。其一，在学科设置上，西部地区高校和其他地区一样，将法学与外语及其他专业分设，并且将作为涉外法律专业学习重点内容的国际法律归入二级学科范畴；涉外专业课程的深度、广度、融合度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难以在外国法、比较法及其他交叉领域有较深的涉猎，这一学科结构不利于涉外法治人才的专业化培养。其二，在理论与实践教学方面，理论教学远离实务运用，难以学以致用；实践培育内容少，对理论的检验不及时、不到位；理论和实践的融合程度较低，融合方式体主要体现为形式衔接而非内容融合，这不利于提升培养对象的学习兴趣和专业获得感，也不能满足西部地区对应用型法治人才的需求。其三，西部各地区的地理位置特殊，对外开放的区位特征显著，云南、广西以“澜—湄合作机制”为契机，与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交往密切；重庆经“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与中亚、欧洲国家有往来；西北地区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为平台，与蒙古、巴基斯坦等国家往来频繁。但是缺乏区域功能定位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有效发挥各地区与相应国家在地缘、人缘方面的优势，容易在与国内其他高校的竞争中形成马太效应，使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陷入更深困境。

（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薄弱

涉外法治人才是精通国内外法律的专业人才，是集理论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才，国内法、国际法、外国法、外语等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是人才专业化的前提和保障。然而西部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外语、法律、实践等方面基础薄弱，高校人才培养难，而西部地区普遍运用的培训方式更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人才培养手段，在人才培养基础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不能实现“雪中送炭”的效果。

从外语基础看，其一，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西部地区与国内其他学校一样，从素质教育到专业教育，投入较大教学资源培养学生外语能力。但在教学效果方面有显著差距，西

① 杨宗科：《论“新法学”的建设理路》，《法学》2020 年第 7 期。

② 马怀德：《法学教育法治人才培养的根本遵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 年第 12 期。

部地区大学生大学英语四六级的通过率远低于东部地区，英语听说能力差距明显。其二，法律英语将法律和英语有机融合，作为国际法职业语言，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科目，也是阻止大量普通法律工作者成为涉外法治人才的门槛。然而，西部地区由于师资力量不足，不少院校尚未开设该课程，而一些开设该课程的院校将其作为选修课，法律英语课程的学习无法提升西部地区对涉外法律专业的认识，也无法满足西部地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其三，西部地区的涉外交往对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有一定程度的需求，即便因地缘优势能熟悉部分外语的口语运用，但离书面化工作需求尚有距离，且与法律融合的专业用语无法通过因地缘优势产生的日常交往补足，而这种差距，通过培训依然于事无补。

从法律基础看，西部地区的法律专业培养只能较好的顾及国内法律，对于国际法律、外国法律的专业培养存在较大问题。一方面，由于学科设置结构和师资力量不足的原因，西部地区的国际法律基础教学薄弱，目前的本科课程几乎只能涵盖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没有相应课程和足够师资来完成对外国法、比较法、国际规则等的深入学习，在国别法、深层次国际规则的学习和运用上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涉外法律实务产生于一定的经济条件，西部地区一些涉外业务开展时间晚，甚至一些涉外业务还尚未在西部开展，相关人员经验不足，质量提升慢。而在能开展或已经开展的涉外实务领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不够、锻炼不够。这使得涉外法律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相脱节，理论学习缺乏实践的检验显得更加生硬，生硬的理论知识无法灵活运用于多变的实务场景，难以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良性循环，最终在理论和实务运用上捉襟见肘。

从实践基础看，培养对象的专业劣势在西部地区更为明显。首先，语言能力的提升需要实践锻炼，西部地区英语语言环境相对缺乏，英语学习效果多是“哑巴英语”，将外语学习做到能说会用的极少。其次，法律与生俱来地具有实践性，法律实践不仅从方法论意义上连接国家与社会，也可能在实体论层面形塑二者的关系。[①] 西部地区涉外业务的总量及业务类型相比于东部地区均有较大差距，这对涉外法治人员专业能力的培养有天然的劣势，在较高级别的涉外业务上更加缺乏锻炼机会，难以从方法论、实体论角度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现与西部社会的有效连接。再次，西部地区的几个省区与外国接壤，与接壤国家的对外交往相较于其他省份有一定的地缘优势，特别是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接壤，在涉外法治人才中也倾向于法律与东南亚小语种的复合，由于小语种的适用面相对狭窄，培养对象的成长空间不优于适用英语的涉外领域，培养对象在未来前景方面有一定的权衡和担忧，这不利于培养对象的专业化建设。

涉外法治人才培训中，建立在薄弱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培训恰似空中楼阁，但如以巩固基础为目的的培训，则与高校教育本末倒置，因此培训并不能解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薄弱的问题。

（三）涉外法治人才环境隐藏危机

人才作为 21 世纪重要的战略资源，国际国内各地区之间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人才争夺战。除前述薄弱的社会基础，西部地区在吸才、用才、留才方面的政策和环境缺乏竞争力，在人才培养的末端环节不能有效巩固人才培养成果。

首先，在吸引人才方面，由于决定人才流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大环境上，只有当城市规模满足一定门槛条件时，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显著吸引人才流入。[②] 国际上，通都大埠之间，人才竞争异常激烈，而国内一线城市、重要经济圈、城市群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城市相对分散，明显有地理、经济方面的劣势。而涉外法治人才通晓国内外法律，在法学和外语方面都有相应优势，甚至具有一定的精英特性。在涉外法治人才的竞争体系中，呈现出人才少、竞争者多、竞争优势各异的状况。但西部地区社会基础薄弱，人才引进政策并不优厚，不优于中东部地区，也不足以抵消其在其他方面的劣势，更无

① 曾令健：《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② 董亚宁、顾芸、杨开忠等：《公共服务、城市规模与人才区位 ——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 年第 1 期 。

法与国际大都市相抗衡，西部地区的吸才劣势较为突出。即便后面发展了兰州—西宁经济带、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但其影响力、竞争力依然不足以和其他竞争对手匹敌。

其次，在用好人才方面，由于法律工作需要多个行业多种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良好的职业环境易于也便于人才价值的发挥。处于探索和成长初期的西部地区，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不足；[①] 在涉外法治工作体制的设立和规范方面有待完善；人才功能定位偏差，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人才价值发挥不到位。并且西部地区人才工作环境更加恶劣，个人专长难以发挥，法治人才在涉外工作中难以形成相当的职业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这不利于对国家忠诚、德才兼备、业务精良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队伍的建设。

再次，在留住人才方面，西部地区没有用足自身在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丰富涉外产业类型，资源零散、信息分散、缺乏就业前景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人才的留用。此外，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工作起步晚，涉外法治人才在早期需求量小，人才管理和服务保障体制缺失，人才晋升体系论资排辈，涉外法治人才无法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待遇和认同。而工作环境不顺畅、思维悬殊等会消减人才留下的意念。加之在对个人就业择业有重要影响的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组织发展前景，工作内容等因素中，西部地区在涉外法治人才个人职业发展、组织发展前景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的情形下，工作内容、薪酬待遇又无明显优势，人才环境潜藏危机。在优势利用不足，劣势特征显著的西部，难以留住人才便也不足为奇。

四、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完善路径

根据上述成因分析，欲走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主阵地作用，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确保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能养；配合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实现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能留；进而找准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出路。

（一）构建完善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西部地区在新时代对国际型、应用型、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引发了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理念、方式、内容、师资队伍等的变革和创新。西部地区应当找准人才培养的定位，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服务西部地区建设发展。

首先，西部地区应当找准人才培养的定位。第一，立足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基础薄弱的现实，在各类别、各层面的涉外法治人才需求中，坚持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并举，对国家层面及部分中高端的人才通过引进人才的方式满足需求，对于基层涉外法治工作者及其他涉外法治人才通过人才培养的方式填补空缺。第二，立足西部地区法学理论研究水平和英语水平普遍低于中东部地区的现实，采取错位竞争策略差异化培养人才。相比于涉外理论的研究，侧重涉外实务能力的培养，强化涉外实务人才的竞争优势；相比于英语语种的专业培养，注重与西部地区往来更为频繁的其他语种的人才培养，强化非通用语涉外法治人才的竞争优势。第三，立足西部地区在国家对外发展中的区位功能及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特殊意义，强化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服务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的法治人才；注重培养维护边境安全、国家安全，打击恐怖活动、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司法人才，更好地服务西部地区边疆治理、更好地发挥西部地区国家安全屏障的作用。

其次，转变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理念，以发展的眼光、国际的视野培养素质、知识、能力均高皆强的综合性人才。应转变陈旧的知识观念，注重培养人才的主体意识、“大德观”意识，将素质教育、品德的教化贯穿于法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贯穿在开设的思政课程、法律职业道德等课程和法律、外语及其他专业的专业教育中，贯通在各类涉外法治实践和培训中，并通过实践性、反思性的养成性教育培育涉外法治人才的道德品质，以社会约束机制演练养成自我约束习惯。[②] 此外还应注重强化培养对象的国家意识、涉外意识，用理想信念引

① 参见许中缘、范沁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区域特征、差距缘由与优化对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② 参见杨宗科：《习近平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思想的科学内涵》，《法学》2021年第1期。

导人才，将中国国家命运、西部地区涉外发展、个人涉外法治事业建设统一于人才培养过程中，革新人才观念，以知识复合、能力复合、思维复合的人才观念引导人才，培养适用国际化开放场景中的创新人才。

再次，补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主体的缺口。如前所述，西部地区高校普遍缺乏涉外法律专业教师，实务领域培育力量也相对缺乏，培养主体缺口问题明显，这使得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补足高校培养主体缺口是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当务之急。目前，通过自行培养补足人才缺口有时间、条件方面的不现实性，为此，允许高校自主设定人才选拔标准、简化人才引进流程，通过人才引进方式引进人才是西部地区弥补培养主体缺口的快捷方式。此外，高校要向政府和地方社会培养输送有价值的人才，就要接入他们的反馈回路，就要与社会接轨，就要吸收整合他们的教育资源和供给能力。[①] 建立相应机制、畅通渠道吸收引进社会法治实务人才，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涉外法治培育力量和高校教育资源的融通，才能有力打造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师资团队，有效解决人才培养主体缺口问题。

最后，创新西部地区人才培养模式。在重拾高校人才培养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灵活调整和优化涉外法律相关学科，强化实务培养、融合培养和特色培养。一是以应用为导向，适当增加实务课程师资和课程数量，提升实务能力培养质量。吸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仲裁委、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力量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计、教材编写、专业教学，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教学中，[②] 弥补高校在实务资源和实务经验方面的不足。在专业设置中适当增加实务课程，必要时将实务课堂转移到实务部门的具体工作场景，以用促学。二是把人才的融合培养作为西部地区人才培养专业路径，推动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法学专业与外语等其他专业的深度融合。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需求为导向，动态调整涉外专业设置。提升国际法学科地位，为涉外法律课程和外语课程设置提供空间，建立立体化的涉外课程体系。在有需求的地区建设符合自身区位特色的“法学＋外语”“法学＋其他专业”的复合专业，设定相应人才评估办法，推动形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专业化课程体系。三是发挥西部地区区位优势，将涉外法治人才的实务培养、融合培养融入西部地区特色。对于前述复合专业的设置，顺应国家对区际法学的建设规划，根据西部地区各自的区位特征，调整相应特色的外语语种、复合专业或实务课程，形成“法律老挝语”“法律文化”等的专业特色，强化专业实用性，形成特色竞争优势。

（二）全面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培养主体针对培养对象的专业化养成，前述人才培养体系为人才的专业化养成提供了思路、设置了路径、奠定了基础。凝聚各方力量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充分发挥培养主体和培养对象的能动作用，能在已有人才培养基础之上添砖加瓦，有助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养得出”。

第一，通过政策、科技凝聚各方力量、盘活各类资源，夯实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专业基础。当下，最快捷有效的方式是用好国家解决西部地区高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政策和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条件。具体而言，首先，应当用好国家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举措，用好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特别项目、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具体项目等，促进西部高校国际法治人才交流，深化与相关国家在涉外办学、法治人才培养、涉外法律实务融合等方面的合作；借鉴国内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有益经验，完善高校人才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机制；探索建立涉外实务部门和高校间人才常态化交流机制，凝聚国内国外、理论实践部门的专业人才参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其次，应当用好国家在西部高校专业建设和能力提升中提供的资源，特别巩固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省部共建中西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等一系

① 刘家明：《高校人才培养平台模式及其向多边平台转型的思考》，《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

② 《全面做好法治人才培养工作》，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74 页。

列重大项目成果，强化和优化西部高校专业建设，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奠定复合专业基础。再次，应当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和红利，用好网络平台、移动通信技术等为人才培养赋能。对于西部地区实务部门欠缺的业务类型，以及西部高校在涉外法治教学中欠缺的优质专业教学资源，通过信息技术等打破地域之间、高校和实务部门间的阻隔，实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专业资源的共享，弥补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师资不够、基础薄弱的短板。

第二，以能力提升和专业认同刺激培养主体价值释放，充分发挥培养主体能动性，进一步发挥培养主体价值作用。一方面，在前述国家政策和人才项目中，加大对培养主体的培育力度，提升西部高校涉外法治师资队伍水平。同时，优化配置理论和实务教学资源，充分调动各培养主体的积极性，将高校教育与实务部门培育充分融合，能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激发各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避免各自在不擅长领域的牵强迁就，不仅能调动培养主体的积极性，也能促进两者互相取长补短，促进法律实践教育与国家、社会有效衔接，从而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另一方面，“法律＋外语”的复合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涉外法律工作离不开法律外语的专业工具，通过法律外语及“法学＋”的复合专业设置，提升法律外语、国际法律等的专业地位，强化各主体对涉外法律专业的认识，增强培养主体的专业认同感，进而帮助强化涉外法治专业化建设。

第三，通过学生自选和专业分流，充分发挥培养对象能动性，以便巩固培养对象专业基础，促进其专业化成长。如上所述，无差别的教学模式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要循序渐进也要创新发展，有差别、有层次的人才梯队能力建设更符合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在西部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将通识教育和个性化相结合，除涉外法治教育的通识课外，允许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培养类别、外语语种。结合前述实务培养、融合培养、特色培养的体系建设，探索专业领域深度，拓展就业领域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学习热情。同时，在教学中设置一定的分流机制，根据不同的学生基础进行不同程度的专业强化，根据不同学生的兴趣志向进行不同语种的专业化学习，因材施教，培养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涉外法治人才。

（三）多方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

围绕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数量少而又难以留住人才的现实困境，紧紧抓住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实践基础薄弱和在“吸才、用才、留才”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多措并举提升西部地区人才工作环境，确保西部地区人才“留得住”。

一方面，强化显性措施招引、留用人才。一是在吸才政策上，充分认识西部地区的竞争劣势，强化政策支持构筑人才竞争新优势。对于一些高端涉外法治人才，由国家统一制定人才岗位标准，实现同一人才定位在不同地区的相同引入条件，防止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无法与东部抗衡的不利局面。在一些普惠人才政策中，由国家向西部地区单列一些人才指标，进一步增加西部地区人才竞争力。此外，西部地区结合自身对外发展需求，制定并落实更优惠的涉外法治专项人才政策，以具有足够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吸引人才。二是在留用人才工作中，从待遇、制度、事业等方面鼓励涉外法治人才扎根西部。在待遇上，认真落实人才引进承诺，结合涉外法治工作业绩，完善物质、精神、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综合保障。在制度上，破除人才交流、人事提拔方面的机制障碍，依托“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各类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平台，开展干部挂职、人才培训、人事交流等人才工作，建立以能力、业绩、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向人才展现看得见的成长空间。在事业上，放宽相应职称评定、职位晋升方面的限制，给予涉外法治人才干事创业的政策、资金、平台的支持，给人才搭建看得见的舞台，促使涉外法治人才能干、想干、可干，进而促进涉外法治人才在西部能留下、想留下、真留下。

另一方面，运用隐形手段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保障以人才作为基础，人才发展需要借助相应平台，可以说，经济发展、法治建设、人才留用之间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体，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能吸引留住人才，越是人才聚集的地方越能促进经济增长，越是经济繁荣的地区越需要法治的保障。西部地区的涉外经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增长迅速，涉外法治人才价值发挥已经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打造法治化工作环境有助于人才培养基础建设，

促进人才价值发挥进而留用人才。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将人才环境与营商环境融合打造，形成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西部地区留用涉外法治人才的良性开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①] 营商环境法治化不仅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职责而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中制胜的法宝，成为地方开展法治竞争的主要面向。[②] 西部地区借助涉外经济发展契机，在打造良好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强化法治化建设，逐渐优化外语口语、涉外法治业务的宏观环境，拓展非通用语涉外法治人才成长空间，将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工作起步晚的劣势转为优势，在无形中破除以往不利于人才价值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涉外法治人才工作环境，逆转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困境。

结 语

西部地区以往的国际法理论和外语教学内容搭建起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体系，但无法满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和开放发展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近年，西部地区个别高校探索并尝试了“法学 + 小语种”的专业特色培养人才，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务部门开展了相应的人才培训工作，一些涉外法律工作者也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强化对涉外法治能力的培养。即便如此，在结果上依然呈现出人才结构单一、人才质量低、人才留不住等突出问题，当下多样的人才培养形式并未帮助西部地区走出人才培养的困境。为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难、留住难的问题，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主阵地作用，解决好高校人才培养主体缺位问题，找准人才培养定位，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构起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考虑到西部地区人才基础薄弱，以及在“吸才、用才、留才”方面竞争优势不足的现实，充分发挥培养主体和培养对象的能动作用，通过政策、科技等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赋能，并以显性招引、留用人才的政策措施配合隐形手段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进而巩固人才培养基础，改善人才环境。这样一来，以高校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主，辅助有力措施夯实人才培养前端的基础，优化人才培养末段的环境，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铺平道路，真正走出人才培养的困境。

■责任编辑/宋雨桃

Predicaments in Training Foreign-related Talented People for Legal Affair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and Solution Approaches

ZHENG Xi & LIAO Jian-l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xecuting the strategy of law-bas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promoting the regional external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ing various reform measures,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has faced a demand for foreign-related multi-lingual talented people for legal affairs in various fields and at different levels. However, the training of foreign-related talented people for legal affair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is facing an awkward and difficult situation, which finds expression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demand for talent is diverse but the talent available cannot satisfy the demand, the training models are diverse but the results are dissatisfactory, there is a shortage of talented people and a threat of? the brain drain.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complete system for training talented people for legal affai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and also related to the weak foundation of such training and the poor talent-related environ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redicaments, the solution approach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ystem for training talented people for legal affairs,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for such training, and create a good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the talented people,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training and retention of foreign-related talented people for legal affairs, an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and the opening-up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Keywords: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training of foreign-related talented people for legal affairs; predicament; solution approach

① 蔡宏波、钟超：《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营商环境与法治建设》，《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

② 苟学珍：《地方法治竞争：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地方经验》，《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业主委员会“成立难”及其化解

胡仕林

［云南大学，昆明　650500］

摘　要：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依法选举产生、代表业主管理物业区域内事务的一种自治性、常设性组织，对城市社区治理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业主委员会数量少、比例低，其成立普遍存在启动难、筹备难、选举难、备案难等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业主外部的地方政府、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企业的阻碍有关。从实践层面化解业主委员会“成立难”的基本路径在于构建多元社会支持机制，主要措施包括：强化地方政府和居民委员会的综合性支持；强化地方立法机关的规则支持；强化开发商、物业企业的物质和信息支持；强化党组织的人力资源支持；强化经济社会组织的专业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业主委员会成立难；社会支持；住宅小区；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117－09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并从基层建设的角度提出“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②]住宅小区是9亿多居住在城镇的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③]是城市社区的细分单元或“细胞”，小区治理作为网格化、精细化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其状况直接影响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成效。而在小区治理中，业主委员会（简称“业委会”）作为业主依法选举产生、代表业主管理物业区域内事务的自治性、常设性组织，既是小区治理的重要组织参与者，也是城市基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

收稿日期：2023－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云南民族地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策研究”（项目号：ZD20190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仕林，法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① 转引自黄树贤：《奋力开创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新局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求是》2018年第15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③ 2022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达92071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个百分点。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访问时间：2023－06－30。

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业主自组织治理、规范反映诉求、依法维权以及协助基层党政机关延伸公共服务管理、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等方面能够发挥直接而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被近年来诸多小区业委会积极而有效地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所充分证实。在当前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和社区治理“行政化”“内卷化”突出、治理绩效欠佳的情况下，加强业委会建设、推动治理重心从“社区”向“小区”下移十分必要，理应成为改善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突破口。

加强业委会建设，首要问题是普遍成立业委会。然而，历经 30 余年的发展，[①] 业委会的成立状况并不乐观。尽管官方未公布全国业委会的统计数据，但从近年媒体报道看，除少数地方成立比例较高外，如上海到 2019 年共成立业委会 9478 个、组建率达到 92.47%，[②] 业委会发展慢、数量少、比例低仍是全国较普遍的现象，如深圳、广州 2016 年分别为 34%、[③] 28.5%，[④] 海口 2019 年为 13.4%，[⑤] 河南全省 2017 年平均占比约 9%[⑥]。从笔者调研的云南部分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州、市看，情况亦大致如此。楚雄州 2018 年有 307 个物业服务小区、业委会 151 个，占比 49.2%；玉溪市 2019 年成立有业委会的住宅小区比例为 23%；曲靖市 2018 年中心城区业委会数量约占物业小区总数的 15%，县（市）成立业委会的物业小区约占 10%；省会昆明市 2019 年共有物业服务项目 2000 余个、业委会 200 余个，占比约 10%。

业委会成立比例偏低，反映出实践中存在比较突出的“成立难”问题。新闻媒体对此多有报道，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颇多关切，但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从已有的相关研究看，仅有少量学者就此做专门性探讨，认为业主交易成本过高、[⑦] 国家控制过多而支持不足[⑧]等是业委会“成立难”的基本原因。大多数学者则是在“业主维权”或“业主自治”的主题下宽泛或附带性论及，归纳下来，主要有如下代表性观点：成立业委会通常是业主维权过程中产生的诉求，这种以维权为指向的业委会在国家看来是“麻烦的制造者”，在物业企业看来是“利益的争夺者”，[⑨] 故而难以成立；在业主自治语境下，业委会成立难根源在于商品房小区这类陌生人社区的自发合作难以达成，小区体量过大、主体众多、社会流动性高是制约集体行动达成的结构性要素。[⑩] 总体而言，学界对业委会“成立难”问题尚缺乏充分的实践感知和理论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媒体报道为主要经验材料，在考察该问题现实表现的基础上，侧重从地方实践层面探析解决的思路和办法。

一、业委会“成立难”的现实表现：四难

成立数量少、比例偏低是业委会“成立难”最为直观的结果表现，那么“成立难”究竟难在何处？在《民法典》颁行前，成立业委会主要根据《物权法》（2007 年）、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2003 年）、住建部 2009 年印发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简称《指导规则》）以及地方的相关规定进行，首次成立业委会的基本流程是：程序启动（业主提出筹备业主大会书面申请，政府组织、指导成立筹备组）→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业主投票选举产生业委会→业委会备案。从地方的实践情况看，这四个环节和步骤都存在不少困

① 1991 年 3 月 22 日，深圳万科天景花园成立“业主管理委员会”，这是内地诞生的首个业委会。建设部 1994 年颁布的《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要求“住宅小区应当成立住宅小区管理委员会”；国务院 2003 年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正式确认业主委员会制度，之后 2007 年颁布的《物权法》、2020 年颁布的《民法典》均予再次确认。

② 罗水元、杨玉红：《申城业委会组建率高达 92.47% 居全国第一》，《新民晚报》2019 年 6 月 23 日第 A04 版。

③ 周松：《深圳住宅区业委会成立率仅 34%》，《深圳晚报》2016 年 4 月 25 日第 A06 版。

④ 成小珍：《“城市建设与管理发展报告”蓝皮书调研业委会成立情况并建议——业委会成立情况纳入部门街道考核》，《信息时报》2018 年 9 月 12 日第 A08 版。

⑤ 吴雪君：《“难产”的业委会》，《工人日报》2019 年 7 月 28 日第 2 版。

⑥ 孙煊哲：《我省业委会成立占比不到一成》，《大河报》2018 年 11 月 14 日第 AI·24 版。

⑦ 厉进伟：《业主委员会“成立难”问题及其破解》，《行政与法》2018 年第 5 期。

⑧ 胡仕林：《元治理视角下业主委员会“成立难”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⑨ 陈鹏：《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野下的业委会研究——以 B 市商品房社区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3 年第 3 期。

⑩ 王德福：《业主自治的困境及其超越》，《求索》2019 年第 3 期。

难和问题。

（一）启动难

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的成立是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成立的第一关，直接关系到后者的程序启动。换言之，筹备组的成立是前提，只有具备了这个前提才能推动余下步骤的进行。根据《指导规则》，区、县房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业主提出筹备业主大会书面申请后60日内，负责组织、指导成立筹备组，并通过筹备组来推动整个进程；筹备组由业主代表、建设单位代表、街道办、乡镇人民政府代表和居委会代表组成，组长由基层政府代表担任，业主代表由基层政府或者居委会组织业主推荐产生并不低于筹备组总人数的一半。

筹备组的成立看似简单，但实践中却有不少的困难和障碍。从业主的角度看，国家法律虽然规定其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委会，但由于“陌生人社区”“工作忙”“搭便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小区管理“尚可”的情况下，业主往往缺乏成立业主组织的意愿和动力，进而在提出筹备申请、推选或参选业主代表等方面难以形成集体行动。从业主外部看，对筹备组的成立增设限制性条件是较为常见的情形，这其中既有地方立法、“红头文件”作出的限制也有操作中的人为限制。比如，对于筹备申请的提出，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已交付的专有部分面积超过建筑物总面积50%时，业主即可提出筹备业主大会申请，且并未对提出申请的业主的数量作出限定，但有些地方附加更严苛的规定，要求“入住率”不得低于50%、业主联名申请比例不得低于10%甚至30%等等。[①] 又如，对于筹备组业主代表的资格、条件等，国家层面并无特别的限制性规定，但实践中却限制颇多。西安某小区第一次推选的筹备组业主代表中，街道办认为其中4名业主拖欠物业费、另外4名未按规定递交推选表从而不具备资格；第二次推选时，街道办又另外增加了一些条件，如要求提交工作单位或公安机关核实后的本人工作简历及遵纪守法情况说明（无犯罪证明）。[②] 上述这些限制性条件，常被业主和社会各界斥为“刁难”，而这些“刁难”使业委会的成立在初始阶段即举步维艰。除增设限制性条件外，启动阶段还存在“找不到指导者”、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躲拖推”、开发商拒绝参与等难题。

（二）筹备难

筹备组成立后，围绕选举产生业委会这个核心目标，需要做很多筹备工作，主要包括：确认业主身份、业主人数以及所拥有的专有部分面积；草拟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确定首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规则；制定业委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和业委会选举办法，确定委员候选人名单；宣传动员业主报名参选和投票。然而，做好这些工作并不容易，困难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一是业主信任度、参与度低。筹备组中的业主代表是筹备工作的主要力量，其开展工作完全是公益性的，没有报酬，很多时候因为没有经费还得垫资。即便如此，业主代表往往还得不到理解、信任甚至会遭到部分业主的质疑，“吃力不讨好”使得业主代表的积极性严重受挫。而一般业主往往由于没有时间、精力或者基于观望、“搭便车”心理而不愿提供个人相关信息、不愿参与宣传动员、不愿参选业委会委员等等，从而导致了业主集体行动的困境。

二是开发商、物业公司不配合甚至阻挠。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委会，需要掌握小区及业主的相关资料信息，以便确认身份、产权面积、投票资格等事宜。但开发商或物业公司大多拒绝提供，而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对此也常常表示无能为力。实践中，筹备组成员索要业主的联系方式及相关个人信息名册时，常被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导致筹备工作“搁浅”。也有貌似“配合”的情况，但提供的业主名册只有业主姓名和建筑面积却没有业主联系方式。除此之外，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以各种手段阻挠宣传成立业委会、恐吓威胁业主代表等行为亦屡见不鲜。

三是业主与居委会、政府之间存在认识分歧。筹备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业委会的成立和运行设定微观操作规则，但业主方与居委会、政府对诸多问题尤其是业委会委员的参选

① 例如《昆明市物业管理办法》（2016）第16条规定：符合成立业主大会条件的物业管理区域，由该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总人数30%以上的业主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成立业主大会的书面申请。

② 余晖：《究竟是谁阻挠业委会成立》，《华商报》2017年5月18日第A4版。

资格问题往往认识不一致，导致业委会成立产生波折、停顿。郑州某小区原定于2018年3月31日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但就在会议召开前一天晚上，社区贴出公告称，业委会候选人中有4名业主被查出不具备入选资格，理由是1名业主被拘留过（因为维权），另外3名业主的房屋产权证上是配偶的名字。首次业主大会被通知取消后，小区业主要求会议延期但未获允许，于是仍按期召开首次业主大会，投票结果为“双过半”，但当业主们申请备案时被拒绝。9月份，业主代表再次申请成立筹备组，而社区10月却通知，这次筹备组25名业主代表均无资格，理由是其中有8位拖欠物管费、17位未按时交纳物管费。①

（三）选举难

业委会由业主投票选举产生，但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即人数、面积“双过半”。“双过半”对商品房住宅小区成立业委会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是对于那些千户以上的小区，征集到足够多的投票“工程量”很大、难度不小。成都某小区从成立筹备组到业委会最终成立，总共号召全体业主进行了3次投票，历时3年。② 由于“双过半”难以达到，实践中出现了“从众规则”（即未参与投票表决的业主被视为同意已参与投票的大多数业主的意见），但该规则存在争议。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认为，《深圳市某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条约定的“从众规则”与《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计票规则相悖而不得适用。③

除“双过半”这个高门槛之外，业委会选举还可能会面对其他一些阻碍和破坏。如成都某小区业委会选举时，七八名自称业主的人冲入会场，将投票箱砸烂，撕毁并抛撒、踩踏选票，而小区物业公司客户经理竟是肇事者之一。④

（四）备案难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委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基层政府予以备案。备案成为业委会成立的最后一关，只有备案成功，业委会才能获得来自政府的“背书”，也才能取得业主的认可与支持。但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确备案的法律性质和效力，实践中相关各方对备案是告知性还是审批性备案、实质性还是形式性审查看法不一。

在备案规则不明、认识不一的情况之下，业委会成功备案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加大，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基于管控思维普遍形成了从严理解执行相关规定的明显实践倾向，不予备案的可采理由广泛涉及启动、筹备、选举各阶段或大或小的程序和实体问题，较为常见的情形是：认为启动阶段未按要求成立筹备组，包括开发商未参与、组长不是政府代表、业主代表无资格等；认为业委会成员的入选资格存在问题，包括产权证名字不是本人而是其配偶、未按时交纳物管费、有违法犯罪前科等；认为选举投票存在问题，包括投票期延长、未达“双过半”、舞弊等。例如，某小区业委会向房管局申请备案时，尽管街道办及居委会均同意“予以备案”，但房管局“不予受理”，理由包括：建设单位未参与筹备组，“未对部分业主候选人资格进行核查认证”（当选委员孙某系服刑释放人员）。⑤ 8600户3万余居民的长沙某小区自2004年分期交付入住，15年间共4次发起成立业委会，其中2018年发起的第4次进展到备案阶段遭遇“卡壳”，官方给出的主要理由是：湖南省规定“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应当自业主大会筹备组成立之日起6个月内召开”，该小区筹备组于2018年7月6日成立、次年1月6日到期后就要自行解散，而筹备组业主代表将原定截至2019年1月6日的投票时间延长至1月31日，违背了前述规定。⑥

在当前业委会成立规则不够明晰、业主对规则知之不多而政府缺乏有效指导参与以及相关利益方不愿配合的情况下，业委会成立过程难免存在诸多不合规、不规范之处。用“显微

① 陈媛媛：《25名业主筹备成立业委会 因未按时交物业费被取消资格》，《河南商报》2018年11月29日第A11版。

② 《二问业委会：这么近、那么远，业委会成立咋这么难?》，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2344479804362235&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2-12-06。

③ 史青玉、陈雯莉：《未参与表决的业主可否“被投票”?》，《晶报》2017年4月1日第A04版。

④ 王春：《业委会选举大会上 物管冲进场撕毁选票500张》，《成都商报》2017年2月6日第4版。

⑤ 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鄂03行终29号］，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访问时间：2022-12-06。

⑥ 袁汝婷、白田田、刘良恒：《15年4次夭折：建个业委会咋这么难》，《半月谈》2019年第8期。

镜”查找问题并严格地与是否备案挂钩，必然使业委会成功备案变得非常困难。除“从严把关”外，“暂缓备案”“暂不予以备案”的拖延策略也是业委会备案难的具体表现。例如，对南京某大厦业委会申请备案事宜，办事处表示备案申请资料齐全，但因业主之间矛盾大、改选过程涉嫌违规，故从妥善解决矛盾角度出发，作出暂缓备案的决定，即现在不予备案。①

二、业委会“成立难”的化解路径：多元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精神病学文献，后被广泛运用于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犯罪学等学科领域，但其内涵众说纷纭、不尽一致。在社会学意义上，一般认为社会支持由主体、客体、内容等要素构成，主体即社会支持的提供者，既包括政府、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正式主体，也包括家庭、邻里、志愿者等非正式主体；客体即社会支持的接受者，通常是弱势或脆弱群体，如病患者、城乡老年人、大学生、妇女、未成年人、下岗失业者等，他们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或摆脱不利处境从而需要外部给予支持帮助；内容即主体根据客体的需要而给予的各种帮助，比如政策支持、物质支持、人才支持、信息支持、服务支持、技术支持、精神支持等等。② 就主旨而言，社会支持理论意在通过构建多主体参与的社会支持机制、网络或系统，以此帮助弱者摆脱困境、获得自我发展。

把社会支持理论应用于分析业委会“成立难”的实践，可以发现背后的基本原因在于：在业委会的成立过程中，陌生、松散、异质性强的业主群体通常是弱者，普遍存在单靠自身难以化解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来就需要外部力量给予帮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是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开发商、物业企业等相关方非但不给予帮助，反而不同程度地在态度、规则、行动上对成立业委会进行排斥和阻碍。概而言之，业主内部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外部的阻碍构成业委会“成立难”的基本原因。因此，实践层面化解业委会“成立难”的基本路径就在于变阻碍为支持，变阻力为推力，构建起助推业委会成立的多元社会支持机制。

（一）强化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综合性支持

业委会成立过程中出现的启动难、筹备难、选举难、备案难，很大程度上正是地方政府（尤其是街道办、乡镇政府）和居委会态度消极、采取排斥和阻碍行动的综合反映。因此，地方政府和居委会是化解业委会“成立难”的关键，应当转变观念认识，强化对业委会成立的行动支持。

就理念层面而言，应当在科学认识业委会制度及其实践的基础上，树立支持业委会成立发展的理念。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业委会制度本身应有的正向治理功能。对业委会制度的认识在深层次上涉及对业主自治、社会自治的认识，王利明指出“社会自治是指市民社会中的成员通过法定或者约定的程序自主决定、管理共同事务，自我负责的一种治理方式，以业主自治、公司自治、行业自治、团体自治等为表现形式”。③ 业主自治的基础在于物权，具有私人属性，理应受到尊重。同时，业主自治对于激发业主参与小区治理、维护业主合法权益、化解邻里和物业矛盾纠纷、降低政府管理社会成本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功能，在政策导向上应给予支持。业委会作为业主自治常态化、组织化进行的重要载体，充分实现业主自治功能必然要支持业委会组织的大量发展。这些理念和认识在《物业管理条例》《物权法》《民法典》等中央立法以及十八大以来党的若干重要会议和文件中均有体现，地方政府自然应当加以贯彻落实。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业委会制度运行实践中出现的负面现象。通常情况下，新建小区交付业主使用后，由于业主集体行动困难等原因，业委会往往不能及时成立，小区长期缺乏业委会成为比较普遍的问题。但当业主发现权益受到损害需要集体维权（如争取公

①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 苏01行终275号］，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访问时间：2022-12-06。

② 相关研究概况可参考：陈成文、潘泽泉：《论社会支持的社会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周林刚、冯建华：《社会支持理论——一个文献的回顾》，《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林顺利、孟亚男：《国内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③ 王利明：《法治与社会自治》，《当代贵州》2015年第9期。

共收益、更换物业公司）时，就会产生成立业委会的诉求和行动，而在此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矛盾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于是出现业委会被“污名化”的现象，认为业委会是“影响稳定的因素”“麻烦的制造者”“不应该存在”等等，进而在态度和行动上阻碍业委会成立成为地方政府较为普遍的选择。这种把业委会制度实践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与其本身应有的正向治理功能混淆起来进而阻碍其发展的认识和做法，实际上颠倒了因果关系，也是鸵鸟心态和因噎废食的体现，应当摒弃。

就行动层面而言，应当积极主动，对成立业委会给予政策、物质、人力、信息、指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支持。一方面，要针对“增量”，建立常态化支持新建小区及时组建业委会的机制。业委会组建得越早，越能发挥监督功能，预防和减少开发商、物业企业侵害业主权益的纠纷。但从实践情况看，依靠业主力量自发性组织推动组建业委会难度很大，需要政府主动引导、积极指导和大力支持。比如新建小区符合业主大会成立条件时，社区居委会、基层政府应宣传引导业主提出成立申请；在接到业主或建设单位成立业主大会的申请后，及时审核、及时组织成立筹备组；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前，对筹备组成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在筹备和投票选举过程中，提供人财物、信息等多方面的支持，指导筹备组成员强力开展宣传动员、“扫楼”等活动；建立基层党政、居委会、业主代表、开发商、物业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及时解决争议、消除阻碍。另一方面，要针对“存量”，动员党政体制内外的资源力量，强力支持无业委会小区普遍组建业委会。目前，很多地方业委会成立比例偏低，大量符合组建条件的小区未能组建业委会。对此，需要采取非常规方法才能加速解决。建议参照上海、武汉等地的做法，以党政主导推动为主要方式，把加强业委会建设作为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专门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和推动，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通过明确责任主体、细化任务分工、安排专项经费、强化监督考核、加强指导协调等措施，力争通过 3 至 5 年实现“应建尽建、全面覆盖”的目标。

（二）强化地方立法机关的规则支持

业委会成立过程中出现的启动难、筹备难、选举难、备案难，固然成因复杂，但很多情况下是业主、政府、相关利益方等在规则供给不足、设定不合理情形下发生认知和行动冲突的结果，反映出地方立法上的不足。业委会成立规则一般包含在物业管理立法之中，但物业管理地方立法数量上尚未全国全部覆盖，质量上问题不少。[①] 以云南省为例，目前尚未出台关于物业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近年也仅有昆明（2016 年）、玉溪（2016 年）、蒙自（2018 年）、丽江（2019 年）、楚雄（2021 年）等少部分地方政府出台物业管理办法；与业委会相关的规定多散见于前述不多的政府关于物业管理的规范中，存在不够全面、过于原则、程序烦琐、门槛过高等问题。总体而言，在当前《民法典》已经施行的情况下，各地应当根据上位法，尽快制定出台或修改物业管理立法，对成立业委会进行全面细致、科学有效的规范。

从各地立法情况看，业委会的成立都要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监督控制，但有些规定的必要性、合理性是存在问题的，应当在科学平衡促进自治与监督控制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例如关于首次成立业主大会的条件和程序，有的地方规定要有 10% 甚至 30% 的业主提出申请，门槛比较高。实际上，这里面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成立条件（已交付业主的专有部分面积达到建筑物总面积 50% 以上），只要符合成立条件，不论多少业主都可以申请启动程序，业主申请数量的多寡与最终能否成功召开业主大会、选出业委会并无直接关联。依笔者所见，只要交付面积过半，开发商或物业企业就应该向政府提出申请；同时业主（不限数量或降低数量要求比如 10 人以上）也可以提出申请。又如，关于筹备组业主代表、业委会委员候选人资格，很多地方都做了限制，比较普遍的是不得有欠缴物业费、违法犯罪记录等情形。应该说，担任代表或委员是业主基于物权而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而非政治权利，立法上不宜轻易剥夺。业主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应当充分尊重大部分业主意思自治的结果。因此，立法所要做的是要求参选人必须公示那些可能影响业主做出决策和判断的信息。另外，一些地方立法将“按时交纳物业费等相关费用”作为参选业委会成员的必要条件，已被全

① 宋伟哲：《物业管理立法的困境与路径》，《城市问题》2020 年第 2 期。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后认为缺乏上位法依据，不符合民法典等上位法的立法原意，不符合法治精神，[①] 有此类规定的地方应当及时废止。再如，最后阶段的备案问题，有的地方立法未作明确规定，操作中实际奉行的是审批性备案、实质性审查，不必要地增加了业委会成立的难度。如前所述，政府从程序启动之初即介入到业委会组建的过程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备案阶段再作实质审查无疑是重复劳动且可能因否定先前的结果而产生争端。因此，在对政府介入业委会成立过程已有制度安排的情形下，应当明确备案的性质只是形式性审查。

（三）强化开发商、物业企业的物质和信息支持

从实践情况看，业委会“成立难”常见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开发商、物业企业的阻挠。本来，业委会的成立可以搭建起业主与开发商、物业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有利于互通意见、提升物业服务质量、预防和化解业主欠费等纠纷，双方是可以友好相处、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的。但有些开发商、物业企业存在侵害业主利益、物业服务质量差等情形，担心业委会成立后“恶行败露”或被“拿钱夺权”、被“炒掉”，故而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显然，在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希望开发商、物业企业主动欢迎、支持业主成立业委会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在业主与开发商、物业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仍较普遍的当下，应当通过明确设定“义务”“责任”的方式强制开发商、物业企业支持成立业委会。

在物质支持方面，一是要提供筹备经费。对于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经费，应当明确由开发商按一定标准承担，并在项目办理竣工验收前向基层政府缴存。对此经费，基层政府应及时催收、保管、审批、拨付并监督筹备组的使用情况。二是要提供工作用房。明确规定业委会工作用房按一定标准从物业服务用房中安排，在筹备成立业委会期间由筹备组使用。

在信息支持方面，一是要提供关于业委会是否具备组建条件的信息。规定业主有权了解业委会是否符合组建条件（已交付业主的专有部分面积达到建筑物总面积 50%），建设单位有义务明确告知；规定业委会符合组建条件时，建设单位应及时主动向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报告，并在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向业主公告。建设单位未履行前述告知、报告、公告义务的，政府应当督促履行并给予处罚。二是要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筹备组成立后，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向其提供物业管理区域证明、房屋及建筑物面积清册、业主名册等文件资料；未提供的，政府应当督促提供并给予处罚。

（四）强化党组织的人力资源支持

住宅小区是基层社会的构成细胞，其业委会的组建和运行对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直接影响。实践中，一些地方针对业委会成立难、运行难问题，把党建引领与小区治理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形成了“红色物业”“红色业委会”模式。“红色物业”“红色业委会”的核心在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嵌入到小区、物业企业、业委会中，这可看作党组织提供的人力资源支持。在红色业委会的成立过程中，这种支持主要体现为鼓励、动员和支持具备业主资格的党员参选筹备组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大力宣传、发动和引导业主积极参与选举投票并支持党组织推荐人员当选。鉴于党组织和党员在业主中通常拥有较高威信和号召力，他们的参与很大程度上能够化解业主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也很有可能确保筹备组业主代表和业委会中多数是党员，而党员占据多数往往能够打消各级党政和领导干部对业委会失控的顾虑，这些都将大幅减少业委会成立过程中的困难和阻碍。更为紧要的是，成立业委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致小区“善治”的手段，党员被认为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模范，由其占多数组成的业委会更有可能促进小区“善治”目标的实现。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在业委会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应从社区或小区治理的全局出发，大力强化党组织的人力资源支持，大量组建红色业委会。为此，既要鼓励居住在小区的党员业主“亮明身份”，主动参选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或者积极参加宣传动员、“扫楼”等活动；也要结合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到社区“双报到”等志愿服务活动，把

① 朱宁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次以民法典为依据作出审查意见 地方立法“不交物业费禁止竞选业委会成员”规定被叫停》，《法治日报》2021 年 5 月 25 日第 5 版。

更多在职党员安排到推动组建业委会的相关工作中。同时，要注重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强化党组织对成立业委会的人力资源支持。这方面，2020 年 3 月出台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可资各地借鉴，该《条例》明确规定：社区党组织推荐是业委会委员候选人产生方式之一，委员候选人名单报社区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引导和支持业主中的党员积极参选、通过法定程序担任业委会委员。

（五）强化经济社会组织的专业和技术支持

业委会的成立有较强的法律性、政策性，程序烦琐，矛盾和争议比较多，客观上需要经济社会组织给予专业支持和技术支持。选举投票是业委会成立的关键，难度最大，对专业和技术支持的需求也最为强烈。相对于《物权法》旧的“双过半”规定“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2021 年起施行的《民法典》第 278 条尽管总体上降低了业委会成立表决通过的门槛（由全体业主“双过半”同意改为参与表决业主“双过半”同意），但同时提高了业主参与表决的要求（由全体业主“双过半”参与改为“双三分之二”参与）。从以往的实践看，受业主参与意识不足、前期宣传动员不充分、挨家挨户“扫楼”不到位、投票不够便利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业主参与投票表决的比例不高本身就是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民法典》施行后，要达到其规定的“双三分之二”参与表决，难度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尤其对于那些千户、万户以上的小区，达到法定要求更是难上加难。业主“双三分之二”参与表决属于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地方性法规予以变更，也不允许以业主规约或者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形式予以变更；同时，以往实践中各地为降低对业主参与的要求出台的一些变通性规定（比如经过通知或公告程序送达仍不参与投票可视为参与并同意或者同意多数），将受到更多的检视。[①] 在此种情况之下，地方层面要化解业委会“成立难”，应围绕提高业主投票参与率和投票结果的真实可信度而努力，除建立完善委托投票制度、楼栋代表制度等配套规则外，要着重从消减组织动员不力、投票不便等障碍入手，强化经济社会组织的专业支持和技术支持。比如，引入公证、律师等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组织选举投票工作，开发建设、推广使用方便、快捷的电子投票系统。实际上，这些方式方法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实践，例如北京某小区依托“北京业主”APP 投票组建业委会，投票率达到 99.1%，从源头上确保了“真业主投真票”且投票过程全程可追溯；[②] 厦门某小区业委会选举采用“互联网 + 公证”模式，通过引入科技公司、公证、律师团队等力量，业主们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便捷参与投票，公证处并全程公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耗时长、错误率高等问题。[③] 对于此类探索，值得其他地方参考、借鉴和推广。

三、延伸思考：从业委会到小区共治与善治

作为社区的微观构成单元，住宅小区是 9 亿多居住在城镇的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小区治理事关群众安居乐业、房产保值增值、基层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带有基础性、全局性的民生和政治问题。但长期以来，小区治理在认识和实践中往往被简单地、偏颇地等同于物业管理或业主自治，从而带来居委会、基层党政要么置身事外要么模糊性存在、选择性参与以及业主组织缺位、物业企业独大等问题。治理主体的这种结构性缺陷，致使小区治理成效不彰、困境重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新建小区的持续增量和大批已建小区进入损耗加速、维修高峰期，物业管理纠纷、更换物业冲突、业主维权事件、物业脱管弃管、维修改造难、违规“住改商”、私搭乱建、“群租”乱象、“执法不进小区”等各类新老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优化小区治理结构迫在眉睫，十分必要。小区治理主要是业主基于私人物权而产生的对建筑物的共同管理，这就决定了业主居于治理的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小区是一个“不完全生活体”，[④] 亦非完全自足、自主的“独立王

① 韩亮：《〈民法典〉业主自治权的理解与适用》，《地方立法研究》2021 年第 2 期。

② 张小英：《真业主投真票 自主决定物业事》，《北京日报》2019 年 4 月 19 日第 1 版。

③ 罗子泓：《同安区陆丰社区首创“互联网 + 公证”成立小区业委会》，《厦门日报》2019 年 10 月 23 日第 A08 版。

④ 王德福：《“社区自治”辨析与反思》，《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

国”，仍然是执政党、政府、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等多方作用的场域。在此意义上，小区治理就整体结构而言是以业主自治为基、为主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显然，要在小区治理中发挥业主自治的主体性作用，常设性业主代表组织——业委会的成立和良性运行就十分关键。然而，吊诡的是业委会制度虽已正式确立并发展了近30年，但制度的实践却存在巨大反差：业委会成立难运行难、良性运行难上加难的困境长期普遍存在。要改变此种状况以促进小区治理结构优化从而走向善治，成立业委会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本文的研究表明，业委会成立难主要难在启动难、筹备难、选举难、备案难，而其背后的症结在于业主内部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外部的各种阻碍。这单靠业主自身力量难以化解，同时也不可能理想化地、消极地“坐等”市民社会发育成熟来解决，而只能着眼于多元共治、依赖社会各方尤其是地方党政的支持和帮助来加以克服。60年前，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其精神内核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很大程度上，成立业委会、促进小区治理也需要这样一个走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我们相信，只要地方党政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善于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真正在态度、规则、行动上支持业委会的成立发展，则“难者亦易矣”！同时，要高度关注实践中以“设立业委会确有困难”为由，退而求其次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通常由基层政府、住建部门、村/居委会、业主、物业服务人等的代表组成）的做法，这种做法容易架空或虚置现行业委会制度、出现物业管理委员会替代业主委员会的倾向，应当严格限制。

此外，有学者认为业委会的建立和运作、更换物业公司、小区治理积极分子的鼓励、物业纠纷化解、物业管理立法等问题导向的研究，虽然能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可行方案，但方法和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似指业主参与小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难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①]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实际上并没有哪种主义、哪种理论、哪种方法能够解决小区治理的根本性问题，“毕其功于一役”或把所有问题“连根拔起”的想法都不太现实。小区治理是实践性活动，从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进而促进实践层面问题的解决和治理的优化，是本文这类问题导向研究的价值所在。可以想见，这类研究越多越深入，小区治理实践中的问题就可能越少越小，“善治”由此而可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小区治理而言，或许“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更为可取。

■责任编辑/张瑞臣

Approaches to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Establishing the Realty Owners' Committe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upport Theory

HU Shi-li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realty owners' committee is an autonomous and standing organization elected by the owners according to the law, which manages the relevant affairs of the community on behalf of the owners, and has a direct an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 numb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alty owners' committees in the urban area have been small, and their establishment generally has difficulties in their start-up, preparation, election, and registration. To a large extent, this situation results from the obstacles incur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residents' committee, the property developer and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enterprise. The practical solutions to the difficulties in establishing the realty owners' committee include the enhancement of the following supports: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 jointly offe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residents' committee, the rule-based support by the local legislatures, the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support by the property developer and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enterprise, the HR support by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by the socio-economic organizations.

Keywords: difficulties in establishing the realty owners' committee; social support; residential community; community governance

① 高伟：《城市住宅小区治理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年，第9页。

海外中资企业公共外交实践的路径、成效与问题的评析

——以越南中资企业为例

毕世鸿[1]，马丹丹[1,2]

［1.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2. 曲靖师范学院，曲靖　655011］

摘　要：企业公共外交能力是衡量“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全球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但也是中资企业在提升跨国经营能力过程中所面临的“短板”。通过分析越南36家中资企业及其1025名越南员工的调研数据后发现，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对公共外交的认识不够深入，本土化经营程度不足、履行社会责任和企业对外传播效果欠佳等问题。越南中资企业亟待加深对公共外交的理解，找到企业经济行为与公共外交实践的最佳契合点，并学会借助新媒体丰富传播方式，强化传播效果，真正发挥中资企业在外维护国家利益、增强整体外交公信力、提升国家国际形象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企业公共外交；越南；海外中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126－12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抬头，作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海外中资企业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中国经济将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许多中国企业更希望跳跃到全新发展阶段。但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形势严峻，不确定因素增加，如何在新形势下“走出去”且“融进去”成为海外中资企业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种常态，海外中资企业如何在扮演好自己经济角色的同时，发挥更多公共外交职能，维护母国的海外利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①]这同样值得思考。现有研究从传播、公共关系、国际关系等多个视角论证跨国企业已成为公共外交中的重要新兴力量。[②]在公共外交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下，跨国企业基于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及跨国属性，通过履行企业社会

收稿日期：2023－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项目号：2022GZZH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建设项目、国家级高端智库与教育部新型智库培育建设（周边外交研究中心）项目、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周边外交研究理论创新高地项目、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项目号：2021Z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毕世鸿，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教授；马丹丹，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www. gov. cn/xinwen/2022－10/25/content_ 5721685. htm，访问时间：2023－4－25。

② 赵世人：《企业公共外交指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王莉丽：《公共外交多元理论与舆论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陈炜：《中国跨国公司公共外交》，广州：广州出版社，2016年；Niels van Willigen，Business Diplomacy from an IR Perspective，Diplomatica，2020：2（1），13－19；Michael B. Goodman，“The role of business in public diplomacy”，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May 1，2006：27（3），5－7.

责任、拓展和维护公共关系等方式在实现自身经营目标和价值诉求的同时，展现出在公共外交领域独特的优越性及不可替代性。因此，如何让海外中资企业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充分发挥其政治、外交功能以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并与沿线国家建立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等议题成为许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重点。[①] 但是在充分论证“如何做”之后，却鲜有研究从东道国的视角审视海外中资企业“做得如何”。据此，本文依据越南实地调研结果及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就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路径与成效进行讨论，并分析企业公共外交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企业在新形势下推进公共外交的方向。

一、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的利益逻辑及实践路径

传统意义上，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为争取他国民心、影响海外受众而采取的各类外交公关活动。[②] 但伴随着全球化演进和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公共外交主体得到扩充和延展，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甚至公众个人都被纳入公共外交的主体之中。至此，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公共外交中非官方参与者虽不能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但可通过多种方式向外国公众或政府多角度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增信释疑，并了解对方观点，[③] 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企业作为资本、知识、技术和人才高度密集的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外交承担者。[④] 对于海外中资企业而言，参与公共外交实践、学习公共外交经验已成为其拓展海外业务的必修课。但从本质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具有全新外交形态的政府行为，而企业所开展活动的背后基本都包含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如何更好地促进上述两者的融合，首先需厘清企业参与公共外交背后的利益逻辑，才能明确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维度与路径。

（一）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的利益逻辑

企业具有“逐利”的本性，而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当企业参与公共外交成为一种事实或趋势时就说明它们之间存在需求的契合。

从企业角度而言，参与公共外交是一种获利行为。第一，公共外交可以帮助企业规避一些非商业性风险。在海外中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因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差异而带来的非商业性风险难以避免，如果仅以商业手段来处理往往适得其反。而即便东道国与中国毗邻且文化相近，依然会出现因语言、管理模式差异导致沟通不畅引发冲突等问题。不仅如此，一些因政治因素所引发的风险，海外中资企业更需调整应对措施与手段。例如因东道国发生内乱、暴恐或政权更迭等事件导致企业利益受损，又或因国家间关系，海外中资企业遭受莫名“审查壁垒”等，对于这些非商业性风险，均需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来规避或应对。

第二，公共外交可以促进企业实现与东道国的“利益共享”，以获得足够的接纳和认可。“共商共建共享”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再加上近年来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法律规范、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识日渐提升，这就对海外中资企业在经营模式、管理方法、观念认知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外界对海外中资企业的看法依旧存在“资源掠夺”“侵占市场”“破坏环境”等负面印象，尽管这些标签有失偏颇，但也说明企业尚未充分考虑到如何更好维护东道国的切身利益。而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可以帮助其获得东道国民众和政府的信任，可为企业提供继续生存的经营氛围、对企业较为公正、客观及友好的舆论环境，从而将“利益共享”落到实处。

从政府角度而言，让企业参与公共外交可弥补政府外交的一些“短板”。第一，企业参

① 柯银斌：《公司外交及其能力提升》，《公共外交季刊》2020 年第 3 期；许永权、王勋：《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走出去”与开展公共外交的思考》，《公共外交季刊》2014 年第 7 期。

②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Defining Public Diplomacy, 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page/what-is-pd, 访问时间：2023-4-19.

③ 赵启正：《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十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年，第 2 页。

④ 钟新、杨爽：《多元主体、多种渠道、多维理念：赵启正与中国的新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2021 年第 3 期。

与公共外交可以增强整体外交的公信力。政府在进行公共外交实践时会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局限或不足。例如对外宣传的方式官方色彩浓厚，宣传主体单一且具有鲜明的“政府行为”；偏向于用较为宏大的叙事风格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实则“不接地气”等。而根据2023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3），政府不被信任的情况在受访的28个国家中较为普遍；[①] 企业则获得最高的信任度评分且是唯一被视为兼具能力与道德的组织。[②] 尽管在调查报告中，中国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但多数西方国家受访者则将中国政府视为“异类”，且该印象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首先是“纠偏”，需要使国际公众相信、接受和支持中国和平发展以及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③] 据此，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不仅可以适当规避政府公共外交的短板，还可大幅增强整体外交的公信力和可信度。

第二，企业参与公共外交可以为国家形象塑造提供更多的辅助与正面投射。对于企业来说，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代表着巨大的生产力。企业不仅会因此收获可观利润，还可获得来自公众的信任、善意。而介于跨国企业的国家属性，公众对企业的印象会汇聚为该国某一行业的印象，进而上升到国家整体印象，再辐射到对这一国家的国民性格、素养的综合判断。[④] 因此，可以说跨国企业的形象与母国国家形象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目前，在“中国制造”的队伍里出现了如华为、小米、格力等一大批代表国家形象的企业，但就整体而言，中国企业为塑造国家形象所提供的辅助和正面投射尚不充分。因此，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通过提升自身的产品、服务质量，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好企业形象，有助于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减少误解。

总之，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是一种合理且必要的选择，不仅“有利可图”也能“有所作为”。基于此，当明确企业与公共外交各自所需时，探讨“怎么做”显得尤为必要。

（二）海外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维度与路径

赵启正曾指出，企业参与公共外交需要解决“如何想”“如何做”及“如何说”的问题。[⑤] 据此，为保证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的可持续性与可操作性，且更好地实现企业与母国利益的双赢，本文从意识、行动、传播三个维度来探究海外中资企业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

其一，培养公共外交意识，外化于行。海外中资企业管理者需要在对外交往及日常管理活动中具备一定的公共外交意识，并将其体现在企业对外交往与日常管理等活动中。因为跨国企业具有跨地域、跨国界、跨民族、跨种族、跨文化等混合性特征和跨国特质。这种混合性特征决定了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企业是一个连接不同地域、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而比政府更加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文化万国宫”。[⑥] 并且，跨国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与不同的人和利益相关方打交道，基于双方所属国籍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各类活动甚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工作交流都可被视为“微型外交”。因此，每一位有机会进行对外交往的海外中资企业员工都应具备一定的公共外交知识，其中包括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法律法规等东道国相关知识，以及外交学、国际关系学、心理学等理论知识。对于海外中资企业来说，这些知识主要用于降低企业在东道国的非市场风险，规避因非市场因素导致资源浪费、利益受损。可以说，对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海外中资企业而言，培养公共外交意识，掌握相关基础知识，是其今后“走稳”“走好”的基本前提。

其二，推进本土化战略，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利益共享。“本土化”是跨国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具有可持续性而采取的淡化母国色彩，适

① 28个国家包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沙特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巴西、印度、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

② The Edelman Firm, 2023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https://www.edelman.com/trust/2023/trust-barometer, 访问时间：2023-4-19.

③ 金新、贾梦茜：《中美公共外交博弈：叙事构建与策略选择》，《国际展望》2021年第6期。

④ 刘君、张胜军：《企业的“公共外交载体”功能》，《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第1期。

⑤ 赵启正：《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十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⑥ 李志永：《企业公共外交的价值、路径与限度——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

应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措施。[①] 衡量本土化的指标主要从资源配置本土化、生产经营本土化、人力资源本土化、技术研发本土化、公共关系本土化等几个方面出发。从本质上来讲，本土化与公共外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一方面，本土化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这与海外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有共同的价值体现。另一方面，本土化提升了中资企业与东道国的相互依存性，前者为后者带来资金、技术，帮助提高就业率、增加税收以及产业升级；后者助力前者实现全球化目标，获得利益，赢得口碑，树立形象。双方在实现利益共享的过程中，必然会加深理解和沟通，提高不同文化之间的兼容性，而这也是企业推行公共外交的核心目标。

除了“本土化”路径，海外中资企业在东道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企业提高海外竞争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高企业“软实力”的必由之路。阿奇 B. 卡罗尔（Archie B. Carroll）等将企业社会责任（CSR）细分为四个部分，并组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在企业责任的金字塔中，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是基础，处于金字塔底部；履行法律责任是更上一层的要求；随后稍高层面的伦理责任，是社会期待企业能以符合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的方式开展工作，尊重消费者、雇员、业主、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在最高层面，则是期望企业履行慈善责任并主动投身社会服务。[②] 在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之下，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道德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期望”，慈善责任则是一种美好“愿景”。对于海外中资企业来说，如果在东道国的活动能达到要求，满足期望，实现愿景，则不仅能加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并能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展现发展合作的有效性，塑造负责任的跨国企业形象，为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搭建沟通的桥梁。[③]

其三，善用各类传播媒介，传播正面形象。媒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构建人类关于世界的认知。[④] 同理，许多东道国民众了解海外中资企业、了解中国，往往都是通过媒体渠道。而在当前高度数字化、信息化和个性化的新形势下，信息传播渠道及传播主体日益多元，除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民众使用一部手机以及一个社交软件就能实现“认识世界”以及“被世界认识”。这一特性对海外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而言可谓双刃剑。一方面，中资企业可以多渠道推销自己，增加曝光度和舆论热度以传播正面形象，增加大众对自身及母国的好感度。而另一方面，当针对中资企业或母国的负面舆论出现时，多渠道、超快速的信息传播也会成为洪水猛兽，导致企业在东道国的活动举步维艰。因此，海外中资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各类传播媒介，主动引导舆论导向，在个体、群体、组织之间建立起正面的信息连接，创造出一个能够发出自己声音、传播自身价值观、具有时效性和影响力的互动空间。[⑤]

二、越南中资企业公共外交的举措及成效

近年来，中越关系继续向纵深发展，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下，两国不断深化政策沟通和战略互动，实现了设施联通成果丰富、资金融通逐步推进、民心相通精彩纷呈的合作局面。[⑥] 基于此，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赴越投资建厂、拓展各类合作项目。但越南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风险，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是必然选择。本文依据前述数据库，详细分析其开展公共外交的举措和成效。

（一）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在受访的 36 家越南中资企业中，企业类型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且工业占了六成（工业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主要以餐饮、零售、娱乐服务、航空服务和金融业为主）。从企业规模上来看，大型企业占比 50%，中小型企业各占 25%；运营时间上，接近九成（87.87%）的企

① 宋东升：《国际化能力提升的核心是本土化能力提升》，《施工企业管理》2022 年第 5 期。

② ［美］阿奇·B. 卡罗尔，安·K. 巴克霍尔茨：《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黄煜平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第 22－26 页。

③ 任欣霖、孔建勋：《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发展合作》，《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④ 王莉丽：《公共外交多元理论与舆论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69 页。

⑤ 孟浈浈、张举玺：《空间转向与符号流动：数字化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建构》，《当代传播》2023 年第 1 期。

⑥ 毕世鸿：《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越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306 页。

业是在 2005 年之后开始在越南经营的，因此大部分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时间并不短，公共外交的效果已初步呈现。另外，越南中资企业类型呈多元化态势，私营企业占比最多（45.46%），其次为国有企业（27.27%），再次为股份合作企业（22.73%）。这样的类型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中资企业被视为中国政府推行对外战略的工具，同时也弱化了其开展公共外交的“政治色彩”。

在受访的 1025 名中资企业越南员工中，从年龄分布上来看，17～25 岁和 26～35 岁这两个年龄段的员工较多，总和占比超过八成。从族群分布来看，京族占比极高（91.99%），其他例如岱依族、傣族、芒族等民族员工较少。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具有中学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九成以上，其中具有中学学历的员工占比七成左右，本科及以上的员工占到三成左右。可见，越南中资企业雇用当地员工的程度很高，员工多为青壮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很明显。但越南员工的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集中在中学阶段，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未来的发展。

（二）越南中资企业公共外交的举措

根据上文的论述，以下将从企业公共外交的意识、行动和传播三个方面论述越南中资企业公共外交的举措。

第一，意识方面，越南中资企业均具备一定的公共外交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越南当地企业高层、当地政府领导均保持一定程度的交往。如表 1 所示，就行业而言，超过八成（80.95%）的工业企业与越南当地的企业高层都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但在与政府相关人员的交往方面，工业企业并未表现出太大热情，超过三成（33.33%）的企业表示没有来往，超过四成（42.86%）表示来往较少。而相比之下，服务业企业无论与同行业高管还是与政府人员都保持较为密切的接触，表示没有与上述两类人员接触的企业均未超过三成。可见，由于行业不同，工业企业与服务业企业的对外交往程度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越南中资企业对外交往、互动的情况难言理想。

表 1 被访者孝道观的描述性分析表 1 越南中资企业与当地企业高层及政府领导的交往情况 单位:%

企业与越南同类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往来情况				
	没有往来	较少往来	有往来	往来频繁
工业	19.05	57.14	19.05	4.76
服务业	7.69	23.08	30.77	38.46
企业与所在地行政长官的往来情况				
	没有往来	较少往来	有往来	往来频繁
工业	33.33	42.86	19.05	4.76
服务业	15.38	30.77	46.15	7.69
企业与越南行业部门的政府领导的往来情况				
	没有往来	较少往来	有往来	往来频繁
工业	33.33	42.86	14.92	9.52
服务业	23.08	23.08	46.15	7.69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其次，企业的公共外交意识还体现在日常的生产管理活动中，例如是否提前了解本地风俗习惯，是否给予不同民族的员工足够尊重等。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主要民族京族、岱依族、傣族和芒族。据调查，绝大部分来自京族、岱依族、傣族和芒族的员工都认为越南中资企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只有极少数京族和傣族员工表示不同意见。这说明中资企业在对越投资之前都相应地了解过当地的风俗习惯，具备一定的公共外交意识，但仍存在一些可提升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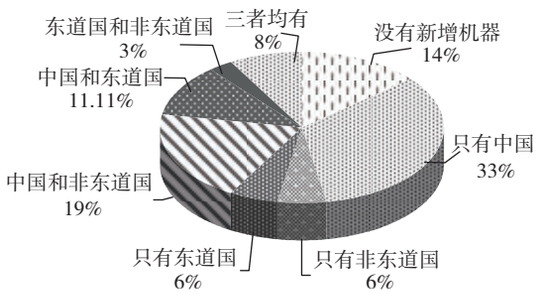
第二，在行动方面，中资企业主要通过本地化经营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开展公共外交实践。本土化程度可以反映出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高低。相互依存的程度越高，说明企业融入当地社会发展的情况越好，进而公共外交实践的效果也就越好。据此，本文对越南中资企业本土化程度的分析主要从供销本土化、生产本土化、人力资源本土化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供销方面，有四成的（40%）的越南中资企业没有越南本土供应商，剩下的企业

虽有本土供应商，但大部分本土供应商的数量在10个以下。相比之下，中资企业对非越南供应商的需求更大，接近八成（77.14%）的企业有非越南供应商，且供应商数量在1～10个的企业数量占到受访企业总数的近一半（48.58%）。在销售商方面，九成的越南中资企业没有越南本土销售商，剩下一成拥有本土销售商的企业，其本土销售商的数量也仅在1～10个。这表明大多数中资企业的销售目的地并不是越南。

其次，生产方面，主要通过对机器设备原产国来分析本地化程度。如图1所示，有三分之一（33.33%）的企业仅使用中国产机器设备；而仅使用越南产及其他国家机器设备的企业只占5.56%。整体来看，使用中国产机器设备的企业较为普遍，超过七成（72.21%）的企业都或多或少使用中国产设备，而越南产机器设备并未受到企业青睐。

最后，在人力资源本土化方面，调研问卷根据员工类型设置不同条件，以便更为全面掌握越南中资企业雇佣越南员工的具体情况。根据表2可见，越南员工的整体占比已超过八成（82.31%），有的企业甚至接近全体员工均为越南籍（98.35%）。但如果根据员工类型来看，过半（53.75%）的越南员工都处于一线或生产岗位，属于管理类和技术类的越南员工占比都未超过一成，分别是3.85%和5.18%。



注：来源国主分为中国、越南（东道国）和其他国家（非东道国）三个选项。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1　越南中资企业固定资产来源国

表2　越南中资企业不同条件下越南员工的占比　　单位:%

	均　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越南员工占比	82.31	13.52	98.35	50.00
中高层管理员工中的越南员工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3.85	5.73	21.66	0.00
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中的越南员工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5.18	13.31	76.92	0.00
非生产员工中的越南员工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14.75	22.79	71.42	0.00
一线员工或生产员工中的越南员工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53.75	38.51	97.47	0.00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通过对越南中资企业本土化的分析可知，企业在供销和生产两方面的本土化程度都不高。相比之下，人力资源本土化程度较高，但大部分越南员工从事的都是一些对学历要求不高的一线生产工作。今后如需进一步提高本土化经营水平，则应重视培养并雇佣更多越南籍中高层管理员工。

除了本土化经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实践路径。本文主要关注社会责任“金字塔”中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伦理责任在社会责任“金字塔”中属于较为抽象的部分，但其核心是企业要主动采纳或制定企业道德规范，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相关利益者（消费者、雇员、生态环境等）的损害，例如改善员工生产生活环境，提高员工收入和福利，创造良好的企业氛围等。因此，通过了解企业员工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及社会保障情况，可略见中资企业在伦理责任方面的履行情况。

通过表3可知，尽管工业企业存在普遍加班的状况，但是工业企业给予员工的福利待遇较为优越，超过八成（81.82%）的企业有员工食堂或者提供午餐，一半的工业企业提供员工宿舍，接近四成（36.36%）的工业企业还建有员工文体活动中心，有超过九成（95.45%）的工业企业经常组织员工聚餐。相比之下，服务业企业加班情况不到五成（46.15%），在食宿方面的待遇也略逊于工业企业，但所有的服务业企业都组织过员工聚餐。而如表4所示，在社会保障方面，中资企业管理人员超过九成（94.74%）享有社会保障，非管理人员的社保情况也接近八成（79.38%）。由此可见，越南中资企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员工的生产生活环境，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落实了企业的伦理责任。

表 3　越南中资企业福利待遇比较　　单位：%

	是否有加班		是否有员工食堂或午餐安排		是否提供员工宿舍		是否有员工文体活动中心		是否与越南员工聚餐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工业	77.27	22.73	81.82	18.18	50.00	50.00	36.36	63.64	95.45	4.55
服务业	46.15	53.85	78.57	21.43	35.71	64.29	14.29	85.71	100.00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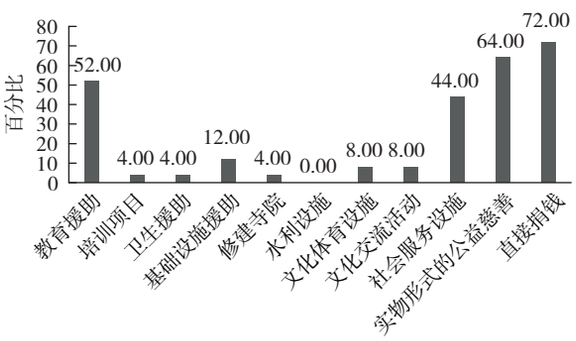
表 4　中资企业越南员工享有社会保障情况

单位：%

是否享有社会保障	管理人员	非管理人员
是	94.74	79.38
否	5.26	20.62
合计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而在慈善责任方面，如图 2 所示，越南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活动是捐钱（72%）及捐物（64%），其次是针对教育（52%）和社会服务设施（44%）的援助，其余涉及改善当地民生的相关项目，除基础设施援助之外，卫生援助、修建寺院、水利设施援助、培训等项目均未超过一成。另外，企业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比例也较低（8%）。可以说，越南中资企业对于慈善责任的履行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还需进一步改进。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 2　越南中资企业开展相关社会责任活动比例

第三，传播方面。在当前互联网 + 大数据的时代，企业如需提升知名度并收获良好的企业形象，必须学会利用各类传播媒介，丰富对外宣传的手段。但越南中资企业未能紧跟时代潮流，利用多种新媒体宣传企业形象，且超过半数的企业依旧保持“闷声做事”的老传统。由图 3 可知，越南中资企业并不重视对企业形象的宣传。“只做不说”的企业超过五成（55.56%），使用新媒体进行企业宣传的占比不到三成（27.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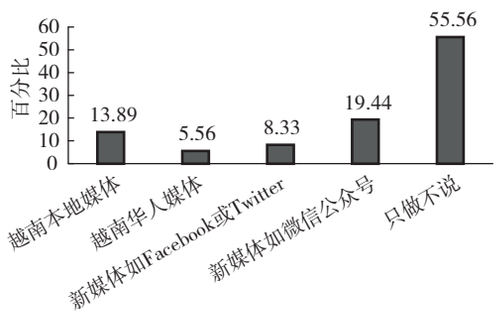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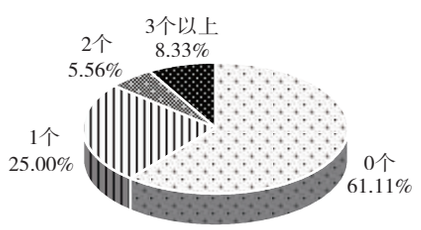


图 3　越南中资企业形象宣传手段对比

而图 4 则进一步说明越南中资企业对于新媒体宣传方式的忽视，有超过六成（61.11%）的企业没有社交媒体公众账号，有四分之一（25%）的企业有一个公众账号，有两个以上公众账号的企业仅占比 13.89%。可见，越南中资企业对企业形象的宣传情况并不理想，“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仍是常态，这不利于企业公共外交的开展与深入。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 4　越南中资企业社交媒体公众账号数量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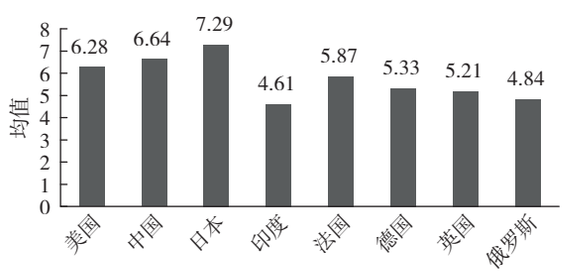
三、越南中资企业公共外交的成效及越南员工的对华认知

通过上述对企业公共外交举措的梳理可知，越南中资企业当前开展公共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越南中资企业的公共外交实践确实取得一定成效，越南员工在中国国家形象、影响力及发展模式等方面均给出较为正面的评价与反馈；但同时越南员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情况及

“中国制造”存在认知偏差，甚至负面认知。

（一）企业公共外交的成效及越南员工对中国的正面认知

一是欢迎中国到越投资，较为认可中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经过调研，有八成左右（88.57%）的越南员工对中资企业在越投资持积极态度。这一正面反馈也体现在对中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认可度上。问卷中将认可度的打分标准设置为1～10分，1分为最不认可，10分为最为认可。如图5所示，越南员工对中资企业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的认可度较高，均值6.64，整体位居第二，仅次于日本企业。这说明海外中资企业近几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取得初步成效，但同时中资企业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在调查中发现，有超过七成的越南中资企业并未建立公益行为准则的规章制度，也未制定年度公益计划，这说明中资企业在具体的指导规范及细节等方面的工作并不到位，而这也许是与日本企业存在认可度差异的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5　各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效果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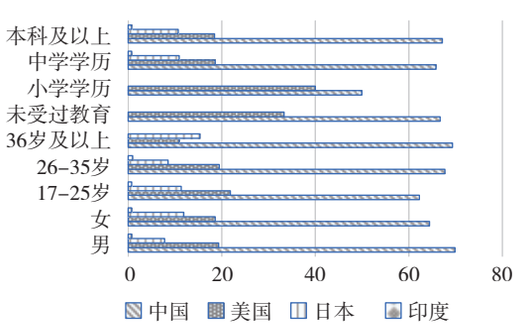
二是中国的国家形象正面积极，被视为当前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海外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最为核心的价值之一便是可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改善东道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调研中，通过对比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德国和英国几个对越投资的重点国家的国家形象，发现越南员工对中国形象的打分均值为6.09（10分最高，1分最低），仅次于日本（7.41）位列第二，美国（5.85）、法国（5.85）、德国（5.24）和英国（5.06）分别位列第三、第五和第六，印度的得分最低为4.27。与此结果相比，据新加坡优素福·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2023年发布的《东南亚态势》调查报告，越南社会精英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较为负面，接近八成（78.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并不会为全球的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稳定提供积极的支持”，而对美国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仅约为两成（19.8%）。[①] 出现上述结果差异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本文所采用的调查结果均来自越南中资企业的越南员工，其回答很可能会考虑当下所处的就业环境。其次，这些员工九成以上为中学及以上学历，而《东南亚态势》的受调对象均为社会精英，受教育程度不同也会导致调查结果的差异。而这一点在下面关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也有所体现。

另外，通过对比图5与表5中的国家排名，可以发现跨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与国家形象的好坏呈正相关，社会责任履行认可度较高的三个国家依次是日本、中国和美国，而国家形象分值的前三名同样是这三个国家；印度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认可度较低，其国家形象的分数也同样位于末位。可见，海外中资企业需更加重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以此提升正面效应。在影响力方面，无论按性别、年龄还是教育程度，越南员工均认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最大，详见图6。

表5　在越投资国家形象打分对比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美国	5.85	2.11	10	2
中国	6.09	1.73	10	2
日本	7.41	2.05	10	3
印度	4.27	1.91	7	1
法国	5.85	2.28	9	2
德国	5.24	2.46	8	1
英国	5.06	2.09	8	1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6　按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划分认为哪个国家影响力最大（单位：%）

①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9 February, 2023, pp. 44 – 52.

三是整体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较为认可，但高学历人群更倾向于日本模式。越南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在发展模式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相互参考和借鉴。如图 6 所示，当问及越南员工越南未来发展需要借鉴的国家时，有四成左右（41.01%）的员工选择中国，其次是日本（33.3%），美国位列第三（14.77%）。另外，相较于印度（0.33%），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国家获得 4.47% 的比例，说明韩国企业在越南具有一定影响力，而印度的存在感最低。

然而，当调查样本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之后，如图 7 所示，选择未来借鉴中国发展模式的比例会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而降低，即员工学历越高，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的认可度反而越低。而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随着员工学历层次的提高，认为应该借鉴学习日本的比例越大。其中比例最高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高达 43.51%，而同样的学历层次选择中国的比例为 31.23%。可见，无论是国家形象还是发展模式，日本都获得越南员工较高的认可。这与日本企业注重企业形象塑造、关注当地民生并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密切相关，值得海外中资企业借鉴。



	中国	日本	美国	印度	其他	韩国
■未受教育	1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小学学历	64.71	17.65	5.88	0.00	5.88	5.88
■中学学历	44.87	29.08	13.95	0.50	5.55	6.05
■本科及以上	31.23	43.51	17.19	0.00	6.67	1.40
■合计	41.05	33.37	14.79	0.33	5.90	4.56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 7　哪个国家应该是越南未来发展需要借鉴的对象

（二）越南员工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及负面认知

第一，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存在认知偏差。结合上文可以看出，越南中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开展了较为丰富且涉及多个领域的活动，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但越南员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例如，越南员工对企业开展文体交流活动的认知度最高（67.02%），但实际上文体活动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中仅占比 8%。类似的认知偏差还出现在培训项目援助、卫生援助，文化体育设施援助等项目上。而对企业较为重视的教育援助的认知情况却并不乐观，表示“有”的比例仅在三成左右（32.39%）。整体而言，造成这样的认识偏差一方面是由于越南中资企业缺乏宣传意识，另一方面表明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需进一步深化，只有了解当地民众真实需求并给予相应帮助，才能避免出现付出真心但对方却“不领情”的情况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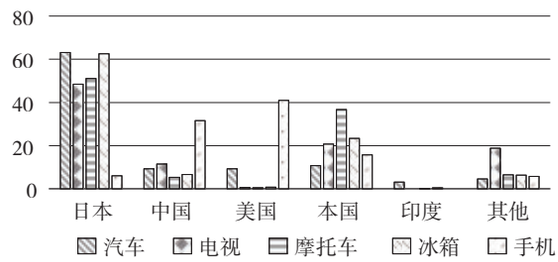
表 6　越南员工对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认知状况

援助项目类别	有	没有	不清楚	企业开展活动比例
教育援助	32.39	34.15	33.46	52.00
培训项目	42.54	33.76	23.70	4.00
卫生援助	51.56	24.71	23.73	4.00
基础设施援助	34.83	31.22	33.95	12.00
修建寺院	14.54	47.41	38.05	4.00
水利设施	22.24	38.15	39.61	0.00
文化体育设施	40.29	30.54	29.17	8.00
文体交流活动	67.02	17.17	15.80	8.00
社会服务设施	30.83	33.76	35.41	44.00
以钱或实物形式进行公益慈善捐赠	59.47	14.94	25.59	64.00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第二，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较低，缺乏对“中国制造”的信任。尽管越南员工受雇于中资企业，甚至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生产中国品牌产

品，但当回归日常生活，员工却并不倾向于选择中国品牌以及“中国制造”。如图 8 所示，越南员工家庭在选择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电视、摩托车和冰箱时都较为一致倾向于日本品牌或日本制造；中国品牌仅在“手机”领域超越日本，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中国品牌及“中国制造”在越南市场的失利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例如一些早期进入越南市场的中资企业，对越消费市场缺乏了解，曾一度以“质差价廉”的商品打入越南市场，导致低廉的“中国制造”逐渐失去越南消费者信任。① 此外，中资企业本地化程度不高，对产品缺乏有效的宣传也是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 8　越南员工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原产国百分比（单位:%）

四、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应对

整体而言，越南中资企业对公共外交的认知和实践并不成熟。尽管企业在本土化经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外传播等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为塑造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其中仍存在认知不足，实践水平相对落后，开展效果甚微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对症下药，及时调整。

（一）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企业公共外交的认知仍停留在企业公共关系层面。维持公共关系是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良好的公共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形象，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扩大产品销量以实现可观利润。而公共外交是公共关系在外交领域的拓展，它建立在公共关系网络基础之上，其终极目标在于国家利益。② 但就越南中资企业而言，其对公共外交的认识仍停留在企业公共关系层面。例如企业偏向于走“上层路线”来维持政企关系。这一点对于越南中资企业来说无可厚非，为避免断水、断电、断网等情况造成利益损失，许多企业会与当地主管部门或官员保持来往，并向其支付非正规费用。但是这也导致企业容易忽视与当地社区、民众建立密切及良好的关系。另外，企业为保证生产效率对员工开展的培训内容主要涉及安全生产与技能培训，而有关企业文化、跨文化交际等促进价值观及文化兼容的培训内容却很少涉及。概言之，越南中资企业尚未认识到企业维护公共关系与开展公共外交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和协同性，也未能让企业的公共关系行为与公共外交实践形成交集。如果今后不设法弥补企业在这方面的缺失，就难以实现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共赢。

第二，企业虽已“走进去”，未能“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大部分越南中资企业尽管已经“出海”多年，但根据调查结果来看，企业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较低，并未真正实现“民心相通”。首先，在本土化方面，越南中资企业虽然雇用大量越南员工，但聘用的岗位多为一线生产岗，中高层管理岗和技术岗中越南员工的占比较小。这其中固然存在越南低成本产业工人资源丰富、技术人员整体水平较低等因素，但企业中缺少本土的中高层次人才并不利于企业进行文化整合，更不利于普通员工建立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另外，越南中资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偏向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且“拿得出手”的慈善公益项目，但却忽视当地民众真正的需要，供给出现脱节。这不仅难以实现“民心相通”，而且不利于企业塑造良好形象和口碑，还可能出现“花钱多，见效少”的情况。

第三，疏于与当地媒体对接，传播意识和能力较弱。媒体作为海外中资企业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也是对外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许多东道国民众认识中国产品、海外中资企业进而希望了解中国都需通过媒体来获取资讯。而且对于大部分东道国民众来说，本国媒体是最直接的信息来源。在调查中也发现有超过

① 杨键：《百年来越南的中国观演变轨迹及动因探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② 赵启正：《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十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年，第 25 页。

五成（57.64%）的越南员工了解中国的渠道来自本国媒体。但是，大多数越南中资企业并不懂得利用媒体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特别是对新媒体的运用尚不充分。海外中资企业放弃形象构建的新空间，这对其品牌宣传及形象塑造极为不利，继而错失在新的传播格局中保持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机会，更难言实现积极的国家形象塑造及文化输出。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国家的本地媒体会因政治、人权等因素有选择地“忽视”对中资企业的正面报道，而热衷于炒作负面新闻，这也许是中资企业疏于与当地媒体对接的原因之一。因此，海外中资企业需要重视积极对接本地媒体开展宣传，也需要善用脸书、推特、优兔、瓦茨艾普、照片墙、抖音、ZALO 等新媒体，可获得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二）海外中资企业推进公共外交的主要方向

其一，中资企业应拓宽对自我角色及功能的认知。基于对利益的追求，海外中资企业对公共关系的经营更具有自发性，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的事，企业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但实际上，企业也可以兼具政治和外交的角色和功能，而这也就是国家领导人出访会安排许多优秀企业家随行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应拓宽对自我角色及功能的认知，寻找到企业公共关系与公共外交的契合点，利用公共关系的资源和经验助力公共外交。当企业能具备成熟的公共关系处理能力时，其不仅能协调与外界的关系，改善自身的境遇，传播正面的企业形象，还能在无形中兼顾实现公共外交的目标，达到企业与国家双赢的效果。另外，当企业通过对外交往收获良好且正面反馈时，外界及企业自身不必纠结这究竟是“商业行为”还是“外交行为”，只要能在客观上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改善舆论环境，都应给予鼓励。

其二，全方位、多角度积极推进“融进去”。海外中资企业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管理、生产和技术上尽快实现本土化。因此，在日常管理中要入乡随俗，重视当地的专业服务，跟当地搭建好桥梁，善于用当地人办当地事，用当地人的方法解决当地的问题；[①] 在生产中适当的技术转移也必不可少，企业要充分信任和使用当地员工及各类资源，充分表现出对当地的信任和依赖，从而让当地员工树立起归属感与荣誉感，让企业获得更多来自当地的认同。另外，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还应立足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拓宽在环境保护、社会慈善等方面的实践，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在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的同时，积极融入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潮流，增加企业在当地的竞争优势。[②]

其三，改变传播策略，扩大传播受众。坚守“酒香不怕巷子深”或“高调做事，低调宣传”这样传统且被动的传播策略似乎是许多海外中资企业的通病。然而，在当前“西强我弱”的全球传播格局之下，不懂得通过各类新媒体主动进行“自我宣传”，忽视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难以让东道国民众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海外中资企业及中国形象。因此，海外中资企业需根据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资讯及文化消费类型，实现专业化、精准化对接，不断借助更多本土化传播平台讲述企业故事。[③] 除此之外，企业对传播受众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消费者”，还应多接触一些本地或国际性媒体、行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尤其要重视与本土优秀企业家、意见领袖等精英人士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与上述各类组织或人士的接触，向对方展现企业最为真实且正面的信息或素材，同时了解对方对本企业及中国的认知，并利用其影响力和公信力消除隔阂、扩大交流、增进合作继而实现互利共赢。

结 论

当前，受大国竞争及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步入重构轨道。越南凭借开放的市场环境、优越的地理区位、相对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① 翁诗杰：《发展中国家要打造本土品牌，中国能不能“扶一把”?》，观察者网：https：//www. guancha. cn/wengshijie/2023_ 05_ 16_ 692490_ s. shtml，访问时间：2023 - 5 - 16，。

② 邹春萌：《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社会责任实践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思想战线》2023 年第 2 期。

③ 李涛：《海外中资企业的国际形象塑造研究——基于“柬埔寨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分析》，《思想战线》2022 年第 4 期。

成为吸引跨国企业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①] 基于此，中资企业出现扎堆投资越南的情况，但其对越投资的风险及不确定性也有不断升级的趋势。例如越南并不满足于成为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洼地，正逐渐提高准入门槛，政策调整频率较高；又如中越虽然毗邻，但文化差异较大，越南员工劳动效率较低且较缺乏稳定性也时常令企业管理者头疼，如果企业忽视对中越文化差异的平衡，强行套用国内管理模式，则可能引发内部矛盾或升级为非必要冲突。因此，无论是面对政策风险还是文化风险，中资企业都需要通过除商业手段之外的措施来为自身发展保驾护航、趋利避害，而积极学习和践行公共外交无疑成为企业的“优选”。

对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中资企业而言，开展公共外交仍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其间虽有收获，但与西方跨国企业相比，在公共外交意识、行动、传播手段以及实践效果上仍存差距。为此，首先，海外中资企业需学会统筹同东道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双方更多的利益交汇点。企业与东道国共处时必须相互尊重，包容差异，均衡发展。[②] 其次，除了海外中资企业自身需要不断学习和努力之外，政府也可在引导、统筹、规划及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撑，以增强海外中资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对周边转型国家的舆情跟踪，第一时间了解对方的舆情变化，针对潜在敏感问题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应对之策；[③] 引领企业加强与社会组织、智库、工商团体及行业协会的合作，按地区、分国别启发企业制定公共外交战略，开展相应的培训并提供经验分享，帮助企业提高对公共外交的重视程度，消解畏难情绪。最后，无论是政府或是企业还应认识到，当前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要求中国需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而公共外交不只是一场公关活动，还涉及建立长期关系、获得更多关注与信任以及关于谁的“故事”会获胜。[④] 因此，海外中资企业全面深化公共外交是一个线性过程，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与恒心，久久为功。

■责任编辑/张瑞臣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Paths, Effects and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Public Diplomatic Practice of Overseas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The Case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Vietnam

BI Shi-hong[1] & MA Dan-dan[1,2]

(1.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2.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655011, China)

Abstract: The capability of the corporate public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measuring the globalization level of overseas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but it is also a “weakness”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ir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capability. After analyzing the survey data of 1, 025 Vietnamese employees in 36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Vietnam,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level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se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here are such problems as an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diplomacy, a dissatisfactory localized management, and a poor performa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is urgently imperative for the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Vietnam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diplomacy, find the convergence point between their economic behavior and public diplomatic practice, and learn to enrich communication methods with the help of new media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so as to truly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safeguard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broad, enhancing the overall diplomatic credi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China.

Keywords: corporate public diplomacy; Vietnam; overseas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世界开放报告2022》课题组：《全球制造业格局加速调整》，《经济日报》2022年11月9日。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06页。

③ 孙云霄：《国际规范转变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④ Joseph S. Nye, Jr,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new-public-diplomacy-2010-02, 访问时间：2023-4-19.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问题与推进对策

阿剑波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摘　要：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指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系统构成要素，顺应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促进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自觉做出相应变革和超越的动态发展过程。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所含之义。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具有特定的生成逻辑，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当前，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在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制度、队伍现代化发展方面面临现实问题。因此，从观念变革、内容鼎新、方法转型、制度完善、队伍造就层面研究探讨问题解决的对策，以培养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时代新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3）05－0138－07

新时代我们党能够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上取得巨大成功，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长时间探究思索，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层面取得的创新突破始终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中国式现代化来之不易，新时代一定要珍惜好坚持好拓展和深化好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是党的“生命线事业”，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向前推进的历史发展逻辑中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题中所含之义。

一、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研究论题不仅遵循着特定的逻辑生成发展理路，而且蕴藏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科学内涵。

（一）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论题生成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论题的理性正名和内涵的科学界定，是研究探讨

收稿日期：2022－03－2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部地区高校思政课质量提升战略研究”（项目号：20SZK10730002）、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项目“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难题与对策研究”（项目号：AFSZ22010）、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难题与策略研究”（项目号：2022J0027）、云南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阿剑波，法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该论题的逻辑起始点。现代化是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过渡转化的过程，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①] 这表明现代化与发展是两个具有非常鲜明区别的概念，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相对性、过渡性、转化性、限度性的理论特征，而发展具有显著的绝对性、过程性、永恒性、无限性的理论特征。

然而，现代化与发展两个概念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现代化发展逐渐得以实现的过程。[②] 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往前推进和拓展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实现自身内生型现代化发展自觉，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培养造就具有高素质强能力的现代人。由此，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术前沿研究论题开始孕育生成并逐渐得以学理确证。

（二）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科学内涵

正如现代化与发展具有显著区别和密切联系，在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与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同样具有明显的区别和联系。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二者可以作为同义词，然而二者仍是内涵和外延有明显区别的不能等同的概念。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现代”转化过渡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因此从范围上看有着特定的限度。而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它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持续向前迈进的过程，没有范围上的限度，是思想政治教育无限向前延伸的过程。

具体而言，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即是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往现代实现转变的这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目前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推进现代化的这个过程是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也就是人的思想品德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要求相适应相契合，进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的发展新阶段。[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④] 从根本上来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正名、提供方向指引、激发内生动力。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中的“中国式”，就是立足于生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来的，并且始终体现着彰显着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要求的质的规定性，既意蕴着各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更彰显着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底色。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科学内涵正是在与其有密切逻辑关联概念内涵的辨析中得到进一步明晰确证的。所谓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指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系统构成要素，顺应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促进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自觉做出相应变革和超越的动态发展过程。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科学内涵，一方面彰显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现代化属性，另一方面展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推进中无限永恒发展的发展目标指向性。因此，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严谨科学的内涵，对其进行研究意义非常重大。

二、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从始至终遵循着找题与解题的基本逻辑思路。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意蕴着

① 张琢、马福云：《发展社会学》（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20页。
② 张琢、马福云：《发展社会学》（增订版），第20页。
③ 阿剑波：《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现实难题与实现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5期。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22页。

丰富的科学内涵，同时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其现实问题的发掘并不是要否定取得的成绩，而是要解决好问题，进一步探究新时代推进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潜在空间和突破方向。

（一）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够

从观念论的角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来自于客观世界，是人脑对客观世界感知产生的能动反映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想要取得怎样的理想目标效果，关键看其中富含着什么样的教育思想观念。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观念是通过移入人的大脑，并且在人的头脑之中进行加工改造之后的物质的东西。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继续向前推进，最难的首先要解决好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最深刻、最缓慢，也最有难度。其难度困境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的相对封闭性和滞后性，也就是观念现代化发展的领域相对狭小、开放程度有待提高，观念现代化发展水平与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要求不相平衡不相适应；也表现在观念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性、保守性和物本化，也就是观念现代化发展方式相对单一、进程相对保守，观念现代化发展中出现过于注重社会外部需要驱动而忽视人本需求的物本化倾向，也存在观念现代化发展中程度方向把握不准的情况。由此，从观念深层领域影响和制约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水平不高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是“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题中所含之义。② 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义和价值诉求。然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存在教育内容与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就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相对迟缓和相对滞后。同时也存在只顾快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而随意增加扩充和发展更新教育内容，忽略教育内容本质规定及其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泛化倾向结果的出现。不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的速度要求多快、范围要求多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处的核心内容地位始终保持不变。然而，新时代促进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的主次失序、主次凌乱、层次分化、层次失范等问题。即使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有一定进展，但存在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的重点核心点以及其先后次序把握不准的情况，从而整体上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水平。

（三）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能力不足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和方法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发生交互作用，推动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的现代化发展层次直接决定了其教育方法的现代化发展水准，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相互依存。黑格尔指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③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教育方法并不能游离于教育内容之外而存在，它是教育内容发挥育人作用的灵魂。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中既存在因过多依赖传统型、经验型方法，而忽视现代科学方法论融入，出现现代化科学型教育方法发展能力不佳的状况；又存在过多重视单向灌输方法，而忽视教育主客体双向交流互动方法层面的现代化发展，互动性方法现代化发展能力不够的状况；也存在只重视某一种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致使各种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合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凸显出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的综合性相对缺乏的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2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220 页。

③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429 页。

端。当前处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各种媒介载体对于教育效果提升的功能更加突显，可当前依旧存在只专注于聚焦于促进单一媒体方法现代化发展的境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媒介载体方法现代化发展不仅相对单一且能力不足。所以当前急需扭转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能力不足的局面。

（四）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进度欠佳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不能缺少有关制度的规约，没有相关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会受到影响阻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不够完善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法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①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存在制度规范健全程度不够和完善能力不佳的难题，约束着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的水准和进度，即使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制度规范，然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规范性程度不够、有效性执行性不足、制度化程度有待提升的现代化发展问题。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离不开领导体制发挥应有作用，然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快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体制亟待完善优化的问题逐渐凸显，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体制弊端和错位难题不断出现。同样也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及要求不相匹配，以及该机制构成要素不能有效协调运转和高效联动运行，亦即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滞后，对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总之，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中制度规范失范、领导体制阻滞、运行机制滞后，不利于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的向前推进。

（五）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效能不强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程度如何，重点看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的进展怎样效能如何，因为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是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只有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得到切实保障，才能更扎实的"保证这支队伍后继有人、源源不断"。②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推进中，存在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素质不够，尤其是存在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综合素养有待提高的问题；存在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的能力水平不足、能力亟待提升，尤其是存在教育队伍运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增强教育效能的能力提升的难题。此外，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存在教育队伍管理理念、方法与手段相对滞后、教育队伍管理水准有待进一步增强的现实困境。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进程中，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更需要解答好队伍如何实现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根本转变的难题，助力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根源上改变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推进中面临教育队伍治理能力不足、治理水平不够、治理效能不强的困难局面，破解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效能不强的难题。

三、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对策

现代化发展研究问题意识和问题指向明确，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推进策略自觉回应现实问题，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探讨：

（一）观念变革：推动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

新时代要高效推进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必须先着眼于解决好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因为只有现代化发展的先进创新观念，才能引领带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其他要素的现代化发展，以培养高标准高素质能力强的时代新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观念，旨在实现推进改变、促进更新或制造出创造出新的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恩格斯指出："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

① 《习近平谈中共的纪律和规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 年 1 月 8 日第 8 版。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80 页。

——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①]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观念均来自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反映，不论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反映。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观念的创新，核心在于创造正确反映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教育观念，破解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服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持续推进，实现时代新人培养目标。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重点在于从深层上推动教育观念的创新变革，关键在于“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②] 培养能够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担负起大任的时代新人。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观念领域首先得到现代化发展，才能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观念基础。推动相对封闭、滞后、单一、保守、物本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实现根本性转换变革，往开放性、发展性、多样性、创造性和人本化的方向实现现代化发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所含的核心之义。详言之，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要在深入明确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什么样观念的人才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出具有开放包容、动态发展、种类多样的观念，对传统的优秀思想政治教育观念进行继承弘扬的同时，不断创新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观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及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观念不动摇。

（二）内容鼎新：确保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借助特定具体的教育内容来展开，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逻辑过程里教育内容自身也必须实现更新发展。恩格斯提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③] 理论思维脱胎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维作为当前培养时代新人的科学理论思维，它由时代孕育而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向前发展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它的形式会存在一些差异，同时它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明显的不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继续往前推进，对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提出现代化发展的诉求，这种诉求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变得更加突显和迫切。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动态变化发展的内容，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相对固定不变的，然而随着新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在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就是要不断革故鼎新出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破解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相对迟缓、泛化倾向和层次失序的困境，实现教育内容向渐进性、主导性和科学性的鼎新转型。详细而言，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对人的思想品德提出的新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到循序渐进地更新完善，使教育内容更加切合新时代发展的期望，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成果，有条理有逻辑有层次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包括“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内容的核心要素，同时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中主导性地位根本不动摇，此外要不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发展的科学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体系发展的有序性科学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水平。

（三）方法转型：促进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选取受制于其内容的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的水准究竟如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④]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往前推进，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年7月13日第1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3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新目标提出了新任务，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的完成，需要解决完成目标任务的方法问题，从根本上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法。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法，并不是要抛弃传统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而是紧密结合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对人才培养新的实际需求，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紧紧聚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科学性缺少、互动性不够、综合性缺乏、媒体数单一的现实问题，加快教育方法往现代化发展向度转型，推进教育方法向科学型、互动型、综合型、多媒体型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转变。具体而言，在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持续向前推进和不断深化拓展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思维养成、科学理论借鉴、科学技术发展成果运用以及科学化水平稳步提升，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二者双向互动方法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加重视“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运用经济、法律、技术、行政和社会管理、舆论监督等各种手段”[①] 方法的协调运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向多样化、协同性、综合型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迈进，自觉利用移动互联网、新媒介、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发展前沿成果，并对网络空间中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进行方向引导，[②]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向多媒体型方向实现现代化发展，通过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进而助力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现。

（四）制度完善：实现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功能作用的发挥，其中不仅需要教育育人柔性作用的发挥，而且需要教育制度刚性作用的有效规约。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制度规范约束对人类实现现代化发展产生的作用日益突显。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培养现代人的重要教育手段，具有柔性教育育人的作用，而作为一种培养特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需要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就是一种制度，对人的意识形态理念的养成发挥着严格的刚性规约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不仅要求而且驱使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向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实现转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③]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要有效落实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制度，还要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着力解答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难题。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制度，从而“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④] 在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往前推进的条件下，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制度，要以问题为导向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制度规范失范、领导体制阻滞、运行机制滞后的现实问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规范、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实现向现代化发展的向度转型。也就是说，通过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构筑起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体系，使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规范实现现代化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的全面领导，不断创新完善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体制，此外要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良性运行中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因果联系以及运转方式的现代化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往现代化发展的向度稳步迈进。总之，要在继承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同时，丰富完善和改进转化相对滞后的制度规范、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现代化发展，培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人才，助力民族复兴目标达成。

---

①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4 页。

② 周宣辰、程倩：《“信息茧房”负效应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探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95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110 页。

（五）队伍造就：推进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现代化发展新理念，最终都要回归到由具体的现实的个人构成的教育队伍来落实执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整体上推进现代化发展，那么教育队伍的现代化发展既是重要保障，又是关键要素。亦即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不仅是教育队伍自身作为系统关键要素实现现代化发展，而且保障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系统要素现代化发展目标得以达成。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背景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要得以顺利实现，务必以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的实现为最基本最基础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要以造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队伍为第一位条件。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依靠力量来源和育人目标旨归的现代化发展，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现力量来源于教育队伍，同时最终目标实现也要助力于教育队伍建设。造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队伍，旨在锻造高素质强能力善治理的现代化发展的教育队伍。

新时代推进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是“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①] 的现代化发展教育队伍的题中之意的基本要求。在准确理解把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中遇到队伍素质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够、队伍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不足以及队伍管理现代化发展水准不高的现实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加快推进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素质、能力及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转型对问题进行有效解答。具体而言，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要从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从整体上全方位提升队伍政治、思想、道德、知识、心理等方面素质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同时促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意识形态宣传能力、运用新媒体工具以及控制和驾驭新媒介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此外，要运用治理的有关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手段，“以多元协调共治的合力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②] 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实际效能，增强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育人实效，培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以及能够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人。

■责任编辑/宋雨桃

Implica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sty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Solution Approaches

A Jian-bo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sty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refers to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various components in the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conforms to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people, and consciously makes corresponding changes and transcendence for promoting this proces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sty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reveals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not only has a specific generative logic, but also contains rich scientific implications. At present, it faces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contents, methods, systems and team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eptual changes, content innovation, method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nd team build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andling strategies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so as to train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new era;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process;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①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页。

② 王学俭、阿剑波：《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路径》，《思想理论教育》2020年第2期。